圣西门选集

第一卷



商务印书馆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圣 西 门 选 集

第 一 卷

王燕生　徐仲年　徐基恩等译

董果良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圣 西 门 选 集

第 一 卷

王燕生 徐仲年 徐基恩等译

董果良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0 1/8 印张 215 千字

1962 年 8 月第 1 版　　1979 年 12 月北京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300 册

统一书号：3017·56　　定价：1.50 元

ŒUVRES
DE
SAINT-SIMON
TOME 1
Réimpression anastaltique
1966

内 容 提 要

昂利·圣西门(1760—1825年)是法国杰出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把他同傅立叶与欧文并列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强烈反对不事生产的封建贵族与军人等级，认为社会应当由实业家和科学家来领导；他还提出了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萌芽的主张。但是由于当时不成熟的历史条件，圣西门的理论也带有重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他主张保留私有制，并且把宣传和平的思想作为实现社会改造的唯一手段上。

本选集旧版系根据俄译本转译的，此次再版时按照1966年法文版《圣西门全集》重新进行了校订，并补译了俄译本中未收集进去的数篇文章。



昂利·圣西门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选集总序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思想家欧文，是十九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著名的代表。他们的学说，总的说来是空想的、无法实现的，但是其中却包含着十分可贵的无数真理的天才预测，他们堪称为自己时代的"真正的文化英雄"(列宁)。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导师们尽管对他们的空想总是严格地批判，但始终对他们怀着极大的敬意，并且教育进步人类特别是工人阶级，要对这份历史遗产，对这些"文化英雄"们的著作"给以特别的注意"。

三大空想家各有自己的特点。圣西门具有天才的慧眼和博学的头脑，他觉察出了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几乎所有思想的萌芽。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特别出色，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每页都放射出讽刺和批判的光芒，揭露了被誉为文明社会的丑恶。欧文的学说和他的活动，具有"实践的性质"。正如恩格斯所说，欧文的共产主义是通过新拉纳克棉纺厂的"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①。欧文主张废除私有制，主张人人都有劳动的平等义务和获得产品的平等权利，他是共产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则与欧文不同，他们是社会主义者②。圣西门"除无产阶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303页。

② 马克思说:"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李嘉图时期，同时也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对派——共产主义(欧文)和社会主义(傅立叶、圣西门)(社会主义还只是处在它的发展的最初阶段)。"见《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第260页。

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恩格斯);傅立叶主张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但在他设计的“法郎吉”中,还保存着一定的私有财产。欧文后期曾接近过工人运动，求助于工人阶级实现其梦想，在英国工人中进行了多年的活动。三大空想家虽然有所不同,但他们是属于同一时代、同一类型的思想家，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十九世纪初期的伟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批判,是三大空想家的著作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因此把他们的学说叫做“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胜利之后,他们就洞察出了这个制度的几乎一切的弊病,虽然他们没能做出科学的结论，却对它进行了机智有力的批判。傅立叶把革命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约言和革命后资产阶级文化奴仆的颂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贫困现实相对照。一方面，揭穿了资产阶级学者的冠冕堂皇的约言、华美词句的空虚;另一方面，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惊人矛盾——文明运行于“罪恶的循环”之中,贫困是由富裕本身所产生。傅立叶描述资本主义是一种“每个人对全体和全体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制度;圣西门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同剥削阶级的极端豪华相反,劳动群众普遍遭受奴役和贫困。傅立叶说,资产阶级文明就是“复活的奴隶制”,雇佣劳动就是奴隶劳动，工厂就是“温和的苦役场所”。欧文用营业会计的数字,说明劳动者阶级手创的宏伟生产力,只替少数人发财致富,而自己反而贫困和被奴役。圣西门尖锐抨击当时的法国政府丝毫不关心改善人民的悲惨境遇。他们

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而且力图找出资本主义罪恶的祸根。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灾难的原因是:“社会有两个值得同样畏惧和仇视的敌人——无政府状态和专横霸道”。傅立叶却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看到了“一切灾难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的分散性或不协调的劳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引起了竞争,竞争中产生“工业封建主义”即垄断。他从无政府状态中推论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他把最初一次危机(1825年)就称为“多血症的危机”,即由过剩而起的危机。欧文更进一步指出,私有制是社会上存在经济不平等、劳动群众受苦和犯罪的原因。他说:“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他们虽然都没有看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性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的矛盾,而这个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但是,欧文已经“猜到了文明世界根本缺陷的存在”(马克思)。另外,傅立叶还特别出色地鞭笞了资本主义的商业。他十分熟悉资本主义商业的内幕,历数其重重罪恶。他指出资本主义商业是撒谎和欺骗的场所,是全体人民的陷阱;商人是一帮抢劫犯、强盗和海寇,“经纪人就是兜售他人谎言并添上自己谎言的人”。他讽刺当时法国盛极一时的商业骗术和小商人习气,达到了令人发噱的程度。傅立叶还精辟地评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性关系和妇女地位问题。他说,妇女是商品,“正象在文法中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交易中也是两个卖淫构成一桩德行”。在每一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标准”。总之,三大空想家的著作,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和科学地研究资本主义的宝贵材料,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第二，在他们那夹杂着晦涩语句和神秘色彩的著作中，天才地预示了一些社会真理，这些真理后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其正确性。例如，他们提出了历史发展有规律的思想。以前法国的启蒙学者，常常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幸运造成的偶然性，而圣西门首先在历史中寻找规律性。他认为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应该成为象自然科学一样严格的科学。圣西门又在论述社会发展阶段时，指出新的社会形式比前一个社会形式是前进了一步。以前，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原始社会是人类的黄金时代，进入私有制社会是人类不自觉的迷误、人性的堕落。他们的理想就是复归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圣西门却把未来社会放在大工业的基础上，看做是社会进一步前进的结果。他说："在盲目的传说中到现在为止看作是属于过去的黄金时代，现在正摆在我们的面前。"又如，他理解到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恩格斯说，这在一八〇二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

在傅立叶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中也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和部分的唯物主义成分。例如，他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表解，说明社会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就是在罪恶中循环的资本主义阶段，也是暂时的灾难。他说："任何社会在它本身即具有孕育下一个社会的能力。当这个社会达到它本身主要特征的高峰时，它也就达到了分娩的阵痛时期。"每个历史时代，都各有其上升线和下降线。并且，他还首先以工业的发展即以经济因素作为说明各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征。恩格斯对傅立叶的社会历史观估价很高，说他的伟大，最显著的表现在这上面。

第三，在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预测和幻想性的描绘中，除了有一些象海水变柠檬汁、行星交配等等的奇谈怪论以外，还有许多积极的结论。例如，圣西门提出了："人人应当劳动"的原则，以有计划有组织的生产代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要求；对人的政治管理，应当变为对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指导，即消灭国家的思想。傅立叶提出了劳动将由痛苦和谋生手段变成人们的乐生要素，以及协作和竞赛的问题。傅立叶和欧文都提出了消灭旧的分工制度和城乡对立的方案，儿童公共教育的要求和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理。欧文及其门徒的合作工厂和合作村社的实验，在实践上证明了没有资本家工人可以进行现代生产、劳动者集体经营大规模农业是可能的。以及其他等等。

尽管他们有许多天才的思想，但是，他们的整个学说却只是一种空想，好象是一面用真理和虚玄的线混合织成的网。他们虽然批判过资本主义，咒骂它，梦想消灭它，但是终未发现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没有找到成为新社会创造者的社会力量。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一切和空无"上面，就是说，他们笼统的向整个社会呼吁，甚至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所以结果一切落空。他们根本不了解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贫苦、屈辱的阶级。他们否定阶级斗争，他们的社会主义是"非政治的社会主义"，"没有斗争的社会主义"，他们没有估计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幻想用社会主义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因此，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他们的学派日益起着阻碍工人运动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的意义是与历史发展进程成反

比例的。这些学说的创始人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而他们的门徒，却成了反动的宗派分子。他们的学说，只是在他们的时代，就是在无产阶级尚未走上独立革命斗争以前，在理论上代表着无产阶级；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已发展起来，当科学社会主义出现以后，空想社会主义就从无产阶级退到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方面，起着反动的或保守的作用。例如，圣西门派关于银行和信用制度的幻想，就受到历史的嘲弄，在拿破仑第三的时代，表现为空前未有的大投机。因此，马克思很感慨地说："圣西门是巴黎交易所的守护天使，是骗子的预言家，是普遍贪污行贿的救世主；除了圣鞠斯特化身为'中庸'之士基佐先生而拿破仑化身为路易·波拿巴以外，历史上再没有更冷酷的讽刺了。"（马克思：《法兰西'动产抵押银行'》）傅立叶派，和圣西门派一样，用各种空想实验的无谓号召，引诱无产阶级离开同资产阶级进行的革命斗争。他们都拚命攻击一切工人政治运动。例如，在法国，傅立叶派攻击和《改革报》联系着的工人政治斗争和工人革命家；在英国，欧文派敌视宪章运动，这些欧文的门徒们对旧制度异常驯服，他们只依靠争取社会舆论，对改变旧制度的其他途径，一概否定。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形成，有其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他们的学说产生于十九世纪初期，这是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英国进行产业革命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英法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随着这种统治而来的，开始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贫富的对立更加尖锐。产业革命造成的巨大生产力的成果，都落到资本家手里，而亲手创造这种生产力的劳动者反受奴役。这就表明，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社

会制度。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和启蒙学者的美好约言相对照，“理性王国”乃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以拯救人类自命的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便出而陈述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和拟定拯救人类的社会主义真理。可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很不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只是开始露头，这就使空想家们不能看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发展规律。同时，无产阶级才刚刚从一般没有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还处在现代无产阶级的萌芽时期，无力进行独立的政治行动，尚未显示出它是创造新社会的力量。既然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尚在不发展的经济关系中隐藏着，空想家们就不得不从头脑中来创造社会主义的真理，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学说不能不陷于空想。总之，当时的社会关系，一方面，虽然没有发展到能够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程度，但另一方面，却已经发展到能够使这些关怀劳苦群众的伟大思想家们猜出这些关系的发展趋向，创造出混合着天才预测和玄虚幻想的社会主义学说。不成熟的理论适应着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正是适应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间的斗争尚未发展的最初时期的状况。这就是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

这种学说的产生，还有其思想根源。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从旧唯物主义学说出发的。尽管他们喜欢向唯心主义甚至宗教频送秋波，但仍不失为旧唯物主义的产儿。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

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他们的学说以旧唯物主义为基础，自然也有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就是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这些创造新社会原理的思想家们，却沿袭着旧时启蒙学者和旧唯物主义者的思想方法。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要为全体人类建立合乎理性或人性的社会。当然他们心目中的“理性王国”是与启蒙学者追求的资产阶级理想化的国家根本不同，在他们看来，合乎理性的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但他们把社会主义同样看作是理性的表现，看作是思想的产物。这种合乎理性的社会所以还没有出现，在他们看来，只是由于真正的理性尚未被天才发现出来，尚未被人们正确认识，而不是因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性的缘故。只有他们才凭借自己的天才头脑，偶然侥幸找到了社会主义真理，制定了合乎理性的社会计划。所以，实现社会主义，就是按照他们的思想去构造现实。他们也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对待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产生看作是无条件的、与人类历史发展无关的事情。他们以抽象的人性为准绳，按照“是——是，否——否”的公式判断社会现象。私有制或者符合人性，或者不符合人性；一夫一妻制家庭或者符合人性，或者不符合人性；等等。他们斥责资本主义制度违背人性，是人类的迷误，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存在和灭亡对于各该历史时期来说都是合理的。由于他们认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就有理由指望，在许多可能有的社会制度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制度更符合人性的制度，空想家们都认为自己找到了这种制度，都拿出了自己的“乌托邦”。

尽管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很不现实，尽管他们的时代已成过去，但是，我们现在来阅读和研究这三位伟大空想社会主义

者的著作，仍然会得到许多好处。第一，可以加深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全部历史痛苦经验的产物。人类只是在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之后，才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又只是在乌托邦荒野上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探索出社会生活的客观法则，从而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从这一方面说，科学社会主义也是已往全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特别是十九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总结。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中，包含有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批判地利用了他们学说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恩格斯说，德国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肩上的。他们的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之一。研究他们的思想，自然会加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第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有一些好东西，我们还可以利用。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全部基础的批判，至今还不失为有价值的思想资料。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种种积极结论，有些已被或者将被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在过去是理应受到嘲笑的幻想，如通过合作社和公社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却日益变成了现实的事物。第三，他们的著作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空想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了解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了解他们走上错误道路的原因，特别是思想方法方面的原因，可以避免重复他们的错误。

只要我们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读他们的著作，只要我们从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以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为指导，那么，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无疑地会得到许多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78 年 12 月

目　次

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 1
生平自述……………………………………………………………28
人类科学概论……………………………………………………42
论万有引力………………………………………………………87
给一个美国人的信…………………………………………… 141
《三个时代》的《序论》和《结论》…………………………… 177
加强实业的政治力量和增加法国的财富的制宪措施………… 185
组织者………………………………………………………… 235
论实业体系…………………………………………………… 250

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①]

第一封信

我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十分积极地观察和思考了一生，而为你们造福则是我生平活动的目的。我想出了一项我认为对你们可能有益的计划，现在我来向你们介绍这项计划。

请你们到牛顿[②]墓前捐献；请你们一律认捐，钱数不拘。

让每个捐献的人提出三个数学家、三个物理学家、三个化学家、三个生理学家、三个文学家、三个画家和三个音乐家的名字。

请你们每年捐献一次，同时进行同样的提名，但允许每个人有连提同一个人的无限自由。

请把捐献的收入分给得票最多的头三名数学家和头三名物理学家，依次类推。

委托"伦敦皇家学会"[③]会长受理今年的捐献。

来年和以后各年，由捐献最多的人担任这一光荣职务。

---

① 这是圣西门的处女作，1802年写于日内瓦，1803年匿名发表于巴黎，没有标明出版的地点和时间。我们翻译所据的原文，载1966年法文版《圣西门全集》第1卷。——译者注

② 圣西门十分崇拜牛顿(Newton, Isaac 1642—1727年)，他在本选集所收的《论万有引力》中，试图以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作为他的世界观的基础。——译者注

③ "伦敦皇家学会"成立于1662年，按其职能来说，相当于现今各国的科学院，主要从事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牛顿从1703年起担任该会会长，直至逝世。——译者注

要求被你们提名的人不从你们的任何集团得到职位、荣誉和金钱，而要使他们绝对可以自由行事，按照自己的愿望发挥自己的才能。

这样，有天才的人将会得到他们应当享有你们值得给予的报酬。这样的报酬将使他们处在尽全力为你们服务的地位。这种地位将成为精力充沛的人向往的目标，使他们离开对你们的安定有害的道路。

最后，你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为致力发展你们的文化的人们选拔领袖；你们要对这些领袖表示极大的尊敬，你们要授予他们以理财的大权。

朋友的意见

您要求我谈谈我对您寄给我的那项计划的看法，我非常乐意来谈，因为计划的作者的纯洁的灵魂打动了细心的读者，他的意向高尚，应该受到任何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的热烈欢迎。最后，计划的作者希望人类幸福，并正致力于这项事业，我对他表示敬爱。

他的思想既新颖，又富于博爱的精神。他认为有天才的人是给全人类——既给统治者又给被统治者照明的火炬，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要求人类根据完全令人信服的公正原则，用集体行动来酬谢有天才的人。他的计划，从另一角度来看也是好的。显而易见，人类用集体行动来酬谢有天才的人的时候，可以使他们不为人类的个别集团的私利服务；如果由这些集团单独来酬谢有天才的人，则会使他们的一部分力量瘫痪。

这项计划将提供迄今未有的最好职位。这些职位可以使有天才的人各得其所，也就是说，可以使他们高于一切人，甚至高于最有权势的人。看到这种职位，有天才的人将会受到鼓舞，得到因其热爱荣誉和工作热心而应给予的奖励；而工作热心，又使他耽于钻研和深思而任劳任怨，养成为在科学和艺术上成名所必需的坚定精神。

有天才的人个人兴趣十分强烈，而对人类的热爱又能促使他们创造奇迹。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这是多么壮丽的事业！这是多么宏伟的目标！人们有没有使自己更接近神的手段呢？在这方面，人们会因自己所经历的艰辛而得到最好的报酬。

拿人类给予有天才的人的这种崇高职位与科学院院士的席位相比较，我发现人类所选出的人的地位要比院士好得多。前者享有完全的独立，可以发挥他的一切才能，不会因任何不相干的思想干扰而停滞不前。没有任何顾虑可以阻止他的天才发展，或妨害他的工作和幸福。为了保持将要获得的地位，他将振作精神，发愤阅读前人的著作，决心超过他们，摈弃陈规，另辟新路。他的激昂情绪将不断高涨，他将达到促进人类理性进步的这个真正的目的。

这就是有天才的人处于独立地位时将要走的道路，而院士之辈却将继续背道而驰。院士之辈将永远坚持自己的成见，认为自己是真理的保护者。如果他改变了观点，他本人也会反对他那自封的一贯正确论。但是，他宁愿继续对其所谓的异端邪说大发雷霆，变得更加偏执，也不肯为了人类的文明和幸福而后退一步。当有天才的人起来反对科学院的意见时，科学院曾经多么疯狂地迫

害他们！请您看一下院士之辈所走的道路，您将看到他们是既高傲而又卑鄙。每当能够启蒙人类的辩论有害于他的自身生存时，他们总是用十分狡猾的手段加以扼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院士终身任职，另一方面是院士依附政府。

考察一下人类理性的发展史，您就可以看到，人类理性的几乎全部杰作，都应当归功于那些独立思考而且常受迫害的人。而当他们成了院士之后，便都差不多安于院士的席位，饱食终日；即使仍在写作，也只是战战兢兢，发表一些没有什么重要价值的真理而已。只有独立精神，才能使有天才的人的两个最强大的动力，即对人类的热爱和对荣誉的渴望得到养料。院士一旦成了奴隶，他们就什么也创造不出来，这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他们虽然已经沦为奴隶，可是仍然相信自己的荣誉很高，唯恐它降下来。正是这种情况妨害他们的提高。

如果我回顾一下科学院的历史，我就可以看到，英国根本没有科学院。只有两个类似科学院组织的学会；而在一些君主国，甚至在那些为迷信和愚昧无知所统治的国家，科学院却多得象蚁群一般。然而，究竟什么国家能够造就出更多的各种各样的伟大人物呢？在什么地方能够发现更多的真理呢？在什么地方可以更大胆地发表这种真理并被人更迅速地接受呢？在什么地方可以对有益发现的创始者给予更优厚的酬劳呢？在这个岛国，由于热爱人身自由和喜欢争鸣成家，因而使它的人民轻视和排斥科学院。一个英国人，作为一个公民时，都意识到自己人格的尊严；作为一个学者时，都将为自己屈从于有权势的人，或者成为有权势的人所庇护的团体的成员而感到羞愧。

专制独裁的黎塞留①建立了法国的第一个科学院。他十分清楚，贪图奖章和院士的席位，可以束缚作家，而政府则可以由此传播有利于自己观点的原则，从而控制舆论，把科学院变成实行其专制政策的隐蔽机关。事实的发展进程，也证实这位权臣的预谋成功了。这第一个科学院，即法国科学院之母，又生出了一百多个其他科学院，但是它们的一切努力，并未能使法国赶上英国。意大利到处都有科学院，但是它的成名学者却屈指可数。在意大利，一些拆烂污的文学团体大量颁发各种荣誉证书，但是人们既没有因此向善，也没有因此变得更加文明。如果意大利把它的所有科学院都撤销，那里的天才或许可以更快地成长起来。

但是，我不能不承认，科学院毕竟还是带来了一些好处，科学院的机构即使不够完善，也给科学和艺术带来了某些益处。我也看到科学院拥有一些精力充沛的院士，然而科学院的体制却远远落后于现代的哲学观点，以致无须把它长期保存下去。如果人类理性的发展更加勇往直前，我认为可以完全消除即使是权威最高的科学院所受的各种束缚。人类不应忽略：他们应当酬谢那些以其知识的火炬为人类服务的人，他们应当集体酬谢这些以其灿烂的光芒普照大地的火炬。

计划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使我感动。有天才的人至今什么障碍都必须克服：他们往往一开始就偏离自己最重要的观点，因为他们不得不为了维持生活而奔波。他们是多么缺乏经验，

① 黎塞留，阿尔芒·让(Richelieu, Armand Jean 1585—1642年)，是路易十三的宰相，法国专制制度的奠基人之一。根据他的倡议，成立了法兰西学院。后来，法兰西学院併入法国科学院，成为法国科学院的五个学院之一。——译者注

缺乏为发展自己的看法所必需的阅历；有多少机会使他们失去了他们能够全面发展工作所需的合作者；有多少宝贵的思想由于得不到支持、鼓舞和报酬的滋养而流产了！

即使某些有天才的人不顾这一切困难，享有了一定的声誉，得到了报酬，但是这些报酬也往往不足以为他们的工作提供充裕的资金，不足以鼓励被他们认为是天资聪敏的青年人，不足以在这些青年缺乏资金时满足他们的需要。只有有天才的人，才能发现天才的幼苗，培育这些幼苗，并且恰如其分地给予他们以必要的援助。

有天才的人所获得的职位或报酬，几乎经常要他履行一定的职责，而履行这些职责，则或多或少地会影响他的工作。这种职位使他们固定在一个地方，从而妨害他去发现能够导致新发现的事物和人物。给他报酬的政府动摇不定，会使他对未来感到担忧，而且经常迫使他为保持自己的职位而到处奔走。即使他未雨绸缪，但由于战争或财政上的某种支绌，也会使他的薪俸中断，或至少延期支付。

最后，工作上需要保持绝对独立的有天才的人，总是要或多或少地依附于给他报酬的政府。他要领会这个政府的意图，服从这个政府奉行的方式和习惯，按别人的指示进行所谓次要的思考，而不能勇敢地射出自己的构思之矢；他要小心翼翼地设计使其思想大放异采的手段，但以远离实际和远非所想而告终。总而言之，他为了取得一点微不足道的报酬，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

至于同意接受统治者或其他任何人的特别恩赐的有天才的人，由于他已堕落到卑躬屈膝的地位，因而处境就更为可悲。

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政府在行政管理各个方面所遵循的思想，则可以看出这一切思想都是由有天才的人所发现的。有天才的人也象开导被统治者一样在开导着统治者。

我同意有天才的人的发现往往不能一开始就得到利用。但是，如果承认他们的发现只对下一代有利，那么这是否就该成为当代人不给他们以任何报酬的理由呢？难道人类还要继续使那些人死后才能受到尊敬，或者至少处于不公正的境遇吗？

如果这方面尚未发生巨大变化，那么认为人类理性已经有了进步，就将是错误的。

在文明国家里，老老少少都从事种植；但在愚昧无知的国家里（比如在土耳其），人们只知道采伐，而丝毫不去种植。矫健的老人种植的树木，给老人带来的快乐大于为了获利而砍伐树木的人。

有什么东西比一个人把他的热情用于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这个唯一目的更为美好和值得尊敬的呢！当功名心认为伟大和光荣只在于获得新知识，并摈弃满足私欲的动机的时候，才是真正幸福的时刻。卑鄙和傲慢的动机，只能满足愚人、武夫、侵略者和人类的掠夺者的贪欲！这种动机将被抛弃而消失！这种迷魂汤再也麻醉不了那些非凡的人物！光荣归于亚历山大们！阿基米得们万岁！

我的朋友，除了同专横作斗争的天才人物呼吁一切博爱主义者援助他的时候，还有什么时候更有利于产生您来信所述的计划呢！在这一斗争开始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间，毫无主见的人将显著减少。您的计划将得到许多人的响应。文明的王国即将出现。凡是善于前瞻后顾的聪明人都相信这一点。

计划中包含一个可以作为一般组织的基础的基本思想。计划也向人类提出一种可以使人类在抽象思维活动方面再顺利提高一步的想法①。

牛顿的陵墓，这个集会的场所恰好就在英国，真是太幸运了！这个国家一直是其他国家遭受迫害的有天才的人士和学者的避难所。

在谈到牛顿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指出，他曾接受政府委派他担任造币厂厂长的职位，以作为对他的酬劳。从此以后，这位世界公民便只是一个英国人了，他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都倾注在他所承担的职务上。于是，这颗自身闪耀过光辉的明星，在群众面前只是一块反射国王光辉的不发光的物体了。

我们可以大胆地议论这件事。一切有天才的人，一旦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就要在现实方面和荣誉方面蒙受损失，因为他们为了履行自己的职务，就得忽视对于全人类比较重要的工作；或者相反，如果他们抑制不住自己才华的迸发，就得轻视自己的公职。

这两种可能性，对于人类、政府和有天才的人本身来说，都是令人不快的。只有让有天才的人担任一个为三者都能效劳的职务，才能避免这两种可能性。必须让有天才的人独立自主，让人类深刻理解这样一条真理：人类要使有天才的人成为火炬，而不要让

---

① 如果圣比埃尔神甫*想出这一办法，并把它作为一种实施的手段，那么他的普遍和平的思想，也就不会被看成是梦想。还要指出一点，这个想法可以解决道德家们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使人处在一个经常能把自己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一致的地位。

* 圣比埃尔（1658—1743年）神甫是一位法国作家，曾在1713年提出一项建立"持久和平"的空想方案，其方法是信奉基督教的各国国王之间缔结一项公约。——译者注

他们为了私人利益而出卖自己。私人利益会降低他们的人格，使他们放弃真正的使命。

有天才的人的人数，并没有多到使他们一放弃自己的专业就得失去工作的地步。计划的作者考虑到大自然对于提供有天才的人是很吝啬的，所以总共对全人类只设计了二十多个职位。既然其中的任何一个职位都必须由有天才的人来担任，所以这些职位也会经常出缺。

我同意每年改选一次，而且可以连选连任。这样，最有天才的人可以终身当选，而能力和他们相近的人也将受到极大的鼓励。

这样的选举方式，将使个人欲望得不到足够的力量去控制共同利益。

我的朋友，这就是我看完您的计划后得到的初步印象。

现在我向您提出两个问题：

这项计划能否被采纳？

如果能被采纳，它能否医治我由于谨慎而一直没有说出口的人类现有的弊端？

复　信

我的朋友，我以寄给您的那个计划的作者的身份，对您所作的亲切畅谈表示谢意。您对计划的赞语，在您精心写出的书面意见中得到了严密而有力的论证，这将对读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希望，这封复信能消除您认为我的计划不能被采纳而向我表示的不安心理。我直接向人类提出这项计划，是因为它同全体人类有关，但我并不奢望人类立即去实现它。我一直认为，成败取决于对人

类有巨大影响的人士在这时所决心采取的比较积极的行动。尽可能全面地阐明这个问题，是争取他们支持的最好方法。这就是我向人类的各个集团呼吁时所抱的目的。我把人类分成三个阶级。第一个阶级，是我和您有幸所在的那个由学者、艺术家和一切有自由思想的人所构成的阶级，它高举着人类理性进步的旗帜前进。第二个阶级的旗子上写着：不进行任何改革！凡是不属于第一个阶级的有财产的人，都属于这个阶级。

第三个阶级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的人们，它包括人类的其余一切成员。

我对第一个阶级说，凡是收到我向人类提出的那个计划的人，一般经过很短时间的讨论，最终都会同意这项计划的。人人都对 ⑶1
我说，他们希望计划能够成功，但又担心计划实现不了。

根据他们所表示的意见的一致性来判断，我觉得好象人人或者至少大多数人都有同样的见解。如果这种预感得到证实，那么反对我的观点的唯一力量将是因循守旧的势力。

学者、艺术家以及你们这些用自己的一部分人力和财力来发展文化的人，是人类中最有智力的成员。你们最能接受新思想，你们与捐献的成败最有直接关系，所以你们应当克服因循守旧的势力。数学家们，因为你们站在最前列，所以请带头行动起来吧！

学者和艺术家们，用你们的慧眼观察一下人类理性的现状吧。你们会发觉舆论的权杖掌握在你们手里，你们要牢牢地保持它！你们能够创造自己的幸福和你们同时代人的幸福，你们能够防止后代不再染上过去使我们受苦和现在仍在使我们受苦的弊端。你们都来签名捐献吧！

其次,我要对第二个阶级的有财产的人讲述下面这样几句话。

先生们:

你们的人数比没有财产的人少得多，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服从你们呢？这是因为你们在文化上占据优势，使你们有能力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而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又使你们在与他们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由于事情的本性所决定，他们和你们之间必然总是有斗争。

这个道理一经指出,那就显然容易看出,把那些以其重大发明证明自己的智慧超群的没有财产的人团结到你们这方面来，对你们是有益处的。同样,你们阶级的利益是共同的,所以你们阶级的每个成员都应该有所贡献,这也是显然可以看得出来的。

先生们,我同学者和艺术家们经常往来,并从内心世界对他们进行过仔细观察。我可以使你们确信，他们在推动你们下决心献出赤诚和金钱;而为了使他们的杰作最受人类的尊重,为了使他们拥有必要的资金来充分研究他们的思想，他们需要你们的赤诚和金钱。先生们，如果我硬叫你们相信学者和艺术家的头脑里明确地有过我跟你们所说的那种想法，那我就在你们面前犯了言过其实的错误。不,先生们,不是这样。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们,他们的头脑里只是极其模糊地有过这种想法。但是经过长期观察，我终于相信这种想法确实存在，以及这种存在对他们的一切观点发生影响。

先生们,只要你们不采纳我提出的措施,你们大家,即你们国家的每个人，就要遭受你们在法国早已存在的那个阶级目前正遭受的那种天灾人祸。为了证实我的话，你们只须回顾一下法国

1789年以后发生的事件的进程就够了。在法国，最初的人民运动是由学者和艺术家暗中发动起来的。当起义因胜利而刚刚取得合法性以后，他们便以起义的领袖自居，为这次起义规定了破坏曾经挫伤他们赤诚的一切制度的方针，而在实施这一方针时一遇到反抗，他们就越发煽动无知的群众，就越发要打碎一切束缚没有财产的人的炽烈热情的枷锁。他们如愿以偿了，他们最初想要推翻的一切制度终于不可避免地崩溃了。总而言之，他们打胜了这一仗，而你们打输了。这个胜利，使胜利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你们这些失败者损失得更惨。有些学者和艺术家，因其军队抗命而牺牲，即被自己部下所杀死。在道德方面，他们不得不忍受你们对他们所作的貌似有理的谴责，你们责难他们是残酷虐待你们、指使他们的军队以愚昧无知的野蛮行为把天下搞得大乱的罪魁祸首。

物极必反，坏事达到了极点，也就有了补救的办法。现在，你们已经不必去进行抵抗；学者和艺术家们也接受了教训，承认你们的文化比没有财产的人高①，愿意把一部分为使社会组织恢复正常活动所需要的权力交给你们。没有财产的人采取的荒谬措施所引起的饥馑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被制服了。

虽然法国人民能够顺应事物的发展趋势强烈地希望恢复秩序，但是他们只有依靠有天才的人，才能重新组织起来而成为一股社会力量。波拿巴担任了这个角色，他获得了成功。

在向你们列举的见解当中，我提到了你们将要失败。如果你

① 我请读者仔细考虑下述的见解：有财产的人所以能够支配没有财产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财产；他们之所以拥有财产和能够支配没有财产的人，是因为从整体而论，他们的文化比没有财产的人高。

们对这一点仍有怀疑，就请你们拿法国学者和艺术家们今天享有的尊敬和福利同他们在1789年以前的情况比较一下。

先生们，请你们不要同这些人争论，因为你们在使他们有机会与你们交锋的一切战斗中都将败北。在实际行动中，你们的损失要比他们大，但和平对你们也不会有利。请你们自愿去作一项工作，以便为自己立功吧！那些与没有财产的人结成同盟的学者、艺术家和有自由思想的人，迟早也会由于形势所迫，而使你们去做这一项工作。你们都来签名捐献吧！这是你们拥有的可以防止我认为正在威胁着你们的灾难的唯一手段。

我们既然谈到这个问题，就要敢于把它讲完；而不观察一下地球上最有教养的一部分人的政治地位，是不能把它彻底解释清楚的。

现在，欧洲各国政府的行动，并没有受到被统治者的任何明显的反抗而陷于混乱。但是根据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社会舆论来判断，不难作出如下的预言：如果不及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这种安宁是不会长久维持下去的，因为先生们不能视而不见人类理性所面临的已经扩及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危机，不能视而不见法国在可怕的激烈动乱年代中所出现的征兆，而这些征兆现在已被机敏的观察家在英国、甚至在德国察觉出来了。

先生们，如果你们采纳了我的计划，就会使这些民族本来要遭受的而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防止的危机变成行政和财政上的简单改革而被消除，使这些民族免遭法国人民所经历的全面动荡。在这种动荡中，同一民族成员之间的一切现存关系变得捉摸不定，而作为一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的无政府主义则肆意制造破坏，

直到它所累及的民族全体陷于贫困为止。这样的动荡，使民族成员中的最愚昧无知的人产生了恢复秩序的愿望。

先生们，如果还需要再提出新的证明，来使你们相信采纳我为你们避免灾难而提出的措施对你们是有利的话，那我就要对你们的智力表示怀疑。

从安慰你们的赤诚这一观点出发，我现在愿意向你们提出我的计划。请你们以人类理性发展进程的调节者自重，你们可以胜任这项职务，因为你们只要签名捐献，使有天才的人受到尊敬和优遇，则这种签名捐献的一个条件规定当选人不得在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就会保证你们和他人不受损失；但是如果把实权交给当选人，则可能产生这种损失。

经验已经证明，作为各种发明的基础的新颖、明智和正确的观点，通常在产生之初就混杂着一些非常谬误的观念。尽管如此，只要发明人还是这项发明的主人，他就能够要求这项发明付诸实施。这只是个别的不利事例，但在这方面也存在着我要加以说明的极其一般的事例。任何一项发明，为了使自己能够被应用，都要求人们具有不同于它出现时所具有的素养。任何一项发明，都是一种被当代采用而使后代受益的财富。目睹这项发明的产生的当代人只应出于爱护后代的心情来采用它，而后代人则有权由此得到好处。

现在，我用以下几句话来结束我不揣冒昧对你们发出的简短呼吁：

先生们，如果你们仍留在第二个阶级，那是你们自己愿意如此，因为你们是使自己升为第一个阶级的主人。

接着，我向第三个阶级呼吁。

我的朋友们：

英国有许多学者。有教养的英国人对于学者的敬重胜过对国王的敬重。在英国，人人会写，会算，会读。请你们注意，我的朋友们！在这个国家中，城市的工人，甚至乡下的工人，每天都能吃到肉。

在俄国，一个学者触犯了皇帝，就要被割耳劓鼻，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在俄国，农民就跟他们的马匹一样愚昧无知。请你们注意，我的朋友们！俄国的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且不断遭到鞭笞。

从古至今，富人只知道指挥你们，而自己却无所事事。现在，你们要迫使他们进行自我教育，也要迫使他们来教导你们。他们强迫你们用双手为他们劳动，你们要叫他们用头脑为你们工作。你们可以为他们服务，使他们摆脱寂寞的重负。他们给你们金钱，而你们对他们报之以尊敬。尊敬是最值钱的货币，最穷苦的人恰好掌握了少许这种货币。你们要很好使用自己所持有的这种货币，你们的命运将会迅速好转。

为了使你们能够判断我的忠告和看到人类在实行我的计划后可能产生的好处，我必须对某些细节加以说明，但只限于我认为必要的地方。

我的朋友们，学者是有预见的人。这是因为科学能提供预见未来的方法，能使科学成为有用的东西，能使学者高于其他一切人。

我们所熟悉的一切现象，被人们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别：天文现

象、物理现象、化学现象和生理现象。凡是献身于科学的人，都在其中的某一方面比其他的人更有研究。

你们熟悉天文学家的某些预测，你们知道他们可以预报日蚀和月蚀，可是对他们所作的其他许多预测，你们并没有注意，我也不打算向你们详谈这些预测。我只想向你们谈一谈这些预测的实际应用，而这些预测的好处是你们都十分清楚的。

地球上各点的相互位置，就是通过天文学家的预测精确地确定出来的。此外，他们的预测也可以指导船只在汪洋大海中航行。你们都很熟悉化学家的某些预言。化学家对你们说，你们可以用这种石头烧出石灰，而用另一种石头则烧不出来。他对你们说，你们用这种木头烧成的某些数量的炭灰漂衣服，比用另一种木头烧成的数量多得多的炭灰漂衣服，能够漂得同样好，同样白。他对你们说，这种物质同另一种物质混合，就能得到具有某一种性状的物质。

生理学家研究有机体的现象。比如，当你们生病的时候，生理学家会对你们说：您今天这里不舒服，而您明天那里又会难受。

请你们不要以为我想叫你们相信学者能够预见一切。不是这样的，他们当然不能预见一切。我甚至认为他们只能准确地预见很少一些事物，但是你们也会和我一样，相信每一个学者在他的专业方面，是能够预见更多的东西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们只有凭借他的预见的正确性才能获得学者的声誉。至少目前的情况是这样，但不是一向如此。这就要求我们回顾一下人类理性的发展。即使我尽了最大努力讲得一清二楚，我也不能完全肯定你们

会一读这份计划就能立刻了解我。不过你们稍加思索以后，是会相信我的解释的。

人们最初连续观察到的现象是天文现象。先从这种现象着手研究是有充足的理由的，因为它们非常简单。在研究天文的最初阶段，人们常把他们所看到的现象同他们所想象的现象混在一起，并由这种简单的错误形成了一套极其美妙的想法，以满足他们所作的预见的一切要求。后来，人们逐渐抛弃了他们依靠想象所虚构出来的事实，并经过很大的努力之后，终于使这门科学走上日臻完善的道路。天文学家只承认经过他们观察所确证的事实，他们选择了能把事实完满地联系起来的体系。从此以后，他们再没有使科学走上邪路。如果再创立一个新的体系，他们要在采用这一体系以前，检查一下它是否能比原来的体系更好地把事实联系起来。如果发现新的事实，他们就用观察的方法来确定这个事实是否真正存在。

我所说的这个人类理性发展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时期，正是天文学家从自己的队伍中把星相家清除出去的时期。我还应当指出另一点，即从这个时期开始，天文学家变得谦逊而善良了，不再不懂装懂，而你们也不再盲目地去央告他们占星问卜了。

化学现象比天文现象复杂，所以人们过了很久以后才开始研究它们。在研究化学的时候，人们也犯过在研究天文学时所犯的错误，但是化学家们终于也同炼金术士分道扬镳。

生理学至今仍处在天文学和化学曾经处过的那种愚昧状态之中。生理学家必须象天文学家清除星相家、化学家清除炼金术士那样，把哲学家、道德家和形而上学家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出

去①。

我的朋友们，我们都是有机体。我在制定我的计划的时候，曾把我们的社会关系比作生理现象。现在，就用我在建立使生理事实之间发生联系的那种体系时所采用的观点，来向你们说明我的计划的善意。

一系列的观察，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希望自己凌驾于其他一切人之上②。但是经过推理，也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凡是不同他人断绝往来的人，在同他人的关系方面都兼有优势和劣势。因此，我建议你们运用你们对富人所占的一小点优势。……但在继续深入讨论以前，我应当向你们分析一个使你们十分不快的问题。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我们的人数比有财产的人多十倍、二十倍甚至一百倍，可是他们施于我们的权势要比我们施于他们的权势大得多。我的朋友们，我知道这使你们十分气

① 我并不是想说哲学家、道德家和形而上学家没有帮助过生理学，而且大家也都清楚，星相家曾对天文学有过贡献，炼金术士曾作出许多化学发现。然而人们都认为，天文学家与星相学家分家，化学家与炼金术士拆伙，都是做得十分正确的。

还有一个想法需要说明：哲学家、道德家和形而上学家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所谓物理现象和精神现象之间存在的关系。当他们在这方面做出成绩的时候，可以把他们的工作称为生理学工作，但是他们也试图用一个一般体系把所观察到的一切事实联系起来。我十分清楚，只要生理学没有进入我在讨论天文学时详细谈过的轨道，这个企图就不可能实现。

我再补充一点：数学本身包括着建立一般体系所使用的唯一材料，即使不能把数学的计算方法用在那些不能用最简单的观点加以概括的现象上，我也不认为根据这个理由，就应该放弃用适当的概括把作为物理学各个部门的理论基础的思想同万有引力思想联系起来的希望。

② 有两条道路可以使人占据优势，其中有一条是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我的目的是颂扬这条道路，而堵塞另一条道路。

愤，可是请你们注意，有财产的人虽然在人数上比你们少得多，但他们的文化却比你们高。为了共同的福利，应当按照文化程度来分配权势。请你们看一看法国的情况，你们的同志在那里进行统治的时候，却给法国造成了饥荒。

现在，再回头来研究我提出的计划。如果你们采纳我的计划并坚持加以实施，那么你们就能经常使二十一个最有文化的人掌握两个最伟大的统治手段：尊重和金钱。结果，将有成千上万条理由可以使科学迅速发展。大家知道，每当科学向前迈进一步，科学研究工作就更容易进行一些。同样，象你们这样的人，只用少量时间从事学习，也能得到更多的知识，而当你们成了有知识的人以后，就能削弱富人对你们所占的优势。我的朋友们，你们很快就会看到丰硕的果实。但是，我不打算花费时间来讨论前进道路的各段细节，因为现在你们尚未下决心要走这条道路。还是让我们来谈谈你们目前存在的问题。

你们要对给你们作出你们认为是有益事情的人表示尊重，即自愿接受他们对你们的一部分统治。你们和一切人所犯的一个共同错误，就是没有十分明确地划清暂时有益的事物和长远有益的事物之间的界限、局部有益的事物和全局有益的事物之间的界限，以及使一部分人损人利己的事物和一部分人提高全人类幸福的事物之间的界限。总之，你们还没有清楚地看到，对全人类来说，只有一种共同利益，那就是科学的进步。

如果贵村的村长使你们占了邻村的便宜，你们就会颂扬他，尊重他。城市的居民，同样也会表现出要控制邻近城市的意图。各地方之间将彼此敌对，而各民族之间则要发生自私自利的斗争，人们

把这种斗争称之为战争①。人类的这一切集团为相互斗争所花费的力量，究竟有多少是以公益为直接的目的呢？实际上，这是很少的，但也不足为奇，因为人类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集体酬谢那些为公益建立功勋的人。要想尽可能把如此不同而又经常对立的一切力量结合成为一个唯一的整体，要想尽可能把这些力量引导到改善人类命运的唯一道路上来。我认为除了我提出的办法以外，再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关于学者就说到这里，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艺术家。

每逢星期日，你们都很喜欢鉴赏。你们兴致勃勃地读着写得很好的书，看着美丽的图画和精致的雕象，或者听着可以引你们入胜的音乐。要想说得或写得使你们感到舒服，要想创造出使你们喜爱的图画或雕象，要想谱出使你们心旷神怡的音乐，就必须付出艰巨的劳动。我的朋友们，对这些提供了使你们在业余可以享受最能发展你们智慧的文娱、从而陶冶了你们的最细腻感情的艺术家们给予酬谢，难道还不公平合理吗？

我的朋友们，你们都来签名捐献吧！即使捐献很少一点钱，也

① 道德家们在谴责人类利己主义和鼓励爱国主义的时候，陷入了自相矛盾，因为爱国主义不外乎是民族利己主义，它会使各民族以不义相待，正象个人利己主义在人与人之间所表现的那样。

关于利己主义的问题，虽然自世界诞生以来就成为争论的对象，而且随后争论得十分热烈，但是对于它的意见仍然众说纷纭。这个问题要得到解决，就在于开辟一条既符合个人利益又符合公共利益的道路。有机体的自保要靠利己主义，而把人类的各种利益结合起来的种种努力也是方向合理的尝试。但道德家们反对把各种利益结合起来，力图消灭利己主义，而他们的这一切想法，却是一系列不难找出原因的错误。道德家们常把空谈看作事实。

人类在原始时代，个人利己主义最强，因为每个人完全没有把他们之间的利益结合起来。

会聚沙成塔，因为你们的人数非常之多。此外，你们对提名当选的人表示的尊重，还会给他们带来不可估计的力量。当这条道路使尊重达到顶峰时，你们就会看到富人们将怎样急于想在科学和艺术方面成名。在富人之间，因为游手好闲，或仅仅因为想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受他们的支配而经常发生争执。他们还常常把你们卷入这种争执中，而你们又常常被这种争执所愚弄。只要你们能够摆脱这种争执，那你们就将取得全胜。

如果你们采纳我的计划，那么还有一件事情要使你们为难，这就是如何进行选举。我的朋友们，我告诉你们我打算如何选举。我要向我认识的所有数学家们征求意见，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各提出三名最优秀的数学家。然后，我再从被推荐的人中间提出三名得票最多的数学家。我也要这样来选出物理学家等。

我的朋友们，我把人类分成三个集团，并对每个集团提出我认为能够促使他们采纳我的计划的理由。然后，我要向我的全体同时代人说明我对法国革命的看法。

取消家庭出身所带来的特权，曾要求人们作出努力来破坏旧制度的各种联系，而又不要因此妨害社会的改造。但是，对全体社会成员发出的经常履行监察职责的呼吁，并没有获得成功。实行把政权交给愚昧无知的人去管理的平等原则①，自然要犯错误，即产生可怕的残酷后果。除此之外，最后还要形成完全不适用的管理形式，因为统治者都是领取薪俸之后才肯管理没有财产的人，而且他们的人数又非常之多，以致被统治者的劳动果实刚刚能够

① 我们同奥伦德·罗德里格的版本一样，删去了一条有关黑人能力的注释。——出版者注

养活他们。这就带来了与没有财产的人的一贯愿望相反的结果，即与少纳税的愿望完全相反的结果。

我认为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人生的第一需要是至为迫切的，没有财产的人的这种需要只能极不充分地得到满足。生理学家清楚地知道，没有财产的人的一贯愿望就是减税，不然提高工资也行。

我认为，如果实行下述制度，社会的一切阶级就可能会安居乐业：精神权力由学者掌握，世俗权力由有财产的人掌握，把选举能够担任人类的伟大领袖职责的权力交给全体人民，把尊重作为付给统治者的工资。

我的朋友，明天再见，我觉得今天已经谈得够多了。

* * *

我不知道这是上帝显圣还是我在作梦，但我觉得确有其事，现在把它告诉你们。

昨天夜里，我听到了这样一番话：

罗马不想再作我的教会的首府，教皇、红衣主教、主教和神甫不再代表我发言，人类对自己委托这样一些没有远见的人来代表我而犯下的渎神罪行感到羞愧。

我曾禁止亚当区别善恶，但他不听我的命令。我把他驱逐出伊甸园，同时给予他的后代以一种使我息怒的方法。这就是要他们认识善恶，从中努力改造自己。这样，我就会改善他们的命运，我把人间变成天堂的日子就会到来。

凡是创立宗教的人都从我这里取得了这种权力，但是他们没有很好了解我的指示。他们都认为我把我的关于神的科学赋予了他们。他们的赤诚指引他们在人生的小节方面分清善恶，却忽略了自己使命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即忽略了创建一种使人类理智沿着捷径无限地接近我的神明的预见的团体。

他们完全忘记了警告我的神职人员：如果这些人员的学识还不如他们属下的教徒，如果他们任凭世俗权力随意统治，我就要收回他们代表我发言的权利。

我告诉你们：我已把牛顿安置在我的身边，我委托他教育和指挥一切星球上的居民。

由人类的二十一名当选人组成的会议，将取名为牛顿会议（总会）。牛顿会议将在地球上代表我，它要把人类分成四个部，分别称为英国部、法国部、德国部和意大利部，每个部各设有自己的会议（分会），其组织的形式与总会相同，每一个人，不管他住在地球上的哪一部分，都要参加其中的一个部，而且都有权选举总会和本部的分会。

妇女可以参加选举，也能当选。

信徒们死后，也将象生前那样享有信徒的荣誉。

分会的理事，非经总会授权，不得开始执行职务。总会决不允许它认为在学识方面没有达到最高水平的人在其当选的部门中任职。

地球上任何部分的居民，不管其地区大小和位于何处，任何时候都可以宣布成立属于某一个分会的支会，并选举自己的牛顿会议的支会。支会的理事，只有经过上级分会授权，才可以开始执行职务。每个分会在总会内驻有常设代表团，而每个支会则在分会内驻有常设代表团。这种代表团由七人组成，每一门专家各选一名代表。

在各级会议里，由一名得票最多的数学家担任主席。

各级会议都分设两个组：第一组由头四类专家组成，第二组由后三类专家组成。第二组单独开会时，由得票最多的文学家主持。

各级会议都要建立一座纪念堂，内设牛顿纪念堂。这个纪念堂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牛顿纪念塚，用艺术家创造出来的各种作品加以点缀；另一部分，要修建和装饰得使人一看就想到这是损害科学和艺术进步的人们将要长眠的场所。

第一组管理纪念塚的内部祭祀工作。

会议的第二组管理纪念塚的外部祭祀工作，它应把这种祭祀组织得庄严隆重。凡是对人类作出的卓越贡献，凡是对传播信仰有特别功劳的事迹，都将得到崇敬，由理事联席会议确定它们应得的荣誉。

凡是住所距离纪念堂不到一日路程的信徒，应每年一次通过特设的入口，到牛顿纪念塚拜谒。

信徒生了子女，要尽快把小孩带到纪念堂去领洗。

凡是不履行这项规定的人，都将被信徒视为本教的敌人。

如果牛顿认为，为了执行我的意旨，必须把前来谒塚的人送到另一个星球上去，那他可以如此处理。

在纪念堂周围，设立若干实验室、若干实习工厂和一个学院。只有纪念堂可以装饰得富丽堂皇，而实验室、实习工厂、学院、理事住宅和各代表团住所，只能建造得简朴适用。图书馆的藏书永远不得超过五百部。

每个理事每年任命五名工作人员：

(1) 一位助理，他在任命他的理事缺席时，有权列席会议和参加辩论；

(2) 一位祭司长，由捐献最多的头五百人中选任，负责组织盛大的祭祀；

(3) 一位在工作上对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作出贡献的人士；

(4) 一位在科学和艺术方面作出有益应用的人士；

(5) 一位值得特别尊敬的人士。

只有经过理事的多数通过，这些任命才能生效。每年任命一次，任期一年，但可连选连任。

各级会议的主席要任命一名圣地保管人，由他管理纪念堂及其附属财产。

圣地保管人也执行警察的职责，同时兼任司库，管理经费的开支，但这一切都要在会议的命令下进行。圣地保管人由捐献最多的一百人中选任，他有权列席会议，他的任命由会议的多数通过才开始生效。

要为理事和他们任命的人员设荣誉章。这种荣誉章，可以根据有权佩带人的志愿，佩在外面或戴在里面。

总会在每个分会设办事机构，轮流到分会去主持会务一年。

拥有最大权力的人将是这个宗教的创始人。作为对他的一种报酬是，他有权参加各级会议和主持它们的工作。他终生享有这项权利，死后葬在牛顿纪念塚内。

一切人都应当劳动，都要把自己看成属于某一工场的工人，这个工场的工作目的，是使人类理智接近我的神明的预见。由牛顿会议总会领导一切工作，它将竭尽全力阐明万有引力定律的作用。这个定律是我支配宇宙的唯一规律。

总会有权增减分会的数目。

各级牛顿会议都要遵守精神权力同世俗权力的分界线。

总会和分会一经选出，战争的灾难便会从欧洲消失，而一去不复返了。

你知道，欧洲人是亚伯的后裔，亚洲和非洲住着该隐的后代。你看，非洲人多么嗜血成性，而亚洲人又多么萎靡不振。这些有罪的人，决不能继续他们的初衷，以努力接近我的神明的预见。欧洲人要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把自己的希腊兄弟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解救出来。这个宗教的创始人将是指挥信徒大军的最高统帅。这支军队将迫使该隐的后代信奉宗教，在全球建立起必要的机构，以保证牛顿会议的理事在进行他们认为有益于发展人类理性的一切旅行中安然无恙。

请睡觉吧！

当我醒来时，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你们刚才读过的一切。

第二封信

上帝对我说：难道有人能够创造出一种凌驾于自古以来的一切宗教之上的宗教吗？这就使我们应该想到，自古以来的宗教没有一个是根据上帝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你们看，上帝向我启示的宗教的戒律多么清楚，这些戒律多么容易执行。每一个人都有义务经常以自己的力量去为人类造福。穷人的双手仍要继续养活富人，但是富人已经受命用脑子工作。如果他们的脑子不能工作，他们就得用双手劳动，因为牛顿当然不会让这个离太阳较近的行星上的工人在工场中有意无所事事。

教会的神职人员不该再有权选举人类的首长，应由所有的信徒选举他们的领袖。被上帝指名代表他的人应当具备的品质，将不是象纯洁和有节制这类微不足道的美德，而应当是才能，并且是最高的才能。

我不想再对这个问题作深入的阐述。一切相信神启的人必然

会相信，只有上帝才能向人类提供促使每个成员都遵守热爱邻人这一戒律的手段。

又及：我本打算写一封信给你们，说明我对宗教的看法。我认为宗教是人类的一大发明，我把它看成是人类进入大同的唯一政治组织。我感到，在我请求你们把统治者放在次要的受尊重的地位①时将会遇到危险。这种危险促使我采用防范的措施：马上向你们传达我要发表的著作中应当包括的一个最主要思想。

假设你们已经知道某个时代的物质分配方式，画出用数字标明宇宙的每一部分的物质数量的宇宙平面图。这样，你们将会清楚地看到：如果把万有引力定律应用在这张平面图上，你们就能以数学知识现在所能达到的精确程度来预见宇宙中将要发生的一切连续不断的变化。

这个假设将使你们的智慧能把一切现象用同一形式表示出来，因为按照宇宙平面图来观察你们自身所占的那一部分空间时，你们就完全见不到你们所说的精神现象同物理现象的差异了。

我对你们所作的这个说明，足以使数学家理解我的思想。

我的亲爱的同时代人，我现在非常高兴：拙著中的最主要部分已经功成圆满，因为我已把它交到你们手里。你们现在有了进入大同的计划，只须稍微改变原有的习惯就可以实现，因为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只要求对通行的观念作某些变动罢了。我已经向学

① 精神权力一旦为学者所掌握，世俗权力便自然而然地降到次要的受尊重的地位*。

* 我们保留了奥伦德·罗德里格版删去的这个注。我们认为，应让读者了解我们为其出版著作的这位有天才的人的思想经过了哪些发展阶段。——出版者注

者阐明我在拟订计划时采取的观点。因此，不管我会遇到什么情况，只要我认为是正确的，你们就能从中得到好处。如果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不能发表我的思想的细节，那么凡是能够清晰地理解万有引力观点的人，或者能够精通生理学知识的人，包括观察人类理性进步的人，只要稍加思考，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补上这些细节。

（陆楼法译）

生平自述①

前言

很多人在考察当今作家的思想之前，都乐于了解他们的个人经历,所以我认为应该将自己的生平简史放在我的著作前面。

第一部分

我于1777年入伍，1779年前往美洲,在德·布伊埃先生和华盛顿麾下服务②。

媾和之后,我向墨西哥总督提出一项沟通两大洋的计划: 开凿一条可以通航的双岔河,使它的一岔注入大西洋,另一岔注入南面的海洋。我的计划受到了冷遇,于是我只好把它放弃。

回到法国后,我被提升为上校,当时我还不满二十三岁。我很快就对自己的无所事事的生活感到厌倦。1785年我到了荷兰。

法国驻荷兰大使德·拉·沃古翁公爵，使这个国家摆脱了英国的影响。他曾建议荷兰的三级会议联合法国组织一支远征军，出征英国属下的印度。德·布伊埃伯爵先生受命统帅这支远征

① 这里所译的两个片断,是圣西门在1808年写的，但与他的学生奥伦德·罗德里格编的1832年版《圣西门全集》所收的原文不同。我们在翻译时删去了附加的引文。原文载1966年法文版《圣西门全集》第1卷。——译者注

② 圣西门在青年时代参加过英国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战争(1775—1783年)。——译者注

军，我在其中得到一个光荣的职位。我继续充实这项计划，但由于德·拉·沃古翁的后任德·维拉克先生的无能，我的计划被搁浅了。

1786年我回到法国，1787年我离开法国前往西班牙。西班牙政府打算开凿一条使马德里通向海洋的运河，但它缺乏人力财力来完成这项计划。

我同西班牙的现任财政大臣卡巴留斯伯爵商妥，我们共同向西班牙政府提出了如下的计划：

如果国王同意将收征运河通行税的权利让与卡巴留斯伯爵先生经营的圣·查理银行，卡巴留斯伯爵将代表银行愿意向政府提供开凿运河所需的资金，而我则出面招募六千名外国人，组成一支外籍军团，其中两千人担任警备任务，其余四千人开凿运河。西班牙政府只担负服装和医疗的费用，这支军团的其余费用将只是工人的工资而已①。

法国大革命爆发，妨碍了这项计划的执行。

1789年底我回到法国后，便热中于金融投机活动。我与一个名叫冯·列德伦的普鲁士伯爵合伙②。

---

① 罗德里格版（第一分册第XVIII页）接着有："这样，西班牙国王用很少的钱，就可建成一条欧洲最宏伟和最有用的运河；他还可以凭空增加兵力六千人，壮大他的国家，而他的臣民必然变为爱好劳动和经营实业的阶级。"——出版者注

② 我们现在看到的圣西门的完整手稿，对这一节有一段简短的发挥。我们在这里读到："在我回到法国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已经开始。我不想参与革命，其理由在我说明我的政治观点时再作详述。* 我热中于金融投机活动。我与一个名叫冯·列德伦的普鲁士伯爵合伙。"——出版者注

* 罗德里格版（第一分册XVIII页）写道："我不想参与革命，因为一方面我确信旧制度已经日薄西山，另一方面我厌恶破坏，而一跟主张取消国民代议制的宫庭政党接近，或与主张推翻王权的革命政党接近，我就只能置身于官场而不得自拔。我的活动转到金融投机方面。我热中于国有财产的投机买卖，我与一个名叫列德伦的普鲁士伯爵合伙。"——出版者注

我追求财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组织巨大的实业机构，创立完善的科学学派的手段①。这就是我向往的真正目的。

我的前程似锦，我的合伙者表现得慷慨大方，他赞同我的计划。

我一直热情奋发、信心十足和一帆风顺地干到1797年。我的投机活动得到了成功，因此我才得以开始实业建设。在布罗阿大街，至今还可以看到我所筹建的工程的始基。冯·列德伦先生重返巴黎，妨碍了我的这项工程。

我同列德伦合伙是一个错误。我以为他也从事与我相同的事业，然而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他一味追求富贵②，而我却要攀登顶峰之上建有荣誉的殿堂的陡峭高山。

1797年，我们——我和列德伦先生发生了争执（我将在一篇个人回忆录中详细阐述争执的缘由③）。我同他断绝关系之后，不久就拟出了关于人类精神的直接行动计划：**使科学迈出一大步和使法国学派发挥首创精神的计划**④。这项创举要求许多准备工作，因此我得从考察人类知识的现状和研究发明的历史着手⑤。

---

① 手稿在这下面是："总之一句话，就是把它当作一种促进文化的提高和人类命运的改善的手段。这就是我向往的真正目的。"——出版者注

② 这句话，在罗德里格版（第XIX页）为："因为他在走向发财致富的欲望拟在其中构筑殿堂的泥泞沼泽，而……"——出版者注

③ 指《圣西门与列德伦的通信》所附《圣西门的初步回忆》，其中谈到列德伦利用圣西门的幼稚轻信，将他们的合伙财产大部分据为己有，只分给圣西门很少一部分。——译者注

④ 这句话，在罗德里格版（第XX页）为："不久就拟出了为人类的理智开辟新的里程——**物理政治学**里程的计划，也就是拟出了使……"——出版者注

⑤ 这句话，在罗德里格版（第XX页）为："因此我得从学习物理科学，考察它的现状，并借助历史的研究来查明丰富这门科学的各项发明的经过着手。"——出版者注

为了做这些准备工作，我没有把研究工作局限在图书馆里①。我搬到巴黎工业大学对面居住，结交了这个大学的几位教授。我花了三年时间去学习无机体物理的现有科学知识②。

1801年，我从巴黎工业大学对面搬走，迁到医科大学附近居住。我同生理学家有了交往。只是当我从他们那里学到有机体物理的一般观点的精确知识后，我才离开了他们。

亚眠和约③使我得以前往英国。我去英国旅行的目的，是想了解英国人有没有发现新的一般观点。我回来时确信，他们现在没有任何重要的新观点。

不久以后，我又到了日内瓦，并游历了德国的一些地方。我从这次旅行中确信，德国的一般科学还处于幼稚状态，因为它仍建立在神秘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但是，在我看到整个德意志民族在这一科学道路上热情奔放地前进时，我又感到它的一般科学的发展

---

① 在这句话后，罗德里格版(第XX页)有："我又重新开始学习，听一些最著名教授讲课。我搬到……"——出版者注

② 罗德里格版（第XXI页）在这段之后，还从圣西门1807年11月2日致上议员布阿希一丹格拉先生的信的第24页和25页中抄录两段。现将这两段转录如下：

"我是用钱购买科学的。我用佳肴和美酒款待教授，对他们解囊相助*，这使我得到我所能想到的一切便利条件。

我有一些严重的困难需要克服。我的脑力已经失去灵敏性，我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但另一方面，我也有很多优点：我到过许多地方，同我所结交和遇到的大批名人经常往来，受过达兰贝尔的指教，这个教育使我得到一套可以概括一切重要事实的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以及其他等等。"

* 在关于同列德伦先生争讼的初步回忆(1812年发表)中，他特别引用了也在经济上遭过厄运的几何学家布阿松的话："在他当上总督、飞黄腾达、不再需要我的资助以前，我一直满足他的一切需要，甚至他的嗜好。"——出版者注

③ 亚眠和约是法国和英国在1802年3月27日签订的，它使法国在同欧洲君主国家的反动联盟的战争中得到暂时的喘息机会。——译者注

是大有希望的①。

我刚才所讲的准备工作使我确信我的科学思想是新颖而且正确之后，我才动笔写了《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②。我把这部著作的头二卷送到经纬度测绘局。由于缺乏资金，我未能继续写下去。我只得选择另一条门路，采取新的写作计划。我将在本文的末尾对这项计划加以详述。

第二部分

在这第二部分，我要谈一谈我以前和现在的经济情况。

我本是著名作家圣西门公爵的最近嫡亲。他的公爵爵位，他的西班牙贵族头衔，他每年享用的五十万里弗③，理应由我继承。但是公爵与我父亲决裂，结果剥夺了我父亲的继承权。

因此，我没有得到圣西门公爵的爵位和财产，却继承了他追求荣誉的欲念。

我父亲在1783年逝世，这并没有使我的经济状况发生任何变

① 在罗德里格版(第XXIII页)，下面的一段是这样开始的："这次旅行回来后，我结了婚。……"同时，罗德里格注释说："圣西门1801年同山格兰小姐，即现在的巴夫尔男爵夫人结婚。"然而，圣西门却说他在1801年从巴黎工业大学对面搬走，迁到巴黎医科大学附近居住。显然，他是在后一幢住所结婚的，并在家里布置了沙龙，招待一些最有名望的学者和艺术家。大家也都知道，亚眠和约是在1802年3月27日签订的，而圣西门却对我们说，这个条约使他得以去英国访问。因此，也显而易见，他是1803年在日内瓦写成他的处女作的。对照这些不同的说法，可以得出结论：他不是在这次旅行回来后结婚的。实际上，圣西门是于法兰西共和国9年热月19日(1801年8月7日)结婚，而于10年收获月5日(1802年6月24日)离婚的。婚后他才去旅行。——出版者注

② 《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在1807—1808年印行。在这里，圣西门没有提到他六年前写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译者注

③ 法国的旧币名称，一里弗等于一法郎。——译者注

化。我母亲供给我金钱，她也出身于圣西门家族。我母亲还健在，但法国大革命已使她破产。因此，我失去了继承财产的一切希望。

我没有从任何人手里继承遗产，我除了劳动收入以外，没有其他财产。

在1790至1797年间，我作投机买卖获利很多。如果不是科学研究工作使我轻视金钱，我早就成了富翁。同我合伙的列德伦伯爵，就钻了我不重视金钱的空子。他一心想发财，而我却追求荣誉。因此，在金钱方面我必然要受他的欺骗，而事实也正是这样。

1798年，我开始从事科学活动，当时我拥有十四万四千里弗。

这只是我从有权得到的收入中预先提取的一笔数字不大的款项，因为我的这项收入光是不动产的租金一项就达十五万里弗。我们的财产由列德伦伯爵管理，他只能从其中取得很小一部分，因为我的实业活动和我所承担的风险对于他获利所起的作用，要比他在我的投机活动中所投下的区区资本大得不可比拟。

有两个理由使我只从我和列德伦伯爵共有的财产中取得十四万四千里弗。

第一个理由是：我虽然确信列德伦伯爵丝毫没有慷慨大方的品质，但是也没有什么事实证明他不忠实。我把他当作朋友看待，并认为在我进行发明考察的旅行期间，把我的财产交给他管理是不会有什么差错的。

第二个理由是：我认为十四万四千里弗足以使我完成我的事业，不等把钱化完，我就能取得一个光荣的学术地位。

我在这两方面的算盘都打错了。

在没有得到应有的光荣学术地位以前，我就把这十四万四千

里弗花得精光，并已证实列德伦伯爵对友人不忠。

三年来，我把钱全部花光。从此(1805年)以后，我的经济情况便十分拮据了。下面就是事实的经过。

我把钱用光了，便去谋职，找赛古尔伯爵先生帮忙。他答应了我的请求，过了六个月，他通知我说，替我在公营当铺找到一个差事。这是一个缮写员的职位，每年薪金一千法郎，每天工作九小时。这个差使我干了六个月，我把自己的著述工作放在晚上进行。我开始咳血，健康状况极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巧遇一位我唯一可以把他称为自己朋友的人。

我遇到了迪亚尔①。从1790年到1797年，我们一直有来往，只是在我同列德伦断绝关系时我们才分手。迪亚尔对我说："老爷，您现在的职位，与您的姓氏和才能不相称。请您搬到我家里去住，您可以随便使用我所有的一切，您愿意怎样工作就怎样工作，您会得到公正的对待的。"我接受了这位正直人的邀请，搬到他那里去住了。我在他家住了两年(1806—1808年)。从那时起，他竭力满足我的一切需要，并花了很多钱来刊印我的著作。相比之下，列德伦伯爵是何等卑鄙②！

…………

我首先印行了两卷本的《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③。后来我

① 迪亚尔是圣西门从前的仆人。——译者注

② 这期间，我曾写信给列德伦伯爵，向他表明我的态度。我通知他说，我想请仲裁法庭调解我们的财产纠纷，我推测他会毫不含糊地拒绝这项要求。但我力促他觉醒：如果他以为我从我委托他管理的不动产的十五万里弗租金中只应得到十四万四千里弗，那是办不到的。列德伦伯爵以两封粗鲁无礼的回信答复我，完全没有同意我的要求。——圣西门

③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他却不提《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出版者注

放弃了这方面的写作活动，因为我发现我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的思想表述清楚。这次写作尝试使我确信，我还没有成熟到把要写的著作表述好和组织好的地步。于是我决定出版书信集①。在书信集里，我分别探讨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只要部分得到解决，我就可以得到建立科学体系的原则。

我印行的书信集，没有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引起普遍的讨论，但是这部著作使我获益非浅：一则是它为我提供了深入思考的机会，二则是它引起了某些愿意向我表示看法的人士的注意。

我的生活每况愈下，但它没有过错，因为我不仅没有跌倒，反而始终斗志昂扬。也就是说，生活中的每一次下降，并没有使我退回到出发点。我一进入创造发明的境界，情绪就高涨起来。我的情绪也时常低落，但是上升的力量总是战胜下降的力量。

我将近五十岁了②，已到了退休养老之年。但是我觉得，我是在经过漫长而艰苦的人生旅程之后，刚刚走上奋发有为的里程，我正处在人生的起点。

我希望公众决不要把对我的品行所作的判断看成是最后结论，我请求人们公正地审查这一判断。关于这个问题，我愿意向公众谈几点我认为值得他们重视的意见。

有人读了在一般科学方面卓有成就的作家的少量作品后，就

① 指《给经纬度测绘局的信》。——出版者注

② 这句话曾使人认为，圣西门是在1810年写下这几行的，但是在1810年满五十岁的人，是可以在1809年说他将近五十岁了的。我们保存的手稿写着的日期是1809年。——我们说圣西门在1760年10月17日生于巴黎。这种误解，是因为有三本介绍圣西门学说的书籍，把生年误记为1760年4月17日而造成的。——出版者注

开始认为他们在私生活方面是智慧和克制的楷模。但是，对事实的论证和检验，说明情况完全相反，证明以表面观察为基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有本质的不同。同一个人不能同时在这两方面都有成就。请看事实：

在近代的名士当中，路德[1]、培根[2]和笛卡儿[3]是一般科学方面最杰出的三个人。

路德攻击了旧的科学体系。

培根提出了建立新的思想体系的方法。

笛卡儿开始了这个体系的建立。

路德说：不是神启而是理性应当成为我们的信仰的基础。

培根提出了建立神启的思想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的思想体系的方法。

笛卡儿宣称：只要给他以物质和运动，他就能创造出一个世界。这就是说，他试图不求助于神启的思想来解释宇宙的结构。

然而，路德过于讲究美食。

培根追求荣华富贵。

笛卡儿嗜好赌博和女人。

可见，这三个人没有一个是实践哲学家。

现在我们来论证。

---

① 路德，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年），著名的宗教改革家，新教（路德派）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译者注

② 培根，弗兰西斯（Bacon, Francis 1561—1626年），杰出的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译者注

③ 笛卡儿，勒内（Descartes, René 1596—1650年），著名的法国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译者注

心情越容易激动，就越能产生更大的热忱。但是，为了全面地探讨重大的科学问题，却需要使激发的热忱达到最高点。因此，认为理论哲学家比任何其他学者更容易受激情支配，这是不足为奇的。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

天文学和生理学这两门科学是哲学的基础。也就是说，研究一般科学的人，应该从大世界和小世界两方面来探讨宇宙。天文学研究大世界，即从大范围研究宇宙现象，而生理学则从小范围研究宇宙，因为考察人类理智现象的最重要哲学方法，是把人脑看成是能够物质地创造宇宙中发生的一切的小机器。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把宇宙看作一个钟，把人看作一块表。尽管它们的体积悬殊，但却是两个相似的机器。

为了加速科学的发展，最伟大、最可贵的方法是对宇宙进行实验，但这不是对大世界，而只是对小世界，即只是对被我们置于实验的人进行试验。

对人进行的一个最重要实验，是在新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然而，只有根据同类实验的结果观察事实后，才能评定实验后产生的新行动是好是坏。但是，并不是所有这样的尝试都能得到理想的结果。因此，献身于研究高级哲学的人，在进行实验的过程中，可能甚至应当做出许多蠢事。

总之，根据事物的本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在哲学上有新的发现，必须：

1）在年轻力壮的时候，过最独特而最积极的生活；

2）钻研一切科学理论，特别是天文学和哲学理论；

3）观察社会上的一切阶级，体验数量繁多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地位，甚至为人和为己创造从未有过的关系；

4）利用自己的晚年，总结对人和对己实验所得的事实的观察，并把这些观察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哲学理论。

人类应对这样生活的人表示崇高的敬意，人类应把他们看成是最有道德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最有系统地、最直接地促进了智慧的真正源泉——科学的进步①。

人们肯定会反驳我说：牛顿八十多岁逝世，终生未娶，他一生仁慈大方，克勤克俭，善于协调各种义务；同时，他也为改善人类命运，繁荣自己的民族，光宗耀祖，富及门第而工作了一生。总之，他所有的只是工作热情，他在各方面都堪称自我节制的典范。

我要这样回答上面这个反驳：牛顿是一位伟大的几何学家和伟大的天文学家，但是他完全没有研究过生理学，从而不能把他视为哲学家，因为我已经说过，一般科学的两根主根是天文学和生理学，应把这两根主根放在一个共同的根基之上，以支承整棵树干。

最好把一般科学比做有两个源头的大江：一个源头丰富了关于无机体的观察的内容，另一个源头充实了关于有机体的说明。

笛卡儿在这条大江中航行，上溯到了两个源头。牛顿只在其中的一个源头度过了一生，他从未下航到大江的远处。这位几何学家完全没有研究过人，他一点也不重视生理现象，他只专心研究无机体和无机体运动的计算方法。牛顿一方面作了重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又阻害了科学的发展。他改进了天文学、光学以及无机体物理的其他部门，但他忽略了物理学的另一个部门，即有机体物

① 应当考虑圣西门对己实验的期间。——出版者注

理，以致使一般科学的研究几乎濒于荒废。

舆论尚未对牛顿作出全面的判断，依然偏爱这位几何学家的发现的积极方面。笛卡儿追求事实，而牛顿则是最精明的猎手，他捉住了所追求的最重要事实并使之降服。这些年轻的美食家坐在宴席上的时候并不知道食橱在哪里，而人类却依靠他们的毫无远见的追猎活动过活。

再回头来谈谈我的生平。我的生活是我的毅力和勇敢的来源，而我的毅力和勇敢的增长要比我的年龄的自然增长快千百倍。我认为，不应按照判断一般人的行为的原则来判断我的行为，因为我迄今为止的生活是一连串实验。

我要用一个实例来说明我认为在下述两个原则之间应当存在的差异：用来判断追求平庸的人生目的的行为的原则，以及用来判断以实验为目的的行为的原则。

如果我看到一个人在动物身上施展他的力量和技巧，而他的唯一的目的是使动物遭受痛苦，那么，即使这个动物是一只苍蝇，我也要说这个人的本性缺乏同情心。我可以断言，他正在走上一定使他变得残酷无情的道路。但是如果我看到一位生理学家用活的动物进行实验，例如将怀胎的母狗剖腹，将健壮有力的公狗肢解等等，那么我将会说：这是一个从事研究工作的人，他的目的是发现使人类安乐生存的有效措施。不幸的毕沙① 以富有同情心出名，杜布阿、鲍阿耶和杜比德朗② 日日夜夜忙于减轻全人类各阶级

① 毕沙，玛丽·弗朗斯瓦(Bichat,Marie François 1771—1802 年)，法国的生理学家，解剖学家，近代的组织学和病理组织学的创始人，只享年 31 岁。——译者注

② 杜布阿、鲍阿耶和杜比德朗三人均是法国的著名外科医生。——译者注

的痛苦。

如果我看到一个不研究一般科学的人常到赌场和妓院去，跟公认没有道德的人打交道而毫不检点，那么我就要说：这是一个快要死亡的人，他所养成的习惯眼看着在败坏他自己的声誉，最后他将变成一个最为人所不齿的人。但是，如果这个人正专心研究理论哲学，如果他的研究目的是确定人的善行和恶行并规定两者的分界线，如果他在寻找一种良药来治好使人们远离幸福道路的理智疾病，那么我就要说：这个人虽置身于混浊世界，但其前进的方向必然使他成为一个情操高尚的人。

我要竭尽全力，尽可能精确地了解不同社会阶级的风尚和观点。我寻求和抓住一切机会与性格不同和道德各异的人士往来。虽然这种寻求在舆论界使我蒙受很大损失，但是我决不会为此感到惋惜。我的自尊心总是随着我的名誉所蒙受的损失而成反比例地上升。我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行为喝采，因为我感到自己有能力向同时代人介绍一些新的积极的观点，而皇上①的超人的天才绝对愚弄不了我，我对他的赞美也不能使我的独立思想发生丝毫的改变。

人们不难相信，我当然遇到过不少异乎寻常的事情。事实上，我也确有许多令人发噱的轶事，但是目前我正从事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它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和全部精力。我现在精力还十分充沛，还能活得很久②。等我年迈的时候，我再来漫谈我的生活

① 指拿破仑。——译者注

② 奥伦德·罗德里格在1832年发表的这部分片断（罗德里格版《圣西门全集》第XXX—XXXVII页）到此结束。我们可以看出，与罗德里格版插入的比喻相比，我们插入的这段比喻有若干改动、补充和删节。我们忠实地复述了我们手中保存的圣西门手稿，并且复述到结尾。应当承认，奥伦德·罗德里格亲眼看到的那部手稿，我们今天没有见到。——出版者注

四 轶事。下面我用一个比喻来结束这第一部分①。

人的一生可以同植物的一年相比。

春天，花开满园：有的花儿结果，有的花儿萎谢，大部分花儿在夏季来到之前没有结果就枯萎凋零了。这不正是人生童年时期的鲜明写照吗！

夏天，园里呈现出另一派美景：树上挂满果实，一些果子硕大丰满，而大部分果子却枯瘪坠落。这不正是人生壮年时期的写照吗！

秋天，园里又呈现出美丽的景象：果子成熟了，这是人生处于成年时期并以其有益的贡献而出类拔萃的幸福时刻的情景。

最后，初冬，园里还有几棵可以使人赏心悦目的果树：树上还依稀地挂着一些果子，这好象是一些年长者，在一生中做过多次实验、仔细观察了实验的结果以后，又以其充沛的精力来热情、清晰、精确地报告他们的工作。这些人就是有创造发明的哲学家。

…………

（陆楼法　唐洪飛译）

① 原文如此，按这个版本的编排，应为第二部分。——译者注

人类科学概论①

总　　序

在我尽一切可能熟悉人类的既有知识以后，便为自己提出下述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工作可以最有益于科学的进步和人类命运的改善？

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

已经发生的一切和将要发生的一切，形成一个数列，数列的前几项是过去，后几项是未来②。因此，研究人类理性至今走过的道路，将向我们指明人类理性在科学活动和幸福道路上还应该迈出哪些有益的步伐。但是，这项研究不宜于从起点开始，因为读者从起点看不到人类理智进步的历史全貌。这种做法会使事物的自然秩序本末倒置，并要把全文的叙述放到只应扼要概括全文的序言

① 《人类科学概论》写成于1813年。圣西门把"人类科学"理解得非常广泛，其中包括生物学、社会学、生理学和哲学等。我们翻译所据的原文载1966年法文版《圣西门全集》第5卷。我们只选译了有关社会科学的部分，删去了讨论生理学和解剖学的部分。——译者注

② 圣西门也同十九世纪上半叶其他思想家一样，从数学上借用"数列"(série)和"项"(terme)这两个概念来表示按一定顺序发生的过程和其中的各个因素或阶段。圣西门在他的著作中到处使用这两个术语。——译者注

里面。因此，我在这里只限于研究过去时期的最近一段。我不打算回溯到十五世纪以前，即使我要谈到遥远的过去，也只限于极其简短的回顾。

在十五世纪，国民教育几乎完全是神学教育。从路德实行宗教改革开始，到光芒四射的路易十四时代，国民学校逐渐学习世俗作家、希腊作家和拉丁作家的作品。这些课程继续扩大，终于排挤了神学，变成了宠儿，把所谓的神圣科学贬谪到特设的学校里去。人们称这种学校为神学院，只是那些准备从事神职工作的人，才到那里就读。在路易十五在位时期，物理学和数学开始成为国民教育讲授的学科；到路易十六执政时期，这两门科学就已经是最主要的课程了；最后，发展到今日，这两门科学已成为教学内容的主要部分。目前，人们把学习文学只看成是一种消遣。在这方面，事物的新旧秩序之间，即五十年、四十年甚至三十年前存在的秩序和目前的秩序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在距离我们还相当近的这些年代，要知道一个人是否受过良好教育，人们会问他是否熟悉希腊、拉丁作家的作品？而在今天，却要问他是否长于数学？是否精通物理、化学、博物学方面的既有知识？一句话，他是否精通实证科学和实验科学？

在回顾有学识的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获悉的关于人类理性发轫以来的经过的时候，特别是在考察人类理性从十五世纪以来的经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

一、从十五世纪以来，人类的理性倾向于把自己的一切判断建立在所观察和所讨论的事实上面。它在这个实证的基础之上，已经改造了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而这些科学现在已构成国民教

育的内容，成为国民教育的基础。因此，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人类科学的一部分的生理学，也要用其他物理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来研究，而当它成为实证科学的时候，便可列为国民教育的学科。

二、个别科学是一般科学的构成成分。只要个别科学还具有臆测性质，一般科学即哲学也必然是臆测性的。当个别科学的一部分开始成为实证科学，而其余部分仍然具有臆测性质的时候，一般科学便是臆测和实证各占一半的科学。当个别科学全部变成实证科学的时候，一般科学也会完全变成实证科学。在生理学和心理学完全以所观察和所研究的事实为基础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会出现，因为这时不再存在既非天文现象、又非化学现象，既非生理现象、又非心理现象的现象了。因此，可以设想学校讲授的哲学变为实证科学的时代即将到来。

三、宗教、一般政治、道德和国民教育的体系，不外是观念体系的应用，或者毋宁说是从不同方面加以观察的思想体系。因此，随着新科学体系的建立，显然也要改造宗教、一般政治、道德和国民教育的体系，从而也要改造僧侣阶级。

四、各个国家的组织都是关于社会秩序的一般观念的个别应用，而欧洲的一般政治体系的改造，必将引起以自己的政治联合结成国家这个伟大共同体的各族人民改造他们的国家。

现在，把拙著将要发挥的思想简要地综述如下：

应当把人类理性未把自己的判断建立在所观察和所研究的事实上面以前的全部工作，看成是准备工作；

只要所有的个别科学还没有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面，一般科

学就不能成为实证科学；

只有哲学的各个部分都成为实验科学，包括宗教体系和僧侣组织在内的一般政治才能成为实证科学，因为一般政治是一般科学的应用；

当作为一般政治的制度得到改进的时候，国家的政治体系也必然趋于完善。

为了证明上述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即为了指出我们能够完成的最有益的工作就是编写四部概论（其中的第一部根据实证原则建立人类科学，第二部给哲学提供坚固的基础，第三部讨论改组僧侣阶级的计划，第四部讨论改革国家制度的问题），就必须详细研究十五世纪以来发生的情况。我现在就来开始这项工作。

为了使问题更加明确，我要考察一下学术团体的变化。现在，我就相继研究学术团体的目前组织和它在十五世纪时的组织，以及它在其间的最主要阶段的组织。

目前，学术团体分成两个非常不同的部分，或者勿宁说存在着两种学术团体。其中每一种团体的活动，都涉及我们的整个知识体系，但是它们的研究目的却很不同：一种是以传授既有知识为目的，这就是大学；另一种是以改进科学体系为目的，这就是科学院①。值得着重指出的是，改进和传播旧科学体系的僧侣阶级，现在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与研究新科学体系的文人学者完全分

① 这里指的是"法国科学院"，它包括五个学院：(1)法兰西学院，专门研究和改进法语，以及发展法国文学；(2)铭文和雅语文学学院，专门研究考古、历史和古典文献；(3)自然科学学院，专门研究精密科学和自然科学；(4)艺术学院，专门研究各种美工艺术；(5)道德和政治科学院，专门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法律等问题。——译者注

开。在一些主要学校里，青年人主要学习新科学体系。

学术工作的这种组织形式，与十五世纪的学术组织形式显然不同，并比十五世纪显然优越。在十五世纪，除了大学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学术团体。当时，也同现在一样，大学的唯一工作就是从事国民教育，所以当时没有一个团体负责改进人类知识体系等工作。

我现在把话题再转回到《人类科学概论》上来，而以上所说的就是这部书的序言。

我对人类科学的看法，是以维克达吉尔、毕沙、孔多塞和卡巴尼斯①的著作为基础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要竭力在本书里把这四位学者发表的思想联合或结合起来，并作若干补充，使它们形成一个有系统的整体。

毫无疑问，卡巴尼斯和毕沙两人研究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可是因为他们二人，或不如说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只是研讨了人类科学的一个个别问题，所以我认为不必在本书里另辟一章来探讨他们的思想，而只把他们的思想作为维克达吉尔的思想的补充加以研究。

① 这四个法国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都是圣西门的同时代人，他们对圣西门世界观的唯物主义成分的发展起过巨大的影响。

维克达吉尔，菲力克斯(Vicq-D'Azyr Félix 1748—1794年)，比较解剖学的基础人之一，反对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活力论观点。

毕沙，玛丽·弗朗斯瓦（Bichat, Marie François 1771—1802年），见第39页注①。

卡巴尼斯，若尔日(Cabanis, Georges 1757—1803年)，法国的医生，社会活动家和哲学家，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追随者。卡巴尼斯的思想和他用生物学观点解释历史的倾向，对当时的社会学说起过很大影响。

关于孔多塞，见93页注。——译者注

如上所述，本书分成两个部分：我准备在第一部分研究维克达吉尔的思想，在第二部分研究孔多塞的思想。这两项研究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我对维克达吉尔的批判较少，因为我认为他的各个思想，一般说来都是非常正确的。因此，我只能对他的思想加以整理和补充，以便尽可能使之形成一个长而连贯的数列。我对孔多塞的态度与此完全不同。我对他的批判较多，因为他的各个思想都没有使我满意。不过，他在其著作中所作的概括，却是惊人的正确，而且十分卓越，所以我要仔细研究他的著作。因此，我要在第一部分研究作为个体的人的科学，而在第二部分则研究作为人类的人的科学。但是，我在第一部分也要谈到人类，而在第二部分也要谈到个体，不过都是顺便提一提而已。

在本书的各个部分，我要建立一系列的事实数列，并坚信这是我们知识的唯一可靠部分。……①

第一部分②

第一个观察

如果拿新生的婴儿同其他哺乳动物的新生小崽比较，我们看不出前者在智力上比后者有决定性优势。在婴儿没有学会发爸爸、妈妈这两个词的发音，没有掌握他应当与这两个词相联系起来的观念以前，周围的人已向他反复多次说过爸爸、妈妈这两个

① 以下删去圣西门给当代几位生理学家的信未译，其中都是讨论生理学和解剖学问题的。——译者注

② 删去第一部分的最初几段讨论生理学问题的文字未译。——译者注

词。根据这种情况，便会相信言语并不是人体组织的直接产物。

第二个观察

在我们阅读希罗多德、修昔的底斯、沈思熟虑的塔西佗和伟大的当代人休谟①的著作，钻研古代编年史，分析古代传说的时候，可以看到已经达到高度文明水平的民族最初也是吃人的；我们看到现在有丰富的产品可供各种非常讲究的需要的民族，最初也曾穴居野处，茹毛饮血；我们还看到以优异的智力活动见称的民族，在记忆力和洞察力方面，最初也只比在机体的发展阶段上最接近于人的动物略胜一筹而已。

第三个观察

最近五十年来，人类理性有了长足的进展。它摆脱了陈规旧套的束缚，它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去消除根深蒂固的偏见；它看到在作为现今社会组织的基础的高尚观念里面，掺杂着许多虚伪的观念，并且两者已经合而为一，所以它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把谬误同

---

① 希罗多德(Herodotos 约公元前484—约公元前425年)，古希腊的历史学家，被西方称为“历史之父”。他的《历史》即《希腊波斯战争史》(共九卷)，内容丰富，描写生动，为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修昔的底斯(Thucydides 约公元前460—约公元前400年)，古代希腊历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希腊的将军。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共八卷)，为研究古希腊史的主要文献。

塔西佗(Tacitus 55—117年)罗马帝国初期的杰出历史学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的《日耳曼尼亚志》，是一部根据亲身观察写成的地方志，对研究古代欧洲具有重大价值。

休谟，戴维(Hume,David 1711—1776年)，英国的哲学家，不可知论者，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人性论》和《人类理解力研究》。——译者注

真理分开。十八个世纪以来代代相因的信仰，受到了最严肃的审查。我们不能不看到，有两种情况在这方面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头一个情况是：原始人定了一些约定的符号，他们利用这些符号，也可以象我们这样，把自己的感觉记述下来，对感觉进行比较和组合。另一个情况是：他们已经得出"神"这样高度抽象化的观念，或者可以说，他们已经达到能够证明神的存在的地步。

探求真理的热情，这时在英国人和法国人中间开始成为真正的民族热情。这两个民族都做过耗资巨大的航海探险，其主要目的是考察社会组织所依据的原则。我指的是在机灵活泼的布根维尔、聪明勇敢的科克和不幸的拉彼鲁兹①的领导下所完成的航海和发现。这些著名的航海家最具有哲学家的头脑，他们访问了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的许多不同部族。由于他们的研究、观察和聪明的实验，我们完全获悉了最愚昧无知、最粗鲁的民族（我们的古代祖先当然也是这样）与达到高度文明的民族之间存在的一切中间状态。这些报道很有价值，因为这使我们现在可以用观察到的事实来论证我们原来只能以猜测和推想来确定的事情。我们现在可以把观察到的事实列成一个连续的数列，由远古的初民一直研究到现代的欧洲人。当然，远古的初民是十分愚昧无知的；而现代

① 布根维尔，路易·安都昂（Bougainville, Louis-Antoin 1729—1811 年），法国的航海家。他在 1766—1769 年完成环球航行，发现许多岛屿，主要是在太平洋的大洋洲发现的。他提供了关于他曾访问过的地方的自然和居民的宝贵资料。

科克，詹姆斯（Cook, James 1728—1779 年），英国的著名航海家。他在十八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曾三次向太平洋远航，发现许多岛屿，其中有夏威夷群岛，他在这里被土著人杀死。科克的旅行对地理科学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

拉彼鲁兹，让·弗朗斯瓦（La Perouse, Jean-François 1749—1788 年）法国的著名航行家。他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有过重要发现。1788 年失踪，他的遗物到 1828 年才被找到。——译者注

欧洲人的文明和科学水平，则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一切先民。

科克向我们报道的一些部族，不知有任何首领，没有任何宗教观念，不穿衣服，没有房屋，穴居野处，茹毛饮血，有吃人的风习，但不是出于复仇，而是人肉的可口滋味强烈地刺激着他们的嗜食人肉的欲望。他还向我讲述了另外一些比较开化的部族，他们承认首领的存在，略有宗教观念（从他们崇拜偶象这一点可以看出），吃熟食，着兽皮，有构筑的房屋，语言极不发达，连三以上的数都数不出来。那里还有吃人的习惯，但程度大为减轻，几乎都是出于报私仇和复族仇的动机。最后，科克还谈到塔希提群岛、散德维齿群岛和友爱群岛的居民，他们已有正式僧侣、政治等级和发达的语言，食人风习的残余几乎只是在用活人作祭品方面。他们完全不吃人肉。不过这位过于慈善的科克，却作了散德维齿群岛土人的食物。

我对科克的朴实报道，有两点感到特别惊奇，这就是：(1)他没有能够使头两类原始部族理解关于单一基因的观念，或是勿宁说，没有使他们理解关于存在着一个万能的神的信念，从而他没有能够向他们证明人具有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本性，而塔希提群岛、散德维齿群岛和友爱群岛上的居民，却能容易理解这种东西；(2)头两类原始部族，不反对人体解剖，不认为这是对人体的肢解；而第三类部族，则不准许进行人体解剖。

第四个观察

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曾有个别儿童由于某种不幸的遭遇而脱离社会，随意行动，被迫单凭个人的机智去满足他们的一切需要。他们没有通过长期认真的教育过程去接受前代人积累的

宝贵知识。其中有许多人，是在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完全孤独生活以后，才又回到社会上来的。我们现在掌握着一些记述这种野人的材料，其中载有一个在瑞典发现的野人，一个在立陶宛的森林中捉住的野人，还有一个曾在香槟森林中过了很久与世隔绝生活的姑娘。最后，我们目前还有一个叫作“阿韦龙野人”的人①。对这些野化了的人所作的观察，证明对人类的现有知识一无所知而与世隔绝的人，在智力发展方面只比发达水平与他们相近的动物略高一点。这个人的智力优势，只能完全与他的社会组织优势相一致。我认为阿韦龙野人在脱离社会的整个期间的智力水平，非常接近于人类最初几代的智力水平。但是，阿韦龙野人的智力应当比原始人高一点，因为他的智力发展有一部分是遗传下来的。

阿韦龙野人在幼年时代便脱离社会而孤独生活，他由于长期养成的习惯已经爱恋这种生活。从他被发现和脱离孤独生活以来的这一段生活史，受到了研究人类科学和试图加速发展这一科学的人士的特别重视。他的这段生活史自然应当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期，从他到菜园去偷菜吃被农民发现和捉住的时候开始，到政府把他送到巴黎为止。第二期，由受政府的委托来照顾这个野人的生活的希卡尔神甫② 对他进行的细心教育过程构成。聋哑教养院的医生伊塔尔③ 对他所做的一系列观察，构成第三期。

① “阿韦龙野人”是一个长期流浪在法国南部森林地带的无人照顾的男孩子，1799年被当地农民发现。这一发现引起了当时的报刊和聋哑教育工作者的极大兴趣。——译者注

② 希卡尔，安布罗阿兹·库库伦(Sicard,Ambroise Cucurron 1742—1822年)，法国的神甫，曾创立数处聋哑教育机构。希卡尔当众演示自己的实验，希图以此自我宣传。——译者注

③ 伊塔尔，安都昂(Itare, Antoin 1775—1838年)，法国的医生，当时欧洲知名的聋哑教育专家。他写过几篇关于“阿韦龙野人”的文章。——译者注

第一期 捉住阿韦龙野人的农民，把他送到最近的一个相当大的医院里。这个医院的医务工作人员对他作了观察，观察虽不十分深入，但是非常合理和精确。他们经过观察确定：他对人类现有的知识毫无所知，他喜欢生吃动植物，非常厌恶熟食，坚决反对人们给他穿衣服的一切尝试，希望回到森林里去，他为此曾一再努力，逃跑了一次，再度捕获时费了很大周折，等等。他们把这个异乎寻常的野人的情况向政府作了详细报告以后，内务部大臣下令把他解到巴黎，交给著名的学者观察，向学者提供随意观察的方便。

第二期 阿韦龙野人到巴黎后，交给希卡尔神甫监护。这位神甫的神学造诣远远超过他的生理学知识，他对宗教原则的信仰远远胜过他对物理学原则的信仰，他硬说人一点也不需要教育的帮助就可以产生关于有神的观念。他完全没有对阿韦龙野人进行观察，而是把这个野人当成了一种公开证明他的神学生理学思想正确的手段。希卡尔神甫完全与真理背道而驰，所以他遭到失败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对抽象问题完全无知的学生，破坏了这位老奸巨滑的形而上学家的一切计划。结果，他大失所望，不得不放弃他那个异想天开的主意。这位聋哑教养院教师接触阿韦龙野人以后，便轻率地单凭幻想建立了一座空中楼阁。按照他的打算，经过充分的练习和良好的训练，就可以拿这个野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显示一番。那时，他将在会上叫野人说出一段打动人心的哀史，叙述他在森林里孤独生活期间遭受的种种不幸，从而赢得所有听众的眼泪。他教导自己的学生要表现出信神的高尚精神状态，以使最无知的观众看到后也能信以为真。因为事实的经过一点也没有符合原来的这种设想，所以维克托（他们这样称呼阿韦龙野人）的第

一位老师，便宜称自己的学生天生愚蠢，不再对他进行教导，把他丢在教养院的一角不加理睬，以为这样便可使社会甚至学者们把他完全忘却。

第三期　在希卡尔神甫不想从阿韦龙野人身上捞到好处以后，这位野人的处境是非常悲惨的。他遭到多次毒打，被打得遍体鳞伤，尤其是腹部的伤势非常严重。这是被脚踢的，可是又一再踢他腰上的那条为了防止他把强迫他穿上的罩衫撕碎而给他扎上的皮带。当维克托由希卡尔神甫手里转到聋哑教养院医生伊塔尔先生手下的时候，他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悲惨。伊塔尔首先关心给维克托治伤。后来，他开始研究和教育这个年轻人。这位生理学家发现：(1)维克托决不是天生愚蠢，甚至他在遭受这番折磨以后，也没有变得愚蠢；如果他的思维器官天生拙劣，这种折磨必然会使他变得更加愚蠢；(2)维克托不是天生就聋，后来也没有变聋，所以他在这方面不存在学会说话的障碍；(3)伊塔尔医生还证明这位年轻人的说话器官良好，他甚至能够叫维克托清晰地说出许多食物，其中包括野人最爱吃的牛奶的名称，因而把说话器官良好这个事实证明得极为清楚。最后，他还十分清楚地证明，影响维克托上进的真正的和唯一的障碍，来自他受教育的时间开始得过晚，来自他的咽喉和思维器官长期没有利用，结果失去了拼音和发音所必要的灵活性。

伊塔尔先生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其中叙述他对阿韦龙野人所作的观察和实验，以及他所采取的尽力改进维克托的思维器官和说话器官的方法。他在报告中非常坦率地、客观地谈到自己所取得的相当重要的成就。这份报告写得非常明确详细，但它给人

留下的印象不深，也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就。我曾长期探索这一有益的科学著作遭到学者们冷遇的原因。最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报告作者过于慎重，是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他没有概括自己所观察的事实的共性，没有说明这些事实能对生理学的建立，甚至对一般科学体系的建立发生什么良好影响。

总结阿韦龙野人的生活史和以前的观察所证明的事实　人都非常喜欢把自己心里产生的思想和观察到的事实加以系统化，也就是说，使它们两者之间协调起来；人也有一种想在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和整个事物总体之间建立联系的强烈愿望，所以孤立的思想或事实，不管它们本身多么重要，如果未被概括，使其具有共性，而仍然同原来一样，只具有个性，就会遭到十分冷淡的对待。因此，我打算进行这种概括，使从阿韦龙野人身上观察到的事实与以前的观察所阐述的事实协调起来。

在对阿韦龙野人进行观察以前，许多有学问和非常聪明的人，还不相信约定的符号是形成和连结任何重要观念的必要条件，不相信没有这种符号的帮助就不能产生关于单一基因的观念。但是，在对这个野人作过观察以后，只有象希卡尔神甫这样有严重学派思想的人，才会对这一点表示怀疑。这种人一心维护落后的神学原则，只相信有神的观念是我们的天赋观念。

对阿韦龙野人进行的观察，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最初对他进行的想要证明单一基因的观念不是后天习得的实验没有成功，而后来对他进行的具有与此完全相反目的的实验，却非常成功。后来的实验是要证明：如果没有约定的符号的帮助，就不能形成任何一个重要的观念或达到高度的抽象。

我要一再反复说，在对阿韦龙野人进行实验以后，完全证明了约定的符号是形成和连结任何重要观念的必要条件。即使把它重复二十次，我也不觉得过多，因为我认为叫读者注意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可以相信，原始人是最愚昧无知的，他们的思维能力十分有限。

不必再作更长的开场白了。我们现在来把我们在人类智力发展中观察到的各个不同阶段列成一个数列。

数列的第一项

原始人在智力上优越于其他动物，只是他们的身体组织优越的直接结果。他们的记忆力只比海狸或象的记忆力强一点。这个事实应当算作已被观察到的事实，因为对阿韦龙野人作过了这种观察，并且观察得很仔细。

数列的第二项

人类处于科克船长在麦哲伦海峡沿岸所见到的那种状态：人们住在山洞里，不会建筑房屋，根本没有首领，不会取火。

数列的第三项

人类处于科克船长在美洲西北岸北部所见到的那种状态：人们住在构筑的房屋里，有政治组织的萌芽，因为他们承认首领；初步掌握非常有限的语言，因为他们数数超不过三以上。

数列的第四项

人类处于科克船长和其他航海家在美洲西北岸北纬五十度附近所见到的那种状态：人们掌握了相当完善的语言，完全听从首领的指挥，吃人的风习很盛。这种发展状态，在新西兰表现得更为明显。

附注：应当特别着重指出，人类最初还没有吃人的习惯，只是后来随着理智的某些发展，才开始有这样的现象。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人在发明了致人死命的进攻武器以后，才企图去杀害他人的。

数列的第五项

友爱群岛、社会群岛和散德维齿群岛的居民：这些地方已经达到很高的开化水平，口说语言并不贫乏，吃人的风习几乎完全绝迹。居民分成“卡尔”和“突突”两个阶级。有宗教仪式，有受社会的所有阶级尊重的有组织的僧侣阶级①。

数列的第六项

秘鲁人和墨西哥人在西班牙人发现他们并征服了他们的国土时所处的状态。当时，他们形成了两个人数众多和性质不同的政治社会。他们的艺术、手工艺和美术已经获得相当显著的进步，因

① 友爱群岛（汤加群岛）、社会群岛（塔希提群岛）和散德维齿群岛（夏威夷群岛）均属玻里尼西亚群岛。早在十八世纪，这里的氏族关系就在解体，产生了阶级分化的因素。“卡尔”和“突突”是当地居民对两个社会集团的称呼。——译者注

为他们已经发现开采和冶炼金属以及用金属装饰高大建筑物的方法。

数列的第七项①

古代埃及人。他们在艺术和美术方面比秘鲁人获得的成就更大，在道德科学和实验科学方面也比秘鲁人优越。他们走完了人类智力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必须经过的一段最艰难路程：这就是他们发明了约定的书写符号。我们完全同意文字是由他们发明的，而不管实际上是不是由他们发明的，或者只是由他们重新发现的，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的目的是确定人类理性进展史的数列，

① 至今人们对埃及人以前的人类智力的状况所作的一切说明和著述，都不是以观察到的事实为基础的。它们完全依靠臆测和推论，所以人类科学至今还是臆测的科学。我在本书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要把人类科学提高到以观察为基础的实验科学的水平。因此，首先要精确地规定出人类智力发展的出发点，其次再确定从这个出发点达到埃及人的智力发展水平所经过的几个过渡阶段。我采取的办法是不是正确的呢？让读者去评论这一点吧，让读者去评论它和评论我吧。如果我采取的办法是正确的，那就请读者向我表示同情，表示愿意今后用尽一切办法全力支持我，帮助我完成为之献身的长期工作，使我达到改善人类命运这一光荣而有益的目的。

我在这个注里，还要谈出两个想法。在本书的以下叙述中，我将充分发挥这两个思想，现在只对它们作扼要的阐述。

一、当然，人类智力的发展曾屡受破坏，可以说被地球上发生的历次巨大灾变所歪曲，尤其是受到洪水的影响。根据地质学的观察，完全肯定了洪水时代的存在。要想分清哪些科学思想是从这些灾变时代遗留下来的，哪些思想是后代重新发现的，那是不可能实现的意图。应当把这个发展看成是这样的：无论有无洪水，或者有无其他任何灾变，它总是发展到了今天。

二、在十八世纪，哲学家和神学家之间对于人类智力的最初发展所持的见解还没有太大的差异。神学家早就说过，而且目前还在说：亚当和夏娃在没有偷吃命果以前，他们在地堂里本是幸福的；而哲学家们则说过：人在野蛮时期是幸福的，只是在建立了政治的、市民的和宗教的制度以后，人才遭遇了灾难。卢梭雄辩地指出的信念和达兰贝尔冷静表达的信念，就是这样。孔多塞在他的《人类理性进步的历史概观》一书中所持的观点，正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同这一观点并没有多大的出人。

而用臆测的思想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

我把埃及人的时代看作人类智力发展的第二出发点。我认为，对人类智力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发展，要进行更加仔细的研究。学者的观点，是与人民群众的信仰不同的。学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致力于发现原因，并把因果的观念协调起来；而人民群众至今仍是以具体形式表达抽象观念的。

但是，在查明这种差异和叙述这两类人的进步情况之前，我要说明数列的这个第二部分的各项。也就是说，我们暂时不往下叙述，而先来概观一下我们仍在走着的道路的第二部分。

从人类理性完全清晰地理解因果观念以后，约定的符号便形成为一个体系。

日、月、星、海洋、森林和河川，以及一切显然有害或有益的动物甚至植物，都曾被我们祖先看作是万物的伟大基因。这就是一般科学的第一阶段，它被人们称为偶象崇拜时代。

后来，人类理性提高到产生无形原因的观念的阶段，开始把我们的欲念、嗜好和各种愉快的或不愉快的感觉看作基因。这个第二阶段得名多神教时代。

再往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如果宇宙是象他们至今所想象的那样，被许多互不依赖的基因所支配，那末，世界就会变得一团糟，而毫无秩序了。于是，他们的认识便提高到存在一个单一基因的观念。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个基因不过是多神教所信仰的一切次要神在一个唯一神身上的结合。这个第三阶段称为有神论时代。

最后，学者们开始理解到：如果认为宇宙是由性质完全不同的要素构成的，那也就等于认为宇宙是混乱的，而试图说明事物的这

样秩序，只能是一种梦想。于是，他们长期以来致力于建立一种科学体系，使概念的分类和划分在这种体系中只作为便于智力活动的手段。可以把这一整个体系看作是许多同类观念，即相互结合的观念的总体。

我再来研究埃及人的两大类别，即学者和人民。

埃及人的学者集团执行祭司的职务，他们是全国的第一流人物，只有他们拥有政治权力，而且是享有无限的最高权力。这些人有两套学说：一套是他们向人民传授的；另一套是他们为自己专用的和向同他们有来往的少数亲信传授的。

他们向人民传授的学说，是偶象崇拜，是唯物主义，是把有形原因看作基因的信仰。他们叫人民崇拜尼罗河，信奉阿皮斯神(即公牛)，崇敬鳄鱼和洋葱，更不用说日月星辰等等了。

他们为自己专用的学说，比他们传授给人民的学说高出一等，更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他们认为有形原因只是次要原因，只把这种原因看作是高级原因的结果，认为高级原因应该是无形原因。

埃及的学者曾经十分仔细地搜集了他们的先驱者对天体运动、尼罗河泛滥和其他各种自然现象所作的一切观察的资料。他们热心地努力积累这些宝贵的知识。

我们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看到象埃及人这样把思想家和信徒之间的界限分得如此清楚。只要研究一下埃及人的历史，人们就会相信祭司的权力和学者的能力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我愿意说：任何一个宗教的僧侣阶级都应当是最有文化的集团；当他们不再是最有文化的集团的时候，便逐渐不被人尊重，衰落下去，最后化归乌有，为更有学问的人所取替；当一般观念逐渐

完善起来的时候，这个转变的时代就要到来。任何一种观念，只有在它正是对于人类理性的进步所作的观察的结果时，它才会表现得最为清楚。这样的观念，我们是不能过早地提出来的。在这里，只指出我所说的观察是由观察埃及人开始的，就可以了。

数列的第八项

为了能够逐次进行研究，我们在人类理性进步数列的这个第二部分，每次都只研究一个民族，或最多只研究一个政治社会，因为在一切伟大的时代，都有一个政治社会绝对地超过其他一切社会，它在科学和战争方面也同时高于其他社会，以致人类理性在这个社会的繁荣时期所达到的一切成就，也只能归于这个社会。

我们已从讨论埃及人开始了数列的这个第二部分的研究。现在，我们来谈谈希腊人，其次谈谈罗马人，再次谈谈萨拉森人①，最后谈谈现代的欧洲人。

可以用一个观念来概括人类理性发展数列的各项，而如果能拿整个人类的道德和一般智力的发展同个人的这种发展相比较，这种概括将会更有意思。在童年时期，我是想说在童年的初期，吃是最大的快乐。在幼年的时候，人的一切细小打算，都以能够得到比较好吃的食物为目的。不难看出，处于开化时期的部族的主要活动，也是以得到食物为目的。上述的观察构成了数列的第一部分。在童年的后期（我们现在进入数列的第二部分，并准备对它进行近乎全面的研究），对艺术和手工艺的爱好，可以说占居统治地位。如果把锯、钉子、斧子、刨子等工具，以及可用这些工具加工的

① 中世纪初叶欧洲人对阿拉伯人的称呼。——译者注

材料给年龄较大的儿童，这些东西一定会引起他的兴趣，而放弃其他玩具。人们可以看到，这样年龄的儿童在玩的时候热心构筑石坝，挖掘小水渠，建造土堤等等。埃及人也同样广泛地表现过这种嗜好，并在这一切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比后来的同样工程都伟大的工程。人的双手什么时候挖造过可以赶得上埃及人所挖的湖泊呢？而他们那些宏伟壮丽但毫无用处的金字塔，岂不是足以令人把后来建成的一切建筑物都看成是小玩意了吗？

现在，人类到了成年时期。我们来观察一下人在成年时期的作为。人在成年时期产生了对于艺术的爱好。哪一个青年人不想在诗歌、音乐和绘画方面一显身手呢？希腊人以擅长美术著称，至今仍然在这方面是我们的典范。

人在精力充沛的年龄时期，最喜欢寻找使用这种精力的机会，而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往往妨碍他断定自己力量有多大。他开始同整个大自然作斗争，锻炼自己，对军事表现出最大的兴趣。于是，罗马人主要以作为军人而感到自豪。在他们之后，还有萨拉森人仍能在这方面获得声誉。但是，在萨拉森人之后，就已经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迅速攻战方面，特别是在对军事经久不衰的热情方面赶得上他们了。

萨拉森人是最后一个勇猛善战的杰出民族，也是奠定实验科学的基础的民族。因此，他们使人类的军事功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开始了成年时期的阶段。在成年时期，人类的活动缓慢下来，但是更有秩序和正规化了，想象力不象以前那样奔放，但是判断力却更加发达了，等等。

我们暂且不对我们即将研究的数列的以后几项预作说明，只

尽一切力量来确定一下希腊时期的文明状况的特点，以阐明希腊人在他们胜过人类其他部分时期所达到的进步。

把希腊人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在数个世纪内一直成为人类的科学先锋的那股生气蓬勃的智力，首先在荷马①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荷马是历史上给我们留下记忆的最古的希腊人，他的作品一直流传到现在，他是多神教的创始人，这意思是说他曾经是多神教的组织者。

我根本不想把我要陈述的对于希腊人所作的少量观察彼此联系起来。我甚至把各次观察编了顺序号，使它们尽可能保持各自的独立性。

一、每当思想家发现的观念被信徒接受的时候，这总是表明人类理性的发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埃及的学者们已经使自己提高到能够概括无形原因的地步，而埃及人民在这一阶段却只有关于有形原因的观念。希腊的全体人民群众都接受了存在无形原因的思想。这一思想，成了希腊各族人民共同信奉的多神教的基础。

二、在希腊人那里，人类理性开始认真地研究社会的组织。他们确立了一些政治原则，他们从实践和理论方面研究这门科学。他们曾为世界贡献了象莱喀古士、德拉古和梭伦②这样伟大的立

---

① 荷马(Homeros 约公元前九世纪)，古希腊的诗人，他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等史诗，最为有名。——译者注

② 莱喀古士(Lycurgus 约公元前396—约公元前325年)，古希腊的演说家和立法家。

德拉古(Draco 公元前七世纪末)也叫德拉孔(Dracon)，他为雅典制定了第一部成文法，以严刑著称。因此，人们一般将苛法称为"德拉古法"。

梭伦(Solon 约公元前638—约公元前559年)，古希腊的政治改革家，诗人，希腊的"七贤"之一，公元前594年任执政官。——译者注

法家。在希腊人那里，这门科学不只是少数几个聪明人专门研究的学问，而是成千上万公民日常的无拘无束的谈论的话题。人们常在公共集会上讨论政治原则及其应用问题。希腊人的社会是人所共知的第一个政治社会，它由许多部族形成，每个部族各有自己的特殊统治形式，甚至经常与大多数的统治形式很不相同。

我准备对希腊人的政治社会发表的见解，我认为都值得读者充分注意。我首先希望读者注意的见解是，希腊社会的一般纽带是宗教。特尔斐神殿是希腊各族人民的总神殿，不受任何一个部族的单独管辖，因为神殿是建立在一块有名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土地上的。这块土地归神殿所有，周围的各族人民对它没有任何权利，甚至在相邻的部族之间进行非常残酷的内战期间，他们也对这个神殿严加保护。特尔斐神殿的祭司们所关心的是，利用他们的预言来维持希腊各族之间的团结，振奋他们的精神去反抗波斯人对他们的自由的侵犯。从特尔斐神殿遭到亵渎以后，狡猾的菲利浦① 控制了希腊社会，强迫希腊人称他为大元帅，成了希腊的主人。他的继承人亚历山大②，比其乃父菲利浦尤有过之，把马其顿人对希腊人的统治又加以扩大。在亚历山大之后，他的统帅安提帕特③ 更是毫无节制。于是希腊人的政治社会，到这时便失去了表现在团结方面的一切力量，只能对来犯的罗马人给予无力的回击。结果，罗马人占领了希腊，希腊完全沦为罗马人的奴隶。

① 菲利浦（Philippus 公元前 382—公元前 336 年），即腓力二世，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译者注

② 亚历山大（Alexander 公元前 356—公元前 323 年），即亚历山大大帝，古代的著名统帅，曾征服过欧亚非许多国家。——译者注

③ 安提帕特（Antipater 公元前 385—公元前 319 年），亚历山大大帝的主要将领。——译者注

另一个见解也要证明宗教观念对政治观念的巨大影响。这个见解认为，在希腊人那里，宗教体系和政治体系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或者更确切地说，宗教体系是政治体系的基础，而政治体系是模拟宗教体系建立的，也就是宗教体系的翻版。实际上，希腊人的奥林匹斯会议就是共和国会议，而希腊各族人民的国体，虽然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共和政体。

三、我已经一再指出希腊人发明了美术。人人都承认，荷马、斐狄亚斯、阿伯勒斯①和其他许多艺术家，始终没有得到可以同他们比美的后继人。关于这一点，没有解释的必要。我只提出一个可供参考的见解，即认为现今的艺术家无法与古人比拟。不错，这个见解只具有次要的意义，但它却相当值得人们玩味。古代的诗人在许多方面都是立法者，而现今的诗人都是一些轻佻浮躁的人，他们只能帮助社会人士消愁解闷，而不再以领导重要事业为己任。在学术界，他们只居次要地位。而且，自以为有特殊才能的人，大部分参加可望获得最大荣誉的职业。现在，只有那些不能在目前的舆论界最为尊重的智力活动部门获得成就的人，才从事诗歌的创作。一个有名气的希腊画家或雕刻家，可以在希腊到处选择称心的模特儿供他描绘或塑造人体的任何部分。最高贵的家庭，都以自己的女儿当选上模特儿为荣。而现今的艺术家，只能到社会的底层去寻找模特儿，而且甚至会遭到道德没有败坏的人的拒绝。

---

① 斐狄亚斯(Phidias 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的著名雕刻家，《雅典娜》、《宙斯》等雕象的作者。

阿伯勒斯(Apelles 约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作家。——译者注

四、在数列的前一项内产生的一般科学思想，经常被下一项所采用。比如，埃及的祭司们创立了多神教，但是信奉多神教的却是希腊人，也就是说，希腊人相信有多数无形基因存在，并崇敬这些无形基因。有神论的情况也是这样。苏格拉底是有神论的创造者，而在他死后五百多年，罗马人成了有神论者。

苏格拉底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在他以后，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他，因为这位天才以他的智慧创造了只能由人类的理性产生的最伟大思想。苏格拉底所享有的荣誉虽然已经很高，并且大大超过其他一切人，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还有加以更明确肯定的必要。我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精确地阐述他的荣誉。

在分析苏格拉底的思想的时候，我发现它是由两个基本的一般观念构成的。其中的第一个观念是：认为任何一个体系都应当形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里，第二级原则是由单一的一般原则引伸出来的，而第三级原则则是由第二级原则引伸出来的，这就可以通过梯级的间距相等的道德阶梯，一级一级地从单一的一般原则下降到最个别的观念。苏格拉底思想中包括的第二个观念是：认为人为了形成自己的科学体系，即为了协调自己的关于宇宙构造的观念，为了给自己的关于现象的构成和发展的知识打下巩固的基础，就必须交互利用先天方法和后天方法来协调他的观念。人的智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始终用同一观点来观察事物时，注意力很容易疲倦，而加速智力活动的唯一手段，就是改变思考的方向。比如，一个人经过紧张的努力，由支配宇宙的单一基因的观念过渡到最个别的事实以后，感到他的注意力已经疲倦得再也发现不了任何新的东西，他的抽象观念与具体观念混在一起使他无法分清

它们。这时，他最好改变思考的方向，把思想移到完全相反的方面去，也就是利用后天方法，由个别事实的考察上升到比较一般的事实的考察，并通过最有规则的步骤达到最为一般的事实。总而言之，苏格拉底是方法的发明人。在他以后，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他这样的高度思维水平，即使培根也不例外。苏格拉底的学生，没有一个能够象他们的老师那样拥有渊博的知识，所以他的学派在它的首领和创立者逝世后不久，也就四分五裂了。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苏格拉底学派中最杰出的两个人。他们把这个学派分成完全不同的两个学派，各为自己的学派起了名称，并在他们的工作进程中彼此背道而驰。一个学派叫学院派，另一个学派叫逍遥派。我认为把前者叫先天派，把后者叫后天派更为恰当，因为这两个称呼可以使人知道其中的每一派哲学家所传播的学说。我不打算说柏拉图是个彻底的先天派，也不打算说亚里士多德是个极端的后天派，而只是想说柏拉图曾相信和主张先天判断应当高于后天判断，而亚里士多德所传授的则与此相反。我再重复一句，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代替不了也赶不上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他的不偏不倚的超验哲学中，认为先天方法和后天方法都是同样可以遵循的良好办法，同样可以导致丰富的发现，但是应当轮流交替使用。

我认为指出下列事实是非常有趣的：人类的理性一直是本能地按照苏格拉底指出的应该遵循的道路发展过来的，可是他的学生们却没有充分理解他的教导。其实，历史向我们表明，柏拉图的思想从它在柏拉图学园诞生时起，一直到阿拉伯的哈里发阿尔一拉希德和阿尔一马门即位时止，在十一个世纪中间始终比亚里士

多德的思想被人重视。在这两位哈里发执政时期，阿拉伯人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翻译过去，学者们才开始重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轻视柏拉图的著作，这种情况也延续了十一个世纪之久。这个思想还需要加以详细发挥，但因为本书仅仅是一个概论，不便于详谈，所以我准备以后再谈。

不过，在结束本文以前，我不能不对苏格拉底的才华再谈几句，不能不指出他在一个重要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非凡的洞察力以及他对这个问题所持的聪明见解。为了详细叙述这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我必须分析苏格拉底的著作。他的著作由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构成，一部分以**建立方法**为目的，另一部分以**应用方法**为目的。我已经说过苏格拉底所建立的方法的内容，所以不打算占用时间再谈这个问题。我准备谈一谈他的纯科学著作，说明他是按照自己的方法论来撰写这些著作的。他的方法论以洞察秋毫和深远透彻著称。他的纯科学著作也分成两类。第一类著作以粉碎多神信仰为任务，或者更概括地说，以破坏对多基因的信仰为目的。他在同诡辩学派和祭司们的一切论战中，总是用后天方法进攻他们，把他的论敌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使他们成为自己用来攻击苏格拉底的迷信的牺牲品。苏格拉底的第二类著作，旨在建立科学体系，他在这里用先天方法观察事物。大家知道，苏格拉底非常清楚，应当用后天方法进行批判，而建设则要用先天方法去进行。

我们现在来考察苏格拉底所作的最一般论断。因为这个论断同时也是人类理性所能完成的最一般论断，所以读者完全可以想到，必须以最大的注意力去判断我要向读者提出的观念。

我再来谈一谈苏格拉底，他准备向他的学生讲话。在苏格拉底的讲话之后，我要解释和详细说明我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形式来写作拙著的这一部分。

苏格拉底对学生的讲话

（因为这个讲话是中间插笔，所以不妨把它分出来另刊。我将及时把它寄奉你们。因此，这又要使你们分神。）[1]

数列的第九项

我现在来谈一谈对于人类理性的进步作过贡献的罗马人。但是，在明确罗马人对于人类理性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以前，我要对不仅同数列的本项有关，而且同数列的其余各项均有关系的两种思想略作说明。这两种思想是两个一般观察。

第一个观察 在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和萨拉森人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这四个相继成为人类的科学先锋的民族，都居住在与周围隔绝的国土上。

埃及人没有邻国。他们的国土一面濒临大海，三面毗连荒无人烟的沙漠。

希腊的各族人民，以及在他们中间一直掌握盟军的总指挥权的拉栖第梦人[2]，都住在一个只有很窄一块土地与大陆相连的半岛上面。意大利的土地三面环海，其余的一面有阿尔卑斯山把它

---

① 《苏格拉底对学生的讲话》，载本卷的《论万有引力》，参看第108—第121页。——译者注

② 即斯巴达人。——译者注

同大陆隔开。可见，罗马人也就住在一个半岛上面。

麦地那和麦加两个城市位于红海沿岸的一块面积不大的土地上。这块土地一面临海，其余三面都是一望无垠的沙漠，把它同阿拉伯半岛的其余部分隔开。如果把阿拉伯半岛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也是一个孤立的国土，因为它三面环海，一面有沙漠把它与亚洲大陆隔开。

最后，英国人是岛上居民，但应当承认，他们在现代各族人民中间有权利占居首位，这是因为：

（1）他们培育了培根、牛顿、洛克、卡文迪什和普利斯特列①这样的伟人；

（2）他们的人民的衣食住都好，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3）按他们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来说，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影响是很大的；

（4）他们所发现的社会组织形式，将逐渐代替欧洲各国的封建制度，他们是本国宪法的忠实保护者，宪法使他们每个人享有人口稠密国家所能享受到的最大限度的人身自由。

可见，曾经起过主要作用的各民族所具有的这个共同点，证明国土的孤立是他们取得这种特殊地位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一个政治社会就不可能长期地保持自己的决定性优势。

如果我愿意发挥这个问题，就得拿古代拉栖第梦人的地理位置和古代雅典人的地理位置相比较，拿现代英国人的地理位置同现代法国人的地理位置相比较。其次，一方面，我要拿拉栖第梦人

① 普利斯特列，约瑟夫（Priestley, Joseph1733—1803年），英国的著名化学家，1774年发现氧气，曾对化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译者注

的严肃性格和认真作风，与雅典人的轻快活泼和见义勇为相比较；另一方面，我要拿英国人的爱国主义以及他们对维护自己的人身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不断关怀，与法国人的温文尔雅以及他们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和在军事上的英雄主义相比较。

第二个观察 孟德斯鸠[①]说，民族性大部分是本国气候条件的结果。孟德斯鸠错了，因为曾经起过主要作用的民族的性格，在任何时代都决定于风尚和生活方式的严肃性和认真性。这样的民族性格，曾相继出现在埃及、希腊、意大利等地的民族中间。这个地区的范围，由北回归线扩展到北纬五十度。在充当人类领袖时期拥有这种性格的各民族，后来丧失了这种性格。在罗马这个曾经居住过元老院元老的城市，现在到处是流氓市侩和各种下流人物。希腊的居民过去是那样文明，而现在却变成十分粗野的民族。巴格达的居民在阿尔—马门执政时期是那样有教养，而现在却处于最愚昧无知的状态。

对罗马人的直接考察 罗马人创立了有神论。他们也是公法的奠基者，并促进了这门科学的最大发展。这是罗马人促进人类智力发展的两个方面，这是构成罗马人的道德个性的两种活动。这两种智力活动的产生，使罗马人具有一种使他们既不同于以往的民族又异于后来的民族的性格。

读者的脑子里现在大概产生了如下的好奇想法：罗马人获得的和至今仍在学术上享有的伟大荣誉，是以他们在五百多年的共

---

① 孟德斯鸠，沙尔·路易(Montesquieu, Charles Louis 1689—1755年)，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法学家，著有《论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等。——译者注

和政体时期取得的成就为基础的，而他们在帝国时期也是走在希腊人的前面。罗马人的这种进步，使他们建立了有神论和创制了民法。这两项成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多神教的基础上，即在没有统一性的宗教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一个由语言和风俗习惯不同、从自己的土地上收获不同产品的民族组成的人口众多的政治社会。被希腊的历史学家说得十分伟大的相信多神教的希腊人，是一个人口不多的民族，他们都说同样一种语言，住在一个人口很少的地方；而现代的欧洲人，却结成了一个人口非常多的政治社会，居住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说着数十种不同的语言，随着所处的纬度不同，吃着各式各样的食物。在古代希腊，只有为数不多的自由人；而在现代的欧洲，则有一亿五千万人享有公民权利。正是希腊人所不知道的这种公民权利制度，引起了这种美好的改革。

关于罗马人，我还要说明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与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密切的直接关系，所以也不十分重要，但我相信读者会对它们很感兴趣，因为它们与当前的事件有关系，并对我们眼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具有直接关系。第一个问题是，简单比较一下罗马人和英国人称霸世界的野心；第二个问题是，我要进行另一个简单的比较，即拿人类在最早几个罗马皇帝时期所遭到的危机，与我们现在身受的危机相比较。

比较罗马人和英国人 我不想对两者进行直接的比较，而只打算证明：罗马人与希腊人的关系，同现在英国人企图与欧洲大陆各国人民建立的关系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和一定意义上，有共同之处。

罗马位于大希腊版图的中央部分，是希腊人的殖民地，或至少

是被希腊人的移民所包围。罗马的奠基人罗慕路斯和努玛[1]，或许还有姓名没有传到今天的其他人，为罗马的最初居民规定了与希腊的其他部族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同的政体。他们把这种政体建立在根本不同的宗教基础和政治基础上面。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信多神教，但是有一点不同，即不论属于哪一部族的希腊人，都最崇敬特尔斐神殿和奥林匹斯神殿，而罗马人却把家神当作主神。希腊人对特尔斐的诸神和奥林匹斯的宙斯的神谕的信仰，使供职于这两个神殿的祭司们得到一种手段，以此来提醒这个政治社会的每个成员不忘一般利益，号召他们关心这种利益，并使关心这种利益的情感超过民族爱国主义的情感。如果罗马人能和他们的邻居萨比尼人、沃尔斯奇人、威伊人等有共同的神殿作为宗教上最高的崇拜对象，那末，这些不同的部族就会在大希腊的版图内结成一个同盟，就象希腊人在古希腊所结成的同盟一样。但是，他们养成的对家神的特别崇拜，煽起了他们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并窒息了他们与邻居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一切情感。

不管从宗教设施的哪一方面来看，宗教设施都是主要的政治设施。从它的消极方面来讲，它只是信仰。可是，具有不同信仰的相邻各族之间，却几乎必然要从宗教的积极行动方面表现为战争状态，而祭司就把这个积极方面解释为出于神的意志。当相邻各族的神职人员没有形成统一的僧侣集团的时候，每一族的祭司都庇护本族的利益；而又因为没有更一般的利益，他们也就根本不反

[1] 罗慕路斯(Romulus)和努玛·彭庇里乌斯 (Numa Pompilius) 是传说时代罗马的初期皇帝(公元前8—7世纪)。据说 罗马的政治、军事和阶级制度都是由他们二人规定下来的。——译者注

对他们所抱的野心。

罗马人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之下，终于统治了周围的一切邻国。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如果他们用宗教的纽带联合起来，就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现在不难看出，罗马人的政策和英国人的政策之间是有共同点的。

从欧洲社会诞生时起，到路德的革命时止，英国人是通过宗教的纽带与大陆的各族人民联系起来的，所以他们的民族野心到这个时期从未超出一定的范围。但是在路德的革命以后，英国人的政策完全变了，他们完全切断了把他们与大陆上各族联系起来的宗教纽带。他们改信的宗教是民族宗教，只存在于英国，这就是英国国教。从这个时候以来，英国为自己规定了一项目的，那就是要统治欧洲的所有居民；如果欧洲人不迫使英国人通过共同的一般设施来与欧洲人联系起来，英国人终会达到这一目的。

这只是一个概述，我不准备立即详细发挥它。当谈到现代的时候，我再来阐述这个问题。现在，我来进行前面说到的简单比较，即拿我们现在经受的政治危机，与罗马人在共和制度衰落时期遭受的政治危机比较。

支配宇宙的一般规律的观念对调节物理学各部门现象的多数个别规律的观念的关系，正如单一神的观念对多数神的观念的关系一样。在希腊建立多神教以后大约过了一千年，罗马人也开始信奉多神教，不过作了若干修改。从多数神的观念过渡到单一神的观念以后，罗马人便进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时期。一般观念方面的这种变化，也是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在数世纪中间处于可怕的混乱状态的重大原因，可是人们至今都只用一些次要

原因来解释这一混乱局面。在这里,我不能不指出,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判断重大的事实,而许多人都喜欢阅读题名为“小原因产生的大事件”的作品,然而这种作品所发挥的,完全是错误的思想,因为任何结果都必然符合于它的原因。以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为例来说,就是一个社会在达到相当高的文明水平之后陷入的大混乱局面,必然是由可能对有教养的人士发生影响的最大的精神原因所引起的。然而,这个原因显而易见就是最重要的、最一般的、从而是联系其余一切观念的观念的改变。简而言之,人类所遇到的最大危机,显然是由多神教向有神论转变而引起的。

现在,我来谈一谈我们目前所遭到的危机,并欲指出这一危机(十分激烈,因为整个欧洲遍地烽火,交战双方的军队人数现已达数百万人)必然是由能起伟大作用的原因引起的。这个能对社会发生最有力影响的原因,就是一般观念、一般信仰的改变或改进。事实上,也正是这个原因在发生作用。这指的是:有教养的阶级开始放弃决定着物理学各部门现象的多数个别规律的观念,而采纳支配一切现象的单一规律的观念。指出下列事实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从阿拉伯学者在阿尔一马门哈里发执政时期奠定实验科学,以及由此认识支配物理学各部门现象的个别规律以来,已经过去一千年了;另一方面,正是这个时候把埃及祭司向其信徒传授多神教的时代与全体居民群众开始信奉单一基因的时代截然划分开来。我所以使用“基因”一词,而不用“神”这个字眼,是因为前者能向我提供后者所不能提供的重要解释。

关于单一基因的信仰,是由苏格拉底牢固地确立起来的;但是这种信仰后来得到了改进,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经过许多世纪的

努力，人类的理性才实现了这一改进。有两种方式体会单一基因的观念。在第一种方式中，想象起着主要的作用；在第二种方式中，观察和判断发生主要的作用。人类的理性一开始就必然在“单一基因”的观念上留下了想象的烙印，因为想象力的发展，无论是从整个人类来说，还是从个体的人来说，都是先于判断力的发展。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全体人类智力的发展也经历了个人智力发展的同一道路。我们不应忽略这一观察，因为它可以说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撞上石头的小孩，会怒气冲冲地大骂石头：可恶的石头！他的生动活泼的想象力引导他责骂石头，他把石头看成是有灵性的东西。人在这样年龄时期，生命力充沛，倾向于认为自然界到处都有生命。最后，不必再作比较，就不言而喻，人们最初是把宇宙中发生的一切现象的原因都看成是有灵性的；也不言而喻，人们现在仍把这种原因看作一种规律，而且这种观点是有很多根据的，我现在就其中最主要的几种加以说明如下：

一、信神只是把困难放到一边，因为信神免除不了人们研究自然，也说明不了支配世界的各种规律的本质。

二、信神而不信神启，更是没有任何用处。正如达格梭[①]大臣已经确凿证明的，这种信仰本身不能提供任何行为准则。当人们的知识已经大大超过代神立言的人的知识，并且能够揭露被尊为天书的书籍中的错误的时候，人们自然不会再信神启。

三、常识不能同神学体系中包含的许多矛盾相调和。神学家

① 达格梭，昂利·弗朗斯瓦(D'aguesseau, Henri François 1668—1751年)，路易十五时代法国的著名国务活动家。他拥护国会，主张限制教皇对教会的权利，接近冉森教派。——译者注

把神看成是万能的,硬说神在造人的时候本来希望使人幸福,可是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说神是至善的,可是接着又说神憎恶人。他们说神能预见一切,可是人却享有意志的自由。人作了孽应当受罚,行了善应当得赏,但是这些赏罚只能在来世实现,所以善行毫未得到鼓励,而恶行也没有受到警惩。

在考察神学体系的时候,人们一方面不能不因为看到这个体系在产生它的那个时代被接受而惊讶;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因为感到它落后于现代的知识水平太远而叹息,从而觉得必须从以下方面去改进它:提出生理学上的证明,指出凡是想在有害于社会的活动方面寻找幸福的人,必然要受到社会组织规律的惩罚。

现在,我们来进行另一个主要比较。我想拿人类理性在有神论确立时期遭到的危机,与人类理性现在受到的危机相比较。

当时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西塞罗在他的《论神性》① 一书中说道:

"我要永远保护他,我以往也一直保护过它,而学者或凡人的话都不能使我忘掉由祖先那里留传下来的关于崇拜不灭的诸神的学说。在谈到宗教的时候,我拥护柯伦克尼乌斯、西庇阿、斯采沃拉等大司祭的意见,而反对芝诺、克列安提斯或克利齐普的见解;我同意卜者列里乌斯这位最聪明的人的说法,在宗教问题上,拿斯多葛派的最主要人物同他比较,我更喜欢倾听他在其著名演讲中

① 《论神性》(De natura deorum) 是西塞罗的晚期作品,在西塞罗 (Cicero, Marcus Tullius 公元前 106—公元前 43 年)逝世前一年问世。从圣西门引用的这一段文章中可以看出,西塞罗拥护罗马的多神教,反对斯多葛派的几个著名代表人物(芝诺、克利齐普、克利安提斯)。斯多葛派批判多神教的神人同形论,批判宗教仪式。一般说来,斯多葛派对于西塞罗世界观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译者注

发表的高见。罗马人的整个宗教,主要因其祭祀和占卜而出名,而希维拉解释者和内脏占卜师①,则参加对异常现象和奇迹的预言。我始终认为必须尊重我们宗教中的这一切要素,并且继续坚信创造占卜方法的罗慕路斯和建立祭礼制度的努玛,为我们的共和国奠定了一切基础。如果共和国不敬诸神,我们的共和国决不能达到如今这样强盛的地步。"

西塞罗当然看到多神教已经过时,看到这种大大落后于当时文明状况的信仰已经变得异常荒谬,以致连他本人都时常说:他无法理解两个卜者怎么能面面相觑而不笑。他也看到要想恢复这种宗教的权力是不可能的,它必然要让位于更适应于文明状况的另一种宗教。

现在,许多学问渊博和精明强干的人正复蹈西塞罗的错误:力图挽救奄奄一息的宗教。同西塞罗一样,他们嘲弄天堂和地狱,嘲弄圣母的慈悲和地堂,嘲弄教皇永无错误的学说;同样地,他们也嘲笑内脏占卜;还同他一样,他们又想使自己所嘲弄的思想仍然受到人们的尊敬。

从我们方才所作的这种对照当中,还可以产生一个比较。西塞罗不相信能够建立一种新的宗教体系;现在,也有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创立新的信仰体系。但是,在西塞罗和当时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表示了自己的信念以后,过了没有多久,另一种在道德上大大高于多神教的宗教就建立起来了。现在,也可以确定不移地说,在不

① 希维拉解释者是根据所谓《希维拉卜书》进行占卜的祭司。据说,这部卜书是在传说时代由一个半传说性的女巫希维拉留给罗马的,其中载有关于罗马未来命运的预言。内脏占卜师是古罗马利用作为供品的动物的内脏预言吉凶的祭司。这两类祭司在古罗马的作用很大,他们可以左右国家大事和军事行动。——译者注

久的将来，必然要建立一个在道德上大大超过基督教的新信仰体系;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泥潭中拔出,继续向前迈进。任何后退,对我们都不能有利,好在我们也不能后退。

数列的第十项

人类理性的发展达到第十阶段，应当归功于萨拉森人即阿拉伯人。他们发明了代数,并创立了实验科学。

萨拉森人同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也充当过人类理性进步中的先驱，也住在一个被自然屏障同其他国家隔开的国土上。这种自然屏障主要是大海,其次是沙漠。但是，他们在许多方面，又与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和当时所知道的其他一切民族有所不同。他们的国土只有一小部分可以耕种，所以基本人民群众仍然处于游牧状态。整个国家的管理制度不够发达，还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这个民族分成许多部落，彼此独立。在他们这里不可能产生专制。但是，把这种性质的社会组织移植到城市人口众多和政府有固定地址的以耕种为主的国家里，必然要迅速地蜕变为专制。当阿拉伯人成为征服者的时候，一部分定居在阿拉伯半岛境外的阿拉伯人，就建立了专制制度。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定居在西班牙的摩尔人①才没有把宗法式统治制度变成专制制度。

阿拉伯人把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实行的政治制度，后来又推广到被他们征服并在其中建立起国家的国土上。我在这里不打算

① 古代和中世纪时期，欧洲人对北非的土著居民，包括后来迁移到那里的阿拉伯人的称呼。——译者注

详细发挥我对这种政治的看法。我所以不想发挥这种看法，是出于两种考虑：第一，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不够明确；第二，我在这里叙述的数列只具有插曲的性质，所以我应当避免说得离题太远。这要涉及到种族史，而种族史则是本书的第二部分将要讨论的。由于这个理由，我似乎应当压缩数列的前几项的叙述。这样，我也可以在以后的叙述中避免雷同的赘述。

数列的第十一项

欧洲社会的奠基人是查理大帝。他把构成这个社会的各个民族巩固地团结在一起，用宗教的纽带把它们同罗马联系起来，并使这个城市独立，不受任何世俗政权的管辖。从查理大帝开始，一直到现在，欧洲社会在物质力量方面始终强大无比，但是在精神方面，只是把摩尔人从西班牙驱逐出去以后，才名列前茅。欧洲社会还没有使人类理性迈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步伐。这个社会在科学方面取得的一切成就只具有局部性质，换句话说，它只是在个别科学方面有所进步。欧洲社会至今完成的科学工作，只能视为是一种用以实现思想体系方面的全面改进的准备工作。分析它从十五世纪至今所作的科学工作，可以看到两千年以前建立的科学体系已经彻底垮台，而阿拉伯人在阿尔一马门哈里发执政时期奠基的科学体系，则已成为非常先进的体系。但是我要重复一句，这个结果还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步伐。

现代欧洲人，也就是我们，还无权利要求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即不以逢迎同时代人为目的的历史学家把我们与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和萨拉森人等量齐观。埃及人把因果的观念区分开来，

并建立了宗教思想体系；希腊人创立了多神教；罗马人创立了有神论；而萨拉森人则用支配宇宙的多数规律的观念取代了作为有神论的基础的有灵原因的观念。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我们已经作过了什么。

我再重复说一句，我们在继续完成萨拉森人的工作，并使它达到完善的地步。但是，我们未能把多数规律的观念归纳为单一规律的观念，或者我们至少还没有按照单一规律的观念改造科学体系和应用体系。这项任务还没有完成，有待将来解决。这使我们不得不设置第十二项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请求读者回忆一下我在序言里所说的一段话：数列的前几项是过去，后几项是未来。可见，研究人类理性的既往发展，可为我们指出人类理性的未来发展的道路。我请求读者思索一下：对于原则的应用所作的这个简述，是不是确实地证明了原则的正确性。我请求读者暂时停止阅读我的文章，想一想未来将会怎样。读者将会发现，你们的想法正如下一项所述。

数列的第十二项

我们的一般知识体系将要加以改造，它应当建立在一种信仰上，这种信仰就是认为宇宙受单一的不变基因所支配。一切应用体系，如宗教体系、政治体系、道德体系和民法体系，都要符合我们的新知识体系。

现在，我不准备较详细地谈论人类理性发展的过去和未来。即使我在这第一部分已经提到这个问题，那也不过是一段插曲，初步地提一下而已，所以只好说得简短一些。使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我

认为人类理性为了使一个思想的各部分得到发展，必须知道它的整体；但人的注意力非常有限，所以在整个工作期间常常要使对象的整体重现在他的眼前，我现在也准备这样作①。……

结　论②

……现在，要使我们的智力能够得到最好的应用，就得：(1)使人类科学具有实证性质，把它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之上，并用物理学的其他部门采用的方法来进行研究；(2)把人类科学(由此建立在生理学知识的基础上的)列为国民教育的学科，并使它成为主要的学科。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建立下列数列：

第一数列：比较无机体和有机体的结构　这项比较的结果，证明无机体发生的作用和有机体对外界的作用，与它们的结构的完善程度成正比。

第二数列：比较各种有机体的组织水平　这项比较的结果，证明以下两项：(1)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有机体中，人是最好的有机体，也就是最有组织的；(2)动物的身体组织水平越高，它的智力越发达。

第三数列：比较动物在各个生存时期的智力　这项比较的结果，证明一切动物都随着它们的原始组织的改进而成正比地发展，

① 由此删去第五个观察和第六个观察未译，因为都是讨论人和动物的生理组织的差异的。——译者注

② 删去结论的前半部分未译。——译者注

如果说人是唯一能够自我改进的动物，那是因为人妨碍了其他动物的本来能够改进的智力的发展。

第四数列：比较人类知识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状态　这项比较的结果，证明人类的智力从来没有停止进步，从来没有向后倒退。

第五数列：从十五世纪至今的各种主要科学事件和政治事件的大事年表　研究这个年表里所列的事实的结果，说明了人类现在遭到的危机的原因。分析这个危机，推断结束危机的方式，指出学者手中拥有的可以缩短危机期限和按照有利于全体欧洲人民的方式消除危机的手段。

在本书的这个第一分册里，我概述了四个数列。下一分册将叙述第五数列。在编著本书的时候，我曾确信：如果这五个数列在方法上能够成立，那么：

（1）把生理学的学习引进国民教育将不会遭到反对；而如果遇到障碍，生理学家也会有充分可靠的论据，毫不费力地把它克服；

（2）政治将变成一门实验科学，而政治问题最后将交由研究实证的人类科学的人士，采用现在对有关其他现象的问题所采用的同样方式和方法来加以讨论。

给生理学家的信

先生们：

兹奉上拙著第一部分的题词，敬希查收。我的创举的成败，与诸位有直接利害关系。诸位是完全可以信任的。在一切学者当

中，只有诸位最能使我获得教益，也只有根据诸位的指教，我才能集中我的精力卓有成效地来改进人类的命运。改进人类的命运，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工作目的。没有诸位先生的襄助，我就不可能成功。如果你们大力支持我，那末，用不了几年工夫，我就可以完成科学中的伟大而有益的革命。

历史证明，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交替进行的，一个接着一个，彼此互为因果。我们要概述一下十五世纪以来发生的最主要革命。这样的概述会使诸位看到，下一次革命应当是科学革命；拙著也会十分清晰地向诸位证明，这次革命的主将正是诸位，而从这场革命得到好处的也主要是你们。

科学革命

哥白尼推翻了旧的宇宙体系，并建立了新的宇宙体系。他证明地球决不是处于太阳系的中心，从而也证明它更不是宇宙的中心。它证明太阳才是这个体系的中心，而我们居住的星球只占其中的一部分，起着微乎其微的作用。哥白尼的证明，从根本上摧毁了基督教的整个科学空中楼阁。

政治革命

路德改变了欧洲的政治体系，使欧洲北部的居民从教皇的宗教裁判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他削弱了联系欧洲各族人民的政治纽带。路德的革命的胜利，引起查理五世产生要把欧洲的全体居民都置于世俗裁判权之下的想法。他试图实现这项计划，但他未能如愿以偿。

科学革命

培根以其论述科学尊严的作品，在更大的程度上，以其题名为《新工具》的著作中提出的思想，推翻了旧的科学体系。他证明说，我们的知识体系，只有打下完全由观察到的事实构成的基础，才能巩固地建立起来。

伽利略证明地球每昼夜自转一周，从而完善了哥白尼的体系。

政治革命

查理一世被他的臣民审判，在绞刑台上丧命。英国完成了最令人难忘的政治革命，建立起古代各族人民所不知道的新的社会组织制度。英吉利民族把王权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可以继承的，其中包括支配皇室费和享有一切荣誉；另一部分主要是审查当选资格的，英吉利民族把这项权利委托给财政大臣，而财政大臣则按议会的大多数议员的意见任免。

路易十四也同查理五世一样，企图把全欧洲都置于世俗裁判权的管辖之下。他最初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后来使法国面临灭亡的边缘。

科学革命

牛顿和洛克出世了，他们创造出使科学向前迈进一大步的伟大新思想。后来，法国人接受了这种思想，并在百科全书中加以发挥。参加百科全书编写工作的，都是法国的最著名学者。

法国的全体文人掀起了反对政府的精神造反。他们大胆议论

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研究权力的起源问题，发表许多文章来叙述他们认为最好的社会制度。他们鼓吹政治改革，也就是鼓吹革命。

政治革命

法国革命是在百科全书出版后不多几年开始的。下层群众象沉渣一样浮了上来，愚昧无知的阶级掌握了整个政权，但是由于他们无能，结果在富裕中造成了饥荒。一个有天才的人①，实现了全体有教养人士的愿望，他改革了君主政体，给它设立了元老院和立法团作为制宪机关。

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把重新实现查理五世和路易十四企图置全体欧洲居民于自己的世俗政权的压迫之下的野心，作为自己的任务。这种野心酿成的双方角逐，引起了一场殃及全欧人民的战争。

科学革命

我们在这里要谈一谈未来。我所要说的是一种预言。我本可以大大发挥这一预言，但是我暂时只想谈一谈有关人类科学的部分。

以生理学知识为基础的人类科学，将成为国民教育的学科；凡是受到这一科学知识哺育的人，在达到成年之后，将会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利用物理学其他各部门用于有关现象的方法。在十八世纪的科学著作和十九世纪的科学著作之间，将会出现一个差别，

① 指拿破仑。——译者注

即十八世纪的一切文献崇尚破坏，而十九世纪的文献将重视社会的再建。

皇帝的雄才大略能够立即觉察出智力发展的一切趋向，他预见和预先感到了这种革命。他提出用什么方法才能加速科学进步这个问题要求法国科学院解决，从而引起了这场革命。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向全世界人提出的，因为他们都希望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还包括下面两个问题：用什么方法才能恢复欧洲的安宁？用什么方法才能改造欧洲各国的社会和改善人类的命运？此致

敬礼！

你们的最忠实和最顺从的仆人 昂利·圣西门

寄自马松—索尔邦路医学院印刷工人M·狄多住所。

（王燕生译）

论万有引力①

迫使英国人承认航海自由的手段

上书皇帝陛下

陛下：兹献上迫使英国人承认航海自由的手段。请陛下颁布如下命令。

皇帝命令：

一、对提出改造欧洲社会的良好方案的设计人，将酬以二千五百万法郎②；

二、全体欧洲人，甚至地球上的全体居民，不分民族，都可以提出自己的作品应征；

---

① 《论万有引力》写于1813年底，与《人类科学概论》存在有机的联系，在安凡丹编辑的《圣西门全集》里，把它当作《人类科学概论》的一部分合编在《人类科学概论》之内。圣西门认为万有引力具有普遍意义，一切社会科学均应建立在这一定律的基础之上。但是，圣西门并没有充分发挥和令人信服地论证他的这一古怪思想。

大陆封锁问题是促使圣西门写作《论万有引力》的动因。当时，法国的工商业和欧洲大陆的各国人民，因大陆封锁受到了很大损失。圣西门在本文里提出了这个问题，向拿破仑建议采取他提出的措施，以迫使英国放弃大陆封锁政策。但在本文的叙述里几乎没有具体地论述这个问题，而完全陷入哲学方法论的讨论。我们翻译所据的原文，载1966年法文版《圣西门全集》第5卷。——译者注

② 用这样巨额的金钱悬赏来鼓励卓越的学者从事研究这个问题和寻找解决办法，当然是不必要的，但是为了引起社会的重视，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寻求普遍和解的方策上面，却是有此必要。公众中的绝大多数个人，可只根据所提方案在将来会有什么好处来评价这一方案。

三、应征的作品应在来年12月1日以前提出;

四、每部应征作品应提出一式三份:一份提交朕,一份提交奥国皇帝,一份提交英国摄政王;

五、朕将邀请奥国皇帝和英国摄政王与朕共同讨论应征的作品,如果这两位国君不采纳朕的建议,朕将单独宣布自己的决定;

六、应征获奖作者的姓名,将在1815年1月1日公布。

皇帝陛下:一切应征作者的作品,要在一点上取得一致的意见,那就是欧洲大陆上的全体人民应当集中自己的力量,迫使英国人承认航海自由。但是,它们还要更加明确地承认另一点,即陛下不应再作莱茵联盟的庇护人,而要把军队撤出意大利,使荷兰恢复自由,停止干涉西班牙的内政。一句话,要恢复各国的天然国界。

如果陛下同意放弃您的征服计划,陛下就会迫使英国人恢复海上航行自由。而如果陛下希望您已有的桂冠再继续大量增加,陛下就会毁坏法兰西,以致最后直接而完全违背您的臣民的意愿。

皇帝陛下:我深信我能够为陛下和您的臣民建立共同的利益。我的这个信念十分坚强,使我敢于振臂疾呼,发表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我的动机是纯洁的。我衷心希望陛下光荣和同胞们幸福。陛下在任何情况下都经常以宽大为怀,这使我得到一个可靠的保证,相信陛下会宽恕我敢于大胆陈言,讲出我的思想发展使我不能不说出的一些话。

乍看起来,我提出的办法或许象哲学家的梦想,跟圣比埃尔神甫[①]的持久和平计划一模一样。

① 参看第8页注。——译者注

我想对陛下略进数言，证明我的目标不是幻想，而是现实。

为了能够得出答案，我曾仔细地研究过这个问题。我恳请陛下圣鉴，接受我献给您的这部著作。

我把我的改造欧洲社会计划的草案叫作《论万有引力》，因为万有引力的观念应当成为新哲学理论的基础，而欧洲的新政治体系则应是新哲学的成果。虽然我不得不作相当深奥的抽象叙述，但是我希望我的想法能具有明确的、甚至引人入胜的形式。我敢相信，只要陛下一读拙著，就会对它感到兴趣盎然。如果陛下不肯开恩亲览，我将感到不幸，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象陛下这样有权威来评定这部著作。

皇帝陛下：人类理性的进步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政治问题的最重要论据已经可以并且应当直接从高级科学和物理科学方面获得的知识产生出来。赋于政治以实证性质，这就是我的成名成家思想所要追求的目的。如果我的倡议得以实现，那末，我将因它能增添我深为钦佩的陛下的德政光泽而感到莫大荣幸。谨呈

陛下：

您的最忠实、最顺从、最听话的臣民谨叩

前　　言

先生们：

一个儿童，要想将来身强力壮，就得长期不断地受到周围人的照顾。对于思想也可以这样说。一般被人公认的原则，在它产生的时候，只不过是初步的刍议。后来，享有学派信誉的人支持这项

刍议，促进它发展成长，使它具备了稳固的性质。我请诸位先生善意地对待我提出的著作。

我准备谈一谈万有引力。这个观念对于物理学家的关系，正如神的观念对于神学家的关系一样。为了研究这个共性的共性，找到改进它的认识手段，思想必须特别集中。

我把这部著作分为三个部分。

我准备在第一部分叙述原则，在第二部分研究这些原则对于引力观念的应用，在第三部分阐明这些原则对于我们的知识体系的一般应用。

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是单独研究的对象。题目本身就十分重要，而内容又十分丰富，以致全部问题不是一篇论文可以讨论完的。因此，我首先以三篇研究报告提纲的形式，向诸位概括地介绍一下我的著作。现在，我就把这三篇研究报告的提纲依次提交贵学术法庭审查。

第一篇研究报告的提纲

导 言

人们认为使用水泥最少的房屋是最好的，而铆焊最少的机器则是最完美的。对于精神产品也可以这样说。用最少的词句使全篇连贯起来的作品是最有价值的。希波革拉底[①]的《箴言》，比其

① 希波革拉底（Hippocrates 公元前约460—377年），古典希腊的天才思想家和医生，为几乎一切医学科目奠定了经验医术的基础。《箴言》是希波革拉底的一部医学著作。——译者注

他任何书籍都写得好。正因为这样，它才一直拥有最多的欣赏者。先生们，我现在向大家介绍的思想，都以纯朴的自然形式出现。除了叙述的次序所需要的联系以外，其中不加其他任何联系。

第一种思想

有两种观念，其性质完全不同，不管你怎样设法去隐瞒其中一种观念的真正起源，或赋予它以非本身所固有的性质，也总是会查出它是出于来源 A，还是出于来源 B。

对事物可以先天地 (à priori) 认识或后天地 (à posteriori) 认识。

在第一种场合下，可以有效地用观念来联系所观察的事实；但是，要想用观念来精确地规定事实或发现新的事实，那是徒劳无功的。

在后天地认识事物时，情况与此完全相反。这时，认识以精确的事实为根据，它引导我们的理性沿着有助于发现新事实的道路前进。

先生们，我们的观念诚然有两种，其性质完全不同，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即都来自我们的感觉。问题在于我们的感觉并不是同一原因的结果。外部对象作用于我们的身体时，特别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产生的是一种感觉；而内部生命力（潜在力量）的作用，则由于它对我们的器官和感官发生影响，而决定着另一种感觉的形成。一些感觉来自我们身体的外表，然后传达到中枢；另一些感觉则在中枢产生，然后向四周的外表扩散。按本质来说，前一种感觉是后天的，而后一种感觉则是先天的。

经过深思不难确信，而且也容易从经验上证明，任何一种观念所固有的共性或个性的特点，都永远不会消失。某种观念的个性，决不与其他观念的原来的个性相同，而前一类观念的共性也决不与其他观念的共性相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后天地认识的观念应当经过再认识，以使它取得完全的先天性；或者相反，对先天地认识的观念也应当经过再认识，以使它取得完全的后天性。

第二种思想

至今，只是根据形而上学观点的考察，把科学研究分为先天的科学研究和后天的科学研究。至今，人们认为各种不同的现象，可以用这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来研究，或同时并用两种方法来研究。我们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要从物理学观点来考察这种分类。我们将要说明，只有一类现象可用后天方法来研究；而另一部分科学，我们总认为是先天的。

物理学这门科学分成两大部门，即分成有机体物理学和无机体物理学。我们感官的证实作用，是研究无机体物理学的基础。但是，我们感官所作的证明，显然是后天思维的出发点，所以十分清楚，在研究这门知识的时候，我们应当走后天的道路。

在有机体物理学中，我们的生命力（被看作潜在力量）的作用是我们一切研究的出发点，因为我们总是根据类推原则，来判断其他有机体内的全部和部分生命现象的细节的。有时产生这种情况（对此还始终没有人指出）：当由后天考察向先天条件过渡时，实际上就是由无机体物理研究向有机体物理研究过渡；反之亦然。

从物理学上来讲，对生命作出正确的定义，是划定先天感觉和

后天感觉的分界线的唯一手段和可靠手段。

从物理学上来讲，生命是物质的一个点，我们的一切生命力都向这一点集中，并由这一点向四周扩散。后天感觉是生命力由我们身体的外表向集中点汇合的结果，而先天感觉则是生命力扩散活动的结果。

先生们，如果你们肯下工夫，深入了解这一思想，做到必须把它掌握为止，那末，这种思想在你们这些比我高明得多的人士手中，将会变成最有价值的科学源泉。

第三种思想

这种思想完全不是我的思想数列中的必要一项，它只是第二种思想附带的成分。本节的内容，是讨论上一节所确定的原则的应用。在这里，我要列举一些证据，以证明这一原则的巨大好处；同时指出，根据这一原则，可对原因至今不明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实作出满意的解释。

达兰贝尔在他的《百科全书引论》中，孔多塞在他的《人类理性进步的历史概观》① 中，以及论述知识起源的其他一切作者，都承认最初被人研究的科学是天文学和医学，但是其中没有一位作者指出这个事实的重大意义，谁也没有说明它的原因，而我们现在却很容易把这个原因找到。

① 孔多塞，让·安都昂(Condorcet,Jean Antoine 1743—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学者和思想家。他的数学、经济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对圣西门世界观的形成起过很大影响。他在《人类理性进步的历史概观》中，用决定论的观点阐述了人类的逐步发展。圣西门曾预定根据这部书来写他的《人类科学概论》的第二部分。——译者注

我们的观念，不外是我们利用表示感觉的符号进行加工和随意再现的感觉。

我们的知识不外是连结起来的观念数列。

因此，既然我们的知识来自我们的观念，而我们的观念则直接产生于我们的感觉，那末由此可见，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观念，都应当根据物理学观点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别，因为我们在上一节已经明确指出，我们存在着两种感觉：一种感觉来自集中的生命活动，另一种感觉来自扩散的生命活动。

上述的一切，首先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科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分成两个彼此非常不同的部门；其次说明我们现在称为无机体物理学和有机体物理学的这两个部门，在它们产生的时候就有两个萌芽：其中的一个萌芽叫天文学，另一个萌芽叫医学。

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它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结果，但至今还未引人注意。这个事实就是：人们的两种感觉，从而也就是我们的两个知识部门，都是在同一个时代获得最优越的成就的。也就是说，在无机体物理学中有什么发现的时候，有机体物理学也必然会有重大的进步。

比如，哈维①是伽利略的同时代人，洛克和牛顿生于同一时代。

我们并不想因此就说：我们在两门物理学方面的知识的进步，一定发生在昌盛的时代。相反地，我们在以后的一节中将要指出：从柏拉图到阿拉伯的哈里发时期，人类科学的发展比无机体科学

① 哈维，威廉(Harvey, William 1578—1657年)，英国的著名生理学家和医生，血液循环的发现者。——译者注

迅速得多；而从七、八世纪的阿拉伯人到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理性则在无机体科学方面特别进步。为了总括和概述最后这两种想法，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我们神经系统的生命流体的呼吸活动（它是感觉的基本原因），总以呼出和吸入的形式出现——呼出是我们的被动感觉、后天活动和无机体物理认识的原因，而吸入则是我们的能动感觉、先天活动的进步和有机体物理学的成就的原因。我们说，生命流体的呼吸活动总是表现得十分明显，但不一定相同，因为证明生命流体的集中活动结果的科学资料，在以前的十一个世纪就已积累得很丰富了，而说明生命流体的扩散活动的资料，则在后来的十一个世纪才多了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恢复了平衡，因为后来发生了相互补偿作用。

本书的篇幅有限，我们只能作扼要的叙述。如果我们是向没有受过高深教育的人或凡夫俗子解释，我们就应当详细发挥以上所述的观点；但是，诸位先生，你们的科学才能，无论从禀赋来说，还是从学识来说，都使我们可以不必赘述，而只向你们直接提出最终的结论就可以了。如果让诸位浪费很多时间来阅读我的著作，我也感到过意不去；你们对此抱有成见，也不会对我不利，因为我在学术界还没有任何声望。

第四种思想

我们在《第二种思想》中已经指出，至今只是根据形而上学的观点，把科学著作分成先天科学著作和后天科学著作。我们现在要说，在这方面，人们的认识还很不全面。为此，我在研究过程中

要回述到伟大的培根时代，因为他现在仍在英法两国的哲学界中占据首位，因为自从这位伟人逝世以后，还没有一位学者能在思想方面达到他那样高度的概括水平。

培根当然对科学作了很大贡献，但还没有达到人们所想象的那种程度。他的贡献至今仍被人们夸大，显然超过了他实际应得的荣誉。培根并不是象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精通万事的完人。可以证明这种看法的是，培根没有彻底阐明关于方法论的思想，而是象我们所指出的，他反而把这种思想弄乱了。

在法国，人人都在谈论这位作者，但是读他作品的人却很少。他的作品的精髓，只是由于孔狄亚克①的介绍，才被人们了解。孔狄亚克论证了培根关于方法论的思想。为了使人人都能理解，我们的证明当然要直接涉及孔狄亚克所发挥的一些原则。

证　　明

这个证明涉及一个最重要的形而上学问题，它非常简要，又是至今所作的一切证明中最完整的证明。只要把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就自然会产生出来。但是，问题的这种提法，既要求我们特别细心，又要求你们密切注意。现在，我们利用事先判断，来精确地规定我们想要阐述的要点。

事先判断:

(1)用两种方式表达关于个别事实向主要事实上升的思想：为

① 孔狄亚克，埃蒂耶纳(Condillac, Etienne 1715—1780年)，法国的思想家，在认识论方面最彻底地发展了十八世纪的启蒙哲学，把一切认识过程都直接归结为感觉。尽管孔狄亚克持有不可知论的观点，但是他的认识论的许多重要论点却接近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译者注

了表达这一思想的被动方面，人们使用了**后天地**(à posteriori)这一术语，而用**分析**这一术语表达这一思想的主动方面。

术语**先天地**(à priori)，相当于综合的主动形式。

(2)为了正确地论述方法，必须清晰明确地了解下述三个判断过程：第一，就是在所研究的问题有数量非常多的中间判断，而这些中间判断又是按照其共性的大小依次排列的时候，在问题的最个别判断和最一般判断之间建立的过程；第二，就是把所有的个别判断归纳成一般判断的过程；第三，就是从最一般判断下降到最个别判断的过程。后两种过程可以互相证实。

(3)孔狄亚克完全令人信服地证明，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最明确地表达观念。这种方式，就是用定义十分明确的各种术语来表达观念。如果我们的语言十分丰富，作出正确的论断并不困难，甚至不可能作出不正确的论断。

现在，只须用几句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重要问题，并且可以证明人们现在对于最初由培根提出而后来由孔狄亚克论证、确定和建立起来的方法所持的看法，正处在可怕的混乱状态。这是一场真正的大混乱，如果不创造一种新的**语言**，那是无法廓清的。

先生们，请你们回味一下人们在听到重大发现时所产生的感想。诸位可能说：这个发现太容易了，容易得使人觉得它未被大家及早发现而感到惊奇和难以置信。请你们再等一些时候，就会与我们共同庆祝在你们面前出现的改革。这种改革具有可以形成某种理论的最重要形而上学因素。

解决办法

孔狄亚克用分析这一术语来表达下述的一般判断过程：在判断过程中需要建立中间判断，并以尽量增加中间判断的数量为目的，也就是说，尽量从最多方面和从四面八方来考察所研究的问题。他也用分析这个术语来表达两个次要判断过程中的一个过程，即表达由个别的事实、观念或判断上升到一般的事实、观念和判断的过程。他用综合这一术语来专门表达另一个次要判断过程，即表达由一般观念下降到个别观念的过程。

先生们，由此可以明显看出：

（一）孔狄亚克把关于方法的概念弄得一塌糊涂，使分析这一术语具有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而对这两种不同的意义，又绝对必须用完全不同和十分明确的术语来区别。

（二）孔狄亚克，从而也有培根（这种虚假方法的真正发明人），给予后天判断方法的重视大大高于先天判断方法，因为他们在用分析一词规定这种方法时，也同规定一般判断过程一样，把这两种过程合而为一了。这样作，只能降低综合这一判断过程的作用，而必然把综合同分析等量齐观，即认为综合的重要性和效用不过跟次要的分析过程相等，其实分析应是综合的对偶。

（三）最后，说明关于方法的概念的唯一方式，应是用一个术语表达主要过程，而对每一个次要过程则用其他术语来表达。

先生们，当我们利用我们所取得的选择用语的权利，指出创造这个用语的全部好处之后，把应当作为任何理论的基础的一般过程称为笛卡儿式过程，你们应当承认这是公正的。我相信你们一

定会赞同我的这种爱国主义热情，它将激励我们立即摆脱很长时期以来压在我们头上的英国的科学枷锁。

第五种思想

我们在上一节里已经明确地指出培根所犯的错误，在这一节里我们来揭示它的原因。人，甚至是最精明强干的人，都是环境的产物。因此，正确地叙述培根所处的环境，会使我们了解环境对培根哲学产生的影响。

促使北方各族文明开化的基督教，遏止了在意大利风行的荒淫生活习气，促进了欧洲地区的开发、欧洲沼泽地带的排干、欧洲气候的改善、道路和桥梁的敷设和医院的建立；基督教在人民中间传播了读书识字的重要学问，使各地实行了人口登记制度，开展了搜集历史资料的工作，削弱和几乎消灭了奴隶制度，最后组成了从未有过的人口最多的政治社会。我们说，基督教在作出这一切重大贡献之后，就成了一种已经完成自己使命和做出一切贡献的制度。现在，基督教已经过时了。这个制度在各个方面：无论在它为社会规定的法律方面，还是在它用来统治社会的法官方面；无论在它传播的道德方面，还是在受它鼓励而活动的传道者方面，都已成为社会的累赘。

在象培根这样精明的人的眼里，宗教只是、也只能是一般的科学理论，而理论只是用来建立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的。自从基督教理论建立以来，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了；但它未能把人类理性在这一千五百年间所掌握的知识整理得井井有条，这是不足为奇的；实际上，它也不可能把它成立以后所发现的各种事实都联系起来。

阿拉伯人改革了科学的两个主要部门，因为他们同时建立了新的天文学派和新的医学学说。在他们给科学指出的新方向方面，已经有了许多新发现；但是，为了建立新的科学大厦，还必须收集所需要的大量资料。培根清晰地意识到，人类理性有继续进行本身的探索的需要。因此，他一方面力图破坏在取得宗教性质以后而拥有巨大力量的旧理论的威信，另一方面又提出许多方法来引导理智到各科学部门去探索新的发现。

由此可见，培根为他生活的时代作出了他所能作出的贡献，说出了他所能说出的最好言论，写出了他所能写出的最好作品，从而竭尽他的全力打击了先天哲学的威信，并且全力促进了后天哲学的发展。

先生们，你们是不是认为，如果培根今天死而复活，也会说出这些话来呢？请你们设想一下，这位伟人今天真正复活过来，并前来参加法国科学院①的会议的情况吧！如果他看到第一学院的任何一个学部都没有研究哲学问题，看到这个无所不包的学术机关竟然没有一个学院研究哲学问题，他会感到何等的惊讶！像培根这样的人，一位在各种学术工作方面都堪称师表的人，要想参加科学院，不管他以什么理由提出，都进不了第一学院，第二学院只能把他看成是一位天资聪敏的人，而第三学院则只能把他看作是一位有学问的人。

请你们设想一下，这位哲学家从法国科学院出来，再到一所大学去的情况吧！如果他看到这个以教育为己任的学术机关，与以

① 参看第5页注。——译者注

改进科学为目的的学术机关没有任何有机联系，他会感到何等的惊讶！

请你们设想一下，他离开了这所大学，接着又遍访欧洲各国内阁的情况吧！如果他看到各国内阁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处在不受人民欢迎的境地，看到各国内阁都使用微不足道的资金去医治社会的巨大创伤，他会感到何等的惊讶！他会十分惊奇地看到，在这里竟没有一个人感到有必要恢复欧洲各国人民共同的政治机构，以便在政治上把他们联合起来和制止每个国家的民族野心。

我们已经叙述得相当充分，只要再向前迈出一步，就可以到达一般观念了。在这科学的进军中，来到智慧顶峰跟前而不攀登上去，却又回到我们思想的出发点，未免是懦弱无能的表现。先生们，振奋起来吧！我得到一种灵感，好象培根在通过我的嘴说话……下面，就是培根首先对法国科学院说的话：

"先生们，你们有一百六十个人。你们无论在天才方面，还是在学识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你们定期出席会议。你们被分配在各个学院和学部，研究各科学部门的知识。你们有主席，也有秘书，但是算不了一个学术团体，因为你们只是凑在一起的一群学者，你们的工作没有任何完整的东西。你们的工作成果只是一大堆错综复杂的思想，因为你们的思想没有用一个统一的一般观念联合起来，你们的团体组织得没有系统。你们的组织所以有这些缺点，是因为你们只是部分地、从而是间接地和不能令人满意地回答皇帝向你们提出的下述重大问题：应当使用什么办法来加速知识的进步？

先生们，你们不想组织起来吗？这再也容易不过了：请你们选

定一个观点，使其余的一切观点都能与它发生关系，并能由它引导出作为它的结果的一切原则。这样，你们就会有哲学了。毫无疑问，这种哲学将以万有引力的观念为基础。你们的一切工作从这时开始，也将具有系统性。至于你们团体的组织方法，这也非常简单，因为各部门都是同样的。请你们指定一个学院专门研究哲学，委托你们吸收进入这个学院的人员从万有引力的观念出发，用他们的先天方法或后天方法，把一切已知的现象总结起来或联合起来。这样，无论从主动的方面来说，还是从被动的方面来说，即无论从思想方面来说，还是从组织方面来说，你们都将有系统地组织起来。你们的力量，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将是不可估量的。”

接着，培根又向大学发表谈话:

“你们的组织只是中间性的和短期的。如果你们不立即采取措施来加强自己的组织，它必然只能存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你们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可行的措施如下:

一、尽可能同法国科学院接近，与它密切合作，以便组成一个伟大的、统一的法兰西学术团体。这样，这个学术团体将由两个职能完全不同的部分构成，即由改进科学的科学院和你们这个传授科学的学校构成。

二、绝对不要忘记，在传授科学的时候，应当多用先天方法，而少用后天方法。

三、要尽快在委托你们实行的国民教育中开设哲学课程，这门课程应以万有引力的观念为基础，以根据这个原则尽可能直接说明各类现象为己任。”

最后，培根到杜伊勒宫向皇帝进谏，禀奏道:

"皇帝陛下：圣上的大军，从卡迪斯[①]到莫斯科，从汉堡到意大利南端，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圣上的武功已登峰造极，而陛下为使武功继续增加所做的努力，只会使武功逐渐减少。在陛下登极的最初几年，是历史上的最辉煌时期。现在，陛下已经达到成年，陛下的政务也应当具有与这个生活时期相适应的安静稳定的性质。

"皇帝陛下，圣上曾以查理大帝为楷模。在军事方面，陛下大大超过了查理大帝，但是查理大帝不仅是一个军人，而且在政治方面也很英明。他是欧洲的最伟大政治家。陛下的雄才大略难道能在这一方面甘拜下风吗？

"查理大帝是欧洲社会的真正组织者，他利用政治联系有条不紊地把欧洲各族人民联合起来。从八世纪到十五世纪，这个政治联系从未被破坏，而是卓有成效地执行着它的使命。但是自十五世纪迄今，它逐渐趋于松弛，而目前已被陛下完全摧毁，因为陛下剥夺了教皇对罗马行使的主权。

"查理大帝明白，整个世界及其所属岛屿上的居民人数众多，而且是由许多民族构成的。这些民族的风俗习惯极不相同，操着完全不同的语言，互相被天然境界隔开，生活在气候条件不同的地方，所吃的食物也不一样，所以不能统统由一个政府管辖。他也明白，这些居住在相邻地域的不同民族，如果不以共同的一般观念联系起来，如果不由最有学问的人组成的团体负责采用一般原则来解决对这些民族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如果不成立国际法庭，就

---

① 在法国的西部。——译者注

必然不断地互相征战。查理大帝明白，宗教是欧洲各族人民的共同道德法典，由宗教的神职人员组成的管理机关，也应当具有一般机关的性质。最后，他也明白，必须使宗教和僧侣阶级的首领拥有独立的权限，从而使他们不直接听命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这就是使他授权教皇管辖罗马及其领土的原因。

“皇帝陛下：我现在把我要向圣上奏明的问题分成三个部分来叙述。在第一部分，我准备略述从查理大帝到十五世纪发生的事件。在第二部分，我一方面要向圣上说明查理大帝用来联合欧洲各族人民的政治联系是怎样在文明进步的影响下逐渐破裂的，另一方面说明科学的进步如何提供了改组欧洲社会和改进欧洲政治体系的方法。在第三部分，我想坦率地向陛下提出一种方法，使您可以把您的万能智慧和强大权力用来为欧洲造福，为法兰西民族增光，以及用来满足陛下个人的意愿。后代需要您及时进行的这些工作，会使陛下比您所借鉴的查理大帝更为英明。”

第一部分

“人们把历史称为君主的谘政纲鉴，然而人们认为这部纲鉴对君主如何治理国家却毫无用处。从科学观点来说，历史学实际上还没有脱离摇篮时期。人类知识的这一重要部门，迄今不过是一堆多少比较精确的事实。但是，这些事实没有用任何理论贯串起来，还没有按前后一贯的次序联合起来。因此，无论对君主来说，还是对他们的臣民来说，历史还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借鉴。它既没有为君主，又没有为臣民提出过继往开来的方法。目前，只有

各个民族的历史，而这些历史的作者又都以过高评价自己同胞和大力贬低敌人为其主要任务。还没有一个历史学家采用过一般观点，也没有一个人写过全人类的历史。最后，还没有一个人向君主进谏，直言什么是所发生的事件的后果，什么是文明所向的自然秩序，什么是陛下应当运用大权追求的目标。

“仅向君主们进言说，他们应为臣民的幸福而勤政。这就等于向他们说了一句对于指导他们的活动毫无现实意义的空话。我本来可以大大发挥这段前言，并能把它说得津津有味，但是考虑到陛下的时间非常宝贵，不能浪费在消遣方面。因此，我准备只用一个论点来结束这次讲话。这个论点就是：使各国的现代历史学家能够取得一致看法的唯一重点，乃是我即将证明的一种错误见解。他们都把从九世纪到十五世纪这段期间叫作野蛮时代。其实不然，人们正是在这几个世纪当中，建立了使得欧洲社会在政治方面绝对优胜于以前时期的所有机构。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从九世纪到十五世纪都建立了哪些主要的政治机构；然后研究其中每个机构的宗旨，分析它们所作的斗争怎样得以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维持，甚至有助于社会秩序的改进。

“把权力分成**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这是人们想出的第一个划分。这一划分好得无以复加，它是直接从我们的思维能力分为先天的事物观察力和后天的事物观察力而产生的。精神权力是在政治上应用我们的先天的事物观察力，而世俗权力则是我们的后天的事物观察力所产生的政治活动。这两种权力各有其天然界限。这种界限也象我方才说过的思维能力的划分一样，把这两种权力彼此分开。如果用先天方法观察事物，我们很容易沿着最初的几

级阶梯下降，但是随着逐渐离开出发点，我们由一般事实向个别事实的过渡就会越来越不可靠。在我们从个别事实出发向一般事实前进的时候，则会出现相反的缺欠。这时，我们可以自由地沿着最初的几级阶梯上升，但是越到后来，要想走向一般事实，就很没有把握了。在政治方面，精神权力可以正确地判断对所有民族都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但是，在谈到调整每个民族的个别利益的时候，精神权力的活动就不可靠了，甚至是有妨害的了。世俗权力与此不同，它是其所辖的每个民族的个别利益的最好调整者，但在各民族共同的一般利益方面，它始终不会得出良好的结果。然而，从九世纪到十五世纪，精神权力的影响始终与世俗权力的影响平衡，因为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够吞并对方。实际上，欧洲在这五百年间，完全得到了来自良好社会组织的共同好处。欧洲所以能够得到这种好处，是因为从未有过一次规模巨大的阋墙战争破坏欧洲的安宁。除了欧洲社会曾同宣传伊斯兰教的亚非人民发生过几次战争以外，欧洲内部没有爆发过全面的大战。许多十八世纪作家，只从十字军东征给欧洲带来的害处方面来研究十字军东征。但是，如果不偏不倚地拿这些害处同十字军东征带来的好处相比，我们就会发现好处大于害处。

“在萨拉森人的首领们的脑海里经常出现征服欧洲的计划，而穆罕默德传给他们的宗教狂热又在经常鼓舞他们去实现这个计划。为了迫使萨拉森人放弃这项计划，必须对他们进攻，从而迫使他们注意保卫自己的老巢。”

附注：先生们，我非常希望这段插笔能够引起你们的兴趣，但是也热烈地希望你们读完之后不要对它念念不忘，以使你们可以把全副精力用于

研究我在本篇里主要想发挥的观念数列。简而言之，我请你们暂时把死而复生的培根所说的话忘掉，而只钻研维鲁拉姆男爵①给我们留下的作品。

第六种思想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指出的那样，环境没有促使培根成为一位能够概括全般的完人。因此，他不可能达到最高的科学观点。为了寻找一位最能概括地考察科学的哲学家，必须回溯到古代的苏格拉底。苏拉格底是第一个，而且也是唯一的一个能对整个科学领域一览无遗的人。有人会问我们：苏格拉底的著作没有传到今日，你这一见解有什么根据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根据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虽然只与我们的问题有间接关系，但是能为我们的判断提供一个非常可靠的根据。这个事实的内容如下：苏格拉底的学派后来分成两支，即分成两个小派，其中的一派采用了先天的判断方法，而另一派则经常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运用后天判断法。因为两个学派都明确宣称自己师宗苏格拉底的学说，所以由此可以显然看出，这位哲学家在自己的学说中既使用了先天法，又运用了后天法；而他的学生们，则根据自己的看法，有的采用了前一种方法，有的使用了后一种方法。又因为在苏格拉底逝世以后，没有一个门徒能够兼用两种方法，所以他的学派终于分成了两个小派。由此可以证明，苏格拉底所教导和传授的，正如以上所述，是最高的哲学，即具有绝对共性的哲学。

① 维鲁拉姆男爵(Baron Verulam)，即培根。——译者注

第七种思想

先生们，苏格拉底逝世至今有二千三百年了。在这一期间的头十一至十二个世纪里，柏拉图的哲学、即先天的方法占据优势。在这以后的十一至十二个世纪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即后天的哲学占了上风。可见，人类的理性又经历了一个伟大的哲学时期。因此，目前的环境要求出现一位具有天赋的哲学才智的伟人，把苏格拉底的观点继承下来。

先生们，这一思想是我在这篇研究报告中想要向诸位阐述的观念数列的最后一项。为了使你们能够按照苏格拉底的方法思考，我现在向你们介绍一些用先天方法想出和认识出来的同类思想。我把本篇的这个第二部分叫作«苏格拉底对学生的讲话»。我借用苏格拉底的口发表的思想，如果他在世的时候能够预见到从那时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他也会自己说出来的。

苏格拉底对学生的讲话

“信仰数个有灵性的基因，是荒谬透顶的事情，因为它们彼此不断敌对，不按它们尊为最高首领的宙斯的意志行事，反而嘲弄宙斯。如果世界是被这些有灵性的基因支配的话，那末，它就要处在一团混乱的状态。我们看到，宇宙的秩序井然得使人惊奇。为了使世界存有这种秩序，必然有一个单一的基因支配宇宙。

希腊人以他们拥有的知识自豪。如果只拿他们的知识与在他们之前的其他各族人民的知识比较，希腊人是有权自豪的。但是，如果拿他们知道的东西与他们尚待学习的东西比较，他们就不

会满足于自己的文明了。他们被想象所控制，他们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美术上。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强大得使我怀疑他们的后裔能否赶得上他们。不过，这样就能占据首要的地位吗？我不以为然，我把美术只看成是消遣。我觉得在一切科学中，最重要的乃是哲学。

哲学家站在思想的顶峰，他由这里俯瞰世界，观察世界过去是什么样子和将来应该变成什么样子。他不仅是一位观众，而且是一个剧中人。他是在道德世界中起最主要作用的角色，因为他对世界将来应当变成什么样所持的观点支配着人类社会。在没有跟你们谈论世界将来应当变成什么样以前，在没有要求你们协助我把人类社会组织得最为幸福以前，我打算略微谈一谈过去，因为温故知新，而对于未来所作的判断经常要以过去为基础。我对于这一点只作极其扼要的说明，因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你们早就知道了。

最初的人类超出在机体的发展阶段达到仅次于人类的动物的地方，只在于人类智力的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则直接来自人类的组织结构的优越性。但是这种智力的优越性也是很微弱的，几乎是觉察不出来的。人类在发达到形成语言以前，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只是从语言完全形成（以抽象符号的形成和一般观念——原因、结果——的分立为标志的时代）以后，人类的智力才比其他动物的智力具有绝对的优势，即出现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把人类的智力同低级动物的本能分开。我认为这一切成果只是事先的准备，如果没有完成这种准备，人类的理性就不可能拟出正确的工作计划，也不可能想出引导自己进行研究和思考的方法。

我想确立科学体系应当经常依据的一般观念。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宇宙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我'，另一部分是这个'我'之外的外界。我把大的部分称为大世界，把小的部分称为小世界。大世界对小世界，或者小世界对大世界，经常起着作用和反作用。

大世界和小世界是两个绝对相似的现象。两者之间的全部差异，只表现在规模大小和时间长短方面。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研究宇宙：既可以从小世界来研究，又可以从大世界来研究。这两种方法之间有本质的差异。我们认识大世界，主要研究它从外周到中心的活动；而认识小世界，则主要研究它从中心到外周的活动。用第一种方法研究宇宙是**后天的**研究，而第二种研究则是**先天的**研究。

一切小世界，在一切最重要的方面都彼此相似。因此，在我研究我本身的时候，就同时研究着其余的一切人；在我向你们传达我对我认为有利或有害于我的幸福的一切活动所作的观察时，我很想使一切人都和睦相处。这就是哲学应当为自己规定的主要目的。

我说哲学家主要应当从小世界来研究宇宙，但是，我并不因此主张哲学家应当轻视对大世界的观察，因为这两种研究是相辅相成，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如果完全放弃其中的一项研究的线索，就会找不到另一项研究的头绪。

柏拉图，我承认你的智慧高于你的同侪。我认为，这就是你可以成为我的继承人，继我之后领导我所创立的学派的保证。因此，我主要向你说明一下我的学派在我死后将会遇到的情况，即直接

向你揭示人类最遥远的将来。

亲爱的柏拉图,你的智慧的特点要求你从小世界去研究宇宙,并且要尽可能专门去研究它。你的想象力极为丰富，当你成了学派的领袖以后，这种想象力会更加旺盛。想象力会对你发生很大的作用，以致你会觉得你好象清晰地感到大世界的中心和构成你的灵魂的那个世界的中心之间，因有无数的中间环节而存在着联系;你会觉得你好象摆脱了你所受的束缚,离开了与你并存的一切东西;你会从观念上感到自己超然于宇宙之外,好象你看到了宇宙是怎样运行的，好象你在无拘无束地跟最关心宇宙运行的上帝交谈。

你在将来讲学的过程中,既会有优点,又会有缺点。你要用这种方法确立必要的一般观念,以便奠定伟大的政治体系的基础,指出组织人数众多的社会的方法。我们现在的政治社会只由数十万人组成，而且其中只有数千人是自由人。将来根据你制定的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将有数亿人之多①。你所制定的原则，将会成为人们乐意跟随的向导,因为你把这些原则已经解释得十分清楚,好象它们是由既支配着大世界、又支配着一切小世界的伟大自然秩序产生的。这些原则完全相信你的学说，因为你的学说把它们解释得明确而中肯。最后,当你的信徒看到你的判断所依据的观念,是认为在宇宙中小世界起着主要作用，而大世界只是为了满足小世界的快乐才由伟大的自然秩序规定的时候，他们的自尊心也会得到满足。

我的亲爱的柏拉图,你将建立起完整的形而上学,而你的物理

① 欧洲社会现在就是由数亿人构成的。

学将会令人厌烦。你会把一般原则巧妙地调和起来，但在说明个别事实时将会非常拙劣。

你的最有才华的学生发现你的方法的缺点以后，便会采取与你截然相反的方法。他将宣传这种方法，并将创立一个跟你的学派相反的学派。这个学派的原则将是：我们的一切认识来自我们的感觉。这个原则显然属于后天方法。于是，出现了你的学派的永久反对派，而在你的学派中，人们仍将效法你的先天法。①

在我去世以后，将出现两个学派，它们把原来只集中在我一个学派的工作分开，即在你创立的学派方面，以先天法研究事物，并尽可能只从小世界方面去考察宇宙；而在你的最有才华的学生创立的学派方面，将主要从大世界方面去研究宇宙，从外周到中心来观察事物。在我向你说明这两个学派的情况以前，我要略微谈一谈这种分裂所造成的优缺点。

科学工作只集中在一个学派的优点，在于可以同时进行先天的判断和后天的判断，以及可以同时从大世界和小世界去研究宇宙，所以一类研究的过程可以证实和补充另一类研究的过程。但是，在分裂成两个学派以后，就会建立无限广泛的事实数列，使这些事实得到最深刻的研究，因为每个学派都会根据自己的宗旨，尽可能用同一种判断方法去深入自己的研究。

现在，我向你谈一谈你将来建立的学派和你的最有才华的学

① 苏格拉底的这个预言得到证实：亚里士多德成了柏拉图的敌手和竞争者。学院派和逍遥派*从此开始存在，而且现在仍然存在，并在互相斗争。代表学院派的有德国的哲学家，代表逍遥派的有法国和英国的学派。

* 学院派也称柏拉图学派，由柏拉图的讲学地点 Academie（学院）而得名。逍遥派也称亚里士多德学派，这个名词来自希腊语的动词 Peripatein（散步）。亚里士多德通常是在同学生们散步时讲学的。——译者注

生将要建立的学派的命运。

在人类今后的整个生存时期，这两个学派将要同时并存，轮流互占优劣地位，但是优势始终不会是完全的。到任何时候，一个学派也不会使另一个学派完全屈服。你的学派将在一千年或一千二百年间比你的学生建立的学派拥有更多的追随者，你的学生建立的学派也将在同样长的期间内，即在十一、二个世纪内比你的学派占据优势①。

当然，你非常希望知道在我为你的学派预言能够取得成功的十一、二个世纪间将要发生的重大事件。我现在来告诉你。

我向你传授的哲学思想，对于人类肯定有好处，但是福也伏祸，从来没有不伏大祸的大福。这些思想导致了希腊社会的覆灭。在这个社会里，主要的联系纽带是其中的各族人民对特尔斐神殿及其祭司的预言的尊敬。我要破坏你们的诸神享有的尊敬，破坏这些神的祭司所受的尊敬。这样，我也就能破坏连结希腊各族人民的纽带。希腊人的力量在于他们的团结。一旦他们四分五裂，就容易被人征服，屈从于他族。这就是罗马人要对他们进行统治。罗马人占领这块土地以后，又要被蛮族打败，蛮族将由罗马人的武力所及的最远地区的沙漠和森林地带入侵。这时，人类才感到必

① 苏格拉底的预言完全得到证实，因为柏拉图主义成了建立宗教的基础，教父们都是柏拉图主义的信徒，他们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是社会上的唯一学者；因为柏拉图主义从它成立之日（约在公元前四百年）起到八世纪，一直比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占据优势，而在八世纪的时候，阿拉伯人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翻译过去，并使它们占据领导地位共达一千一百年之久。这是苏格拉底预言他的学生或他学生将要建立的学派约有一千年或一千二百年繁荣期的平均数。

亚里士多德的学派由于阿拉伯人而取得了新的力量和荣誉，并且开始占据优势地位。这个学派的精神成了培根主义的基础，现在仍比柏拉图主义占优势。虽然德国人用尽一切力量来抬高柏拉图主义，但是亚里士多德学派从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一直占优势，优势的期限也正如苏格拉底所预言的，为十一个世纪。

须根据比现今所理解的更为广泛和更为博爱的观念来建立社会组织。柏拉图,你将要传布的原则,在最初的五百年或六百年内只会被少数人所接受,并且会具有宗教原则的意义,即神启原则的意义。这种原则将使欧洲社会的大部分人得到开化,一切社会阶级都会信仰它们。但是,由于事物的本性,一切制度都要逐渐腐朽,所以曾经作为反对派而积极和无私地活动的神职人员,在他们掌握最高权力之后,就要开始滥用这种权力。从此以后,你的学派就要从首要地位降到次要地位,而你的学生将要建立的以大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学派,则将受到精明强干的人们的特别重视。他们寻找各种方法去反对你的门徒只顾享乐而非法滥用职权的行为,因为享乐是与哲学爱好很少有共同之处的。

我的亲爱的学生们,现在我终于要谈到对于人类理性最有价值和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机。在人类的历史中是可以存在这个时机的,因为这个时机是指人类的活动在达到顶峰之后和开始下降之前将要停滞的若干时间。我希望你们特别注意这个时机,但为了不让你们预付过多的精力而感到疲劳,我要赶快讲完这个时机与我即将告诉你们的那个要在二千五百年之后才会到来的时代之间相隔的漫长时期的经过。

我已经向你们说过,我们的先驱者的工作,只是、也只能是事先的准备工作。他们所创造的一切理智武器,他们所发现的一切观念,都是使人类理性达到可以开创科学体系的状态的必要条件。在这以前,还不可能把所获得的知识结合起来和协调起来,简而言之,就是还不能使它们系统化。掌握的材料过少,建立的观点不高,就不可能从高处一眼望到科学的最远领域。

人类理性的财富还非常有限，以致需要很长时间来从事比较繁重的积累工作。我现在开始草拟的科学体系，最快也得在二千至二千五百年以后完成。是的，我的朋友们，为了筑起由我奠基的大厦，是需要数十亿人的努力和数千年的时间的。如果你们考虑到这项工程需要无数的工序，你们就不会对此感到惊奇了。这就必须完成各式各样的智力活动，进行各种程度的一般研究和特殊研究，而这些活动和研究又是无穷无尽的。

因此，出现了三个伟大的时代。我把第一时代叫作准备工作时代，它包括从古至今所发生的和所完成的一切。我把我们现在正进入的第二时代称为臆测体系的组织时代。第三时代将在二十至二十五个世纪以后开始，它是实证体系的组织时代。目前的时代和二十至二十五个世纪以后开始的时代，在下述一点上彼此相同：目前这个时代由我一个人开创，而以后的那个时代也将由一个人开始。诚然，这是一个人的工作，而且也不可能不这样，因为几个人的思想的结合体不能产生具有单一性质的观点。其次，统一的观点和系统的观点是两个相同的概念，所以要有一个由人类理性创造科学的实证体系的时代。也就是说，这个实证体系的各个主要部分的协调工作，也将要由一个人来完成。

我也将在那个时代再现。当然，你们根据这段预言，也可能认为我相信毕达哥拉斯① 的轮回思想。你们这样想是错误的，我在

①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的哲学家，生于萨摩斯岛，反动的贵族党的追随者，曾创办毕达哥拉斯同盟传播他的学说。他和他的学生们研究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据说，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的定理、勾股弦定理、比例定理、声学上的数值关系理论、无理数论、地是球形和转动的理论，都是他发现的。毕达哥拉斯哲学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认为数是整个世界的本质，把数看成是与实在的现实脱离的独立实体。毕达哥拉斯是灵性转生论、即轮回思想的热烈拥护者。——译者注

这方面的观点跟他的看法根本不同。趁这个机会，我想向你们叙述一下我对这个萨摩斯岛的著名哲学家的一般学说的全部观点。我很乐意这样作，因为温故可使我们的精神得到安慰，使我们增加信心和力量，而这种信心和力量又是继续进行和完成关于人类未来的共同命运的研究工作所必需的。

毕达哥拉斯说：特洛伊城陷落的情景，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名叫欧福耳玻斯，在被墨涅拉俄斯打伤后，我改名赫尔莫提姆，后来当了渔夫。我现在叫毕达哥拉斯。

这段话向我们证明，这位天才家的想象把他引到何等荒谬的地步，他把确切的事物当作最虚幻的观念。这也向我们证明，这位哲学家以为灵魂具有实体，这个实体不依存于它的本体而存在，它的持续存在时间等于他的数个外壳的持续存在的时间。我对灵魂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我认为灵魂是形而上学的概念，它是一个几何学上的点，我们的一切感觉都向这一点集中，并由这一点向四外扩散。在我向你们说我将在两千年以后再现于世界的时候，我指的是那个时代的道德条件将同现在几乎相同，那时将出现一个人，那些与我现在的感觉几乎相似的感觉，将向这个人身上集中，而那些与我在这篇讲话的第二部分将要叙述的思想具有相同性质的思想，将从这个人身上向四外扩散。

毕达哥拉斯的轮回思想和我对轮回的看法之间的差异就是这样。现在，我来向你们说明这位哲学家的学说，或者不如说是谈谈他的学说的一些基本观点。正如我刚才向你们说过的那样，他一方面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轮回的观念上，另一方面又把它建立在认为**唯一的科学是数的科学**这个论断上。把这两种观念结合在一

起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前一个观念属于臆测体系，而后一个观念则属于实证体系。我再深入地解释一下：第一个观念在臆测体系之前，而第二个观念则在实证体系之后。

我们的理性的一切活动就在于比较。因此，一个一般观念一方面可能只是我们的理性所作的比较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可能只是我们即应进行的比较的事先观察。我开始组织的臆测体系的基础，是下述这样的一般观念：**支配宇宙的是统一而有灵性的基因**。

这个观念被分成两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是这个体系中的主要比较项目。这两部分是：(1)作用于大世界的原因；(2)支配小世界的活动的原因。只能对同类的事物进行比较。可见，必然要设想大世界和小世界都是由同类基因支配的。如果设想大世界是由统一而有灵性的基因支配的，那末也得设想小世界是由相似的基因支配的。支配大世界的基因所具有的永恒性，在支配小世界的基因中也同样应当具备。只能说第一个基因没有始因，而第二个基因是被创造出来的，因为从推理方面来说，在进行这种逻辑活动之前，不必存有比较的第二项。毕达哥拉斯认为灵魂的长久性是有限的，它相当于数个外壳的长久性。因此，他在这方面的思想，落后于我就要开始组织的体系。

现在我向你们证明，**唯一的科学是数的科学的观念**，要在实证体系成立之后很久才能出现。只有经过二千至二千五百年以后，人类的理性才能在实证体系下工作。

我们首先来明确规定臆测体系和实证体系之间的差异。

在臆测体系下，支配宇宙的是统一而有灵性的基因。在这种看法中，不必建立中间观念，认为精神实体的组织已为人们所共知，

并且只考虑两个极限，即只考虑一般实体对大世界的作用的意志和个别实体对小世界的作用的意志。在实证体系下，认为支配世界的只有一个规律，所以学者要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建立中间观念。

我时常感到需要改革自己观念的基础。我们现在来简单说明一下人类理智由古至今的主要发展阶段。

（一）人类与其他动物同源，只是由于人类的智力优越，人类才与其他动物截然分开。智力的优越性直接来自人类的组织结构的优越性，但这种优越性表现得并不明显，几乎是觉察不到的。

（二）人类发明了一些符号，这些符号使他们得到一系列理智活动手段，从而使人类绝对地优越于其他动物。从此以后，人类能把观念分成两大类，即把观念分成原因和结果。

（三）人类把日、月、星、海、河、山、林和其他一切巨大的物体，以及对他们显然有益或有害的一切东西，看成是万物的始因。这时，人类社会也出现了分化。一方面，某些人致力于通过原因的认识来说明结果；另一方面，大部分人敬神，乞求于他们认为是始因的原因，以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结果。

（四）人类继续提高，产生了无形原因的观念。他们把自己的每一种欲念和能力都崇拜如神。他们虚构了一个奥林匹斯群神会议，并责成这个群神会关心统治宇宙。

这就是我们的先人所作的一切，这就是我在试图整理人类的知识，即在考察万物是同一原因的结果的时候所见到的世界的情况。

在实证体系中，宇宙将受下述规律的支配：任何一个分子都有朝着阻力最小的方向运动的基本趋势。一方面，要在互相结合的

分子的作用之间进行一般比较；另一方面，要在处于流动状态的分子的作用之间进行一般比较。物理学将被分为两个部分，即被分为无机体物理学和有机体物理学。将会看到：在无机体中，固体的作用大于流体的作用；而在有机体中，流体的作用强于固体的作用。人们将不再认为宇宙是由两种不同的属性，即精神的属性和物理的属性构成的。现在用超自然的或神启的原因解释的现象，将被看作是无法衡量的流体的作用的结果。只有在天文方面，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将会成为完全相同的科学。

可见，唯一的科学是数的科学这一观念，要在实证体系成立以后很久才能出现。如果人类的理性可以达到这种高度，这个观念将会成为精密体系的基础。但是，人类居住的行星的寿命必然是有限的，所以人类对这个行星的依存性将规定人类理智进步的极限。

正如我向你们指出的，毕达哥拉斯就这样把两种观念作了自己学说的基础。但把这两种观念结合起来，却是违反自然的，因为伟大的自然秩序在把它们列入我们进化的数列中时，是把两者之间的距离排得非常遥远的。这位曾经发现伟大勾股弦定理的伟大才子的哲学研究工作所以成就不大，正是因为他在方法上具有这种缺点。他的学说现在已经有一部分被人遗忘了，而人们对于他的全部观念的记忆也将完全消失。

我的亲爱的学生们，为了使你们不蹈毕达哥拉斯所犯错误的复辙，为了不使你们的理性跳过太大的间距，为了充分论证我要在两千年以后述说的话，为了叫你们理解我在创造实证体系的工作中应用的推理，我要规定几个中间观念，并向你们说明人类理性在

建立臆测体系期间应当取得的进步；我还要使你们了解在今后的二千至二千五百年内将要发生的最重大事件，并对你们揭示主要事实的决定性原因。

我向你们传授的学说，在今后的头五、六百年内只有科学的性质，而在其次的五、六百年内又要取得宗教的性质，再在随后的五、六百年内还将具有政治的性质。最后，它在科学方面、宗教方面和政治方面将要相继衰落，而这三方面的衰落都要继续五、六百年。在这以后，我再度出现于世界来建立实证体系。”①

① 苏格拉底的预言完全得到证实，因为从苏格拉底逝世到基督教在欧洲开始创立，其间经过了五、六百年，他的学说在这个时期只具有科学的性质。从基督教在欧洲生根到查理大帝时代，也是经过了五、六百年，在这个期间苏格拉底的学说变成了有神论，成为基督教的理论基础，显然取得了宗教性质。从查理大帝统治时代到十四至十五世纪，又过去了五、六百年，在这时间出现了威克里夫*和路德。查理大帝使已经存在十二个世纪的苏格拉底思想体系具有了政治的性质，他一方面赋与教皇以管辖罗马的最高权力，另一方面迫使萨克森人接受罗马教廷的管辖。最后，由威克里夫到现在，也快五百年了，而在这五百年内，苏格拉底的学说开始不再具有科学的性质，因为哥白尼建立的新的天文学体系取得了优势，打败了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说宇宙是为地球、特别是为地球上的居民而创造的学者。接着，苏格拉底的学说又失去了宗教的性质，因为最初有培尔**，后来有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从宗教方面对它大加嘲弄，把当时称为信仰的一切东西叫作迷信。最后，当拿破仑皇帝剥夺了查理大帝授与教皇的最高权力的时候，苏格拉底的学说便不再具有政治的性质。

对从苏格拉底到目前所经过的时代进行划分，并不是出于臆造，而是有实际根据的，同时也不是出于形而上学，而是根据物理学进行的。首先，把它分成两个相等的部分，其中的每个部分各有自己的独特性质，因为在第一个五、六百年内，人类的理性主要是按照先天的方法思考；而在第二个五、六百年内，苏格拉底的学派从事于探索一切细小源流，这些源流的汇合便形成了后天的哲学大河。但是，当这条大河又分成许多小溪，由小溪去活跃各个科学部门和为各个知识领域带来统一、丰收和幸福的时候，它又得到先天的哲学大河的名称。这个划分真是绝妙而分明，而且结果也很丰硕！

如按正文中所说的那样，把从苏格拉底到现今的时代分成四个相等的部分，使其中的每个部分都有十分明确而肯定的性质，也是一种绝妙的划分。

如果历史学家能够根据这个理论对事实进行分类，那末历史将会成为饶有兴趣和富有教育意义的知识。

* 威克里夫，约翰（Wiclif, John 约 1320—1384 年），英国的宗教改革家，他揭发了僧侣阶级的道德堕落，反对教皇对世俗政权的干涉，争取英国教会的独立自主。威克里夫的学说曾对英国十四世纪的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作用，并对十五和十六世纪欧洲大陆的社会运动和宗教运动的发展发生很大的影响。——译者注

** 培尔，比埃尔（Bayle, Pierre 1647—1706 年），法国的政论家，怀疑主义哲学家，笛卡儿的信徒。他激烈反对宗教迷信，主张思想自由和信教自由。他对法国的启蒙哲学发生过巨大影响。伏尔泰称他为“人类理性的光荣”。——译者注

我们在第三篇中再继续这篇讲话①。

第八种思想

在我的头脑中先天地产生了下面的想法：先生们，考虑到即使我不辞辛苦，以被动的方式反复说明这一思想，你们也会抱怨我，所以我要以所谓主动的形式来表达这一思想。

先生们，你们必然会对这种想法表示惊异，埋怨我不该把苏格拉底的这篇讲话的未完部分移到第三篇去。我可以告诉你们引起我采取这个决定的动机，并且希望你们同意我的动机。

在苏格拉底的讲话的第二部分，我们将要谈的是人类直至遥远的将来的命运；我们将要指出，万有引力观念的影响必然巨大无比；我们还要指出，这个思想应当发生绝对的一般观念的作用，并代替神的观念。然而在目前情况下，这一观念还远远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所以我们如果不在一篇专著中阐明我们所要说的东西，或者不证明这一观念至少可以被人们普遍接受（这种证明将是下一篇的研究对象），人们就完全不会理解我所要讲的东西。

第一篇研究报告的结论②

现在，把我们所说的一切总结在本篇中：

---

① 圣西门没有写完《苏格拉底对学生的讲话》。——译者注

② 读过拙著《人类科学概论》的人，最能理解本篇及其结论中所述的观念。我把《人类科学概论》复写了六十部，分赠给海内的著名学者，而主要是赠给生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我手下还存有数部，如果有人希望阅读，我可以立即奉寄。

(一)先天地(à priori)、综合、生理学、主动方法等术语，从它们所表达的思想的本质来说，都是同义语。

(二)后天地(à posteriori)、分析、无机体物理学、被动方法等术语，从它们的本质来说，也都是同义语。

(三)一般哲学是用这种或那种方式随意叙述观念的。

第二篇研究报告的提纲

本篇的编辑工作很快就要结束，一旦结束，我立即把它献给你们。现在，我只向诸位通知一下我采用的篇章节目和各章节的讨论对象。我以为，这样做足可以使你们判断拙著的最重要章节的价值。

在第二篇里，我为自己规定了两个目的：第一，证明万有引力的发现，也跟牛顿的其他一切发现一样，是后天地完成的；第二，叙述这位伟大的几何学家和物理学家先天地想出和研究出来的观念。因此，本篇当然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 一 部 分

我们把这一部分又分成四章。

第一章　我们准备在这一章里叙述由十五世纪到牛顿时代的天文学发现史。我们主要研究哥白尼、刻卜勒、伽利略、惠根斯[①]

① 惠根斯，克利斯提安(Huygens,Christian 1629—1695 年)，荷兰杰出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译者注

和伟大笛卡儿的各项发现。我们将要在这里证明：万有引力的观念只是从这五位伟人的观念中总结出来的，我们所以认为牛顿是最高的科学大师，那是因为他的天才比这五位齐名的天才更高。

第二章 我们准备在这一章里分析牛顿的著作：首先研究他的万有引力观念，然后研究作为他发现微积分的基础的观念，最后研究他的光学所依据的观念。我们将要指出：(1)他的一切工作都是以先天法进行的；(2)他认为，为了保护自己的万有引力观念不受任何方面的反对，必须建立"虚空"这个观念，但从物理学方面来说，他的这个"虚空"观念，是与他在光学方面所持的观念相矛盾的；(3)他只把万有引力观念作为一个假说来提出，而且只把这个假说用于天文学方面，即只用于天上的固体，而没有考虑这种引力对于天上的流体发生的作用。

第三章 我们准备在这一章里叙述万有引力观念从其发现一直到今天的发展史。我们要在这里说明卡文迪什[①]的非常卓越的实验，他证明地球的大气层同天体的空间一样，也存有引力，因为山脉所受的引力是十分明显的。

第四章 我们在这一章里将主要说明由于一个学派的谬误而造成的混乱。这个学派把牛顿看成是一位哲学家，认为无机体物理学是科学工作的唯一出发点，而后天方法则是改进人类命运和改善后天知识的唯一手段。

---

① 卡文迪什，亨利(Cavendish, Henry 1730—1801年)，英国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译者注

第二部分

我们也把这一部分分为四章。

第一章　我们准备在这一章里叙述牛顿以先天方法想出和研究出来的两种观念。我们将要说明：(1)通过这项研究，可使人们了解牛顿发现的一切真理，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联系，从而纠正牛顿所犯的错误，即克服他的某些观点之间的矛盾；(2)通过这一研究过程，使普通物理学在牛顿以后所得到的一切发现与这位伟人给我们留下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3)这样就可以创造出一种理论，用这种理论大概可以发现一切必要的事实，以便根据天体的密度及其轨道经过的空间的稀度计算出太阳系各天体的轨道斜度和偏心率。

第二章　我们准备指出采用先天法对天文学带来的特殊好处，和对整个科学带来的一般好处。我们将要说明，人们也应当象重视从阿尔一马门①哈里发时代开始至今日益盛行的后天法那样重视先天法。

第三章　我们将要在这一章中指出，人们现在过于重视代数分析，但又过于轻视逻辑分析。这有下述事实为证：数学在法国科学院里居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而逻辑学甚至没有进入它的第一学院。我们要指出，逻辑分析是生理学、特别是居于我们这一知识

① 阿尔一马门(Al-Mamoun 786—833年)，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阿尔一拉希德的儿子，因从事广泛的启蒙活动而出名。根据他的指示，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希腊其他学者的著作译成阿拉伯文，还曾下令建立巴格达天文台。——译者注

部门之冠的人类科学所能采用的唯一方法。我们还要说明，最高等的数学也只能用于与无机体物理有关的现象，同有机体物理的现象比较，无机体物理的现象具有极其次要的意义。最后，我们还要证明，为了整个社会的幸福，略微降低人们至今对于数学的重视，应当是很重要的。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要降低对数学家的重视，而只是说应当降低对数学的重视，因为数学家能成为最好的逻辑学家，他们可以促进人类科学的进步，他们一般还能比别人在这方面作得更好，这是因为：(1)数学能使人养成良好的逻辑思维习惯；(2)数学在目前和很久以来就是受到极大重视的科学，而一些最聪明的人也都喜欢这门科学。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孔多塞的情况，他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而人类科学的最近的主要成就也应当归功于他。

第四章 我们准备在这最后一章中发挥下述的看法：

如果笛卡儿今日死而复生，他在很短期间内就会恢复法国学派昔日占据的优势。笛卡儿生逢的环境，对于发挥他的天才没有发生有利的作用，但他却使科学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如果环境象今天这样对他这样的天才十分有利，那末，他会作出多么伟大的贡献呀！

我们也要发挥下述的思想：

通过观察证明，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交替进行的，它们相继发生，互为因果。洛克和牛顿都是在英国革命后不久出世的。我们每天都在等待具有重大意义的新的科学思想的诞生。先生们，请你们说一说，我提请诸位注意的这些思想，从它们的本性来说，难道不能引起伟大的科学革命吗？

第二篇研究报告的结论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在第二篇研究报告中作出如下的结论：

（一）根据万有引力的观念，可以比较直接地说明各种现象；

（二）改造我们的知识体系的唯一手段，就是以万有引力的观念作为知识体系的基础，从科学、宗教和政治方面来说明这个观念；

（三）万有引力的观念同神的观念没有任何矛盾，因为万有引力的观念正是神用来支配宇宙的不变规律的观念；

（四）如果充分谨慎地处理，万有引力的哲学可以逐渐地、不经过动荡地用更为明确和肯定的观念代替神学所宣传的一切有益的道德原则。

第三篇研究报告的提纲

这篇研究报告分为两个部分。

第 一 部 分

第一部分的内容，是叙述人类理性的过去、未来和现在的简史。因此，这一部分又分成三卷。

先生们，我们先用一点时间来谈一谈这个划分。这个划分十

分新颖，而且极其重要，它会消除讨论政治时产生谬误的一般原因。这是我偶然想出的一个最好想法。我为这一思想欢呼，如果你们肯花费气力掌握它，也一定会为此雀跃。

人们最初想出的和迄今应用的划分方法，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叙述历史，即首先是过去，然后是现在，最后是未来。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怎样呢？如果仍然沿用旧的划分方法，而不采纳我提出的划分方法，结果将会怎样呢？人们认为，对于未来的推论，主要应以目前的事件为根据。但是，拿目前的事件作为推论未来的基础是不太可靠的，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情况对于推论者的影响，可以改变推论者的观点，而为了防止这种影响，除了回顾悠久的过去和瞻望遥远未来的凝思画面以外，别无其他方法。

先生们，请你们作如下的实验：有人向你们谈论他的政治信念的时候，你们可以要求他论证他在考察遥远的过去和未来时所持的观点，并使现在只对他的这两项考察起到连结点的作用。这时你们将会看到，他必将作出正确的推论，也就是说，他的推论将至少具有一般性质，只有极少一部分受到他的境遇或命运的影响。

你们会说，以充分的才学广泛论证自己的推论的人是非常少的，而能够讨论政治的人也是寥寥无几的。先生们，这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正希望这样，我们所要追求的也正是这个目标。当然，我们完全没有阻止教养不高的人去谈论政治的意图，因为政治实际上与人人都有利害关系。但是，为了证明一个人拥有从事政治科学的能力，我们希望为此明确规定出他应当具备的条件。

我们在这一篇里将要应用方才规定的原则，然后要在这篇提纲里，把这项原则的应用说得清清楚楚，以使你们可以判断我要发

挥的思想值不值得赞成。

第一卷

我们把这一卷分成三章。

第一章 论尚无人居住时的行星 人类的生存与行星的存在有关系。人类的生存直接依赖于行星，地质学的资料必须作为人类史的导论。许多著名的地质学家总结他们的观察，一致得出如下的结论：最初，地球表面是一片汪洋，所以很长时期没有人和其他陆上动物居住。我们要在本章里讨论这个观点，并用曾经居住在地球上的生物提供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

第二章 在这一章里，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明确的观念，即认为人同其他现象一样也是一种现象；其次，我们要叙述从人类出现到苏格拉底出世时的理智进步史。为了完成这两项任务，我们要建立下述四个数列：

第一个数列 比较无机体和有机体的结构。这一比较的结果，证明无机体产生的效果和有机体对它们周围的事物发生的作用，是与它们的结构的完善程度成正比的。

第二个数列 比较各种有机体因其组织结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这一比较的结果，证明以下两项：(1)人的组织性最高，即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有机体中，人的结构是最有组织的；(2)动物的组织性越完善，它就越有智慧。

第三个数列 比较动物在各个不同生存时期的智力。这一比较的结果，证明一切动物的进化都与它们的最初组织的完善改进成正比，既然人是唯一最进化的动物，所以他当然妨害了其他动物

的智力得到它们所能达到的发展。

第四个数列　比较人类的知识从人类出现到苏格拉底出世时的各个阶段的状况。这一比较的结果，证明人类的智力，从人类出现开始，一直到苏格拉底出世为止，始终是不断向前发展的①。

第三章　我们将对从苏格拉底到现今所经过的几个世纪进行两次叙述：第一次，我们分四个阶段叙述；第二次，只分两个阶段叙述。

第一次，我们首先介绍苏格拉底的学说在他逝世后头五、六个世纪内的情况，指出他的学说在这一期间只具有哲学的性质；其次，我们介绍苏格拉底的学说在其次的五、六个世纪内的情况，指出他的学说在这一期间又获得了宗教的性质；再次，我们介绍这个学说在更下的五、六个世纪内的情况，指出它在这个时期兼有哲学的性质、宗教的性质和政治的性质。最后，我们还要说明一个重要事实，即在最近几个世纪里，苏格拉底的学说相继失去哲学的性质、宗教的性质和政治的性质，而在今天已经衰落下去，因为目前一切有教养的阶级都摈弃了这个学说，只有愚昧无知的阶级还以它为指南。

第二次，我们把从苏格拉底到今天的时期分成两个相等的部分。首先，我们将要指出，在头十一至十二个世纪里，人类的理性只是在应用这位哲学家所创造的理论方面作了一些工作，而对它的改进没有作出任何的努力。其次，我们要说明在以后的十一至十二个世纪里，人类的理性作了两项工作：一方面，继续把苏格拉底的理论应用在越来越细致的小节上；另一方面，又努力为科学体

① 参看《人类科学概论》第一部分，其中对这四个数列作了详细的发挥。

系创造了更为巩固的基础。在这以后，我们将叙述实验科学从最初几个哈里发开创这门科学以来的发展史。我们将要指出，物理学的各个部门的理论是怎么由于自然趋势向一个汇合点发展的；最后，我们还要说明，这些理论现在只差一步就要统一为万有引力的观念了。

第二卷　论人类的未来

在本卷的开端有一篇导论，我们准备在其中指出（这项工作不难）：对未来的历史，不会象过去的历史那样详述；我们的智力有限，这迫使我们只能作简短扼要的说明。

我们根据对过去的历史的三分法，也把本卷分成三章。

第一章　论不能住人以后的行星。应当根据地质学的推断来揭开人类的历史，由于同样的理由，也应当根据这种推断来结束人类的历史。

我们的行星有日益干涸的趋势。非洲曾经是世界上第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因而也是最适宜于人居住的地方，而到现在，它几乎要完全干涸了。在亚洲，阿拉伯沙漠日益明显扩大，中亚细亚的鞑靼大沙漠也有这种趋势，它们好象努力向一起汇合，要吞没人类这个第二摇篮的现在还很富饶的大地的全部植被。在欧洲，西班牙在罗马人统治时期曾是肥沃的地方，而现在已经干涸了。在德意志，大部分森林已经消失，这里的河川水量也不如塔西佗①向我

①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Tacitus, Publius Cornelius 55—117年），罗马帝国初期的杰出历史学家，他的《日耳曼尼亚志》，是一部根据自己的亲身观察写成的地方志，对于研究古代中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译者注

们叙述的那个时代丰沛了。根据这些观察，地质学家必然得出我们的行星完全干涸的时代终将来临的结论。显而易见，到那个时代，行星上就不能住人了，也没有人住了，所以从某个时期开始，人类也将逐渐灭亡。

因此，断定我们的行星终将完全干涸和没有人住，也等于断定人类历史的行将终结。

第二章　在这一章的开始部分，我们将描述在饮了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后而等待死亡的最后一个人的感觉。我们将要指出，这个人对于死亡的痛苦感觉将大大甚于我们，因为他一个人的死亡就等于全人类的灭绝。然后，我们再由对这最后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的研究，转向眼看人类就要开始灭绝的人们的精神状态的研究。当时，这些人确信人类必然灭亡，而这种确信又在麻痹人类的一切精神力量，使人类觉得自己与我们在研究人类的过去的那一卷的第二章谈到的那些人相似。从主要方面来说，这些人的愿望也将跟其他动物的一样。

第三章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介绍摆脱了一切迷信观点和一切科学妄谈的人类理智。这一章由两节构成。我们准备在第一节里描绘掌握着良好科学体系的人类，而在第二节里则向致力于建立这种体系的人介绍这种人类。第二节讲到人类着手建立这种体系时为止。这时，将为从未来回到现在的人展示出现在的图景，就象对从过去回到现在的人一样，这副现在的图景显示着苏格拉底创立的科学理论的最后作用。

第三卷 论人类的现在

我们首先作一般论述，这种论述的内容大致如下。人类已经结束其生命上升的阶段，但还没有开始下降。现在是人类发展到最高阶段，使各式各样的精神享受都达到顶峰的时刻。在这个阶段，人类的推理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是想象活动还没有消失。如果说古代世界给人类呈现出一幅老年悲惨的图景，那末现代世界则给人类呈现出接近于青年时代的童年时期的欢乐情景。

然后，我们便直接讨论问题的实质。我们将要指出，苏格拉底首创的理论已经没有用途，甚至成了科学的负担，从而也成为人类的负担。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证明，建立新科学体系(实证体系)所需的一切材料已经备齐。在我们这样确定人类现在所处的精神状态以后，要暂时离开实际观察的道路，即暂时不用后天方法，不用被动方式，而开始采用先天方法，即采用人类进行创造活动的主动方式。

我们将要叙述，建立新科学理论的工作要求一切学者、特别是致力于研究哲学(或一般科学)的人进行通力合作。因为欧洲的哲学家现在分成两派，所以事先的必要工作，就是把他们统一在一个原则之下，以便组成一个能够完成建立新的一般理论的巨大工作的科学机构。

我们首先要向英法两国的哲学界呼吁，并向他们指出：如果他们认为应当在他们的判断中排除关于一般的、有灵性的基因的观念，那末，他们在继续专心致志地寻找新的事实而不协调与总结所收集和所确定的大量事实的时候，就要发生严重的错误。简而言

之，是他们放弃后天方法而采用先天方法的时候了。

其次，我们要向德国的哲学界呼吁，并告诉他们：你们完全有理由宣称人类理性用先天方法考察事物的伟大时代已经到来；你们完全有理由在自己的哲学讲坛上抨击英法的学者，说他们不断标新立异，以胡说八道来充实他们的库存，而且始终不肯休止。你们完全有理由宣传需要一般理论，宣传科学只有在哲学方面直接有利于社会，宣传学者可以成立一个总的政治团体，因为这是联系欧洲的各个民族，制止民族与国王的野心的需要。但是，当你们想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有灵性的基因这一观念之上时，你们就犯了严重的错误，因为能够联合学者的观点的不是神的观念，而是作为神的规律的万有引力的观念。趁此机会，我们要阐明一个至今仍然处在完全混乱状态的问题。我们还要证明，一些本来应被称为唯物主义者的人，至今被人称为唯灵论者；而一些本来应被称为唯灵论者的人，却被称为唯物主义者。实际上，把抽象的东西具体化，这不是唯物主义者的作法又是什么呢？从神的存在中抽出规律的概念，这不是唯灵论者的作法又是什么呢？

在结束第三篇研究报告的第一部分的时候我要指出：只应当把这一部分论述看作是第二部分的导论。

第 二 部 分

我们要在第二部分略述新的哲学体系。我们首先介绍我们对世界体系的看法，其次叙述我们对人类科学的看法。因此，第二部分自然要分成两卷。

第一卷 论世界体系

至今形成的一切观念体系都以宇宙演化论为基础，而将来新创造的一切体系也要以此为基础，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在谈论一个容器的内容之前，必须先说明容器本身。至今，在已经创造的一切天体演化论中，太阳系被公论为一般体系。按照我们知识的目前水平来说，这个看法还没有达到完全为人们所公认的地步。因此，我们要谈一谈世界体系的真正的一般结构。我们认为宇宙是由两个半球组成的，一个是我们居住的半球，这里的物质趋向凝固；另一个则是其中的物质趋向流动的半球。

第二卷 论人类科学

我们在这里介绍以生理学观察为基础的人类科学。这门科学是我用来建立道德体系的原则。经验证明，凡是不以有利于自己同类的方式寻找幸福的人，不管他的前途怎样光明，也不会是幸福的。

由于人们不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和一视同仁的态度为自己的同类造福，所以必须把道德理论分成四个部分，以适用于下列四类人：

（一）智力活动能促进哲学进步的人；

（二）能够感受爱国主义情感的人；

（三）生来就在家庭寻找幸福而可以成为值得尊敬的家长的人；

（四）不仅有办法完成自己的职责而且愿意帮助更有能力的

人的人。

第三篇研究报告的结论

我们对第三篇所述的一切作如下的结论：物理科学和精神科学的一般理论，都可以建立在万有引力观念的基础上，万有引力是神用来支配和管理宇宙的规律。我们将要说明如何以最快的方式去建立这一理论，这包括：要求社会上的一切学者参加讨论这个问题的竞赛；成立一个委员会审议应征作品，对最能达到这个目的的作品授奖（委员们应当集合在罗马开会）。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目前欧洲全体居民陷入的危机，只是由于缺乏一般观念而造成的。只要出现符合于文明状态的理论，一切就会立即走上轨道，欧洲各族人民的共同体制就会自然恢复，而具有符合于人类既得知识水平的教养的僧侣阶级，在制止民族和国王的野心以后，很快就会恢复欧洲的安宁。

我们将要指出：不要害怕在建立新理论时遇到的一切困难，不要被向往至善境地的过度热情所奴役。我们欢迎参加这一工作的哲学家，对以前的科学学说、宗教学说和政治学说所依据的理论进行审查，看一看它们带来了什么好处和害处。我们要向他们证明，最重要的是尽快开始这项工作，因为这项工作的草案一经拟成，就会找到消灭全面大战的可怕灾难和改造欧洲社会的手段。这个问题，是目前最值得学者注意的唯一哲学问题。最后，我们要向现代的哲学家指出，在我们圆满地完成我们的任务以后，我们还要嘱咐我们的后代关心改进我们的工作。

应当注意《人类科学概论》总序里的下述一段话：

“我计划写的著作，并不限于这部概论。我要写的著作包括四部概论，它们的名称为：《人类科学概论》、《哲学概论》、《僧侣阶级改造概论》和《各族人民的国家改造概论》。促使我执行这项著述计划的，与其说是感到自己有能力完成这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还不如说是相信它对社会是必要的。在开始执行这项计划的时候，我曾声明：我不想领导这个伟大事业，我的最迫切的希望，是寻找一位能力比我强的人来负起这项任务，在找到这个人之后，我甘愿当他的助手，他可以随意支使我。在盼望这个使我可以解除这项力不胜任的职务的幸运日子到来的过程中，我发现一条可以使我较好地完成这项任务的道路。但是，我请读者注意，在目前这个阶段，我应当把自己看成是这个事业的领导人，拟出暂时由我负责把整个工作进行到底的计划。

“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我准备从1813年1月1日（从这一天起，我已实际开始执行）起，一直工作十二年。我的《人类科学概论》拟在1816年1月1日以前，《哲学概论》拟在1819年1月1日以前，《僧侣阶级改造概论》拟在1822年1月1日以前，《各族人民的国家改造概论》拟在1825年1月1日以前，提交欧洲的各学术团体审议。

“我的《人类科学概论》的第一部分已经写完。我准备把它誊写几份，并在清稿上留出一半空白，把它们分送给最有能力审查这类著作的人士。我请他们审议，给予我以帮助，把他们的意见记在空白的地方。在我接到他们对第一部分提出的意见之后，再把即将写完的第二部分的清稿寄给他们。我也准备用同样的方法，把我

今后的著作分批提交有识之士斧正。这些人士心地善良，一贯甘为公益服务，甘为寻找消灭全欧人民所遭受的危机的各种手段服务。”

因此，三年以后，我才能着手研究我现在提出的问题。我要用今后的三年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六年后才能把它解决。可见，我准备用六年时间来培养读者的认识和锤炼我的思想，而现在不这样办了，我要用两个星期来攀登理智的高峰，并登上顶巅。现在，我要用五十页篇幅把读者提高到这个无限的抽象思维高度。先生们，你们可能要问：是什么东西使你这样作的呢？是一种以最大的威力支配着有勇气的人的东西，即一方面是希望为善的感情，另一方面是希望获得荣誉的心理。

皇帝在驾返巴黎之后，曾表示打算实现他的强迫英国人承认航海自由的计划。他在我军受挫之后表示的这种自豪的、也许是英勇的行为，使我受到鼓舞。但是，据说皇帝要用武力迫使整个欧洲大陆协助他实现其推翻英国人的海上霸权的计划，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他已向我们证明，他用这种方法并未能达到他的目的。另一方面，我国各界人士明确向他表示：他们愿意生活在法国的天然国界之内，即不越过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他们大声疾呼：如果政府的元首迫使我们的军队越过这条天然国界去进行新的征服，这将违背他们的愿望。我认为他们的这个愿望是公正的，我也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我十分沉痛地、甚至有些自卑地看到，许多法国人本来打算迫使英国人承认和服从人权，而现在却软下来了。我深信可以把皇帝的豪迈的目的同人民的意向协调起来，所以竭尽全力来制定一项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的计划，并且迫不及待地、简单扼要地说出使皇帝的意图和臣民的意图相协调的方法。我不惜为此操心费力，因为我知道，经过这番努力，两个星期就可以把我的思想说得一清二楚，而按以前拟议的计划，要用数周或甚至数年才有可能办到。

是的，先生们，我深信你们在阅读我的第一部概论的时候，一定会对其中的思想的新颖性、力量和正义性感到惊讶。我也深信，三个月以后，或许再早一些，我的第二部概论就可以问世。它也一定会达到目的，即用先天的概念，把牛顿和后来人在天文学中所得的发现联结起来。最后，我还准备在一年之内出版我的第三部概论，在其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以万有引力的观念为基础的一般科学理论。我们认为，万有引力的观念是一般的、统一的、不变的规律，神通过这一规律来治理和支配世界。这个阐述足以使学术团体得到把新的一般理论用于政治科学的方法。

这项著述工作的结果，将是通过建立一个为欧洲各族人民所共有的一般机构来改组欧洲社会。这个机构将根据每个民族的文化程度，被各个民族看成是学术性的或宗教性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将在制止各民族和君主的野心方面发生积极的政治作用。这个作用大概首先要见效于英国；但如果法国人不退回自己的天然国界，或者非法地越过天然国界，这个作用也必然要全力地见效于法国。

欧洲的学者如果能够联合在一个共同的一般团体里，并把以万有引力观念为基础的哲学作为互相联系的手段，他们的力量将是不可估量的。

给欧洲学者的信

先生们，僧侣阶级是最有学问的集团，或者毋宁说，最有学问的机构在执行着神职工作，这是理所当然的。当世俗人士比宗教人士变得更有学问的时候，联结社会的总纽带就要松弛；而当世俗人士在学术方面大大超过宗教人士的时候，这条纽带就要完全断裂。我发表的这一见解，是实际观察十五世纪至今发生的一切所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十五世纪以来，世俗人士在学术方面不断进步，而教会人士则因循陈旧的观念和理论，一句话，在学术方面毫无建树，所以他们成了最没有文化的阶级的一部分。实际上，从十五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联合欧洲各民族并以制止各民族和君主的野心为宗旨的机构，也在逐渐衰落。现在，它已经土崩瓦解了；而全面的战争，可怕的战争，使全体欧洲居民濒临死亡威胁的战争，已经打了二十多年，并且已经毁灭了几百万人，而这几百万人，只不过是几支枕戈待发的大军的先遣队而已。

先生们，当科学理论变成不能令人满意的时候，它就要腐朽，而宣传它的僧侣阶级也将不复存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世俗人士在创造出新的一般科学理论以后，就要取代旧的僧侣阶级，形成新的宗教团体，这也是势所必至的现象。

先生们，你们的安宁和你们的共同幸福，要求你们采取措施。只有你们能够使欧洲恢复安宁，只有你们可以改造欧洲社会。机不可失，时不待人。目前还在流血，你们赶快表态吧！目前的局势迫切地要求人们采取简而易行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实践应当

走在理论的前面。如果你们正如我乐于相信的那样，都是仁慈而聪明的人士，那末你们一定会这样办。

让欧洲的每个学术团体都派一名或数名代表到罗马去，委托他们选举教皇。让选出的教皇即位之后，立刻发布内容大致如下的公告：

新科学理论的第一代教皇公告

欧洲对悲惨的三十年战争① 记忆犹新。人们说，宗教战争是最残酷的。不错，这种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但仍不如因破坏宗教联系而爆发的战争残酷，因为这种破坏将使人类重新回到原始状态，即回到战争连年不断的状态。实际上……②

（王燕生译）

① 三十年战争，是一场发生于 1618—1648 年间的宗教战争。初为德意志新教诸侯与天主教诸侯、皇帝之间的战争，后来扩大为欧洲诸国间的大战。丹麦、瑞典、法国等支持新教联盟，而旧教联盟则得到教皇和西班牙的支持。德意志受战争的破坏最大。——译者注

② 圣西门的《论万有引力》写到这里就中止了，后来没有续写。——译者注

给一个美国人的信①

第一封信

这次通信的目的——自由美国的壮观——美国自由的奠基人的明智和自制——特权阶层

阁下，您想知道旧大陆的目前情况，您要求我向您介绍一下欧洲的理性发展的进程，而您则以向我提供美国的类似情况作为答谢。您的建议使我受宠若惊，感到高兴，因为我准备与您交换的意见正是我经常研究的对象。

我认为，您所拟议的为考察新旧大陆的人类理性的进步而建立哲学通信的这项计划，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想法。这必将产生新的、有益的接近，从而大大有利于阐明一些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经常比较两个国家的文明状况，将会扩大政治眼界的范围。即使这两国的居民文化水平相等，而他们的风尚截然不同，他们所处的生存条件极其悬殊，以致在最重要方面(比如其中一国人口太少，而另一国人口过多)可以被看作是彼此完全对立的，这样的比较也会扩大政治眼界的范围。

① 这篇通信载于圣西门在1817年出版的文集《实业，或为献身于有益和独立的劳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讨论》第1卷，通信的大标题为《政治和哲学通信》。我们翻译所据的原文，载1966年法文版《圣西门全集》第1卷。——译者注

因为我们的通信要按照您的要求随写随发表，所以现在我要向公众介绍一下自己，向他们说明我是怎样一个人，我在思考些什么问题。

根据侥幸的家庭出身给我安排的社会地位，传统的习惯确定不移地规定了我将来立身处世的职业。我被选入军界服务。

我服役后一年，法国宣布支持美洲的起义者①，我便利用这个机会到了美洲，在那里前后参加过五次战役。

我参加过围攻约克城② 的战役，在俘虏康沃利斯③ 将军及其部下时立过大功。显然可见，我可以把自己看作是合众国自由的奠基人之一，因为正是这场决定媾和的战役，永久地确立了美国的独立。

回到法国以后，我一直以最大的注意力和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贵国相继飞速发展的政治事件的进程。至今，这些事件直接导致了贵国建立起空前美好和空前纯朴的社会制度。

在贵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不断听到你们的船只不再受压迫、挂着自己的新国旗开到我们这个已经衰老但渴望返老还童的欧洲的消息。这些消息使我产生的感触，是无法用笔墨可以形容的。

华盛顿以及那些同他一起为完成起义、为团结你们的力量并引导其达到完全摆脱英国统治而独立的伟大目标的人们的行为，

① 根据起义的英国北美殖民地的代表富兰克林同法国在1778年签订的条约，法国负责从财政和军事上援助北美，并把自己的武装力量派到北美去参加北美独立战争(1775—1783年)。——译者注

②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城市。——译者注

③ 康沃利斯，查理(Cornwalis,Charles 1738—1805年)，英国的将军，指挥英国在北美的南军，1781年10月投降。——译者注

是我一向所钦佩的。由于你们交给他们的权力的行使方式，由于你们一开始就采取的、而以后又一直保持的镇静态度，特别是由于一百年来的启蒙运动和你们的祖国以往在文明中所取得的进步，人类已经在政治上得到了很大的教训。

可见，至今一直被认为是梦想的事，过去被人们贬之为虚构的事，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们看到了你们自由的缔造者们在用他们受命担任的职权尽量巩固和严明地建立起个人自由，我们看到了公共自由和个体自由同时建立起来，我们看到了民族的繁荣同组成这个新社会的成员的个人命运的改善并肩前进，我们最后也看到了这个社会的人口、财富和文化以无与伦比的速度与日俱增。

阁下，既然我过去能有这样深刻的感受，既然我现在还如此热心地关怀三十多年前发生在远离我的家乡两千多里约①以外地方的事件(这些事件对我只有某种次要的意义)，那末您就可以想象得到，对于从那时以来发生在我的祖国并为我亲眼目睹的政治运动，我该有多么深刻的感触了。

复兴中的民族的活动总是艰苦的，而且常常是含有风险的；正在经历这种变革的人民，会在变革的过程中觉得自己一方面在衰老，另一方面又在返老还童。

法国的政治机构已经陈旧，再也不是可以使政体活动灵便的弹簧或机轮了。它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能力、和谐和作用，而只不过是压在本民族身上并且以其巨大的重量要把它压垮的一堆废物罢了。官职增多了，绝大部分职位变成世袭，而那些官运亨通的家庭，总是按照只要环境不迫使他们去劳动、他们就游手好闲的规律

① 里约，法国的长度单位，约为4.5公里。——译者注

代代相因，以致到了 1789 年，还能控制被统治者的唯一手段，就只有历来养成的服从的习惯了。

社会团体丧失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等级的划分再也显不出它的优点，而它的缺点却大大增加了。

一个民族被分成数个等级，而在等级内部又形成若干个特权阶层。我认为，可以把这样的民族比作一支由精锐部队和下等连队组成的军队。据说，精锐部队是圣火的保护者，而创造部队的团结精神并维持这种精神的正是这些圣火的保护者，因为他们的行为最容易受荣誉感支配。他们的范例鼓舞着下等连队的勇气。他们在下等连队中激起的信心，以及下等连队极其强烈地模仿他们的愿望，甚至会使最胆小的人，在同他们并肩战斗的时候变成最勇敢的人，而得到他们支持的军队，也变得完全好象是一支精锐的部队了。结果，想要参加这支部队的志愿，成了受到希望尽早应征入伍的高尚竞争心所激励的一切士兵的雄心壮志。

有一些人反对这种意见。他们认为：如果普通部队和精锐部队不得不各自单独行动的话(可惜，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那末人们很快就会确信，随着使最勇敢的人离开下等连队，就将使这支部队实际上陷于瓦解，如同一个人被抽去了血液中的最纯的部分一样。

但是，我要研究的问题并不是这个。假如，由于某种原因，先由全军选拔出来的组成精锐部队的连队还不如普通部队的话，又该怎么办呢？下述的情况二者必居其一：要末完全放弃精锐部队，要末如果想要极力保持它，就必须决定另行选拔，重新组织。

然而我认为，一个民族，如果它的上等阶层、特权集团、官员在

情感上、能力上和教育上还不如大多数人民，那末我要说这个民族的境遇，就同一支部队在其掷弹兵和狙击兵丧失其高于下等部队士兵的实际优越性的情况一模一样。

确实可以说，在1789年，法兰西民族的僧侣阶层、贵族和国家官吏在文化、毅力、高尚灵魂和各种优秀品质方面，都不比大多数法国人出众。在他们看来，他们继续用来统治全民族的权力，是一种不尽任何义务的特权，而由他们掌握这种特权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对于自己政治权利的合法性的看法是荒谬的。他们只知道同胞应对他们尽义务，而完全不承认自己应对同胞尽义务。

我已经说过，在1789年，法兰西民族曾同时呈现衰老和返老还童的情景。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衰老是统治者的归宿，而人民则是走向返老还童的道路。

出身不是贵族、神甫和官吏的法国人，即普通的法兰西人民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任何权利来干预国家大事，甚至认为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思考如此高深的观念。别人使他们如此习惯于这种看法，而他们自己也完全养成了这种看法，以致认为凡是敢于谈论公益、敢于对政府应当采取的行动或应当实行的措施发表意见的被统治者，都是可笑的。

这是多么荒谬的见解！由于这种谬见，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都相信自己生来不是为了自身幸福而劳动，而是为了使他人享福而服务；认为能够判断什么是适合于他们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他们的领袖。

阁下，在前几页中，我的笔就屡次想描述法国人自己制造的灾难的情景，摘录他们作过的乖戾举动，复述他们在革命期间所犯的

暴行。但是，我的内心反对我这样做。一想起我亲眼目睹的这些可怕情景，在我的内心就引起反感。

如果对于一个既令人生畏又使人怜悯的时代的这种回顾，只是一个无益而又没有教育意义的叙述；如果这种回顾不能通过因果关系的深刻分析使我令人欣慰地证明，压迫我们达二十五年之久的灾难从现在起到以后若干年止，甚至从现在起到将来若干世纪止都不会再度发生，或者更正确地说，不能证明政治科学的进步将使灾难一去不复返；简而言之，如果这种分析不能使我有办法向法国人证明他们终于要走上真正的道路，并且能信心百倍地沿着它前进，那末，事实上我又何必把我的思想停留在如此令人心碎的回忆上，重叙我的祖国在二十五年多的时间里所经历的不幸呢！

第二封信

美国人民在宣布独立时的理性和风尚——这种理性必然产生的社会制度——法国人民在一七八九年的理性和风尚。

阁下，我在美洲期间，研究政治科学的时间大大超过研究军事战术的时间。战争本身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而战争的目的却强烈地吸引着我。后一种兴趣，使我毫无怨言地忍受了戎马生活的艰苦。我时常自言自语说：我希望战争早日结束，我应该寻找结束战争的手段。

当我看到和平就要来临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厌恶军职的感情。我清晰地了解什么是我应当献身的职业，即什么是我的爱好和天赋要求我去作的职业。我的天职根本不是当一个军人，我应从事

一种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与此截然相反的活动。研究人类理性的进程，以便将来为改进人类的文明而努力——这就是我为自己规定的目的。从此我就完全献身于这一目的，并为此贡献出了我的一生。从那时起，这项新的工作便开始占去了我的全部精力。我在美洲逗留的后期，都用于思考我亲眼目睹的重大事件上。我竭力探索和揭示它们的原因，并设法预见它们的后果。我尤其致力于研究对于我的祖国可能产生的后果。

从此以后，我预感到美国革命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纪元的开始，必然决定整个文明的重大进展，并将在短时间内使欧洲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发生巨变。我仔细地研究了美洲居民所处的环境，并拿这种环境同在旧大陆占统治地位的环境相比较，结果发现两者迥然不同。我由此得出结论：东西两半球的文明不是按照同一进程发展的。

我当时形成的见解，现在仍没有失去它们的意义。我甚至敢说，这些见解仍然是当今舆论界最关切的问题。我来重复其中几个。

我曾发现：

一、在这个国家，信教自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且绝对不受限制，因为任何一种宗教也没有在这里占有统治地位，因为任何一种宗教也没有在这里受到特殊庇护，因为任何一种教义也没有在这里被视为国定的教义，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存在许多各不相同的宗教，因为所出现的一切宗教都一律得到承认，因为每个人都有创立新宗教和招收信徒的自由，因为在所有这些宗教之间，不管它们是什么宗教，彼此之间都允许开展不同意见的争论。

二、在这里，不存在任何特权集团，没有贵族阶层，没有封建制度的残余，因为这里从来没有存在过封建制度①。最后，这里的民族完全没有被划分成若干等级，而是一个由一些性质相同的部分合成的政治体。

三、在这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家庭连续几代占据显要的公职，所以谁也不把官职看作是自己的世袭领地；最后，任何一个公民，不管他是谁，只要他敢于觊觎可以占据国家要职的特权，舆论就会公开反对他。

四、著名的潘恩②是英国的新大陆殖民地的最初建立者之一，他的性格正是美利坚民族的主要性格。一般来说，这个民族在本质上是和平的、勤劳的和节俭的。

我从这些观察得出如下的结论：美国人为自己建立的制度比欧洲人民实行的制度要自由和民主得多；他们的民族精神根本不是军人精神；在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里，在他们的各种法律和条例中，都要求他们致力于保护农业、商业和各种实业；他们立法的一贯目的，是一视同仁地保护一切公民，甚至一切外国人，即保护他们的个人自由以及占有任何财产的全权；舆论和法律一样，都认为军职只不过是暂时的、偶然的职务，一当情况需要时，全体公民都必须履行。但军职完全没有成为特殊的和由相当一部分居民独占的职业，更没有把它看成是使军职人员有权担任高官的职业。

① 它存在于加拿大。

② 潘恩，威廉(Penn, William 1644—1718年)，英国的社会活动家，教友会的教士，因在英国宣传教友会的教义而受到迫害，在狱中写了他的名著《既不要十字架，也不要王冠》。1681年移居北美，在那里建立了宾夕法尼亚移民区，并为这个移民区制定了一部民主宪法。一百多年以后，这部宪法成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蓝本。——译者注

我由此得出结论：在其他一些同样是很重要的方面，美国人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也没有跟着欧洲走。

在欧洲，能够设法增加税收而又不使纳税人怨声载道的人，一向被认为是最伟大的政治活动家，或至少是最受人们尊敬、推崇和赞扬的最精明强干的人。我感到，在美洲，最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则是能够尽量设法减少人民负担而又不使公益受到损害的人。旧大陆的人民或被统治者都同意这样的见解：为了公共福利，应当以大量金钱酬谢公职人员，而对议员或代表支给高薪也是必要的。我感到美国人的想法与此完全不同，他们认为公职人员越不豪华铺张，越平易近人，生活越朴素，才能越受人尊敬。

最后，我认为新旧大陆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差异：在美洲，人们认为就任公职是出于尽义务和服从公众意志而接受重任；而在欧洲，情况却与此相反，人们认为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等于行使世袭的权利，这种权利能够代替遗产，因为它可以使人发财致富。

在1789年，法国人民远远没有能够建立起这样的社会制度；他们无能的首要根源，在于政治上的完全愚昧无知。在他们看来，公众的事情就跟天气的变化一样：天晴了，人们就高兴；天阴了，人们就忧愁，而从未产生过怎样去影响天气状况的想法。

同样，当社会繁荣时，法国人就兴高采烈；而当情况发生困难时，他们就悲观失望，低声向上天祈祷，乞求天老爷赋与他们的首领以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如果灾祸日益深重，穷人的痛苦实在是水深火热，他们又去哀告上苍，即向唯一能制裁国王的法官——上帝诉苦，请求上帝有朝一日惩罚压迫他们的人，把希望寄托在来

世的审判上，以为那里可以纠正人间的不平和报偿他们在人间所受的虐待。

我再说一遍：谁也不关心国家大事，对此完全抱着消极的态度；谁也不对自己另眼相看，只把自己看成是无所作为的群众的一分子，看成是无能为力的机体的一部分；不管当局有什么过失和错误，这个机体在当局面前只能默不作声，俯首贴耳。

由第四等级治理国家，这是当时常开的一个玩笑，而且是一个流行的玩笑。直接受到这个玩笑戏谑的人，即普通的平民（他们通常都不属于头三个等级）正是最常重复这个玩笑的人。他们兴致勃勃地对自己开这种玩笑，然而这些人正是民族中唯一的生产阶级，他们才是法兰西民族。由此可见，法兰西民族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无能，是有着非常深刻和非常明确的认识的。

法国人有过自己的三级会议，但是只能偶而看到这个会议的召开。每届会议的会期非常短促，而民族中的一部分，即所谓第三等级，除了能俯身在宝座之前直接向国王恭敬地请愿以外，一般得不到其他任何好处。根据国王的一时高兴恩赐给法兰西民族并又根据国王的一时高兴所实施的这种政治权利，当然不会具有特别吸引人心的作用。

然而，这多少也还有一点好处：当时间的发展和启蒙运动的进步使民族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可能采取的保护措施的时候，这种权利就好象为民族做好了开始行动的准备。然而，就连这点好处最后也消失了。长期以来，三级会议再也没有召开。旷日持久的拖延，甚至使人把它完全忘却了。人们只能勉强地记得这一古老的、至少还曾有过的政治措施。简而言之，对于它的习惯已被

破坏，对于它的记忆已在思想中消逝。而这种习惯和记忆的消失，便使我所说的法兰西民族的愚昧无知达到了顶峰。

如果这方面的一切传统在1789年都没有丧失，如果法国人的头脑里还保留着他们曾经从事过的政治活动的某种痕迹，那就会看到他们将依靠适当的根据，首先要求恢复他们过去的权利，并且毫无疑问会把这种恢复权利看成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即使他们暴露出追求名利的野心，但这种野心同有人早已流露出来的野心相比，也不会有过之而无不及①。

尼德兰人民和英国人民，曾长期处在专制的压迫之下。但是，由于他们有坚定的原则，同时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当局的特权，所以在情绪不满的时候，他们的思想总是围绕着这些明确规定的观念积极地活动。因此，一方面，即使政府的专横跋扈能够压制他们的政治积极性，甚至压制得使它暂时不复存在的地步，也不能把它彻底消灭掉，更不能抹掉对它的回忆；另一方面，当他们有机会抬头的时候，他们努力的目标就被明白地确定下来，他们的计划也早已拟定完毕。这个计划的内容，就是恢复他们的被剥夺的权利，并取得新的保障以免权利再被夺走。因此，如果说法国人民的1789年起义缺乏组织，那末它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任何合法的手段来使人们了解它的愿望，没有任何正确的方法来有效地阐明自己对于想要进行的改革和感到必须对制度进行革新的看法。

如果说法国人宣布过人权，那么它的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

① 路易十四第一个说“朕即国家”，这句话也就是即将取消人民的一切政治权利的信号。路易十四在财政上造成的赤字，即使在1789年叫二十个总稽核的家庭破产，也弥补不上。因此，就是这个路易引起了革命，我们大家和波旁王朝遭到的一切不幸，都应当由他负责。

他们的思想已经不习惯于公民的权利了。由于不能重新要求他们已经不再知道的福利，他们便糊里糊涂地一味追求想象之中的福利；由于在政治上无知，他们便祈求于天命；由于他们在热情迸发的时候毫不考虑公认的界限，他们便自然不会先为自己规定界限。但愿田地的埂界突然消失，所有权不再存在，让每个人去占有一切。

然而，法兰西民族的这种无知，不管如何严重，也许还不是造成它无能的最坏因素。人们的头脑远非一块白板，其中虽然没有储藏任何正确有用的观念，但不一定就没有错误有害的观念。谬见到处泛滥，使得人的头脑长期不能接受真理。

僧侣阶级向人民指出了反对国王的办法，即让人民仰仗教皇——上帝的使者和人世最高裁判者的威信，可是他们自己却服从世俗的政权，充当了它的工具。它教导人们唯命是从①。

① 更加详细地研究一下僧侣阶级自产生以来直到现在的行为和学说，也许是很有趣的。可以把这段时期分成几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第一个时代　从基督教产生到君士坦丁大帝领洗。

在这个时期，僧侣阶级还不是一个与其余教徒分离的团体。基督徒还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他们反对现存的一切制度，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人们的任何集团都为自己选择领导者，并保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撤换他们的权利。权力完全掌握在人民手里。

第二个时代　从君士坦丁大帝到查理大帝。

神甫即以前的祭司开始形成一个单独的团体，出现了僧侣阶级。这个阶级力图联合起来，渗入到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和西部地区的蛮族的政治和宗教机构之中。基督教的传教士在西部地区的蛮族中获得了成就。

第三个时代　从查理大帝到教会的大分裂。

罗马的大主教脱离帝国而独立，成为享有主权的君主，管辖全部基督教僧侣阶级。他利用这一僧侣阶级作为工具，到处宣传和说教："教皇是上帝的代表，具有神的全部明智，他是国王之间的或国王与其臣民之间的一切争端的天然裁判者。"由此可见，教皇向人民指出了他们反对王公大人的不正义行为的办法。这一学说被用诸于实践，而且有一些国王还受过罗马教廷的制裁和审判。

第四个时代　从教会的大分裂到宗教改革。

教廷被迁到阿维尼翁。从此以后，教皇的势力离开了罗马这个永久城市，不再统治全世界，失去其昔日具有的吸引力。大教堂、大学和政府从四面八方攻击阿维尼翁

大学最初隶属于僧侣阶级，后来又受世俗权力所管辖，由于它们同时与这两个不同的机构保持隶属关系，所以毫无自己的政治主张。

但是，经过在不同时期以独特的方式教授古代文献之后，这些大学便产生和养成了一种过分崇尚古代、古代伟人和古代制度的尊古风气。

世人对这两种教育有什么想法呢？一个青年人在开始进入社会时将会形成什么观点呢？

拿教皇、主教、神甫、修士和整个僧侣阶级作笑料，已经是普遍流行的现象；而在谈到国王的时候，大家都用一种恭恭敬敬的语调，表示忠心耿耿。然而，僧侣阶级也在宣传对国王要百依百顺，并从宗教上赋予国王的威信以神圣的根据。真是十足的自欺欺人！人们没有发现，从一方面加以破坏的东西，正是从另一方面竭力加以支持的东西①。

教廷。僧侣阶级本身力图使世俗权力照旧服从于精神权力，并且对自己最高首领的已经开始压抑他们的权威打算加以限制。于是，这个与世俗权力对立的巨大团体开始解体，并趋于自消自灭。

第五个时代　　宗教改革以后。

天主教的僧侣阶级失去了一半欧洲，它的势力也随之削弱，实际上已经无力与国王抗衡。它不再斗争了，而为了自保，便使自己成为国王的奴隶。

它希望自己成为王权的必要支柱，向国王宣称王座应当依靠神坛。王权使它保住了财产，而它则要宣传国王就是神的化身。

① 由此应当断言，即使王位受到人们的尊敬，即使舆论界认为它是强大的，这种力量和尊敬也决不是来自僧侣阶级及其消极服从的学说，因为人们不会遵循被人轻视的老师的教训和告诫。正确的说法与此相反，实际上是因为人们憎恨僧侣阶级，感到受它的暴政压迫，而国王打碎了这种暴政的桎梏，所以王位便具有了主要的力量，反抗的情绪在斗争结束之后仍然继续存在。

但是，国王的威信所依据的基础既不巩固，又未持久，这是因为：一方面，不再发生作用的僧侣阶级，随着人们不再惧怕它而成为嘲弄的对象；另一方面，人民没有继续与国王结成同盟的兴趣，因为他们的敌人已经被打败，使人民和国王联系起来的纽带日渐松弛。于是，国王与其臣民之间的疏远和斗争的基础已经存在了。

大学的教学工作应该产生成果。社会上所重视的，人们所欢迎的，人们想从一代青年人身上看到的，并不是他们对祖国的制度、对当代的事物和人物的了解，而是他们对古代的学识，他们对那些与当今毫无关系的一无所用的往昔的回忆。

此外，人们期望于青年初学者的，并不是要他们成为精明强干的人，而是要他们受到关怀备至的保护；并不是要求他们的才能，而是要求他们的信誉。人们帮助他们取得的，并不是对民族发生有益影响和进行明智改革的能力，而恰恰相反，却是危害同胞的权力，而他们也将成为同胞的又一个灾难。最后，人们指示他们当作最高成就的，根本不是改进社会的状况，不是保护同国人的自由，而恰恰相反，却是成为统治者，为增加统治者的利益而加深和扩大弊端。

最初发起革命的法国人所获得的三种教育，可以概括如下：僧侣阶级进行的教育，直接使法国人变为奴隶，所以它也不能而且当然不能对理性和风尚发生积极的影响；大学进行的教育，只能使法国人发疯，沉缅于幻想，而且它做的还很有效；法国人进入社会时得到的教育，使他们变得野心勃勃，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和乐于发号施令。我们以后再来研究我们祖先的这种明智所发生的结果。

附注：我们删去了第三封信、第四封信和第五封信，因为它们现在已经失去发表的意义。——圣西门

第六封信

一种欲念引起了法国革命——革命只能以另一种欲念来结束

——革命的真正目的——我们正在进入全人类共同的革命。

如果让我考察法国革命是由什么欲念引起的，社会上的哪个阶级对它感受最深，我就认为是要求平等的热望引起的，是属于最下等阶级的人感受最深。由于无知，同时也由于自身的利益，他们最热烈地投身于革命，而且喜欢在革命中使用暴力。追求平等的欲念，得到了摧毁革命爆发时期所存在的社会组织的后果。我现在不禁要问：既然所有的东西一下子都被摧毁了，那末现在还需要不需要另一种欲念来激励新的建设工作呢？或者换句话说，革命能不能以欲念或自制来结束呢？

在旧制度下养成的习惯，是建立真正的新制度的巨大障碍。这样一种新制度的建立，要求有伟大的哲学著作问世和作出巨大的经济牺牲。只有欲念才能使人们决心去作巨大的努力。

自制决不是积极的力量，它本质上是胆怯的，自身不足以破坏现有的习惯，它只是竭力使我们维持这些习惯。

自制所鼓励的，是在专制和神学制度下养成的习惯与自由的实业观点和制度之间谋求调和。然而，由于事物的本性，这后一种制度和观点具有其特殊性。因此，只要它们没有占上风，只要它们没有完全摆脱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去掉妨碍它们的弹簧发挥弹力的铁锈，便将一事无成。

当人们声称法国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和神学的权力时，这是夸大其词。法国革命并没有消灭这种权力，而只是显著地降低了人们对于他们所依据的原则的信任，以至这些权力今天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威信使自己成为约束社会的力量。从什么观点中我

们能够找到这种有机的、必要的约束力量呢？从实业的观点中可以找到。我们应该从这里，也只能从这里寻找拯救自己和结束革命的办法。

不错，阁下，依我看，一切思想和努力所应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最**合理地组织实业**。这指的是最广义的实业，它包括一切有益的工作，包括理论和应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换句话说，最合理地组织实业，就是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在这个政府中，政权只具有必须使有益的工作不致紊乱的效能和作用；在这个政府中，要把一切工作安排得使劳动者能够自己学会组成真正的社会，能够彼此直接地和完全自由地交换各种劳动产品；最后，在这个政府中，只有社会能够知道什么东西对自己有用，什么东西是自己所希望的和所喜欢的，而社会也是评定工作的优点与好处的唯一裁判者。因此，生产者只须希望消费者对他付足劳动报酬或服务报酬，而不管他爱用什么名称来叫这种服务。

此外，我们只想简化和阐明事物的自然进程。我们希望，人们从今以后要有意识地、更直接地、更有成效地努力把他们可以说是不自觉地、慢腾腾地、犹豫不决地、收效甚微地一直进行到现在的事情做好。

在公社解散时，我们看到实业阶级在赎买自己的自由之后，达到了为自身创设政治权力的目的。这项权力，就是只有经过它们同意才能征收新税。它们渐渐强大和富裕起来，同时也变得更加重要了。它们的社会地位在一切方面都得到改善，但是，可以称作封建阶级和神学阶级的那些阶级，却不断地丧失威望和实权。由此我断言，实业阶级必将继续获得成功，最后终将控制整个社会。

事情的发展就是这样 我们的前途就是这样，已经无力维持自己所建立的一切制度的陈旧机构必将永远瓦解，自我消灭。

有一些革命，开始时只是局部的、民族的；还有一些个别的革命，只涉及到某一社会机构。这些相继发生的革命，正在促成以后的普遍革命。

在哲学方面自从阿拉伯人向欧洲输入重视观察的科学文化以来，在政治方面自从公社解散以来，人类的理性显然走向了一场普遍的革命，也就是说，朝着建立一个必将大大全面改进人类理性的现状的事物秩序的方向前进。

在我刚才所说的两个值得纪念的时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可以指出的出类拔萃事件，有路德的革命、查理一世时英国的革命、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的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同时我认为，普遍革命即将开始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个革命将席卷一切文明民族，而不管他们居住在地球的哪一部分。

各国的政府不能再管理人民了，它们的职权将只限于不使有益的工作紊乱。它们将只拥有很少的权力和金钱，因为少量的权力和金钱就足以达到这个目的。为进行大大小小有益的工作所需要的资金，将由自愿捐献者提供，而捐献者本人将监督这些资金的使用和保管情况。

第七封信

三种不同的舆论——它们的不同性质——自由党的双重任务——自由党做过的事情——要留给它做的事情。

阁下，我打算在这封信中向您介绍人类理性目前在法国的发展情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要考察一下法国现存的几种主要政治观点。我认为，分成三种观点便可包括其余一切了。我现在来分别分析其中的每一种观点。我把这三种观点称之为守旧观点、倒退观点和自由观点。

被我称为守旧分子的人，就是那些不适当地自诩有理智并企图以折衷为名把新旧制度捏合在一起的人。他们没有看到，把这两种对立的东西结合起来的企图是荒谬的。他们没有看到，军人操纵的一切权力和以封建原则为基础的一切论断，都是直接反对实业的发展的。实业在这里不能也不想让步，除了建立最有利于实业的政府以外，用其他办法都不能结束革命。

凡是感到地位中常、思想懒惰和贪图安逸的人，都有守旧观点。他们憎恨变革。他们是一些有病的人，甘愿处于虚弱和衰竭状态，慢慢等待死亡，而不下决心采取恢复健康的积极摄生办法。这些人的理性不能上升到足够的高度去认识建立一个果断的秩序所需的必要条件。他们准备为维持事物的现状，并使其一成不变地固定下来，而情愿付出巨大的牺牲。

尽管守旧观点是极大多数人的观点，但它只能是、而且实际上不过是舆论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因为其本质完全是消极的，它所能做的一切不外是妨碍其他观点发挥作用罢了。

有一种观点可能使您感到奇怪：它本来故步自封，可是又非常易变。其他观点总是朝着一个目标前进，按照既定的方针行动，而这种观点却与此不同，它是按照别人指示的思想而行动的。我敢说，它跟在其他一切观点的后面，企图拖人家的后腿。说来也巧，

正是它在反对人家变革的时候，它自己也在发生变化。它总是表示，要决心维护和巩固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在这种观点看来，变化的性质和目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凡是能够存在，这就够了，应该让它永远存在下去。这是对静止的一种古怪偏爱，它提醒我们经常保持警惕，唯恐工作劳而无功——被罚去做达纳乌斯的女儿们的工作①。

被我称为倒退分子的人，通过他们的演说和著作，宣称社会处于一种可怕的分裂解体状态。他们说，这种状态是最不幸的。他们证明，这种状态不能再继续任其下去。他们断言，建立他们所谓的稳固的事物秩序是至为迫切的，因为新的雅各宾党人随时可能出现并篡夺政权。②

随后，他们又研究了1789年以来试图建立的一切管理制度。他们说，经验已经证明，任何一种管理制度都不行，因为它们都在建立后不久便垮台了。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最明智的解决办法是恢复过去的制度，恢复那种延续了许多世纪而在其漫长的存在

---

① 根据希腊神话，国王达纳乌斯有五十个女儿，都因杀夫之罪而被罚在地狱里向无底桶灌水。"达纳乌斯的女儿们的工作"一语，表示一种徒劳无益的工作。——译者注

② 人类的理性是非常脆弱和有限的。我们在生活中经常担心对我们危害不大的事情，而且也决不冒犯对我们最有威胁的危险。一个小孩子被火烫伤了，母亲从此以后一看到小孩子靠近火，就为孩子担心，但在这以前，她就应该采用预防措施，因为小孩子得到的经验会成为他们最好保护者。

历史上有许多证据，证明整个民族的预见，无论在范围的广度上，还是在应验的效果上，都不如个人的预见。

今天，法国各地都组织了国民自卫军，这种民兵部队实质上是一个自由组织，主要由有财产的人组成。在他们的指挥官当中，我们可以到处看到大地主、大工厂主和大富商。现在，当各地的无产者都被解除武装的时候，怎样能怕雅各宾党人卷土重来呢？

期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严重骚乱和全面动荡的管理形式。他们承认这种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但是他们又说，一方面，人类的一切机构，从本性上来说，都是不完善的；另一方面，缺点也是可以纠正的。

有一个事实，证明这种倒退观点对于舆论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证明它所起的作用比持自由观点的人所想象的要大得多。

比如《辩论日报》① 的观点，显然倾向于倒退派，它在法国拥有最多的订阅者。夏多布里安② 的著作也很畅销。在英国，情况也完全是这样，那里的《泰晤士报》③ 是拥有读者最多的报纸。

著名的哥伦布，曾经花了多年的时间去准备他的探险、购置船只和配备航海人员。最后他开航了。在航行的最初几天，船上一片欢腾。但是，惜别大陆和怀念大陆上的种种好处的情感，开始在某些人身上战胜他们发现新大陆的愿望。不安的情绪，随着航行的旷日持久，也就是说，随着越来越接近目的地而不断增长。最后，在将要喊出"发现了大陆"的时刻，也正是大多数人主张返航的时刻。

整个十八世纪，都被法国哲学家用来准备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开始于 1789 年，在革命的最初活动时期，整个民族，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沉浸在欢乐之中，而且满怀着信心。

从 1793 年开始，法兰西民族开始进入解体状态。据我看来，这

①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法国的一家反动报纸，创刊于 1789 年。——译者注

② 夏多布里安，弗朗斯瓦·勒内 (Chateaubriand, François-Réne de 1786—1848 年)，法国的作家和国务活动家。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属于保王党，曾流亡国外。复辟后历任国家要职。他在自己的政论和文艺作品中反对革命思想，拥护反动倒退的观点。从他的文学思想来说，他是法国宫廷浪漫主义的创始人。——译者注

③ 《泰晤士报》("Times")，英国的保守派报纸，创刊于 1785 年。——译者注

一状态尚未结束。在这期间，法兰西民族提供了各种美德的值得留念的范例，同时也犯了各种罪行。法兰西民族以它取得的重大胜利和遭受的惨重失败，保证了自己在历史上占据一个显著的地位。探索新的原则和新的组织基础的法国人，把一切实验都进行到底。

许多有财产的人充满了不安的心情，他们竭力从倒退派的观点中去寻找根据，以证明如果达不到目的，就可以向后转。

现在我来研究自由观点。我把极力想使政府只拥有交给它掌握之后会对民族有好处的权力和金钱的党派，叫做自由党。

自由党开始形成于十八世纪。为了对这个党的现有观点、对它给予舆论的影响，以及对它为使舆论完全对它有利它还要做些什么有个明确的了解，我有必要把它的发展过程简述一下。而且，我也十分愿意向您作这个简述，因为我认为这有助于清晰说明自由党人一词的意义。曾经有一大批作家对此作过解释，但都毫无结果。

正是这些自由党人，通过他们的著述揭露旧的政府组织的弊端，而为革命作了准备工作。也正是他们，在人民中间激起了跃进的高潮。人们一回想起这一高潮，既会联想到许多邪恶的东西，又会联想到许多善良的东西。又正是他们，提出了后来被制宪会议宣布为法兰西民族内外政策的基础的一般原则。

如果法兰西是一个岛国，它的革命就不会引起它曾经招致的一切不幸，而且任何人也不会谴责自由党人发动流血斗争。这种谴责是很不公正的，因为自由党讨厌使用武力，而且它因其他所有政党使用残酷的暴力而蒙受大于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牺牲。我这是

说，如果法兰西是一个岛国，那它的革命就只能是一场比较活跃和比较持久的论战，它讨论与全体法国人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讨论最好的政府组织形式。新的机构自然会取代旧的机构，而进行这场变革也不必诉诸暴力①。

但是，法兰西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它有许多邻国，而且有些还是强邻。这些邻国仍未摆脱封建制度和迷信的羁绊。法国的僧侣阶级和贵族曾向一些强邻求援②，它们央求邻国帮助它们反对自由党人。他们要邻国相信，对法国的僧侣阶级和贵族的打击，将会变成对欧洲的全体僧侣阶级和贵族的打击。德国的军队马上采取行动，猛向法国扑来，即猛向法国的自由党人扑来。自由党人只得唤起无知的老百姓来保卫革命，激励他们拿起武器，以驱逐已经侵入法国境内的封建和迷信的军队。

自由党人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比僧侣阶级和贵族占上风，因为为特权阶层而战的军队都被法国军队击败了③。但

① 法国位于大陆，在某些方面给法国人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但在其他方面，又使法国人得到了很大好处。这种地理位置给他们造成的灾难终于结束了，他们正接近力求由此获得好处的时期。

如果法兰西是个岛国，那它的革命毫无疑问会为时很短，而且不甚残酷。革命也会少流一些血，少制造一些灾难。但是，这样的革命只能是一场妥协折衷的革命，只能是一场半途而废的革命，只能是一场不能使法国人以后避免发生其他革命的革命。

法国人经历了一次可怕的革命，但他们的遭遇还有甚于此。干涉他们内政的邻国对他们大肆蹂躏，但邻国干预法国内部关于政府的良好组织形式的争论，又使它们变成了当事的一方。邻国硬要把争论的结果看作是自己的功劳。

② 僧侣阶级和贵族的少数派由自由党人所组成，所以他们早就不属于特权阶层。因此，我认为必须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贵族的多数派与少数派分开。多数派认为自己就构成了特权阶层的全体。

③ 许多年来，法国人一直在军事舞台上寻找荣誉，然而在获得一百来年的荣誉中间，却是继许多次胜利以后便有几次大败随之而来。

在文明发展的目前阶段，任何军事胜利都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体力在人类社会中今后只能发生次要的作用。好在一个民族正如某一个人一样，今后只有一种获得荣誉的方法，这就是脑力劳动，也就是进行有益的著述，而创造出来的作品越有重大和普遍的利益，其荣誉也就越高。

是，既然自由党人比特权阶层占上风，那末被他们武装起来并夺取了政权的愚昧无知的无产阶级，也就要比他们占上风。自由党人很快就感到，可能有一种东西比旧制度还要坏一千倍。经验使他们懂得，由愚昧无知的阶级管理政府，是最令人讨厌的。幸亏政权没有长期掌握在这样一些人的手里。

从此以后，自由党人依次同罗伯斯庇尔①、执政内阁②和波拿巴进行斗争。自由党人相继被这些最后也相继垮台的革命政府处死。

自由党人从他们出现以后，就想把两个本质上互有联系的方案糅合在一起。但是，这两个缺一不可的方案是完全可以分开研究的。我现在就想这样作。

自由党人首先想推翻封建和神学机构，破除宗教迷信，改变特权阶层强加给被他们称为吝啬鬼的实业界人士的风尚和习惯。

他们在这方面获得了全胜，因为欧洲所有的雇佣军都无力恢复法国的旧制度，因为甚至在目前，当法国受到欧洲其他国家政府保护的时候，法国的僧侣阶级和贵族想要恢复其昔日财势的一切企图都没有得逞，因为领头发起这种复辟运动的人，除了没有弥补他们本人及其等级想要弥补的损失以外，还使他们由于自己的才干所获得的个人尊严受到损失。

据我的理解，自由党的第二个目标，是计划建立一个新制度，

① 罗伯斯庇尔，马克西米利安(Robespierre,Maximilien 1758—1794年)，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年)。——译者注

② 执政内阁，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由五名执政组成的内阁(1795—1799年)。——译者注

以取代旧制度，即根据时代的精神和文明建立一个符合共同利益的政府组织。

在这第二项任务上，自由党人完全没有取得第一项任务所取得的那样成就。他们在某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而在其他方面则做得很少,几乎什么也没有做。

从法国的政论家自革命开始以来发表的大量著作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助于组织新的政治制度的原则和观点，然而关于这种制度的总观念尚未形成。

自由党尤其应当作的,是迅速改换论战的战场,迫使敌人进入自由党的阵地,而不叫他们留在他们的原地;要在自己的战壕里等待他们,而不要总在敌人的战壕里追击他们。

西塞罗说过,他不能设想两个占卜者能够面面相觑而不笑。这句话出自他这样人之口，证明古代各族人民的宗教机构，在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完全腐朽了。但是这些机构,尽管非常腐朽,还是继续存在了许多年，一直延续到基督教的奠基者们把信仰——神和爱一切人的教理放到首位之后，致力于发展和建立这一可以说是新的宗教学说、而不再理睬那种在有教养的人看来已趋灭亡、而在实际上仍然占有统治地位的学说为止。

西塞罗对宗教观念所说的这番话，长期以来就被人们用来谈论我们的政治机构，而这些机构现在还依然存在。它们将一直存在到一个关于社会组织的新观念，即一个以其清新明确而使一切正直的人感到震惊的新观念产生出来的时候为止；一直存在到人们抛弃旧观点、而开始根据这个新观念直接建立政治制度的时候为止。

第八封信

研究政治上的一项一般原则

阁下，可见问题在于寻找一个新的政治组织体系。

这项工作现在达到了什么程度呢？

如果这项工作只限于收集大量材料就感到满足的话，那就可以说即将大功告成。有些观点早已定下来了，而且数量很多，它们之间甚至有某种联系。但是，最重要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了呢？有没有一个基本原则呢？一个公认的、被已发现的真理指引人们去遵守的而且能够产生真理本身的原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也正是我们应当研究的。

在献身这项工作的一切人当中，我认为著述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作了最有益的工作。而萨伊①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我觉得是一部含有最多数量的积极而又彼此协调的观点的著作。

在我看来，这位确实值得十分推崇的作者，仍是属于最接近于目的地而又始终未能到达的人。

下面所引的，就是这本书的序言的头两页。这两页包括了作者的全部创见。这是他的最一般的观点，如果容许我说，我也说这是该书的全部哲学。

---

①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 Jean-Baptiste 1767—1832年)，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保护贸易自由和实业自由，认为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关系是阶级利益的调和。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程》(1803年)偏重理论问题，很少谈到实际问题。——译者注

“只有当人们精确地规定了科学的研究范围和这种研究所能达到的目的的时候，科学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否则，就会一鳞半爪地抓到少数一些真理，而不能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且会造成大量的错误，而不能发现错在什么地方。

“长期以来，人们就把所谓的政治学，即把关于社会组织的科学，同讲授财富如何形成、分配和消费的政治经济学混为一谈。然而，财富实质上是不依政治组织为转移的。不管采取什么政府组织形式，只要管理得好，国家就可以繁荣。我们看到一些民族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富强起来，但也曾看到一些民族却在人民会议制度下衰落下去。即使政治自由很有利于财富的增殖，那也是间接的，如同它很有利教育的发展一样。

“当把构成良好政府的原则，同公有财富或私有财富的积累所依据的原则混淆起来一并研究时，就会使一些观点混乱而得不到澄清，这是不足为奇的。对把自己著作的第一章定名为《论人类的政府》的斯图亚特①，就可以进行这样的谴责；对经济学家派的几乎所有著作和卢梭②为《大百科全书》写的文章，也可以进行这样的谴责。

“我认为，从亚当·斯密③开始，人们就一直把研究财富的科学命名为政治经济学，只把阐述政府和人民之间以及政府彼此之间存在的关系的科学叫做政治学，并总是把这两种学说区分

①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 James 1712—1780年)，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译者注

② 卢梭，让·雅克(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年)，法国杰出的启蒙运动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译者注

③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年)，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开来。”

我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萨伊先生把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当作两门彼此不同和互相分离的科学。另一方面，凡是读过他的著作或是听过他公开讲课的人，都知道他对自己所讲的科学极为重视，并听到他屡次宣称：只有这门科学才使道德和政治得到了两者应有的可靠而正确的东西。

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证明作者好象模模糊糊地、并非情愿地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真正和唯一的基础，但是他没有十分明确地看到这一点，因为他在其著作的个别部分虽然确实提到过这一点，但在他的一般议论中却又否认这一点。

不管怎样，他的工作仍然有很大的贡献。他的这部著作包含着政治经济学至今所发现的并已证明的一切东西。就目前而言，它仍是这门科学在欧洲的**顶峰**(Nec plus ultra)①。

我认为，非常明显地存在于这部著作中的一些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重要的真理如下：

一、生产有益的物品，是政治社会能为自己规定的唯一合理和正确的目的，所以**尊重生产和生产者**的原则，要比**尊重占有和占有者**的原则有益得多；

二、政府干预实业时，政府总是要损害实业，即使政府的努力是出于鼓励实业，也会损害实业；由此得出结论：政府只应当关心

① 在亚当·斯密以前，政治经济学还处于幼稚阶段，被人们讥笑为政府的助手，同政治学混为一谈。当它由于真理的威力和常识的权威而壮大起来以后，就获得了更加完整和更加确切的性质，从而宣布自己同政治学分开而独立。

还需要更大胆一些，还需要更多一点哲学。这样，政治经济学很快就会占据自己真正的地位。最初，它依靠政治学；将来，政治学要依靠它，或者与其这样说，还不如说将来只有它才是全部政治。这个时刻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

保护实业，使其不发生任何混乱和故障；

三、有益物品的生产者是社会上唯一有用的人，所以只有他们才应该协助调整社会的发展进程；实际上只有他们才纳税，所以只有他们才有表决权；

四、人们永远不能在用自己的力量使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时而不损害生产。因此，战争不管其目的如何，都在损害整个人类；战争甚至也损害战胜国的人民；

五、一个民族想对其他民族实行垄断的企图，是一种不良的企图，因为垄断只能靠武力才能获得，只能靠武力才能维持，而且垄断势必减少享用产品的那个民族本身的生产总量；

六、道德实际上是随着实业的完善而发展的；不论从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来看，还是从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来看，这种看法都是正确的。因此，应当推广的教育，应当在人们头脑中加深的并使之到处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要促使每个人提高生产的积极性和尊重别人的生产；

七、全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和一些共同的利益，所以每个人在社会关系方面只应把自己看成是劳动者社会的一员。

阁下，我认为，凡是可以称为政治科学的考察要点的一切东西，我们已经概括在这几点里了。但是从这些要点可以得出什么样的一般观点呢？它们会把我们引向什么样的共同点呢？要知道，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找到、也必将找到一切政治的原则。

这项原则是一个人人都能认识的旨在维持生存和保持安宁的利害关系体系。只有这种体系才能使人们相互理解，感到有必要彼此配合；只有在这种体系下，人们才能共同讨论问题和共同行

动；只有围绕这种体系，政治才能得以实施。在批判一切社会制度和社会问题时，应当以这种利害关系体系作为唯一的尺度。

因此，如用两三句话来概括，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也就是以建立最有利于各种生产的事物秩序为目的的科学。

原则就是出发点。既然这个出发点已被我们在上面指出，而且事实已把我们引到了这个出发点；既然我可以由此说这个出发点是实在的和非常明确的，那末政治学从今以后，就再也不该处于暧昧的猜测之中，任凭局势变化去摆布了；政治的命运也不会再同一个政权、一个政体和一种偏见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政治的活动范围将为人人所共知，政治的活动方式将受到尊重；而关于社会的科学，今后则将获得一个原则，最终成为实证的科学①。

愿身兼政治家和哲学家的人掌握一切已经分别证明的真理，愿他们把这些真理相继运用在我们方才确定的原则上。我们首先请他们用他们已经掌握的真理来判断这一原则，然后请他们用我们向他们提出的原则来判断这些真理。我们要求他们回答：这些真理是否从原则中获得了新的力量，比如说获得了另一个生命。最后，我们还要他们回答：这项原则是不是迄今建立的一切原则中的最一般的和最真实的原则，从而是不是能够得到可靠而有益的结果的最有成效的原则。还有，原则不是由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人发现和指出的。我方才提到的原则并不是我的劳动成果，这应

① 在研究各种观点的时候，对用词不能大意。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在这里提醒读者注意"原则"一词，以免把它同"命令"一词混淆起来（一般有这样情况）。我们不说已经达到出发点的政治是一项命令，而只说它是一项原则。这项原则将来或许可能变成命令，但这不是哲学家的事情。原则一经发现和提出，剩下来的事情就必然自行解决。如果原则是正确的，那它自然会变成命令，而内容也会找到它的表现形式。如果原则错了，它就决定不了任何思想的方向，而形式也不会使原则产生它本身所没有的效力。

当归功于我说过的那些作家和学者。这些人在他们的不同著作中曾间接地提到过这项原则，但他们没有深入探索和观察。我完全没有提出过这一原则，但我对它作过深入的探索和观察，并将它公布出来。

阁下，您当然会对我说：你只把工作完成了一半，你在通过观察事实得到这一原则之后，应当接着对它检验，并用证据来证明你们的叙述。我也是象您这样想的，但由于我认为我的任务的最后一部分只是讨论各种政治问题，而且我现在正研究这些问题，所以对于同目前我认为仅仅提出来就可以的这个原则的发展和运用无关的问题，我以后就什么都不谈了。

第九封信

一个被自己曾经寄于厚望的人弄得濒于灭亡的政府，应当求救于它认为是十分可怕的人。

阁下，您看一下最近一次震撼法国的危机以后的政治事件的进程，毫无疑问不会不感到兴趣。

在波拿巴逃跑和国王驾返之后，王位空缺时建立的议会根本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政府召开了另一个会议。政府运用自己的一切影响，只让曾经勤王的人进了下议院，所以绝大多数议员自然属于以往的特权阶层，而这个阶层之所以存在似乎与人们留恋昔日的王权有关①。

① 这里指的是法国复辟初期(1815 年)选出的立法机关，它的成员主要是反动的大中贵族的代表人物，即极端的保王党分子，或人们简称的“极端分子”。这个立法机关被称为“无双议院”(Chambre introuvable)。——译者注

政府本以为这样组成的议院，很快就会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但是，组成这个议院的人要捞回以往的损失，要重新发财，要争夺权势。总之一句话，他们要恢复自己原来被革命推翻了的地位。于是，出现了一种与政府利益不同的利益。这是一种私人的利益，所以最容易吸引人；它占居了首位，而勤王的忠诚这时便缺少了。

应该使他们操劳和曾经使他们操劳的事情，完全是特权阶级本身的事情，即到处去为自己寻找仅剩的一点特权，而根本不去协助政府。因此，他们这方面是不会有帮助政府解决困难的强烈愿望的。

他们未能如愿以偿的还有两件事：第一，手中要有资金；第二，要能到别处筹集资金。他们手中之所以没有资金，是因为贵族实际上没有掌握可供使用的资金。他们所处社会的生活习惯，通常使他们入不敷出，而不是有所积蓄。

他们也不可能到别处借钱，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的财政观点不会超出税收和政府措施的范围，也就是不会超出专横措施和强制措施的范围，他们不是告贷有门的人；另一方面，他们提出的要求引起了人们担忧和不敢信任，舆论也在反对他们。总之一句话，他们毫无办法。人们不会援助威胁他们的人，人们不会以什么东西授与想要侵占他们的人。

政府很快就觉悟过来了。它不久就认识到，这样一种办法，远远不能使它摆脱困境和开辟财源；恰恰相反，这只能使它失去原有的东西，把它推入新的窘境，最后使它必然彻底崩溃。

政府的处境日益危急。它进退维谷，既想解决极端的匮乏，又想保持议院，但它从议院得到的，除了新的危急和失望动因以外，

其他什么都没有。

从这个议院解脱出来，便成了当时最强烈的和最迫切的需要。议院依靠耍弄狡猾的手腕勉强存在了几个月，现在一道命令又不让它开会了。

当时处于孤立地位的政府，感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困难，以为最后的唯一出路就是成立一个非常会议，把它命名为预算协商委员会。政府向它提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拯救国家和政府。

或许是出于有意，或许是出于巧合，实业界也参加了预算的审议。实业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经过长期讨论，这些意见被通过作为讨论的议题。

这个经过热烈讨论的方案，引起了政府的注意。政府开始不再认为无法自救了。然而，它当时已经发觉议会反对拟出的办法。于是，9月5日下令解散议会和召开新的议会①。

各方面都赞同占了上风并引起政府注意的一种意见。实业界在新的信任的鼓舞下，大胆地宣布政府可以依靠它，只要政府同意采取向它提出的措施，政府就能够很快摆脱危险的处境。

这项提案顺利地通过了，而实业界的诺言也象魔法一般很快兑现了。政府发行了公债，公债很快就被购买一空。

阁下，请允许我提醒您全力注意下述事实，以便评定它的价值和研究它的后果。直到现在，设计财政制度和编制预算都由政府一手包办。政府保持了它所专有的施政能力。它把国家从困难的环境中拯救出来的荣誉都据为己有，而其实是在实业界拟出计划

① 1816年9月5日，路易十八下令解散"无双议院"。在新的选举中，代表大中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对极端反动派的人士获胜。——译者注

以后,国家才自己拯救了自己。

我们看到,在空前未有的最困难环境下,被统治者绕过了统治者为自己拟定出了行动准则,并向自己的领袖们指出了他们唯一应当遵循的道路。既然如此,那种认为只有统治者才有治国之才的偏见,又该如何解释呢!

是的,人民由于感到自己受苦和被暴政压迫而激起的不满所未能办到的事情,以及最尖锐的批判和哲学家们的猛烈攻击都无法办到的事情,如今都一一实现了,并且通过可以称为初步胜利的最新成就而终于赢得了胜利。

今后,还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止实业的壮大,即阻止自由的完全实现呢?只要实业和自由的共同利益总是保持适度,不发生混乱和纠纷,那就不会有任何障碍了。

第十封信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实业的威力,它的目的、进程和手段。

阁下,自从公社解体以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就逐渐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目前的情况,那就不难发现:一切都归结为这种关系。诚然,人们承认政府是必要的东西,即必要的服务,而且也只能这样承认。如果不是在温文尔雅的言谈中,至少也是在有关利益关系的辩论中这样承认。

在我们所谈的时代以前,人们还完全没有这种认识。当时,治理社会的原则不是社会自己规定的,而是被迫接受的。这就是专

制制度和奴隶制度的时代。

最后,实业开始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自由也产生了。公社买到和争得了某些自由,也就是说,公社拿钱向自己的统治者买到了自己不再受这种或那种统治的权利。

通过这些初步的收获,实业变得更自由了,从而也更加富裕了,于是不断得到新的根据和新的手段来购买新的自由;另一方面,在本质上就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的统治者,也由于他们的本性得到不断产生的根据来继续出卖自己的某些新的专横权力①。

事物的这种进程,在法国一直合法地延续到1789年。

这个时期,政府在财政上十分拮据,而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便召开了三级会议。结果,同以后发生的情况完全一样,陷入困境的政府不得不直接听从被统治者的意志,以便从他们手中得到金钱。于是发生了有利于实业的革命,或者至少是实业在努力使革命对它有利。时机大好,使得实业既有办法又有力量购买一部分专制大权,以致使它可以取得一切可能得到的自由。然而遗憾得很,不论是所谓的公社本身,还是审议提案的实业界人士,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当时,对学识持有一种偏见,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事人没有充分意识到保护自己利益对他们是何等重要,而认为必须去求助于更有能力的人,于是他们请来了一些律师。他们派去为自己辩护的人,不是与他们有共同利益的人,而是一些靠替别人打官司为职业的人。这些人对于现实和事实的关心,远不如对于观念和抽象的关心。因此,很快就听到了主张自由不可剥夺的声明,

① 在革命前的最后一段时间内,还可以买到使人变成贵族的职位。因此,从事实业而发财的人,不仅可以买到优待权,而且可以买到专制权。

这当然要导致这样一些容易引起混乱的争论理由:“为什么要讨论我们所持有的东西的价格?为什么对我们自己的东西还要付款?为什么要求我们去做他们可以自己去做的事情呢?”

于是,争脱了一切羁绊的自由感,到处泛滥,整个政府都被它淹没了。

我不想谈论在这以后发生的多少有些残忍的激烈变动,因为这是一座迷宫,而要弄清它的全部曲径,则需要很长时间。

因此,仅就革命这一事实本身而论,我认为它确立了两个重要事实:第一,被人统治是件不舒服的事,人们并不破坏他们所不反对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说,事实上法国革命正是被统治者的共同行动;第二,如果没有一个政府,灾祸更要深重,经验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由革命造成的这两个事实的积极结果,不外乎是这两个事实本身的互相结合和互相印证,也就是说:

“政府是必要的东西,即必要的灾祸。”

当得知病入膏肓的时候,思想上考虑的不再是治病,而只是尽量减轻痛苦。那末,被统治者是怎样忍受这种被人称为政府的灾祸呢?如果象我们在这封信的开头所讲的那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只是金钱关系,那末显而易见,被统治者只能认为政府是一种需要付款的服务机构,对政府的感情越浅,对它支付的钱也就越少。

从本性来说,实业也总是朝着这一目标前进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使它感到比行政机关的挥霍更加可怕,这就是秩序的混乱。同时,它从最近的事态中看到:如果不向现存的行政机关提供维持

它的经费，则这种混乱就不可避免了。于是，实业顺应了时势，把问题搁置起来，甘愿牺牲自己的一部分钱，以保证自己今后能够节约。

但是，为了信心百倍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为了在行动时毫不胆怯或轻率，只是盲目地力图尽量节约还是不够的。因此，必须寻找最切实可行的节约方法，必须对于应该实施的节约办法保持坚定的看法。但是，在有利于开始行动的时期到来以前，即在讨论下届预算之前，就应当讨论和阐述这个问题。

附注：随着接到美国的来信，我们将逐一复函。

再者，我们所维护的利益，关系到一切国家和一切人。我们发表这些信，是希望能与研究同样问题的一切人进行通信。

（王敏华译）

《三个时代》的《序论》和《结论》①

序　论

为什么实业能够如此长期地和如此不断地从进步走向进步呢？为什么有用者阶级能够节节战胜社会上的寄生阶级呢？为什么重大的政治动荡总是以实业获得新胜利为标志呢？为什么实业从未提过自己的口号和树过自己的旗帜呢？为什么它一向不依靠道德与势力来表现和炫耀自己的活动，而总是战战兢兢、无声无息地扩展自己的活动呢？

这是因为在整个这段时间中，社会的原则和它的行动之间，社会所说的和它所做的之间，社会所尊重的和它所追求的之间，曾经存在过而且今天甚至还存在着一个真正而又独特的矛盾。

没有共同观点或一般观点的社会是绝对不曾存在过的。每个人都喜欢表示自己愿意跟他人接触，以保证彼此之间的联合。这种一般观点，不论正确与否，只要它存在，就会发生支配作用，它对整个民族的行动都会发生极大的影响。

然而，人们对于社会利益的感受，受着自身力量的制约；维持

① 《三个时代》一文最初发表于 1817 年出版的《实业》第 2 编，作者署名为 M.***，不是圣西门的作品。这篇文章的《序论》和《结论》则是出于圣西门的手笔，收在 1868 年版《圣西门和安凡丹全集》第 2 卷的《实业》第 2 编里。我们翻译所根据的原文，载 1966 年法文版《圣西门全集》第 1 卷。——译者注

社会的实业技艺总是日趋完美，不断积累作为政治的全部威信和价值的唯一真实的基础的财富。另一方面，占居统治地位的观点，或简称为舆论，却不赞同这些有益的、不断的努力。结果，勤劳能干的人自己竟附和最敌视他们利益的偏见，不敢公开抵制从荣誉和宗教上来说应当加以非难和谴责的这种敌视。

事实上，人们一直认为荣誉和高贵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在这观点占统治地位的整个时期，实业活动非但未被重视，反而遭到轻视。那时，世人所尊重的不是正在发家的人，而是生下来就富裕而且善于挥霍其遗产的人。富贵，即豪华而清高，被认为是唯一光彩的条件和唯一为人羡慕的东西；靠劳动致富的庶民，本应骄傲地显示自己的财富，但他们却不敢表现，好象这是一种耻辱。他们急忙去买一个封建的衔位，设法摆出一副大老爷的架势，精心研究遮盖的方法，以掩盖自己真正的功绩，掩盖自己获得人们尊敬的真正权利，掩盖自己的才能和贡献。

宗教观点的虚伪和糊涂的程度，绝不亚于人们的政治观点，因为宗教在教导人们把劳动视为一种义务的同时，又把劳动贬低为卑贱的事情和发财致富的手段。结果，对于发财致富和暂时享受的蔑视，成了与其他宗教戒律同样严格的戒律；而要想拯救自己，只能通过剥夺或节衣缩食来实现。这肯定不能鼓励人们去积极劳动，因为劳动好坏没有差别，不受褒贬。这也肯定不能建立事物固有的正常秩序，使勤劳能干的人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因为宗教说他们是败坏世俗和腐化时代的罪魁祸首，指责他们硬要在人世创造上帝不准被谪下凡的人享受的那种幸福。

因此，出现了这么多修道院，设立了这么多宗教懒汉团体。

当然，人们对目前利益的不断要求和经常感觉，不会总让大批人清闲懒散。但上述的一般观点，不论其影响大小，毕竟使实业内部活动的速度略有减缓。然而应该承认，顺从了这种影响的社会，即使它打算树起实业的旗帜，也是办不到的。

突然起来反对占居统治地位的舆论，即使是反对可悲的和荒谬的舆论，也几乎总是一种危险而又无益的轻率行为。在人们的思想习惯中，真理有一个极难克服的敌人。人们长期与某些观点相处一起，而当这些观点受到驳斥时，人们就以为自己也受到了威胁。而最容易盲从他人的人，则更是最顽固地反抗新鲜事物。

此外，只揭穿谎言是不够的，还要使人的思想有一个支点。如果你未能使人家接受真理，那是你根本没有驱走他的谬见，或者你使他陷入了失望的迷惘之中：这是革命所使然，或者不如说，这引起了革命。

长期以来，人们就感觉到了旧的一般观点的缺点；长期以来，它们的统治就已经成为桎梏；人们后悔没有抛弃这种精神上的专横，反而把它称为成见，并且由于缺乏更好的观点，至今仍在忍受着这种专横的压迫。

有些不仅明智而且更加大胆的哲学家，对这个陈旧的舆论发出了早期的、但仍然是简明而坚决的抨击。于是，一般观点的体系开始土崩瓦解，社会也开始分裂。

由于人们相互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公认的东西存在，所以他们的思想便分道扬镳，而且彼此成了仇敌。这就造成一切胡作非为之间的斗争和各种胡思乱想之间的战斗。

由于没有共同的观点，人们便依靠一般感情行事。民族的欲

念产生了，平等和黩武光荣的思想交替地熏陶着人们的思想，专横也很快找到了它的地盘。

专横终于被自己亲手摧毁了。在经过这么多次残暴的动乱以后又回到自己出发点的法兰西民族，自庆劫后余生而感到高兴。但是它没有受骗，知道它所抛弃的东西以后对它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而昔日占居统治地位的一般观点再也不会重整旗鼓，恢复自己当初的权威了。社会舆论应该有一个新的基础，就如社会要有一个新的结构一样。

即使封建制度不再存在于政府之中，那也要当心它还存在于被统治者的头脑当中。

但愿抽象概念最终向实证思想让步，但愿常识公认的道德和实业的感人政治永远代替任性的道德和暴露的政治。

革命以前，实业没有足够的信心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来高举自己的旗帜走在文明的前头。革命发生了突变，时代也完全变了；人们的思想过于激动，过于轻率，因而无法趋于和平与宁静。

今天，再也不存在任何这样的障碍了，载入宪法的实业名正言顺地起着最强大的作用，一个有利的时机展现在它的面前。使它唯一感到担心的事情，只是害怕由于自己过于胆怯，仍然置身于他人的麾下，而不在自己的旗帜下行动。因此，希望实业只考虑自己如何存在和如何行动。宪法决不会对实业的各种努力感到恐惧，因为除了实业以外，再没有什么事物能够比它更遵守宪法了，而宪法本身之所以是好的，则是因为它适合于实业。

结 论

在神学和封建体系互相争夺政权的时候，实业乘机获得了较大的自由，这使人民从他们主人的纷争中得到了好处。

人们展开了争论，并且作出了论证。教育也增强了信心，促使人们开始对原先令人可怕的各种臆测提出大胆的看法。

反对和批判的精神日益增强。自由有了支持者，取得了发展和成果，直至它通过可怕的动荡而夺取了政权的最后一道防地，直至它抹去了封建制度和神权政治的最后痕迹。但是，为什么我们的革命变成了流血的、可怕的和惨无人道的革命呢？为什么这一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只是产生了新的奴役形式呢？

这是因为实业听任自己偏离了原来的道路，忘记了自己的学说，从而长期以来采取了与自己背道而驰的策略。

我们方才讲到的这种反抗和批判的精神，又怂恿了实业界的急躁情绪，结果使实业界极其得意地沉缅于这种精神之中。凡是曾使其敌人衰弱的一切东西，只是由于它们起了这种作用，都被它看作是有利于自己事业的东西。然而，这点恰恰是它的错误，因为这立刻使它看不到社会的目的。对自由事业发生指导作用的，不再是现实的和已被明确认识到的需要，而是模糊不清的和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即臆想的需要。人们把自己的愿望表达得过于急躁和狂热，而没有把它表达得合情合理和恰到好处。对自由的热爱，逐渐变成了对政权的憎恨。最后，人们再也不考虑在已经取得的土地上站稳脚跟和加强自己的力量了，而是打算蹂躏这一地盘，

并使它变成一片焦土：凡是能够演变为利害冲突的斗争，都表现为毁灭性的战争。不错，这使政权衰落了，但自由并没有因此而确立起来。自由的基础被人遗忘了，而自由的基础就是实业。

对自由的需要和热爱，是随着实业并通过实业而产生起来的。自由只能随着实业而扩大，只能通过实业而加强。

如果这个实际上相当古老而思想内容又如此新颖的真理能够深入人心，以代替古代的一切骗人的空想，我们就永远也不会听到“要末平等，要末死亡”这句带点血腥味的蠢话。

如果实业界保住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这种地位还继续使它们不听任武断的、毫无原则的哲学的诱惑和吸引，还继续对实业界提供远远超过它们所希望的帮助，那末自由所取得的进步，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要缓慢些，但至少能更为可靠些，而革命也许不那么轰轰烈烈，却能更为有益，少造点孽，多积点德。

本质上是和平的、道德性的东西，只能慎重地、适量地去追求，实业界在追求自由时就应当如此行事，因为只有当自由是正确的时候，也就是说是必要的时候，它才是有益的和可能实现的。

我们在初期所看到的自由，是随着需要的产生竞相花钱购买免税权；而我们在末期所看到的自由，则是合法地扩大自己的所有权并把古老的时效权奉为神圣的权利，然后商购政治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的各种财产，收买各种特权和什一税，收买僧侣阶级和贵族的衔位和权利；最后收买全部专横的权力，直至可以收买王位继承权本身——假如感到王位继承权在限制和压抑人的话。这样，在日益缩小专制范围的同时，自由就合法地建立起来，而不致使社会发生动荡。一旦离开这个方向，自由就会丧失合理性而越出常

轨，就会失去基础而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东西。

这就是我国从革命暴乱开始直到今天的历史。人们既不了解自由的条件，又不认识自由本身，而是听到哪里宣布自由，就满怀希望的热忱扑向那里。这样，我们在那里只会遇到某种新的奴役组织。如果我们要自由，那就得亲手去创造，而永远不要等待。

革命给我们帮了倒忙，我们担心它还会帮倒忙，担心灾难的后果会成为我们失望的原因。指责我们的不幸，这是敌人玩弄的十分强大的武器。让我们把它砸碎，或至少使它变得毫无用处；要在我们的思想中把自由和革命分开，而将一切狂暴行为归咎于革命；要在使自由恢复其原则的同时，将荣誉、信心和力量还给自由；

为了不再受骗，我们要明确知道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如果我们依然稀里糊涂地被如此长期奴役我们的思潮所控制，并且好象在适应这一思潮，那末，我们不成为企图擒获我们的头目的俘虏，还会成为什么呢？一个民族，若想获得自由，光爱自由是不够的，它还应当掌握关于自由的科学。

关于自由的科学，也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有它自己的研究对象和一般原理。然而，这门科学尚未被人们普遍知道，只有少数人刚刚才知道一点。直到它成为人民大众的科学的那一天，自由仍将从外部取得力量，并依靠外力而存在。这样的自由将不是依靠自己的生命而生存，它几乎等于虚设。

正是由于缺乏一般观点，才使我们遭到了失败；我们只有依靠一般观点，才能够真正得到新生；旧的观点早已陈腐，不能重新焕发青春，我们要有新的观点。

这项任务本来是属于十八世纪的哲学家的，可是他们根本没

有完成。在他们之后，又有许多思想家追随他们爬行，依靠自己老师们的观点吃饭，不敢逾越雷池一步。

我们感到必须使政论作家们从这种昏睡状态中醒悟过来，尤其必须唤醒他们转移注意力，此外还必须向哲学提出新世纪、即实业世纪为它所规定的新任务。

（王敏华译）

加强实业的政治力量和增加法国的财富的制宪措施[①]

第一章　综述文明的现状

第一节　文明的现状

气质、教育和环境支配着人们一生的行为，以致我们很少能按照获得的知识来行动。急躁的性格、童年养成的习惯势力和周围的事物，是最经常影响我们的东西，它们不顾理智和经验的警告，也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总是在统治我们。每个人的历史和各民族的历史，简单说来就是这样。

法国和受它感染的欧洲其余部分，在既有的一切思想可以说应该使战争成为不可能的时代，在全体的利益与共同的理智互相协调似乎是应该使博爱成为欧洲的普遍学说和国家生活的准则的时代，竟表现出最疯狂的好战性格。然而，这是我们人类在蒙昧时代养成的古代野蛮风气。希腊人和罗马人，本是我们文学方面的老师，不知道为什么也成了我们政治方面的老师；而知识和习俗之

① 圣西门的这部著作写于1818年5月或6月，载于他的文集《实业》第2卷。奥·罗德里格在1832年以《论财产和法制》为标题刊印过此文。我们翻译所依据的原文，载1966年法文版《圣西门全集》第2卷。——译者注

间、思想和行为之间的这种奇怪的矛盾，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由此而来的。

今天，我们恢复了比较健全的思想，又回到比较合理的道路，但是还应当小心谨慎，避免再犯以前那样的错误；如果再犯，可能产生比以前还悲惨的后果①。一个民族自误，或者更正确点说，它在制宪工作中自欺，那是决不会不受惩罚的。

只要我们还陷在革命的迷宫里，或仍然受着专制的束缚，以致人人困惑和百家沉默的局面，仍然使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和一点也不能稳健而大胆地行动；一句话，只要我们自己的文明还不能开花结果，那就当然地要把英国宪法作为我们羡慕和钦佩的对象。但是在目前，当革命已经销声和专制已经匿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仍然轻信地醉心于英国宪法，对它不加思索地一味崇拜，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我们就会给自己设置障碍。

一百多年以来，英国人为自己的自由奠定了基础，而我们的文明也在悄悄地发展，所以不能不认为：现在照抄他们，只会使我们倒退到一个世纪以前，不能很好地利用我们自己的条件，而使我们变为奴隶，因为人类的理性不会停滞不前。时间越长，积累的知识必然越多，而知识越多，则需要也就越多，从而权利也就越多。因此，我们急于把权利建立在过分狭隘的基础上时，恐怕要由此丧失一部分权利。我们所以要学习英国，是因为它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但是我们能做得比它更好，因为我们的历史比它悠久，而且我们有它的经验可资借鉴。

革命的动荡，我们长时期以来所处的困境，以及人们想要最后

① 这种错误的后患，当然不会太激烈，但必然要为期较长。

摆脱动荡和困境的愿望，使我们有理由庆贺宪章是幸福日子的曙光。但是，当我们象旅客到达埠头、再也不害怕海上的惊涛骇浪而拍手庆贺胜利的时候；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欢呼革命已经永远结束的时候，我们表现出来的与其说是我们的合理信念，还不如说是我们的愿望；与其说是我们的认识，还不如说是我们的意图。难道在这种自信当中果真没有任何轻率的地方吗？难道我们已经充分考虑过这个问题吗？难道我们已经确信宪章所解决的问题是唯一需要解决的和至关重要的问题吗？看来，这些就是向一切有智慧的人提出的而他们也满有信心加以解决的问题，但关于这一点还没有人想过。

我们过于重视政府的形式，好象整个政治都集中于此，只要实行三权分立，就会万事大吉。

在欧洲，有两个国家的人民生活在个人的专制权力之下，这就是丹麦人和土耳其人。如果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需要指出的话，那就是丹麦的专制比土耳其的更强大，因为在丹麦专制是由法律规定的，即以宪法为依据的。然而，在同样的政府形式下，被统治者的处境却有很大差异！再没有比土耳其人民更不幸、更受侮辱、更受虐待的了。简而言之，再没有比他们所受的统治更不公正和所付的代价更高昂的了。同时，没有一个国家能象丹麦那样实际上允许有更广泛的自由；没有一个国家，连英国也不例外，能象丹麦那样使人民更少受到专制的痛苦和更少负担行政管理费用。这种差异由何而来呢？当然，不是来自政府的形式，因为土耳其和丹麦的政府形式是一样的。因此，暴政一定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抛开其他一切差异不谈，丹麦国王是欧洲最穷的君主，而

土耳其大君则是最富的君主，因为他在土耳其主宰一切，他是财富的唯一所有者。

这个例子证明，规定权利和政府形式的法律，并不象规定所有制及其实施的法律那样重要，也不起后者对人民福利所起的那样的影响①。但是，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规定三权分立的法律不是本质性的。我们决不宣传这种异端邪说。当然，议会政府的形式比其他一切政府形式都好得多，但这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所有制的制宪工作才是基本。因此，这项制宪工作才是社会大厦的基石。

因此我们认为，应当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应当如何规定所有制，使它既兼顾自由和财富，又造福于整个社会。

然而，我们下面研究的问题，也与这个总问题有联系。

当消费者在讨论他们的消费份额的会议上占居多数时，他们就可以愿意把份额定得多高就定得多高。这就是说，他们可以不管你们的议会形式，而随意支配你们。反之，实业家们，即关心自由和国家经济的人，一旦全面控制税收表决权的时候，就将只纳他们同意纳的税款，从而在广泛行使他们的权利方面获得真正的自由。为了达到这一点还需要作些什么呢？需要很好地了解所有权的性质，并把这项权利建立在最有利于财富和实业自由的增长的

① 我们并不想说，在革命时期完全没有注意所有权的问题。当然，在宣布僧侣阶级的财产收归国有的时候，曾经讨论过这项权利，因为收归国有的决议，是讨论僧侣阶级的所有权的结果。但是，在研究如何建立最有利于国家的所有制的时候，并没有对所有权进行全面的讨论。我们恳切地请求读者不要忽略：我们一贯认为混乱是最大的灾祸；不管采取什么对策，不管对策收到什么良好效果，维持秩序都要求所采取的对策不得使法律具有回溯效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弊多利少。

基础之上。这就是我们要以本文所阐述的立法手续来实现的主张。现在,我们把这种手续提交舆论审查,亦即提交实业界的舆论审查。

被人们认为可以解决社会自由问题的人权宣言,实际上只是公布了宣言而已。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吗?它将来能够解决吗?不管怎样,人们可以确信,这项问题的解决,不能通过组织、建立或结合三权的方法来实现。

第二节 从对投资人的关系来看农业家和工商业家在权利上的差异

向一个商号或工厂投资的人,被称为股东,这一称呼指出了他们对经营者[①] 所起的作用。

在任何一家工商企业里,经营者均以自己的名字为企业命名。换句话说,如果经营者愿意的话,他就可以用自己的名字作为企业的名称。一句话,经营者在法律面前是重要的人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法律使经营者成了重要的人物。

在农业方面,经营者只是从属性人员,一名佃农而已,他们称土地所有者为自己的东家。

在工商业方面,经营者有权以他认为最有利于其所主持的企业的方式,运用他负责为之增殖的资本。

在农业方面,经营者不过是一个丝毫也不能支配其使用的资本的承租人;他必须使自己关于改进经营的任何想法以及任何农

① 经营者的原文为 travailleur。这个法文词是工人或劳动者的意思,圣西门把直接和间接参加生产的人均称为 travailleur。——译者注

业规划，都服从于土地所有者的想法和规划。

在农业方面，投资人的损失最多是一年的利息。而在另两个实业部门，资本家投入的全部资金随时都在周转获利①。

土地所有者自己种地吗；虽然都是实业家，但土地所有者作为地主要比他们作为耕种者受到更大的尊重。

商人是他为之增殖的资本的所有者吗；在商业方面，他作为商人要比作为资本家获得更大的尊重。

第三节　从对投资人的关系来看两类实业家在权利上的差异的原因

经营工业和商业的实业家的权利，是由双方自由议定的合同确定下来的，这项合同被人们称为“合伙契约”。

不动产所有者是农业的主要投资人，他们的权利来自征服，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强权。

法兰克人征服了高卢人，他们宣布高卢人的土地及其一切劳动产品都归他们所有。可见，所有权的建立、范围和行使方式，在法国一开始就是由征服者规定的。现存的各种财产名称的最古老起源，至少是这样规定下来的。

那时确立的所有权，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法律的精神没有变化。尽管法律有过很多的变化，但都变得更有利于战胜者的代表，即更有利于战胜者的后裔或取得后裔资格的人，而更不利于战败者的后裔。战败者的后裔必然是战败者的唯一代表，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把这个资格转让出去。这样一来，与战胜者有

①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工商业比农业的发展要快得无可比拟。

关系的人便成了土地所有者，而战败者的继承人则成了耕种者。

第四节 消除这种不公正的和有害的差异的措施

什么措施能使实业界大大增加政治权利呢？

这种措施就是：要使农业家获得其投资人所获得的那种好处，如同从事工商业的实业家获得其为之增殖的资本的持有人所获得的好处那样。

法律要准许农业家有权抵押他们租来的土地，同时应当使土地所有权的转让费用尽量低廉和手续尽量简便。

现行的法律力图使目前的土地占有者及其后裔所掌握的土地固定不变，这是阻止法国实业繁荣的最大障碍，它使富有才能的人失去了竞争的动力，而竞争可以刺激他们努力工作。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在以后的一章中加以论述。

毫无疑问，确立所有权和使它受到尊重的法令，是可以向政治社会提供的唯一基础。如果没有法律，连习惯都不承认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最不完善的政治社会也将无法存在。

可见，非常明显，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规定财产的法律和使财产受到尊重的法令都是根本法，但不能因为它们是根本法就认为它们是不能改变的。要有规定所有权的法律，而不必有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规定这项法律的法律。这是因为社会的存在取决于所有权的保存，而不取决于最初制定这项权利的法律的保存。这种法律本身依附于一个更高的和更普遍的法律，即自然法则。凭借这一法则，人类理性取得了不断的进步，一切政治社会得到了改变和

改进其制度的权利。这个最高法则将防止我们的子孙后代受到任何性质的法令的束缚。

这样就产生了下列问题：

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财产？

个人通过什么方法可以取得这种财产？

人们取得财产以后，用什么方式来行使利用财产的权利？

这是古今各国的立法者在他们认为适宜的时候有权讨论的一些问题，因为个人的所有权只能以公益为基础，而公益要普遍有利于这一权利的行使，并可以随着时代不同而变化。

因此，如果认为把农业经营者和他们的投资人置于象工商业者和他们的投资人那样的地位的法律是有益的，即如果认为准许前者可以象后者那样处理交给他们使用的资本的法律是有益的，那就可以而且应当制订这种法律。

选举法是知识进步的结果。我们上面谈到的和拟议提出的法律，也和选举法一样，是必不可缺少的。正如我们下面将证明的那样，社会只有依靠比"宪章"①本身重要得多的法令，才能摆脱它目前所处的困境。

第五节　促使立法者颁布这项法律的措施

人们把舆论称为"世界的女王"，这是完全正确的。它是当代最巨大的道德力量，只要它明确表态，人间的其他一切力量都得让

① 我们这里所说的宪章，跟以前所说的一样，均指法国从大革命以来颁布的一切宪法和英国颁布的宪法。一般说来，这些宪法只规定了政府的形式，而没有规定所有制。

步。因此，如果能够促使舆论命令立法者颁布我们刚才所说的法律，那就可以完全肯定这种法律必将被颁布出来。

可见，问题只在于把舆论引导到这一方向去。

但毫无疑问，实业界在这一方面是有很多办法的。在社会的各阶级当中，实业家之间的联系最为活跃和经常，他们通过书信或面谈进行接触。此外，这个阶级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它能按各个企业对实业界的贡献大小和由此相互发生的不同影响，以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最后，这个阶级正处于这样一种容易被人理解的地位：如果有一打巴黎的大企业感到我们所提出的措施对它们有用，它们的这种见解就会在很短期间内成为整个商人阶级的共同见解。事实上，首都的一家最大银行，正通过若干中间环节同行商和农村小贩发生着联系。可见，只要这个见解成了整个商人阶级的共同见解，则肯定不会遭到耕种者的反对，因为这种见解对他们的好处最为直接和明显。

对这种得到组成实业阶级的两千万人支持的措施，法国有什么精神力量或物质力量能够阻碍人们去采纳它呢？

第二章　这项法律对于实业的政治意义

毫无疑问，规定国家预算的法律，是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因为金钱在政治机体中的作用，就象血液在人体中的作用一样。身体的任何部分，一旦血液停止循环，就会衰弱和很快死亡；同样地，任何一个行政管理机关，一旦无人交纳税款，很快就不复存在。由此可见，财政法是最普遍的法律，其他一切法律都由此产

生或应当由此产生。如果不曾如此，那是因为帐目不够精确，或者是因为各种开支的条款规定得不够周密。

在法国或英国是由谁来制定财政法呢？是议会吗？

不是的！这项主要职能只由三权之一的机关在排除其他两权的条件下行使，即由下议院行使。

由此可见，只有下议院真正拥有全部政治权力。如果说法国和英国的下议院至今从未行使过这项重大的权力，这仅仅是因为在法国和英国的下议院中，迄今至少仍是效忠于政府的人士占极大多数，他们遵从来自政府的指示，按照政府的意图表决预算。因此，舆论认为下议院的这项权力大大低于政府的权力，但又大大高于议会的其他两项权力。

如果我们刚才所谈的没有人表示反对，则显然可知我们提出的办法，能使实业界得到一个完全由他们中间选出的代表组成下议院的手段，极大地提高实业界在下议院的政治作用，使它们得到最高政治权力，然后再用最适当的方式行使这项权力。应该确信无疑，实业界不会把这项权力交给宫廷行使，而目前的议员们是要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大多数是伯爵、侯爵或官员。

问题只在于审查一下这一办法是否合适和能否达到我们指定的目的。十分清楚，如果这个办法能使实业界在选举中得到大多数选票，它就会达到这个目的。

什么是有权选举议员的必要条件呢？

这个条件就是交纳一定金额的直接税。可见，如果全部的直接税或者至少它的绝大部分都由实业家缴纳的话，那末，他们在选举中必将获得绝大多数的选票。

而在工商业方面，正是经营者从这部分国民收入预缴税款。我们提出的办法，就是使农业家与商业家享有同等地位，就是由此使他们经营的企业以他们自己的名义经营，并且由此使所有的农业直接税由他们缴纳，而不象现在这样由土地所有者缴纳。

这项办法的结果将是由实业界缴付绝大部分的直接税，因为既非土地税又非工商税的税收，只占直接税的很小一部分。

实业界由于这项办法在选举中获得多数以后，很快就会在下议院占居多数；而下议院正如我们以上所说的，拥有很大的政治力量，所以实业界不久就可以左右一切，使国家建立起实业界所希望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将必然对实业界最为有利，换句话说，就是对实业体系最为有利。因此，随着实施我们提出的措施，实业体系就会自然而然建立起来，而寄生分子最终必将被置于经营者之下。

那时，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一切愿望，达到我们孜孜以求的目的；而我们的"一切通过实业，一切为了实业"这个题词，将是给人们带来幸福的革命的预言，同时也是它的信号。

第三章 实际措施

第一节 总论

在我们发现的观点向法国人提出以前，宪章就已经草拟、制定和通过，并且付诸实施了，所以我们认为应当采取我们将要分别研究的三项完全不同的立法措施，以便及时而且尽快地建立起最有利于生产的事物秩序；而后，议会则应当拟出一套办法，以便修改

宪章，并以有利于生产者的所有制的法律作为宪章的基础。

我们用以下三点考察，来证明上述的建议是可取的:

（一）国王已经宣布宪法是可以修改的，在他驾返法国的时候，就曾建议对宪章作一些修改；可见，他对这一问题的表态，显然是出自他的建议；

（二）在英国，很早就建立了议会制度，所以它比在法国更为人们所遵守；英国人承认，议会的权力当它的三个组成部分协调一致时是完全无限的，议会既有制宪权又有立法权；

（三）尽管已经发现改进法国宪法的措施，但宪章在规定各种制度时却未能利用这种发现，头脑清楚的人一想到这里就感到气愤。

再说，我们提出的办法只是立法性的，即我们的积极建议只限于这一方面。一想到我们即将提出的三项法案要成为伟大宪法的三个独立条款的时刻即将来临，我们便感到十分满意。这个宪法在规定所有制的时候，将使整个社会普遍受益，而不象目前的政治制度那样，仍只有利于社会成员中的一个阶级。

第二节　第一项法案

制定一项责成土地耕种者缴纳他应负担的那一部分土地税的法律。这项法律所根据的原则是：凡以自己的劳动使财产生益的人，都应当履行财产占有者对公益应尽的义务，并享有因占有财产和对其产品直接纳税而来的政治权利。

不难向所有公正不偏的人证明，只是这一项法律就可以恢复财政秩序。三言两语就足以把这项证明说得一清二楚。

人人都会看到：我们可以大大削减国家开支而不致有损于公共服务，而如果厉行切实可行的节约，财政秩序的恢复将是指日可待的。

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还没有实行本来可以做到的节约呢？

这是因为下议院的绝大多数议员的收入来自他们的薪俸和奖赏，而且这种收入比他们的财产收入多得可观，所以他们希望保持赋税，甚至提高赋税，而不是减轻赋税。

我们曾尽可能精确地扼要对比本届议员的财产收入和他们每年所任职务的薪俸收入，发现后者约比前者多一倍；如果再把这些议员子女的收入也计算进去，则这些议员及其家属由国库得到的进款几乎比他们的财产收入总额多两倍。因此，他们对于防止国库收入减少的关心要比对减少税收的关心大得无法比拟，因为减少税收以后，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枯竭了。

其次，我们要问：怎样组成下议院才能一方面使它关心维持秩序，另一方面使议员的个人利益促使他们去尽量减轻赋税呢？

我们对于这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法案能够非常迅速地达到这一目的，而且可以完成得尽善尽美。

因为实业家是社会中最关心维持秩序的阶级。无论是外族入侵，还是爆发战争，沦为战场的国家的佃户都要完全破产：他们的粮仓将被抢掠一空，他们的牲畜将被杀光；而土地所有者只不过在数年内得不到收入而已。在城市里，商店将遭洗劫，商人的财产将被抢光；而房产的所有者，虽会损失一些房租，但比遭到火灾的损失要少得多，即使遭到失火这种最大的不幸，屋基至少还能保留下

来。人民起义和内部动乱，也会带来同样的后果。

再者，实业家是社会中唯一从各方面关心减轻赋税的阶级，它不能从增加赋税当中得到任何好处，因为实业家的业务使他们无暇去就任收入优厚的官职，国库的支出从来不会直接给他们带来好处。

因此，我们认为有足够的根据，确信采纳我们在本节开端提出的法案，必将迅速地恢复我国的财政秩序。

第三节　第二项法案

第二项法案的目的，在于创设使土地所有者能够把土地交给别人耕种的条件。

目前在英国，土地所有者同耕种经营者之间广泛签订自愿契约。现在我们来说明这种契约的几项特殊条款。

作为这种契约的客体的土地，在交付耕种者使用时，由缔约双方各自估价；而在租约期满时也要估价：如果资本增殖，耕种者和土地所有者共同分享收益；如果资本亏损，耕种者则担负一半损失。

显而易见，这种契约一方面有利于土地所有者，因为它可使他们的财产增殖；另一方面也对国家有利，因为它可使全国的收入增加，从而增多国家的财富。

我们提出的法案的第一款，其目的在于规定：土地所有者和佃户之间，今后缔结任何租约，只有列入上述的条款，才对缔约双方有约束力。

这项法案的第二款，应使耕种者有权要求土地所有者以土地

作抵押来借款，以便对土壤进行可能的改良，并委托耕种者使用借到的资金。

法案的第三款规定：在土地所有者拒绝向与他缔约的农业家提供所要求的贷款时，应由仲裁法院调解双方的纠纷和裁定贷款是否必要；这时，土地所有者必须服从法院的判决。

我们认为有理由作出如下的结论：这项法案能使土地所有者的财产迅速增加，从而扩大全国的土地资产。

第四节　第三项法案

第三项法案以动员地产为目的。

如果不募集公债，法国就无法为使领土不被外国军队完全占领而筹措到目前所需的巨款。

动员地产是国家能使实业界得到所需的资本，以补偿其所遭到的无法计算的亏损和应付新加的负担的唯一手段。

经验证明，动员地产是一项切实可行的措施，因为这项措施已在普鲁士王国的若干邦里毫无障碍地顺利实行了。

这种措施所以没有为曾经实行这种措施的国家带来本来可以产生的一切好处，是因为它根本没有考虑农业和农民的利益，而如果把规定这项措施的法律同我们在这一法案之前提出的前两项法案结合起来（按我们的设想），则毫无疑问会产生非常有利的结果。凡惯于思考这类事情的人都不难理解，这样结合起来的措施，必将使土地收入急剧地大量增加（在一切收入中，土地收入是最重要的），使全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即耕种者的命运得到迅速而重大的改善。

第五节 本章的结论

如果议会在本届会议期间颁布我们提出的三项法案;

如果国王在颁布这三项法案后解散现在的议会;

如果国王在三个月后召开新的议会;

法国就将免遭不断威胁着它的许多灾祸;

有识之士就将迅速消除那种由于面临恶劣的前景但又找不到克服办法而产生的漠不关心的情绪;

法国人将热烈欢迎实业界，而法国的实业界即法兰西民族将以震惊全世界和它本身的速度繁荣起来，因为我们提出的三项法案,将向它提供达到它可能期望的繁荣的一切手段。

其中的第一项法案,将使法国得到必要的政治权力,以便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实行其所希望的节约，取消为维持秩序和繁荣民族而花的一切无益开支。

第二项法案和第三项法案，将为法国提供调动公民的人力和物力所需的一切资本，并把这些资本交给唯一能使这些资本生益的实业家。

第四章 我们提出的措施所带来的农业收入的增加

第一节 农业比其他一切实业部门重要

农业一个部门，比其他一切实业部门加在一起还具有大得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如果全面对比一下（即综合地观察人类的一切

十四

劳动)农业收入和全体工商业收入,则一定发现前者至少要比后者大一百倍。

在英国,工商业的活动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发达得多,而它的农业仍比实业的其余一切部门加在一起还富裕两三倍。

在法国,工商业加在一起的全部收入,还不到农业收入的七分之一,甚至不到八分之一。

由此可见,法国农业部门的每一成就,都将比其他实业部门的同样成就,多使全国的收入即财富增加七、八倍。

因此,社会的注意力,亦即公众的打算和指望,应当首先集中于农业①。

第二节　法国的农业状况

虽然法国的农业在革命以后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比起英国和比利时来,它仍处于幼稚阶段。阿瑟·杨格的著作证明了这一点②。这位著名的农业专家,曾极其正确和非常详尽地证明:

(一)如果法国的土地能象英国那样精耕细作,它的农业收入就可以增加一倍。

(二)如果法国的耕种者能够得到他们所需的资本,法国的农

---

① 如果法国把以往建立和维持殖民地的经费用来发展农业,那么法国现在至少要富三倍。以前的政府在这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现在的政府只比以前的政府稍有改进,它在去年还拨出巨款去重新占领本地治里(1674年法国在印度半岛东岸建立的殖民地。——译者注),而不考虑如果英国人打算夺取这块土地,它是毫无办法保卫它的。只要时机有利,英国人必然会动手。

② 杨格,阿瑟(Young, Arthur 1741—1820年),英国的经济学家、农业经济专家和农业技师。1787—1789年在法国旅行,曾著书叙述法国革命前的社会经济生活。1793年,杨格号召人民反对法国革命。——译者注

业就可以取得更快的进展。

第三节 我们提出的办法对农业可能产生的后果

我们刚才已经证明：第一，光是农业就占全国收入的八分之七；第二，如果农业家能够得到他们所需的资本，农业收入在不多几年之内就能增加一倍。

我们提出的办法，将使法国农业家得到三百亿资金供自己使用；它还会使法国的土地完全变成生产资本，而土地现在则几乎是呆滞资本。由此可见，依靠这个办法，法国的土地财富用不了几年就能增加一倍。

请不要担心耕种者得不到贷款。在这方面，他们会享有同工商业家一样的好处，因为法律已使他们在对待投资人方面与工商业家处于同等的地位，而且也使土地所有权的转让容易办理和用费低廉了。

第四节 土地银行

在欧洲，土地银行的作用已被普遍承认，特别是在某些国家，而首先是在已经试办这种银行的法国，尤其如此。

这种银行为什么没有办成功呢？这只是因为：在自愿转让土地所有权时，以及在依法处理欠债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时，手续烦琐，时间冗长，费用太高。但是，一旦有关土地所有制的这些立法弊端得到改革（这正是我们提出的办法的宗旨），土地银行的创办将变得轻而易举，而且一定办得成功。

因此，我们要再次指出，这个办法将使耕种者得到他们可能需要的一切资本。

第五节　私人银行

可以创办土地银行的那些理由，也会刺激私人银行以它们同工商业家来往的那样高的热情，与耕种者进行业务上的来往。

想一想这项办法会使银行的业务增加多么大吧？三百亿巨款一下子就投入了流通领域；流通领域中的业务，几乎都经过银行家之手，而它们象一块一块肥肉一样，手一碰上它们，就会留下油印。

对耕种者极为有利的这项办法，对于银行家也同样有利。因此，我们强烈地希望银行家既能注意到这项办法将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又能注意到它对社会必定产生的巨大益处，因为他们掌握着能使人们采纳这项办法的一切力量和一切必要手段。

事实上，目前的政府如果不举债，或者银行家不设法使政府得到所需的经费，政府就无法生存下去。因此，银行家可以迫使政府采纳我们提出的办法，或者采纳他们认为必要而政府不愿意实行的其他一切措施。

银行的科学或财政的科学（两者是一回事），还处在童年时期。银行家甚至还不了解：他们同人民站在一起，会比他们同国王站在一起得到更大的好处；他们也还不了解：自己支持人民迫使国王遵守民族利益，会比维护国王的利益得到更大的好处。令人遗憾的是，国王利益违背民族利益的情况，要比我们所看到的要多得多。

配第①是这门科学的真正奠基人，他关于所得税的演说成了这门科学的起点。然而，配第所论述的问题，即至今仍在讨论的唯一重大财政问题，事实上不过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特殊问题，因为它的目的只是以经过改进的提前收税的办法来延长现有政府的寿命，使它们继续存在下去。

总的问题（如果从民族利益的观点来看它的话）在于寻找一套建立一个开支最少而最有利于生产的政府的办法；而它（如果从银行家私人利益的观点来看它的话）的目的在于使业务活动尽量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积极性和可靠性，因为银行家的利润同成交和经办的业务的多少成正比。

第五章　我们提出的办法对司法管理和司法费用的效果

第一节　目前的司法管理费

法国现有八千多名法官②，他们的薪俸只占公民为审理他们之间的利益争端而支付的诉讼费用的很小一部分。

如果把律师、检察官、书记官、执达吏、律师秘书和文书的每年收入，以及那些以承办诉讼案件为职业的人的收入，连同法官的薪俸和司法部的费用加在一起，就可知道法国人为法庭审理他

① 配第，威廉（Petty, William 1623—1687年），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译者注

② 凡是愿意费神在《王家年鉴》中查一下各种法院的全部法官人数的人，都会承认我们说法国有八千多名法官，绝没有夸大其词。

们的案件每年所付的费用高达数亿之多。

但是，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司法部门的管理不善，还会造成另一种并非不小的损失。

法国现有的三、四十万名法学家和他们的见习人员与勤杂人员是一批什么也不生产的人，从而成为实业界的负担，由实业界白白供应衣食住。国家不仅失去了这四十万人本来可在身心方面发挥出来的效益，而且更值得国家惋惜的是，它没有很好利用它拥有的一切资本，而是把这项资本用于非生产方面。然而，这项资本为数甚巨，在法国高达数十亿之巨。

第二节　民事法庭与商事法庭的比较

无论在法庭的组成和案件的审理方式方面，还是在组成法庭的法官的精神面貌方面，民事法庭和商事法庭之间均有本质的不同。

商事法庭对几乎所有案件的审理都以实质为主，而以形式为副。它的目的，始终在于用最迅速和最省钱的方式，使两方和解而结束纠纷。这种法庭的开支，无论是由国库负担，还是由两造负担，钱数都很少。法官不另拿报酬；他们除执行审判职务外，都有其他职业。他们有的现在从事商业活动，有的已经退出商业活动。

民事法庭法官都领取高薪，有的低一些，有的高一些。大法官是法官之长，他的薪俸高得异乎寻常。民事法庭法官审理他承办的案件时，几乎都以形式为主，而以实质为副。他们听任律师随意胡说，让他们对一切次要的问题、甚至是对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不休，愿意争吵多久就争吵多久。可以说，法官、律师和检察官他

们是串通一气的，要把诉讼变成无休无止和使人倾家荡产的勾当。实际上，他们这些人，从最低的律师事务所书记到最高的大法官，难道不是一个鼻孔出气吗！

民事法庭的法官，除了进行审理和诉讼活动外，一生没有干过其他工作。他们最喜欢案件多得不能再多，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提高和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这种精神和意向，同商事法庭法官的精神和意向截然不同，因为后者现在都有其他职业或者过去都有其他职业，现在拥有或者曾经拥有获得人们尊敬和致富的其他手段。

应当指出一个重要情况，这就是两类法庭之间进行着一种斗争，而且十分遗憾，在这种斗争中往往是民事法庭占居上风。

商事法庭有很多诉讼案件要交给两方指定的仲裁法庭判决。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在每一仲裁判决宣判后，败诉的一方不管判决作得怎样正确，总要设法撤销这项判决。他可找到一大批随时准备按他的意愿进行争讼的律师，到一向喜欢取消仲裁判决并把这种判决看作是侵犯自己权利的民事法庭去上诉。简而言之，几乎所有的仲裁判决，向民事法庭上诉后都被撤销了，而已经合情合理对案件的实质作出的判决又要重新审理，并且几乎总是肯定作出与原判相反的判决①。

① 这些见解也完全适用于刑事法庭。

刑事法庭既可以仿效民事法庭组成，也可以按商事法庭的同一精神组成。在第一种情况下，它审理案件的时间特别长，选择确定判决的理由十分烦琐，审判态度非常严格；在第二种情况下，它审理案件灵活而迅速，只以常识为指导原则。在第一种情况下，费用浩大；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不花分文。

在革命以前，法国的刑事法庭是仿效民事法庭组成的；而在目前，它的组织已和商事法庭一样了。陪审员是仲裁人，他介于公诉人和被告之间而负责作出判决。

附注：有一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一切从事法律工作的人都对陪审制度表示反感，他们过去竭力企图推翻这一制度，而现在又在所有刑事案件中竭力引导陪审员以他们所习惯的观察事物的错误方式来审理案件。

一旦地产变成实业财产，一切民事案件当然要由商事法庭管辖。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一切案件不再需费很多，不再审理过于不公，而会审理十分公正和费用极少。

第六章　上述论断的根据

第一节　法学家对法国的政治影响

法国政府分七个部管理政务。在这七个部中，现在有五个部里法学家泛滥。

在国务会议里，法学家占大多数。

在下议院里，法学家的意见显然稳居优势。

在选举当中，法学家的权势大得使他们不必征求政府的同意，就以政府的工作人员和代表自居，候选人全由他们来提名。但是我们应当指出，在颁布选举法以后，应当把我们下面就要谈到的商业城市看作例外，然而这个例外并无多大影响，因为仅有八分之一人口从事工商业。

农村居民常因自身的私事向法学家讨教，而法学家便利用对他们的信任来操纵居民的政治观点。居住在农村的工商业者为数很少（几乎所有的商业都在城市经营，大多数的工厂也设在城市），只有他们在思想上仍保持独立，不受法学家的影响。

如果观察一下构成所谓“上流社会”的各社会阶层，对相继引起公众注意的任何一个政治问题的见解，如果追溯到这些见解的起源或形成，就将看到这些见解几乎都出自某个律师或公证人的事务所。

可以准确地测定出法学家和其他社会集团的政治作用对比：两者是七比一。这就是说，在整个政治影响中，法学家就独占了八分之七。这有下列事实为证：

据我们估计，法国的全部财产共有四百亿，以整数表示，其中不动产约有三百五十亿，动产只有五十亿①。只有法学家能够提供关于稳获不动产的方法的良策；当财产受到侵犯时，只有他们能够指出保护财产的方法，因为确定所有权的法规复杂得惊人，要求人们受过专门的教育。

既然知道法学家独自掌握着八分之七的社会活动，那么毫无疑问，掌握着利害关系的强大杠杆的他们，自然是法国政治问题的舆论的操纵者。

他们在这方面所起的影响是一种真正的公害，因为除了我们已经证实的由此产生的种种弊端之外，还由此产生一种更为严重和流毒更广的祸害，这就是法学家总是想方设法阻止农业家发展他们的事业，同时竭尽全力使投资人享有比经营者更为有利的条件。

第二节　法学家的功绩

不管会从我们方才关于法学家及其影响所造成的危害的论述中得出什么结论，我们还是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他们，即应该

① 动产和不动产这两个用语，可能使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发生误解。人们自然而然认为：凡是不能移动的财物都是不动产，而能够移动的财物则是动产。但是这个说法并不一定正确。使用这种用语的目的，往往不是说明财物的性质，而只是说明财物所有权的转让方式。

附注：在德国和英国，法学家所起的作用未必象在法国这样大，但这两国讲授的法律科学却有重大作用，因为学习法律已成为一切受教育的人的学习科目。

对问题进行多方面观察。因此，我们要全面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直率地指出问题的另一方面。

我们所以能够指出民事法庭制度的缺陷，所以能够看到法学家的思想缺乏自由主义精神，是由于我们拿民事法庭同商事法庭作了比较，拿法学家的政治思想同实业家的政治思想作了比较。但是，如果我们拿民事法庭和法学家的目前思想状况同法兰克征服者在高卢全面定居以后实行的审判制度比较，同这些最初的法官的道德比较，然后再同这里相继建立的封建法庭、国王法庭和领主法庭比较，那末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民事法庭是非常自由的，现在的法学家是遵循着十分高尚的道德原则的；我们还发现，军事专制的消灭，主要应当归功于法学家集团。使公民间的纠纷不再受专横武断的法庭的审理正是他们；确立了辩护的完全自由也正是他们。当然，他们因其活动应在人类思想进步史中占有光荣的一席。

因此，我们认为审级制度起过非常有益的作用，但在目前它却是有害的：它阻碍着文明的进步，它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而且应当由实业法庭来取代。实业法庭不外乎是仲裁法庭，在将来除了实业财产外不存在其他财产的时代，这种法庭将是唯一的必要的审判机关。这将是我们提议的办法的自然结果。

最后，我们认为法学家还可以为社会大大效劳，这就是他们发现我们的办法可能产生某些缺陷时，就应当明确指出。这样的指责，可以推动政论家改进我们只是初步勾出轮廓的设想。

如果现在所说的办法确实很好，并且可以提供能够取消几乎一切司法费用的手段；如果这种办法由此消灭了法学家的生活来源和他们的受到很大尊敬的职业，以致使法学家受到了很大的害

处（在他们作为法学家时），那末，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即在法学家和实业家之间，自然要就这一办法对民族利益的利弊的问题进行争论。

这一争论从下述两个方面来看是有益的：第一，它会显示出政治经济学的原则比民法的原则优越，因为对于一种真理，只加以证明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讨论，而且只有在双方的最高利益互相对立时（就象这两项原则那样），这种讨论才会是有益的；第二，它会引导出应当采取的各种防范措施，以便尽可能避免在法律和习惯发生最有益的变动时几乎经常发生的各种弊端。

英国人民一百五十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争取自由并以稳妥的办法来巩固自由。居住在大陆上的其余各族老欧洲人，三十年以来也在进行同样的追求，但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找到天赋的手段，即没有重建所有制。

实业家的利益，显然同军人及其代理人法学家的利益相矛盾，但实业家没有委托自由主义的政论家来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反对法学家，而迄今一直是委托这些法学家来争取他们的权利。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个人，确实都有如下的情况：一种观点本来很简单易行，但总是迟迟想不出来，一直令人遗憾地等到最后才被想出来。

第七章　法院历史简介

人有个特性，就是对于引起自己注意的事物，总想了解其产生的原因。因此我们相信，向没有探讨过我们的论题的读者，指出我

们已经证明的民事法庭与商事法庭之间的主要差别的原因，是会受到欢迎的。

人的禀性可能变化，但它不可能完全改变，即不可能失去它的本质。各种制度也是如此，它们可以改变形式，但不能赋予它们以同其建立者规定的宗旨相反的宗旨。它们只要存在一天，就要根据它们最初得到的动力和方向，以或大或小的能力进行活动。

由此可见，追溯一个制度的起源，观察它在建立时被赋予的宗旨，就可以确定无疑地查明它的活动、发展过程和实际结果的原因。

因此，我们要追溯民事法庭和商事法庭的起源，并回顾一下这两种法庭自创始以来所发生的一些主要变化。

第一节 这些法院的起源

法兰克人征服高卢以后，高卢人所规定的一切法律都被法兰克人废除。战胜者并不仅仅占有了战败者的一切财产，而且改变了有关财产的基本法或保护法。由于他们至今仍然掌握着侵夺的财产，所以现在的司法权自然是他们建立的或传下来的，总之是曾经适合于他们而且现在仍然适合于他们的东西。

他们规定了可以赎买的一切刑事罪行的价目表。因此，一个法兰克人杀死一个法兰克人，一个法兰克人杀死一个平民，一个平民杀死一个法兰克人，一个平民杀死一个平民，都有不同的赎买价格；伤害则按其轻重程度计价。因为大部分罚金都被分占了高卢人土地的领袖们以军人受禄的名义享受，所以他们都极想由他们自己来行使审判权。

再说，在这个时期，完全不可能有民事罪行，因为当时可以说只存在一种财产，也就是土地，在土地上固定着居民和他们所能有的一切。既然这些财产都掌握在经常武装着的军人手里，所以这自然要引起战争，而不会发生诉讼。既然法兰克人取得了一切诉讼的审判权，后来又指定他们认为适当的人去代替他们执行法官的职务，所以当然可以确认民事法庭现在行使的权利的萌芽是由法兰克人培育起来的。

第二节　这种制度的第一次变革

法兰西的土地被征服后，以军人受禄的形式分配出去；而分得土地的受益人，只是在世期间才行使审判权。

封建制度确立以后，这些禄田变成世袭的田地，而且可以转归妇女占有。当时，审判权始终与土地联系在一起。

这个时期和后来的时期，有许多原因使司法管理制度大大复杂起来。

建立了教会法庭，因而产生了管辖权的问题。

各种赦免法令，增加了财产占有者的人数，同时也增加了可以作为私有财产的项目。

查士丁尼法典[①]的发现，使人们学到了一些法律原则；而列入大学学习科目的罗马法的采用，则奠定了当时还不大为人了解的法律科学的基础。

① 查士丁尼(Justinien 483—565 年)，拜占庭的皇帝。根据他的倡议，汇总当时的各种法令编成罗马法全书，即一般所说的《查士丁尼法典》。这部法典是罗马法发展的顶峰，曾对欧洲封建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的法律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拿破仑法典》就是按照革命后法国的特点，对它加以修改而制定的。——译者注

这些不同的原因使司法管理制度复杂化了，从而促使享有司法权的领主们去聘请法学家作顾问。他们还从这一阶级选拔法官，在他们不在的时候由这些人代理他们进行审判。

最后，这个时期还开始出现了兼理民事和刑事的法庭。

第三节 第二次变革

征服高卢以后，国王和大领主之间就不断争权夺利，双方互有胜负。路易十一以残酷的手段保持了王权的优势。但是，这里不是研究这种手段的地方，我们只想考察一下这种手段的结果。

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四，国王的民事法庭以夺取领主的审判权和扩充国王的权力为司法机关的主要目的。它把审理私人诉讼案件看作是一桩小事，认为判决这类案件是最不光彩的差事。

正是在这一时期的后期，成立了律师团体。他们最初被人称为顾问，拥有王家律师的头衔。这就是说，他们既有责任维护国王的利益，又有负责维护私人的利益。

我们并不断言最高法院或议会法院总是判决国王胜诉。我们也愿意承认，它们作出了许多有利于民族的决定，甚至作出了某些英雄主义的行动。但是，我们坚持认为，法学家从他们一开始出现，就以维护国王掌握法兰克人从高卢人那里夺来的权利为主要职责。

第四节 第三次变革

从三级会议停止召开，而王权已经强大得无人置疑时，法庭的宗旨才略有改进。它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因为它开始把自

已看成是有责任代表三级会议的一个常设委员会。但另一方面，这种改进又因它对待个别人的专横而被大大抵销。这种专横，是由于法庭是常设机关而自然形成的。

第五节 目前状况

我们对于目前的民事法庭已经谈了我们的看法。现在，只需补充说明一下，组成这个法庭的法官由他们的先行者承受的宗旨产生了什么后果。显而易见，这种宗旨是统治的精神，因为这种制度是法兰克人建立的，即征服者强加给高卢人的。

然而，只有文明的精神才应该指导法院。一种想要发挥政治作用的野心，即想要统治的野心支配着法院。这种统治的精神，在法学家阶层当中，当然要表现得非常强烈，因为从三级会议停止召开到革命爆发时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设法取得政治优势，把自己装扮成三级会议的代表，并以这个名义竭力阻碍政府开展工作。

目前，政治机构已经不允许法学家指望得到任何重要的政治地位，他们也不再能够代表人民大放厥词了，或者更正确地说，他们不能再冒用人民的名义胡说八道了，所以他们一心一意想恢复旧制度。凡是稍微留心他们对于政治观点问题的态度的人，都会相当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不仅民事法庭的法官，就是整个法学家阶层，一般都怀有反对民族利益的情绪。

第六节 商事法庭的起源

居住在城市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买到了他们的自由，并促使

公社在他们的推动之下得到全面的解放。而在这一个时期，大部分时间住在设防的城堡中的领主，则委派司法官吏保护他们在城市里的利益和承审居民的诉讼案件，即代表领主掌管他们的这一部分收入。这项收入是为领主提供某些现金收入的唯一来源，领主的其余收入都是实物。

在城市所买到的权利当中，最宝贵的权利，就是由它自己行使司法的权利。一些自治机构相继出现，它们自己治理自己。自治机构的管理人员由公民任命，并有一定的任期。他们实际上执行着仲裁人的职务，从不受其他精神支配。他们的全部职责，就是调解双方的利害冲突和寻求公正的解决。

最初不外乎是自治机构的商事法庭的起源和性质，就是如此。

应当着重指出，就司法权而言，自治机构的职权要比现在的商事法庭大得多。

第七节 司法机关的改革

实业在城市获得自由以后，以惊人的规模发展起来，而且不久就改变了社会的面貌。新出现的享乐，引起了大量的新的需求。只有居住在城市，才能更便于取得实业财富；而由于虚荣或习惯，实业财富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领主们离开了他们的城堡，让他们的农奴获得了自由。他们搬到城市居住，他们的城堡不久就变成了别墅，在一年中气候宜人的季节才来这里住上一段时间。

王公和领主定居在城市，削弱了自治机构的作用，侵占了自治机构的部分权利。于是，最初拥有现在民事法庭的大部分职权的自治机构的大部分司法职权，被缩小到只能审理纯属违警案件和

有关实业纠纷的地步。警务工作仍归原自治机构管理，而有关实业的一切纠纷则归后来设立的商事法庭审理。

第八节　现代商事法庭的宗旨

现代商事法庭的宗旨，同组织商事法庭的自治机构的宗旨一致，这就是调停的精神。商事法庭的法官认为自己是仲裁人，负责判决与他处于平等地位的当事人之间的争讼。他们的观点的政治倾向，必然厌恶专横而主张平等，因为它要符合尊重财产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与法学家的精神是截然相反的。

第九节　本章所述的全部观点的总结

一切案件都可以而且应当以仲裁方式审理，甚至于连那些看来不宜这样处理的刑事案件都可以这样审理。

凡是执行审判员职务的人，都可以从事其他职业，因为使审判员具有仲裁人性质时，他们的职务不会占用很多时间。

但是，这种普遍受益的好处，将依存于我们提出的办法，因为那时将只有实业财产，而一切民事纠纷都将由实业法庭以仲裁方式加以审理。

第八章　实业的政治史简介

第一节　引言

每一个政治方案，每一种制度，要想完美无缺，必须满足下列两个条件：（1）要有利于社会，即要给社会带来实际效益；（2）要

同社会现状协调，要适应现有的观点和事物，要经常作好准备，一句话，要正合时宜。虽然第二个条件远不如第一个条件那样为人所了解，但它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具备这一条件，一种制度才能被人接受，因为只有既不高于又不低于当时社会状况、而且不是不合时宜的制度才能存在下去，或者至少能长期存在下去。历史地考察问题的好处，主要就在这里，因为只有对过去进行哲学的观察，才能对现在的动因得出正确的认识。

我们刚才提出的条件，责成提出新的政治措施的人必须证明这一措施是和社会现状协调的，或者更正确点说，证明这种措施是过去的发展和现代的要求。这样，才可以避免半途而废。因此，在作完这种一般观察之后，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几点补充理由。

我们在以上几章提出的观点，以及人们在本书的以下叙述中将要看到的同类观点，其目的都在于证明我们提出的措施一定会使国民收入大增而使支出大减。由此可以断言这种措施是有益的。

我们即将提出的观点，具有另一种性质。

提出这些观点的目的，是向实业阶级即民族指出：它逐步取得的地位，自然要促使它采取我们提出的措施；它过去取得的进步和目前的需要，都决定它要这样做；换句话说，采取这一措施，是事物的自然进程要求十九世纪的实业界必须迈出的一步，是实业界为了治理社会还须迈出的最后一步，而治理社会是实业阶级自形成以来取得的一切进步所追求的坚定不移的目的。

第二节 实业的政治成就

为了阐明实业家的政治观念，指出企业界今天应当做些什么

来改进社会，就必须研究实业界的政治地位目前处于什么状况；而只有回顾一下过去，即简单地考察一下实业界至今连续走过来的道路，才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把实业界的历史上溯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时代，那末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个民族中，实业阶级完全是军人阶级的奴隶。

北方的战士摧毁了罗马帝国，在西欧定居下来，取代了原来的统治者和征服者。在他们的统治下，实业界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

乍一看来，这次革命对于实业界来说好象只是改朝换代而已，但它对实业界仍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这种改换带来了有利的后果。

实业阶级的奴隶地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们变成了封建领地的奴隶——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善。此外，由于征服者都分散居住在乡村，所以居住在城市的实业家没有处于统治者的直接不断的监视之下——这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

结果，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北欧民族征服罗马帝国，使实业界的命运首次得到了显著的改进。

实业阶级的第二个进步，是它自身的解放。

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罗马帝国的崩溃，给实业界带来了使它能够获得某些发展的好处，逐步达到能够赎买自由的地步。这种赎买，是实业界至今走过来的和以后仍将走的最重要道路。对实业界来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它的政治生命的开始。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政治生命的发展。

这个重要的一步，通常被人称为公社的解放。这一用词极为

确切，因为公社和实业界是同一个东西：公社从它一开始出现，就完全是由居住在城市里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构成的。为了使我们对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公社有一个正确概念，这是一个应当注意的非常重要的情况，而决不能忽视。

实业家赎买了自己的自由以后，他们的命运，从他们每一个人不再象赎买以前受领主的直接欺凌这一点来说，是获得了改善。这对他们来说，当然如释重负。但是，这种赎买并没有使他们对僧侣、贵族和军人的依附关系发生重大的减弱。他们仍须把大部分劳动所得送给这些人，并且还要忍受他们无尽无休的勒索。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实业界是怎样摆脱这第二种专横的压迫的。

独占议会席位和决不想把自己的权利分给他人的特权阶层，想出了一个主意：召集公社的代表即实业界的代表开会，在会上要求实业家呈报他们的财产清册，以便整顿税制，使税收比用勒索方法所取得的还多。这就是公社议会的真正起源。这跟法兰克人征服高卢后不久在法国建立的五月集会① 形式的士兵大会，毫无共同之处②。

建立这种惯例，应当对实业阶级极为有利，因为这是实业阶级从此以后获得的政治成就中的一项主要成就。但从一开始，公社，我们再重复一遍，即实业界，就把向议会选派议员看作是一种最不愉快的负担，因为这些议员在议会里没有任何权利，他们的任务

① 五月集会，后被查理大帝改为三月集会，每年召开一次，集合全副武装的人民进行检阅，会上公布国家准备实行的措施。这是随着王权的加强而日趋没落的人民议会制度的残余。——译者注

② 当然，有人会责备我们，说我们在这个论述中，把在法国发生的事情同在英国发生的事情混淆起来。我们对此回答说，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我们正在讨论的全欧性问题。

只限于向议会报告他们的委托人的财产的增长情况。但是，事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尽管军人阶级和封建阶级把种种勒索和压迫强加于实业界，但实业界仍然依靠劳动、忍耐和节约而终于富裕起来。实业界的地位提高了，它获得了人们的尊重，因为它的人数增多了，因为实业家和军人之间的通婚，把军人阶级的很多人的利益和公社的许多成员的利益联系起来。由于这些原因和其他许多原因，特别是由于实业界使军人感到有可能从实业界取得更多的金钱而减轻自己的负担，简而言之，由于实业界具有理财能力和这种能力对军人发生了有益的作用，所以实业界才从军人那里取得了公社在议会中的发言权。

实业界跨出的这一大步值得重视，因为可以说这是人类的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从此以后，强权者的法律不再是唯一的法律了，更确切地说，暴力和诡计不再是参与制定法律的唯一要素了。从此，公众的利益也开始被考虑了。

实业界在它取得我们方才所说的成就之后迈出的这一步，即从纯政治角度来看它至今迈出的最后一步，是在英国革命以后完成的。这是指英国在国家预算法案方面，实行了只由下议院表决，或者说实行了完全由它表决而任何其他机关均无权过问的制度。如果在那个时候，一方面，英国的公社只由实业界的成员所代表；另一方面，英国的实业界了解到，根据事物的本质，它与其他国家的实业家的利害关系，比它同英国的军人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利害关系还要密切；那末，欧洲人的伟大革命，从这个时期起就已经完成了，而实业和和平的制度也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期，封建制度还有很大的力量，而实业界还

不太了解自己的利益和前途，所以它听任封建精神的支配。而封建精神，实质上就是侵略精神。

事物的自然秩序，即文明的发展进程，使完成伟大的欧洲革命的光荣归于法国实业界了。法国的实业界迈出我们所说的这一步时，虽然大大晚于英国的实业界，但它走得更彻底和更坚决，因为它是在封建制度已经没有力量，而实业界能够容易看清自己的利益和遵循一条经过周密考虑得出的道路前进的时候，获得这一成就的。

我们对实业界的政治史就回顾到此为止。现在，我们来概述一下实业界从下议院取得表决税收的特权以后所获得的文治成就。

从这个时期起，实业界发生的作用是无法估计的。它囊括了一切，它掌握了一切。它改进自己的产品，以此满足人们的享受，而享受终于变成人们的需要。但最主要的成就，是政府成了实业界的纳贡者，政府完全从属于实业界了。如果政府想要进行战争，那它首先关心的不再是兵源，而是求诸实业界：首先要钱，然后要它所需的一切物资，即用得自实业界的金钱向实业界购买物资。实业界向政府供应大炮、枪支、弹药和服装，等等。实业界掌握了一切，甚至操纵着战争。

军事艺术的改进带来的可喜的必然后果，是战争越来越依赖于实业界，以致今天的真正军事力量已经落到实业界手里。构成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的东西，已经不再是军队，而是实业了。现代的军队（指的是从普通列兵到最高指挥官的全体军人），依我们看来，只起着次要的作用，他们的功能只在于使用实业的产品。除非

将领昏庸无能，由实业装备起来的精锐部队，总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法国的革命充分证明，将材并不是那么难得的，也不是那么难培养的。甚至可以认为，军事才能，至少对目前构成军队主力并对战役的胜负起主要作用的部队来说，是实业理论发展的产物。

实业界也掌握了财政。在法国和英国，现在是实业界为公益的需要垫款，而税收也掌握在他们手里。从对实业界的发展和成就所作的这一简述中，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第一，在政治方面，最初处于奴隶地位的实业阶级逐渐上升，不断提高它的社会地位，而现在终于能够掌握一切大权了。这是因为下议院掌握了表决税收的特权，从而拥有了能够左右其他一切权力的巨大社会权力。因此，如果说政治大权暂时还没有掌握在实业界手里，那只是因为下议院还没有象本来应当的那样，由公社成员即实业界占多数。

第二，在文治方面，实际力量现在属于实业界，而封建阶级在他们的一切需要方面都依赖于实业界。

第三节 什么东西至今推迟了实业界的发展

如果说实业界的发展至今仍然很慢；如果说尽管实业界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但它实际上仍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如果说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封建阶级的统治，或者说至少仍受封建精神的统治（两者几乎是一样），那末它的原因就在于：公社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原则，它是依靠一种实践本能和传统习惯而取得一些进步和成就的。

在这里，我们把实业的原则理解为实业界对其权力的行使方

式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外是实业界根据自己的观点并结合自己的利益而拟定的政治计划，而实业界至今还缺乏这种知识。然而十分显然，实业界要使一切大权能够转到自己手里，这种知识却是必不可少的，而在缺乏这种原则的时候，实业界只能处于受支配的地位。

军人阶级或封建阶级有其自己的原则，因此它也能够维护其全部大权。但是，没有自己的原则的实业界，过去和现在只不过是对封建统治办法作些批判而已；这未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也未能对此起促进作用。

实业界的一切原则，不外是一种模糊的愿望，希望有一个好的政府，即希望统治方式符合它的利益。但是十分清楚，如果对符合于实业界利益的统治方式一无所知，这种愿望除了能使实业界作些批判活动以外，其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公社如此长期缺乏的原则，终于被不朽的斯密确立起来，因为这些原则不外是由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得出的一般真理。

四十多年以来，一些最有才能的人一直在专心研究这些原则。他们一方面作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制造舆论，以使人们愿意接受这一重大革新。他们在制造舆论使人们愿意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要完全像讨论私人的事情一样，把整个国家机构看成是一个大实业企业，而这个企业的目的，是使每个社会成员按其贡献的大小，各自得到最大的富裕和福利。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在这项工作当中所显示的远见，以及他们为我们开辟走向幸福和自由的崭新道路方面所表现的坚定精神，使人们不能不感到钦佩。

斯密研究了各种实业企业采用的方法以后，总结他的观察结

果，使观察形成一个整体，并归纳了由此得出的观点，再创立一些原则，最后创立了以致富艺术为基础的科学。这正如亚里士多德研究了他以前的诗人们的作品以后，写成了他的《诗学》一样。

一个值得注意的非常有趣的事情是，斯密的著作受到了所有政府的热烈欢迎。一贯依仗刺刀的力量的统治者们，能够这样盲从不也很好吗！竭力排除暴力行为和制止政府滥用权力的人士，具有多么惊人的远见！

斯密的著作是对封建制度空前的最有力、最直接和最全面的批判。其中的每一页都在证明：公社或实业界被一个在任何方面都对他们无益的制度所折磨，至今建立的一切政府都一贯想使人民破产，因为所有的政府从来都只是消费，而增加财富的唯一手段只能是生产。

可以把他的著作看成是全面驳斥政府的所作所为的集其大成的作品。因此，总的说来，也可以认为它在证明：如果人民不想再过贫困的生活，而想享受和平和自己的劳动果实，人民就必须改变他们政府的原则和本质。

这部著作同时还在证明：一个国家要想富强，就应当象工厂主、商人和一切经营某种实业的人那样行事。因此，这部著作也在证明：一个希望成为自由和富强的国家的预算，应当仿效一个实业公司的独立预算，按照后者采用的同样原则来编制；国家可能为自己规定的唯一的合理目的，就是用尽可能少的管理费用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

萨伊先生修改了斯密的观点，他用更有条理性的方法把观点加以分类；他更超过这门科学的创始人，赋于自己的作品以学说的

性质。他在斯密提出的见解之外，又补充了新的见解，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教程》。

萨伊先生对现代政府的批判更为明确，他对军事管理原则和实业管理原则的比较更加直截了当。

斯密十分谦逊地向社会介绍了他所创立的科学，他把这门科学作为增加财富的手段来向各国政府推荐，他宣称这门科学只是一门从属于政治的、次要的辅助性科学。

萨伊先生在哲学方面比斯密前进了一步。他在自己著作的卷首指出：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截然不同，而且也不从属于政治。他说：这门科学有其自己独特的基础，这个基础完全不同于以组织国家为目的的科学所依据的基础。

一些最专横的政府又来盲从了：它们急忙下令翻译萨伊先生的著作，规定设置政治经济学的有关课程，也就是设立可以证明下述问题的课程：封建政府和军人政府（欧洲各国人民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如此）是落后于文明的现状、使人民破产、在任何方面都无益于人民的政府；根据这种政府的观点和利益编制的国家预算，是极不合理的；国家预算应当仿效经营工业企业的公司的预算来编制；国家的组成不是以掠夺为目的就是以生产为目的，也就是说，国家不是具有军事性质就是具有实业性质，如果它不公然宣称其中之一为其目的，那它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社会①。

---

① 本段的这个卓越而有益的观点，都是孔德先生的。他第一个指出：一个国家如不公然宣称自己具有军事性质（即掠夺性质）或实业性质（即和平性质），它就要处于虚伪的政治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它的力量大部分要相互抵销。孔德先生在他的名著中指出：罗马人是完全为了战争而组织起来的，他们的全部制度都以使他们拥有尽量大的军事力量为目的。孔德使我们看到，罗马人是怎样按照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和开化程度而行动的。他还证明了现代各族人民落后于本世纪的开化水平，而且彼此的行

在应使实业界得到作为行动规范的原则的工作方面，只需再做一件事情即可达到目的，这就是要在实业界之间广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知识。人们难以想象，但又完全是事实，象政治经济学这门对实业界如此有益和必要的科学，即实业界自己的这门科学，竟是当今所有的科学中最未被广泛传播的一门科学。

第四节 实业界现在应当采取的步骤

根据上述可知，实业界现在握有真正的力量，而且还有了以前所没有过的原则，或者说至少可以十分容易掌握原则了，因为原则已经存在。

既然实业界现已在政治生活中占有我们所说的那种重要地位，那末，领导社会的大权为什么还没有落到他们的手里呢？实业体系为什么还没有建立起来呢？封建体系和军人体系为什么还照旧保留呢？这首先是因为实业原则还没有相当普遍地被人们所了解，因而未能获得可以使他们产生信心和力量的威信。其次是因为一看就可以知道，实力和原则还不足以使实业界成为社会的首脑，它还必须有一种手段、而且是合法的手段来使权力转到自己手里。由于不知道这种手段，所以实业界以前企图掌权的时候，只使

动又互相抵触，在把主要职位和最高管理权都交给军人的同时，却又有希望通过商业致富的强烈要求和希望促进实业繁荣的明显意图。

我们所以十分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公正地评价孔德先生的才能，是因为这位值得尊敬的政论家不久以前曾遭到了一些严重的不幸*。

* 孔德，奥古斯特(Comte, Auguste 1798—1857年)，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在同圣西门接近以前，有过一段苦难的经历。1816年，由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工业大学开除，送回故乡交警察监督。重返巴黎后，生活十分困难，依靠充当家庭教师勉强过活。后来，到一个银行当职员，但不久因不合理想而辞职。——译者注

用而且只能使用起义的办法。而在一切手段中，起义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手段。此外，这种手段与实业界的利益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凡是使用武力，对实业界来说都是一种灾难。这就是说，人民骚动时，首当其冲的正是实业界，因为在一切财产之中实业财产最容易遭到破坏。

因此，在斯密解决了指导实业进程的固有原则的制定问题以后，为了实业发展的利益，势必要加以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找到一种合法的手段，把政治大权过渡到实业界手中。

寻找起义这种手段，既不需要大量的脑力，又用不着很多的力量。可是要想找到一种合法的手段，问题就困难得多了。我们决心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并且深信这是实业界至今未能找到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在决定建立实业体系的道路上还没有迈出的唯一步骤。建立实业体系是文明民族六百多年来全力以求的目的，是经过这样长期准备的伟大的欧洲革命的完成。

我们坚信已经找到了这种解决办法，并且认为我们提出的措施正好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这种措施的必然结果，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下议院会完全由公社的成员即实业界的代表组成，或者至少绝大多数由这些人组成；另一方面，由于下议院拥有表决国家预算的特权，所以它握有政治大权。由此可见，我们提出的措施，一定能使政治大权转移到实业界手中，而这种转移将完全合法地进行，完全符合现在的宪法，并且不会引起任何突然的变动，因为这种措施，按其本性来说，只有逐步实施才会有效。

根据这些论点，我们完全相信：采取这种措施是实业界现在应当迈出的一步；因此，按照已为一切历史观察所证实的一般规律，

迟早要采取这种措施，任何东西也不能长期阻止文明的进步。

第九章 比较法学家和实业家在法国革命期间的行为

第一节 法学家的行为

在前两章里，我们已使读者略知法院的历史和实业的历史。现在我们认为，如果最后不比较一下法学家和实业家在法国革命期间的行为，就没有完成两者之间的全面对比。

那末，法学家的行为是怎样的呢？首先，吉伦特派①推翻了旧政府，他们建立了共和国，可是他们也阻碍了君主政体的改制。这个被人称为吉伦特派的政党，以古阿迪、维尔尼奥和杨松奈②为首脑，他们三个人都是法学家，又都是律师。

旧政府被推翻以后，罗伯斯庇尔掌握了大权。而罗伯斯庇尔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也是一个法学家，他的主要助手们也都是法学家。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安委员会和社会治安委员会里都挤满了法学家。在革命的最狂暴和最令人痛苦的时代统治着法国

① 吉伦特派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右派，因其成员大多数出身于吉伦特省而得名；曾一度掌握政权，后来成为革命的障碍，被雅各宾派所驱逐。——译者注

② 古阿迪，玛尔格丽特·艾利（Guadet,Marguerité Elie 1758—1798年），雅各宾党人专政时期逃亡国外。

维尔尼奥，比埃尔·维克图尼安（Vergniaud, Pierre Victurnien 1753—1793年），雅各宾党人专政时被处死刑。

杨松奈，阿尔芒（Gensonné, Armand 1758—1793年），波尔多省的律师，1793年6月2日被处死刑。——译者注

的，自始至终都是这些法学家。

控制着各省、县、市(所说的自治机构)的议会的也是他们，这些议会全部由他们领导。

当时，他们不仅夺取了立法权、行政权和执行权，而且还左右着人民的动向。他们为雅各宾派提供领导人，他们建立了哥德利埃俱乐部[①]。最后，他们，而且几乎全是他们，组成了这一不幸时期的各种人民团体的领导机构。

因此，在完全了解恐怖制度是由掌握了一切的法学家所发明，并且是在被他们摧毁的旧秩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之后，我们还必须把他们都看成是教唆者和操纵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他们都看成是代表他们的这个阴险发明的特点的无数暴行的执行者。

他们一直守着法学家的法阀精神、即统治精神不放，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重大政治危机中毫不改变这种态度。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取得权力，并且为了千方百计掌握政权，这些现代的普洛透斯[②]还善于随机应变，采取不同的方式。现在，我们来观察一下他们所走过的道路。

冒出了一个波拿巴，他还掌握了最高权力。法学家又结成了法阀。可以说法阀们昨天还在宣传狂热的共和主义，不久以前还想用大字在所有的墙壁和公共建筑上特书下述这句令人难忘的话："团结，共和国不可分，自由，平等，博爱；否则毋宁死！"而现在却成了第一批屈膝于偶像的人物。在这第一批人物当中，为侍奉

① 哥德利埃俱乐部，因设在哥德利埃修道院而得名。正式名称为《人权之友社》。——译者注

② 普洛透斯，希腊神话中居住在深海的妖怪，能随意改变自己的形体，甚至可以突然消失、无影无踪。——译者注

和巩固新强权表现出最大热心和迫不及待情绪的，正是这些法学家。康巴塞烈斯①规定了军人在民事方面担当副职的专横制度。在这个时期，审判中和法庭上的一切发言，都得证明专制制度最符合我们的立法精神。在这方面，再也没有比一个文人团体在拿破仑垮台时出版的一本名为《一个伟人的悼词》的小册子更可笑的了。这本书充斥着一批朝秦暮楚之徒的口诵笔写的谄媚言词和似是而非的错误赞语。这些人为了谋求个人利益，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手段的。但他们的每一句话都附有作者的名字，所以不难认定这本书的大部分文章，还是出自法学家的手笔。

但是，经过军事对抗之后，波拿巴被推翻了，旧政府又恢复了，法阀们也改变了腔调，而且在效忠新政权和限制人民自由方面并不因此而降低热情；他们对于宪章的解释方式仍然是反自由的。

革命使人们得到了解法阀所遵循的精神的机会。这种精神就是贪得无厌的权力欲，而且这种欲望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使他们不能成为权力无边的主宰者，那也心甘情愿和全力以赴地在受人支配的状态下掌权。如果我们想到罗马皇帝、即古往今来的最大独裁者是法学家所研究的科学和他们负责推行的法律原则的创始人，那末，就不会对法学家这样贪求权力感到惊讶了。

---

① 康巴塞烈斯，让·雅克（Cambacérès,Jean-Jacques 1753—1824年），法国的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为人毫无节操。曾任国民公会和公安委员会的委员；热月9日以后，任国民公会主席和五百人会议委员；在督政府时期，任司法部长；雾月18日以后，任第二执政；帝制恢复后，任皇帝的总理大臣；1814年，又变成拥护波旁王朝的正统派；在“百日”期间，再任司法部长；在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时期，曾一度下野，但不久又重新上台。康巴塞烈斯对制定《拿破仑法典》起过重大作用。——译者注

第二节 实业家的行为

实业家在革命期间没有起过任何积极作用。他们什么也不管理，他们没有执掌过任何国家事务，他们没有作过任何掌权的尝试，他们没有犯下这个令人一想起来就不寒而栗的时代的专横暴行。恰恰相反，他们受到这种暴行的痛苦最深。实业家在这段期间，先后两次失去了他们的资本：第一次，"粮食最高限价法案"①夺走了他们的资本；第二次，在波拿巴统治时期，烧毁英国商品的法案，再次使实业界丧失老本。

在旧政府崩溃的时候，实业家没有试图去掌握政权，而且也曾避免成为相继而来的政权的工具。

实业界的政治精神在于联合。自它形成为团体以来，即自公社解放以后，它就显示出了这种精神；后来在整个革命时期，以至最后到今天，它还表现着这种精神。这种精神的目的在于：(1)避免发生任何政治动荡，从而使已经建立起来的任何政府形式保持不变；(2)限制政权的活动范围，并尽可能缩小这个范围；(3)减少政府的开支和税收的一切不当使用。

由于实施选举法，现在已有一些重要实业家进入下议院。仔细研究一下他们发表的意见，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一贯目的就是尽可能达到安宁、自由和节约，并且尽可能使三者协调和结合起来。

---

① 1793年由山岳派提出并经国民公会批准的"粮食最高限价法案"，对粮食规定了固定价格。后来，这项措施也被用于其他食品。这项法案严重地打击了商人和投机分子。热月9日后被废除。——译者注

第三节　这种比较的结果

这种比较显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提高实业家的政治作用,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有利的,因为实业家一方面总是支持现有的政府,另一方面又始终不渝地致力于限制权力和减少赋税。

第二,削弱法学家的政治影响,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是有利的,因为这个团体一方面野心勃勃,好闹革命,经常准备推翻政府或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在不能夺取政权或不得不放弃这一企图时,他们又经常准备为那些觊觎政权的人服务,以反对人民的利益;最后,无论在前一种情况下,或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都竭力减少民族的自由,并使压在民族身上的负担加重。

第十章　本文的结论

在社会的一切阶级中,我们只希望看到实业阶级不断增加其权力欲望和政治勇气,我们只认为实业界拥有这种欲望是有益的,而且也不可缺少这种勇气,因为实业家的私人利益,按照事物的常理,完全同公共利益一致。由于认识到这一真理,我们坚决拥护实业家的事业,并且把他们的事业看成是文明的实际中心和发源地。

我们以上对实业家应当坚持的行为所说的一切,可以按一般常识归纳为几句话。

不要跟那些在利益上同你们根本敌对的人混在一起和往来。

要同与你们有共同利益的人联合起来,要用你们现有的一切

十六 手段来增加他们的人数。那么，让我们向你们推荐一个最简单而又最有力的办法。这项办法的成败只取决于你们自己：只要你们理解了它并且愿意去作，就可以成功。

耕种者的利益同你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也是实业家。你们要同他们联合起来，你们要取得他们的强大的支持。如果作到了这一点，你们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为此需要什么呢？要有一项准许耕种者以**地产**作抵押借款的法律，如同银行家现在以**动产**作抵押向外放款一样。同时，银行家应当相信，耕种者是善于经营、遵守信用和能够及时付息的。

不种地的地主的利益同你们的利益相反，他们的利益同贵族的利益一致。不要同他们联盟，至少要同必然成为敌人的人分道扬镳。

贵族和**不种地的地主**掌握的权力本应完全属于你们，因为只有你们在谋取自己利益的时候必然能为公共利益服务。由于他们掌握着本应属于你们的权力，他们就千方百计回避这个问题。我们建议的办法，对他们来说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他们及其忠实喉舌——一大群法学家，必然要拚命加以反对。这就要求你们设法用理智的语言来回击这些讼棍的花言巧语，用真正而勇敢的道德、即**合乎常情**的道德的战无不胜的反驳来回击伪善的道德。

至于我们，越是看到敌人队伍的人数增多，越应欢庆成功；他们对我们著作的疯狂诽谤，只能向你们证明我们的建议是完美的。

但是，你们不能等着挨打，而要尽快发动攻势，追击他们。他们将有他们的律师，你们可请你们的律师。他们的律师是**搞法律的**

人，而你们的律师则是经济学家①。我们将会看到良知和胜利属于哪一方面。

我们不准备一再重复这一有利于开展实业界和非实业界之间的斗争的一般手段，因为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反复谈到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只想补充如下一点：几家重要厂商的少量捐献，就足以带头推动和开展本质上是主张自由的伟大实业事业。如果对参加这一光荣竞赛的某些作家颁发奖金，那末，一笔微不足道②的五万法郎奖金，就可以构成最伟大事业的资本，即最幸福的革命的资本。为了法国和全世界的康乐，这一革命总有一天可以完成。

（徐基恩译）

① 我们所以用经济学家一词来表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是因为政治经济学这个词偏离了原意。同时我们认为，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应当以经济学家的名字命名，因为经济学家是这门科学的真正奠基人。我们怀念他们作出的重大贡献；他们所犯的错误现在不会造成什么妨碍，因为这些错误已经完全消失了。

② 我们认为应当肯定，把一笔五万法郎的奖金称为“微不足道”的奖金是正确的。这个也许会使一些人感到惊奇的说法，在一些眼光远大的人看来却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看到讨论的结果一方面将使各项事业的投资达到三百亿，另一方面又将使实业免除目前缴纳的大部份赋税。“微不足道”一词，在那些看得更远的人看来更是正确的，因为他们预见到实业和和平的制度的全面实现，是这一讨论的理所当然的结果。

组 织 者①

摘要一 关于组织者

我们设想法国突然失去了五十名第一流物理学家、五十名第一流化学家、五十名第一流生理学家、五十名第一流数学家、五十名第一流诗人、五十名第一流画家、五十名第一流雕刻家、五十名第一流音乐家、五十名第一流文学家；

五十名第一流机械师、五十名第一流民用和军事工程师、五十名第一流制炮专家、五十名第一流建筑师、五十名第一流内科医生、五十名第一流外科医生、五十名第一流药剂师、五十名第一流海员、五十名第一流钟表师；

五十名第一流银行家、二百名第一流商业家、六百名第一流农场主、五十名第一流冶金厂主、五十名第一流兵工厂主、五十名第一流制革厂主、五十名第一流染房主、五十名第一流矿主、五十名第一流棉纺织厂主、五十名第一流丝纺织厂主、五十名第一流麻纺织厂主、五十名第一流铁工厂主、五十名第一流陶瓷厂主、五十名第一流水晶玻璃器皿厂主、五十名第一流船主、五十名第一流车马

① 《组织者》是圣西门于1819—1820年出版的一本书信论文集，我们只从其中择译了两篇摘要。作者曾因摘要一《关于组织者》被控为诬蔑波旁王朝，但是陪审法官宣判圣西门无罪。我们翻译所据的原文，载1966年法文版《圣西门全集》第2卷。——译者注

运输行主、五十名第一流印刷厂主、五十名第一流刻版厂主、五十名第一流金银器皿作坊主和其他五金作坊主；

五十名第一流瓦匠、五十名第一流木匠、五十名第一流细木工、五十名第一流马蹄铁匠、五十名第一流锁匠、五十名第一流刀剪匠、五十名第一流翻砂匠，还有一百名从事这里没有提到的行业的而在科学、艺术、工艺方面最有才能的人。法国总共失去了三千名第一流的学者、艺术家和手工业者①。

这些人真正是法国社会之花，因为他们是最能生产的法国人，是制造最重要产品的法国人，是管理最有益于民族的工作并使民族在科学、美术和手工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的法国人。在全体法国人当中，他们是对祖国最有用的人，是为祖国争得最大荣誉、把祖国的文明和繁荣推向顶峰的人。民族要是一霎时失去他们，便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殭尸，立刻沦落到屈居于今天正同它竞争的民族之下的地步；只要这种损失没有得到弥补，只要新的领袖没有出现，它将一直处于这种从属地位。要想从这种灾难中恢复过来，法国至少需要整整一代人的努力，因为精于有益劳动的出类拔萃人物是奇才，而天地间奇才本来不多，尤其这类奇才更是凤毛麟角。

我们再设想另一种情况。假如法国把科学、艺术和工艺方面一切天才人物都保存下来，而在同一天不幸失去某某大人、国王兄弟、安古雷姆公爵殿下、贝利公爵殿下、奥尔良公爵殿下、波旁公爵

① 人们一般只把普通工人称为手工业者。为了避免对这个词发生误解，我们把这个词理解为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人，其中包括农场主、工厂主、商业家、银行家和被他们雇用的一切职工。

殿下、安古雷姆公爵夫人、贝利公爵夫人、奥尔良公爵夫人、波旁公爵夫人和龚德小姐。[①]

同时，还失去全部高官显贵，全部在任或不在任的国家大臣，全部国家参事，全部稽查官，全部元帅，全部的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大本堂神甫和议事司铎，全部的省长和副省长，各部的全体官员，各级法官，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养尊处优的大财主。

当然，这个意外事件会使法国人悲伤，因为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人，因为他们不能看着这么多的同胞突然死去而无动于衷。但是，这三万名被认为是国家栋梁的人物的死亡，只能使他们纯粹出于感情而感到难过，因为这并没有给国家带来任何政治损失。

这首先是因为遗缺的职位可很容易补上。能履行国王兄弟职务的，法国大有人在，而且完成得能象这位先生一样好；很多人能够胜任大公亲王的职务，而且跟安古雷姆公爵殿下、贝利公爵殿下、奥尔良公爵殿下、波旁公爵殿下完全一样胜任；许多法国女性都能象安古雷姆公爵夫人、贝利公爵夫人、奥尔良夫人、波旁夫人和龚德小姐一样，成为贤良的公主或王妃。

宫廷里有的是侍从可以出任高官，军队中有许多人比我们现在的元帅们还善于治军带兵。有多少听差可以充任我们的国家大臣；有多少职员比现任的省长和副省长更善于管理省务；有多少律师同我们的法官一样精通法律；有多少神甫跟我们的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大本堂神甫和议事司铎一样精明能干；至于那些数以万计的养尊处优的财主，他们的继承者无须经过什么训练，便能象他们本人一样善于送往迎来，保持其沙龙的荣誉。

① 这些人都是路易十八世的最近亲属。——译者注

法国的繁荣富强，实际上只能是科学、艺术和工艺进步的成果。但是，那些王公显贵、朝廷重臣、大主教、法国元帅、省长和游手好闲的财主，根本没有直接对科学、艺术、工艺的进步做过什么贡献。他们对这种进步只能有损无益，毫无贡献，因为他们想要竭力维持臆断猜测的学说迄今对实证知识所占的优势。正如他们所做的那样，他们使学者、艺术家和手工业者失去理应受到的最大尊重，从而必然危害国家的繁荣昌盛。他们所以危害国家的繁荣昌盛，是因为他们以不会直接给科学、艺术和工艺带来好处的方式挥霍金钱；他们所以危害国家的繁荣昌盛，还因为他们每年要以俸禄、津贴、赏金、补助等名目，从人民所纳的税款中攫取三、四亿法郎，作为他们的无益劳动的报酬。

这些设想，明确地提出了当前政治上的一个最重要事实。这些设想，提供了一个可以全面地、一目了然地洞察这个事实的观点。这些设想，间接地、但很清楚地证明了社会组织不够完善，人们还任凭暴力和奸诈来支配自己，人类就政治方面而言还处在没有道德的状态。

这是因为唯一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积极造福，但几乎没有得到社会任何报酬的学者、艺术家和手工业者，受着王公和其他一些大大小小的无能而守旧的掌权者的统治；

因为受到尊敬和得到国家其他奖赏的人，往往只是靠投对了娘胎，善于拍马逢迎、惯要阴谋诡计，或搞其他不光彩勾当而享有显要地位；

因为负责管理公务的人，每年拿税收的半数损公肥私，而没有塞进他们腰包的那一部分，连三分之一都没有用来为被统治者

造福。

这些设想表明，现在的社会完全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

这是因为国家把穷人应对富人宽宏大量作了一条基本原则，结果不得温饱的人，每天还要省出一部分生活资料，来为阔佬们锦上添花；

因为一些重大罪犯，即一些欺压全体公民并每年从他们身上勒索三、四亿法郎的巨资的大盗，却在负责惩处违反社会秩序的轻微罪行；

因为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好逸恶劳和穷奢极欲是社会上的大人先生们的特点，而勤劳能干和节衣缩食的人却身居贱位，被他们当作工具使用。

总之是因为：在各行各业中，都是由一些没有才能的人去治理有才能的人；在道德方面，都是由一些道德败坏的人去陶冶公民的操行；在分赃的法庭上，都是由重大罪犯来惩办犯了轻微罪行的小罪犯①。

尽管这个摘要很短，但我们深信它已充分证明：政治机体有病了，而且病入膏肓，已使人苦恼得无法再忍受了，因为它的整体和各个部分都同时受到了危害。这个诊断要比其他一切诊断奏效，因为觉得自己健康（或自以为健康）的人，对于医生劝他服药，劝他接受切实可行的疗法，是什么也听不进去的。

在摘要二中，我们再来考察一下什么药可以对症。

---

① 由本文开始至此，奥·罗德里格在1832年曾以《圣西门的寓言》为标题刊印；后来，他又多次用这个标题刊印过这段文字。1848年，奥·罗德里格还以《一个死人的话》为标题刊印过此文。——出版者注。

摘要二 我的《社会组织理论》一书的摘要

“至今为止，统治者一直把民族当作自己的家产；他们的一切政治谋划，实质上不是为了经营这些产业，就是为了扩大这些产业。有些谋划即使给被统治者带来了一些好处，实际上也只是由统治者当作使其财产更有收益和更加牢靠的手段而想出来的。连老百姓也把由此而产生的好处看成是统治者的恩泽，而不视为统治者的职责。

“毫无疑问，这种事态曾不断地发生过很大变化，但只是形式上的变化而已。也就是说，文化教育的进步日益不断地限制着统治权力，但还丝毫没有改变它的本质。就统治权力目前在我们当中的实施情况来看，它已不那么自由了，地盘也不那么大了，但其本性依然如故。根据神权，国王生来就是黎民之主。这条陈旧的原则，如今至少在理论上仍被认为是基本原则，这有下述事实为证：反驳这一原则的一切企图，都被法律认为是对社会秩序的侵犯。

“而在另一方面，被统治者提出了一条新的一般政治原则。他们认为，统治者不过是社会的管理人员，只应根据被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来领导社会。总之，为民族造福是社会组织的独一无二目的。这一原则已被统治者接受，或者至少已与旧原则一并被他们所承认。换句话说，统治者承认他们必须按照上述观点治理国家，但是他们仍继续认为自己是天生的治理者。可以认为这项原则已经确立，因为议会的三个权力机构之一的下议院，已把维护这项新原则和使其生效，作为它的主要职能。

"毫无疑问，这项原则的确立，是向建立新的政治体系迈出的极其重要的一步。然而，在目前情况下，这项原则还不能产生任何真正的重大效果。我们不能不认为，它至今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个只起限制作用的原则，而并不是一个发生指导作用的原则。原因在于：这项原则太不具体，以致实际上不能成为新社会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只有把它明确规定下来，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把它补充完善之后，它才能明确地具有这种性质。下面，我们就来发挥和论证这一点。

"在目前情况下，人们认为政府的经常的和唯一的职责，就是为社会造福。但是，用什么手段来为社会造福呢？对此，舆论至今无所表示。甚至关于这一点，恐怕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和为大家公认的看法。由此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这必然导致社会的总领导工作完全听凭于统治者的专横武断。只对统治者说'要使我们幸福'，而不向他们指出应该采取什么办法，这就等于硬叫他们负起设计和实施为我们造福所应采取的办法的职责，结果也就等于将我们自己完全交给他们任意摆布。这样一来，我们的头头如果野心勃勃，他们就必然将我们组织起来去征服他人，或为他们垄断统治服务。倘若他们喜爱奢侈豪华，他们就一定为自己建造华丽的宫殿，举行盛会大典，从而竭力使我们为他们造福。倘若他们笃信宗教，他们便会安排我们去进天堂，诸如此类。要知道，由于所处的地位，统治者自然要特别喜欢把符合于他们私欲和嗜好的东西，看成是对人民有莫大好处的东西①。甚至可以设想，统治者已经

① 人们可以想起路易十四在曼太嫩夫人劝他施舍时对她说的一句话："一个国王施舍，得花很多钱。"

意识到需要拟出一项正规的治理方案，而议会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这样做——这就是通过暴力和权术使社会繁荣的方案，因为统治者至今能够见到的唯一统治手法（同时，不管政府是何种形式），总不外乎暴力和权术交替使用。

“凡是对这个问题略加研究的人，不必作较为细致的考察，就可以确信：只要社会仅是笼统地要求统治者为它造福，而对于繁荣社会的一般手段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则专横武断就必然要统治社会的最主要和最重要方面，因为这时统治者除了具有按既定方向领导社会的天然职能之外，还兼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职能，即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职能①。由此可见，政论家当前工作的主要目的，应当是指明社会应走的繁荣道路，并使社会选择这条道路。

“那末，我们现在反躬自问：什么是为社会造福的一般手段呢？我们敢于不揣冒昧地指出这些手段，而一切知情达理的人也不难证明：除了科学、艺术和工艺外，再无其他手段了，因为人们只有在满足自己的身心需要之后，才能成为幸福的人，而满足这些需要，正是科学、艺术和工艺的唯一宗旨或近乎直接的目的。一切对社会真正有益的工作，都与这三个部门有关，而且也只能与它们有关。只有寄生分子和专横的统治者不参与这三方面的活动。在至今采用的和将来可能采用的一切造福于人类的措施当中，除了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科学、艺术和工艺的既有知识的应用、推广或提

① 看到专横武断的现象未被铲除，也不必惊奇。显而易见，不应把责任全推到统治者身上，因为即使他们怀有良好的愿望，在社会没有为自己定出正确的协作目的以前，专横武断现象总要存在下去。其次，也十分清楚，只依靠政府形式的改变，也决不能消除专横武断现象，因为我们所说的一切，并不决定于政府形式，任何政府形式对它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高之外，从来没有而且今后也永远不会有什么其他有益于改善人类命运的办法了。我们要不厌其烦地重复说，除了人作用于物这种活动之外，再也不存在什么人类的有益活动了。人作用于人那种活动，其本身总是对人类有害的，而且由此会损失双倍的人力。人作用于人那种活动，只有在它处于从属地位而又是一致对自然施加较大影响时，才会产生益处。

“当然，我们决不是主张：在目前情况下，除了学者、艺术家和手工业者，就没有什么有用的人了；除了他们的劳动，就没有什么有益的劳动了。既然在现有的社会体制下，这三个阶级还受着寄生分子的统治，那末，一切不属于这三个阶级的人，在从事于使这些阶级摆脱这种统治的工作的时候，便做了一种不仅非常有益而且完全必要的事情。他们的影响尽管是间接的，但毫无疑问会对科学、艺术和工艺带来好处。但是，谁不知道这类活动的效益要依赖于所谓环境，并要随着产生这种效益的（必然是过渡的）事实而一起消失呢！何况社会是不能只靠批判来组织的。但因为我们在此寻求的是一个可以作为新社会体系的基础的原则，所以我们必须完全撇开一切具有过渡性质的东西。

“由此我们认为可以在原则上确定：在新的政治制度下，社会组织的唯一而长远的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有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传播、改进和尽量丰富这些知识。简而言之，就是把科学、艺术和工艺方面的一切个别的活动，尽可能有效地结合起来。

“社会在这种组织制度下会达到何等惊人的繁荣，根本不必在这里作详尽的叙述。其实，这种情景是很容易想象得到的。现在，

我们只用下列的论点来说明这个问题。

“迄今为止，人类征服自然的努力，可以说是纯个人的和孤立的 而且，人们的力量往往有很大一部分互相抵销了，因为人类至今还分成两个不平等部分，其中人数少的一方，往往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有时甚至把人数多的一方的部分力量，用来统治人数多的一方；而后者则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力量用于抵制这种统治。但是，仍然应当相信，尽管如此大量地消耗了力量，人类还是在文化发达的国家里，使康乐和繁荣达到了相当出色的高度。可见，如果任何力量都一点不被浪费；如果人类停止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发号施令，而是组织起来共同去征服自然；如果各国人民相互之间也采取这种办法，那末，人类将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我们方才已经试图说明，必须使社会为自己规定出明确的组织目的，以代替那种空许的造福目的。现在，这个目的已被确定，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它的必要性了。为此，只须假设一个社会体系的目的是空许的，另一社会体系的目的是明确的，然后对两者作一比较就可以了。这种对比，将以新的观点指出我们所提的原则的重要意义。

“假设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商队，它向自己的领队们说：请你们把我们带到对我们最有利的地方去。从这时候起，领队们便成了主宰，而商队本身就什么也不能作主了，只得盲目地跟着往前走，因为要想使这种旅行进行下去，哪怕二十四小时也好，商队也得对它的领队表示无限信任，完全服从。因此，商队就完全听凭领队的摆布，即使领队居心不良和愚昧无知，也得如此。商队的人只有权

表示领队要带他们去的那片沙漠不合他们的心意，或要求把他们带到别处去。而这种权利只会使商队作出一连串痛苦的试验，除非让领队决定旅行的目的，这种试验永久不会给商队带来好处。

“反之，我们假设商队对它的领队说：你们知道去麦加的道路，请把我们带到那里去。在这种新情况下，领队就不再是首领了，而只是向导。他们的职责固然非常重要，但只是从属性的了，而主要的行动均由商队本身来决定。每个队员只要认为合适，任何时候都有权对所走的道路提出批评意见，建议按照他们的意见作出他们认为有益的改变。因为这时只能是在十分肯定而又很容易断定的问题上发生争论（比如，我们离麦加远了而不是近了），所以商队不再服从向导的意志（假如商队对路程比较清楚），而是服从自己对领队讲给它的论证的信念。

“第一种假设是一幅泛泛地要求其领导人为社会造福的社会的图景，第二种假设是依靠科学、艺术和工艺组织起来以达到繁荣的社会的写照。甚至可以说，商队中的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巨大差异，还没有充分说明这两种社会体系之间的差异。我们觉得，这两种社会体系的对立，完全可以用下述几句话确切地表达出来：在旧体系下，社会实质上是受人的统治；在新体系下，社会只是受原则的统治。我们已对这种见解的第一部分说得相当清楚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第二部分。

“在一个依靠科学、艺术和工艺组织起来以达到繁荣这一积极目的的社会里，决定社会应当遵循前进的方向的最重要的政治行动，不再由身居公职的人员来完成，而是由社会组织本身来实施。只有这样，一个由集体掌握的社会，才能真正行使主权。这种主

权，全然不是被群众尊为法律的专横意见，而是导源于事物本质的原则；人们只能承认这项原则的正确性，宣布实施它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担任各种公职的公民，即使是担任最高职务的，从某种观点来看，也只起着从属的作用，因为他的职务不管多么重要，总得遵循并不是由他们选定的方针。其次，这种组织的目的和对象非常明确和非常肯定，以致人的专横、甚至是法律的专横都没有施展的余地，因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只有在目的和对象规定得不明确的时候，才能施展其淫威；而这种不明确性，可以说是使专横发生作用的必要因素。当社会组织的目的和对象明确而肯定的时候，行政管理活动就完全没有意义，或者几乎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它只是发号施令。在这种政治体系下，应当解决的全部问题不外是：社会采取什么措施可以依靠科学、艺术和工艺方面的现有知识使它原有的繁荣更进一步；采取什么措施可以推广这些知识和使其更趋完善；最后，这些不同措施通过什么办法才能办到而又花钱最少和费时最短。我们说，这些问题以及它们可能引起的其他一切问题，都是极其实际和不难确定的问题。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科学的论证，而科学论证完全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受过足能使人理解它的教育的一切人都能接受。另外，在这种体系下，只是由于一切公职都具有积极的性质和明确的目的，就使履行这些职务所必需的能力表现得非常显眼，十分容易被人看到，以致对此绝对不会分辨不清，而每个公民也自然要专心去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凡有关公益的问题，届时也必然会得到解决，而且解决得会象用现在的知识解决当前的问题那样好。同样地，一切公职也必然会交给那些最能按照团体的总目标履行职责的人去担

当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现有政治体系的三个主要弊端，即专横武断、腐败无能和玩弄权术，都将完全消失。

“我们在简述社会组织今后应当确定的目的时所以没有提到维护秩序的问题，是因为维护秩序固然是使社会能够从事任何一种活动的基本条件，但不能把它看成是社会的目的。有一种看法，认为政治体系应以维护秩序为其独一无二的目的。由一些极受尊敬的人想出和传播的这种看法，是以如下的想法为基础的：在目前情况下，只要政府能够或多或少地保证人们的各种活动平安和安全，它实际上就是有用的。但一般人认为，政府为繁荣社会而采取的几乎所有措施，都产生了有损繁荣的实际效果，所以由此出现了一句口头禅：政府能为社会的幸福所做的好事，莫过于它不干预此事。然而这种看法，只对现存的政治体系来说是正确的；而如果把它绝对化了，那就显然是错误的。只要我们还没有构想出另一种政治体系，这种看法就会继续存在。

“专门以维护秩序为目的的职务，在新的社会组织里只占有与它们的自然地位相适应的位置。也就是说，它们将是从属性的职务和警察那样的职务，因为显而易见，只是在社会没有明确的目的的时候，这些职务才有可能成为主要的职务；而一旦社会有了某一目的，即使是不够好的目的，这些职务便要退居于次要的地位。然而，我们现在看到：在新的社会体系下，这一社会活动部门是唯一要求

① 现在，也实行应由最有能力的人担任公职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与我们想要建立的原则毫无共同之处。支持这项原则的人用来行使权利的能力，是使用暴力和施展阴谋的能力。然而，这不仅与我们所说的能力完全无关，而是使我们更加深信：如果这种能力被现有的政权所掌握，那将是十分可悲的；因为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将是延长丑恶的社会体系的存在，使它超过自己的寿命。目前的无能比这种能力还好得多。

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某种管理的部门；而在其余的几乎所有部门，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都将按原则办事。由此可见，真正的管理活动，到那时候就会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因此，在这种秩序下，人们将享有与社会状况相适应的最大程度的自由。还必须指出，这种维持秩序的职务，到那时候可能容易变成几乎全体公民的共同职责，比如制止捣乱分子或解决争议纠纷的职责。由此可见，只须交给专门负责维持秩序的人员的那部分权力，将是非常有限的，对自由的危害也不会太大，因为这些人都处于从属的地位。当政治体系没有坚定地致力于社会繁荣的时候，就需要有庞大的管理机构来维护秩序，因为这时政府必然将群众看成是现有秩序的敌人。但是，当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看到社会所向往的改善福利的目的，以及走向这一目的的先后步骤时，人民群众的力量就会被调动起来；而仅仅这种力量就几乎足以制止反对社会的少数派。

“只要根据实在的和公认的事实进行如下的对比，我们就能很好地说明两种体系之间在我们方才谈到的关系方面存在的对立。

“巴黎工业大学从建校以来一向是最高学府。当提出创办这所大学的问题时，创办人一方面着手拟订使学生可以在最短期间获得最多和最重要知识的教学计划，另一方面聘请最有才干的人来任教。这两个条件一旦实现，创办人便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学校也告建成。而当考虑到学校的性质会产生某些行政事务的时候，创办人就把这些次要的事务分配给各位教授，由他们成立校务委员会，以便随时开会解决问题。最后，当创办人认为许多青年人经常聚在一起，必须在他们中间维持一定的秩序，以使他们从学习中获得一切有用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便把这项公职委托给一

个值得尊敬的但还没有足够的才能担任教授而他自己也甘居下属的人去担任。这个学府的发展经过,大家都是知道的。

“波拿巴来了,他认为这个学校的组织过于简单。为了给学校添上一些他自己的东西,他想把他认为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东西赋予学校。他做了些什么呢?他不怕机构臃肿,从自己的亲信中给学校派来一名总学监、一名上校军衔的副总学监和一名校长,而这三个人又各有数名部下。于是,学校的纪律就专由这帮人来维持了。波拿巴撤销了校务委员会,由总务长来主管校务,总务长下又有几名不同级别的官员。于是,这群废物和蠢才成了头面人物,被看作是学校的灵魂,受到很高的尊敬,高踞于教授之上。原先的正常秩序被完全颠倒过来了:学校的次要部分变成主要部分,而真正重要的职位则退居于第二线。不必说,现今仍然保持的这个新组织,其费用要比旧组织浩大得多;而使政府最费钱的,莫过于那些身为学校行政官员的废物和蠢才。

“假如把我们方才所作的对比加以扩大,推广到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那么新体系对旧体系所占的优势性就不难估计了。

“我们以为,通过上面的论述足以证明,现在能够实行的改善社会状况的唯一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唤起舆论为建立依靠科学、艺术和工艺来使劳动造福于社会的政治体系而大声疾呼。我们并不认为只应举出这一论证就算完了。如果我们不进一步指出,即使不谈这种政治体系的好处,按事物的独自发展进程和人类理性的发展规律,这种政治体系也应当自然形成,那么我们才把任务完成了一半。关于这个问题,将在本摘要的第二部分中叙述。”

(钱继大译)

论实业体系[①]

上帝说：人们要互助互爱。

一、序言

政治机体经历了三十年的危机的基本原因，就是目前在各个最文明民族中迅速蔓延的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这一变革是旧政治制度迄今不断经历的那些变化的最终结果。更确切地说，这一危机的本质就是从封建和神学体系向实业和科学体系过渡。只要新的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危机就必然要继续下去。

被统治者和统治者至今没有理解这些基本真理，而且目前依然如此；或者勿宁说，两者都只是模模糊糊地、一知半解地、极不充分地察觉到这些真理。十九世纪仍然受着十八世纪的危机性质的支配，它还没有具备它所应有的组织特性。这便是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可怕灾难过于拖长的主要原因。然而，一旦我们理解了文明的进程为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一旦目前就应该发挥作用的世俗力量和精神力量摆脱了奄奄一息的状态，这一危机就必然会停止，

---

① 《论实业体系》的单行本（ⅩⅩ页＋311页）出版于1821年，全书由《序言》和《导论》以及致国王、议员、农夫、商人、工人、学者、艺术家和其他实业家的书信和呼吁书组成。我们只选译了《序言》、《导论》、《致博爱者书》和一封《上国王书》，我们翻译所据的原文，载1966年法文版《圣西门全集》第3卷。——译者注

或者至少可以变成单纯的道德运动。

我现在公布我的一部哲学著作的第一片断。这部著作的总目的在于:发挥和证明我只作过简单陈述的几项重要原理;尽量唤起人们普遍注意有待十九世纪来完成的社会大改革的真正性质;证明这个为历来的文化进步所逐渐准备就绪的改革,目前已经完全成熟,如果再拖延下去,就会带来最惨痛的后果;明确指出应该采取什么步骤,以便沉着地、稳步地和迅速地进行这一改革,而不管它会遇到什么实际障碍。一句话,就是尽哲学的全力来促进实业和科学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只要把这一体系建立起来,就能结束现在的社会动荡局面。

如果大多数的有识之士能够以适当的观点去掌握和评论我敢于提出的实业学说,这个学说就能容易被理解,而且不难被接受。遗憾的是,情况并非这样。根深蒂固的不良思想习惯,妨碍着许多人接受这一学说①。掌握政治观念,比掌握其他一切观念更需要象培根所说的"白板"(tabula rasa)②。正因为如此,在掌握政治观念的时候,要遇到更多的困难。

惯用占星术士和炼金术士的眼光去研究天文学和化学的学者们,在企图用这种眼光去理解这两门科学的真谛时所遇到的困难,又出现于今天的政治研究方面。目前,在政治方面正发生天文学和化学方面已发生过的那种变革,即从臆测向实证过渡,从形而上学向形而下学过渡。

① 因此我认为:在其它条件完全相等的情况下,平时不问政治的人要比其他人更能了解和评论我的著作,而且一般说来,更能了解和评论政治方面的一切实证观念。

② 指人脑在未接受一种思想之前所处的没有写上字的白纸状态。——译者注

由于不得不和顽固而普遍存在的习惯作斗争，我认为迎上前去反对这种习惯，略微提前发表我的著作的一部分，这是有益的。我觉得，在此用一般方式扼要地说明一下那些空洞的和形而上学的学说至今对政治产生过和仍保存着什么影响，说明一下什么错误使人们把这些学说误认为真正的政治，最后指出今天为什么需要抛弃这些学说，这也是有益处的。

在封建和神学体系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就诞生和发展了实业和科学体系。这种简单的对照就足以使人感觉到，在这两种针锋相对的体系之间势必存在着某一种中间的和性质折衷的体系。这种中间体系的唯一使命，是改革旧的体系，使旧体系容许新体系发展，然后再向新体系过渡。根据我所列举的材料，非常容易预见这种一般历史事实。无论在世俗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任何改革都只能逐步实现。在这里，一方面由于改革是宏伟的，另一方面由于封建和神学体系本质厌恶一切改革，以致实现任何改革，都需要在旧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一些特殊阶级进行持续几个世纪的特殊活动。这些阶级虽然产生在旧体系之下，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旧体系的影响，所以他们应当依靠自己的政治存在这一事实，在社会内部创造被我抽象地称为中间的和过渡的体系。这些阶级，在世俗权力方面就是法学家，在精神权力方面就是形而上学家。他们双方在政治活动中密切配合在一起，就象封建和神学之间、实业和实验科学之间的配合情况一样。

我方才指出的一般事实具有最重大的意义。这是实证的政治学说应当依据的基本理论之一。现在特别需要好好地阐明这个基本论点，因为其中至今存在的模糊和糊涂观点，造成了今天政治观

念的最大混乱，成为几乎所有的政局动荡的原因。

否认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对改造封建和神学体系，对阻止这些体系把实业和科学体系扼杀在摇篮里起过有益而卓越的影响，那完全是非哲学观点。废除封建的司法制度，建立迫害性较小和比较有组织的审判制度，都应归功于法学家。在法国，议会的行动不是曾多次反对封建制度而保障了实业！如果谴责这些人士有野心，那就等于责备一项有益、合理而且必要的事业的必然后果，等于回避问题的实质。至于形而上学家，正是他们进行了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建立了信仰自由的原则，而这项原则则破坏了神权的基础。倘要我继续讨论任何一个正直的人借助于上述的说明都会容易发挥的论点，我就超出了这篇序文的范围。我以自己的名义声明：我绝对不能想象，没有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参与，旧体系怎样会改变，新体系怎样会发展①。

另一方面，如果说把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对文明进步所作的特殊贡献一笔抹煞是荒谬的，那么，过高评价这种贡献，或者说得更明确一些，没有认清这种贡献的真正本质，也是很危险的。

既然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政治影响只是修补性的、过渡性的和非建设性的，那么由于这种历史局限性，这种影响的存在也必然是短暂的。当旧体系丧失了大部分实力，而新体系的力量在社会的世俗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已占据优势的时刻，这种政治影响就完成了它的天职。截至上一世纪的中叶，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

① 事物本身的特性，要求用这个过渡阶段来处理纯科学问题。哪一个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不知道，长期以来当人类理性尚未从纯神学观念过渡到实证观念以前，就在本部门使用了形而上学！凡是研究过科学发展史的人，谁不相信这种中间阶级对于实现过渡是有用的，甚而是不可缺少的呢！

的政治活动，一直是有益的和受人尊敬的；但从此以后，它就变为完全有害的了。

当法国革命宣告开始的时候，问题已经不在于改革早已几乎失去全部实力的封建和神学体系，而在于组织适应文明情况的需要和取代旧体系的实业和科学体系了。实业家和学者应当各尽自己的天职，占领政治舞台。但结果并没有如此，而是法学家成了革命的领袖，并用形而上学家的学说指挥了这场革命。不必回忆有多少奇谈怪论随之而来，也不必追求这些妄诞言论造成了什么灾难。但是，必须注意指出，虽然经过了这场巨大的实验，迄今依然是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在执掌国务，而现在的一切政治纠纷也全由他们操纵。

这次实验，尽管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并且也确实发生了决定性作用，但因为实验进行得杂乱无章，结果一无所成。经过这次直接分析即实验，并没有证明绝对必须铲除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无所不包的政治影响。他们的这种政治影响，只是由于人们设想他们的学说优越而造成的。但是，今天已很容易证实，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学说，由于它们的本质，现在完全不宜于指导统治者或被统治者的政治行动。这种障碍是很大的，可以说大得能取消个人可能发挥的作用，尽管这个个人的才华十分卓越。

稍有知识的人现在都承认，社会制度必须彻底改造。改造的需要已经成为燃眉之急，势在必行。但在这方面，有一个主要错误，即相信新体系应该奠基在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学说之上。这个错误所以能持续下来，只是因为人们在自己的一系列政治观察中溯本求源不够，没有仔细研究一般事实，或者说得更确切些，

还没有根据一般历史事实作出政治上的论断。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至于把社会制度的形式的改变误认为社会制度的真正改革了。社会制度的形式改变，过去曾起过作用，但在今天已不再发生任何作用了。

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总爱把形式当作内容，把空谈当作行动。因此，普遍产生一种看法，认为政治制度几乎是多得无穷无尽。然而，实际上只有、也只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体系：封建军事体系和实业体系。而从精神方面来说，则为信仰体系和实证体系。开化的人类的整个过去，必然都能按这两大社会体系划分。实际上，不论是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个人，都只有两种活动目的：不是征服他人，就是自己劳动。而在精神方面，相当于这两种目的的，是盲目的信仰和科学的证明，后者也就是以实证观察为根据的证明。因此，必须改变共同活动的目的，方能确实改变社会制度。一切其他改进，尽管意义重大，但只不过是形式改变而已，即只改变形式，而未改变体系本身。只有形而上学由于它的能力很差，才会使事物的面目全非，把应该分开的东西结合起来，把应该结合的东西却分开了。

在封建军事体系鼎盛时期，社会组织纯一，个性鲜明，因为当时的社会有明确的活动目的，即大力发展军事行动；政治机体的其余一切部分都要协调起来为此目的服务。目前，为了达到实业的活动目的，社会也要组织得更加完善、比较纯一和个性鲜明，并把一切社会力量结合起来走向这个目的。但是，自从封建军事体系衰落以来，直到今天，社会还未被真正组织起来，因为上述的两种目的同时并存，而政治制度的性质也是很杂乱的。然而在今天，当

过渡时期基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再认为过渡或准备状态仍象永久的制度那样是有用的和必要的，把这种局面当作永久的制度，那显然是荒谬绝伦了。可是，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学说，却恰恰引导人们这样做。

不必一再反复说：一个社会必须有一个活动目的，否则就没有政治制度①。立法从来不是目的，而只能是手段。现在，在文明已经取得一切进步后，人们才来结成社会以制定彼此互相遵守的法律，这岂非咄咄怪事②。毫无疑问，这是故弄玄虚的卓绝表现。这种现

① 波拿巴致力于恢复封建神学体系的时候，他是懂得这个基本真理的。无奈他没有把这个体系用好，这是由于他无能，或者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他有野心。他所受到的教育能够使他懂得，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领袖，今日应该怎样领导国事。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野心家，如果他承认自己无能，他就得去当军人，如果他自以为有本领，他就可以当实业家。

② 毫无疑问，人们要说，根据这个假说，社会契约的目的在于保证自由。这就是总在同一个观念圈子里打转转，错把过渡状态当作是必需建立的体系。

只要封建和神学体系还多少有些力量，保证自由就成为当务之急，因为那时，自由会受到严重而不断的侵犯。但是在今天，就不会再担心实业和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了，因为无论在世俗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这个体系自会导致最高级的社会自由而不必人们去直接干预。在这种体系下，再用一个庞大复杂的政治机构专去保障不再严重受到威胁的自由，那就太象唐·吉诃德先生同风车作战了。

此外，保证个人自由，无论如何不会成为社会契约的目的。正确理解的自由，是文明的一种结果，而且和文明一样，也是逐步完善起来的，它可不是文明的目的。人们并不是为了自由而联合在一起的。野蛮人群集是为了狩猎或战争，却不是为追求自由，因为他们若要自由，最好是离群索居，孤独生活。我再复述一遍，需要一个活动目的，而自由不可能成为这样的目的，因为自由恰好要以这种目的为前提，因为真正的自由决不在于社会成员可以随心所欲，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任何地方出现这种倾向，都应当严格制止；恰恰相反，真正的自由，在于尽量广泛地和毫无障碍地发展人们在世俗方面或精神方面有利于集体的才能。

此外，我们还必须指出，随着文明的进步，世俗和精神方面的广义分工也将同样地发展。由此，必然产生如下的情况：人们日益减少彼此间的个人依赖，而逐渐增加他们之间每个人对集体的依赖关系。如果人们仍把自由当作政治学说的基础，那么，今日流行的空洞的和形而上学的自由观念，就会严重妨害集体对个人的影响。从这一观点

象难道不象有些人煞有介事地聚集在一起，商订新的象棋比赛规则，并以为自己参加了比赛吗？然而，这种荒谬绝伦的行为，对于凡事惯于只看表面而使判断往往错误的法学家来说，尤其是自然的，但也是可以宽恕的。然而对于凡事惯于只看实质的实业家来说，如果仍然坚持这样的错误，那就绝对不可原谅了。

现在我们回来研究对待事物的正确方式。我们应当承认：长期以来对于改变封建和神学体系，从而协助实业和科学体系的发展，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影响是有益的。但是，我们也得承认，

来看，自由也同文明的发展和秩序井然的制度的建立有矛盾的，秩序井然的制度，恰恰要求各部分严密配合和局部从属于全体。

我不谈政治自由，因为十分明显，比起个人自由，它更不能当作社会联合的目的。其实，为了说明事情的真相，我对这个问题可以指出：不管公民的能力如何，单在理论上承认每个公民都有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利，并把这种权利称为天赋权利；而在实际中，却又不问才能的条件而加以限制，这是政治观念依然空洞无物和含糊不清的最完整和最明显的例证。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人们早就宣布谈论政治不需要什么才能，既不需要天赋才能，又不需要后天才能！当然，在宣布的时候不会直接了当说出来，但其含意是十分清楚的。

既然为不比化学重要和困难的政治规定了与化学完全相同的原则，那么为什么不宣布：凡是能交纳一千法郎直接税的法国人就能在化学方面有所发现呢？为什么？这因为从事化学所必需的才能是众所共知的，而政治上所需要的才能却是没有人知道。这种差别从何而来？这来自化学今天已是一门实证科学，而政治还只是一种臆测学说，甚至不配称为科学。

形而上学从来不传授任何真实的东西。正因为它有这种本质，所以它才硬说：人不需要任何专门的科学训练就能够作到一切。我刚才所说的令人注意的情况，目前只存在于政治和它的母体——哲学当中，因为在我们所有的知识里，只有政治和哲学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即使今天最实证的科学，当它们还陷在形而上学的黑暗统治之中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科学只有具备实证或实验性质之后，研究它们所必须的条件才会明确起来，不再成为普遍争论的对象。对于政治来说，情况也必然完全一样。今天，仍然有人可笑地认为，政治知识是天生的，或者说，只要你生为法国人，便能判断政治问题。这种说法不但不为人们所讪笑，反而被称为爱国主义。然而，一旦政治进入实验科学行列（今天看来不会太迟了），掌握政治才能的条件就会变得明确而肯定，而政治研究则将由可以堵塞一切谬论邪说的特殊的学者阶层去进行。

由于后一体系的发展，这种影响在它达到目的以后，就必然不再发生作用，从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益处，因为旧体系已经变得再无足够的力量充当社会的基础，而新体系已经发展到只要一推动便能跃居社会机构之首的地步。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曾经保护幼年时期的新体系，对抗壮年时期的旧体系。可是，当儿童成年，而成年人变成老头之后，一切干涉都是有害无益的，新人应该和老人直接商谈。

实际上，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插入新旧体系之间，是造成今天政治观念极端混乱的主要原因，而妨碍我们开始实行实业体系的，也正是这个原因。但是，如果避开这个中间人，使两个对立体系之间的关系变成直接关系，这种混乱就会象要魔术一般立即消失。人们将互相解释，互相谅解；人们不再相信社会能无活动目的而存在；人们自会承认，既然昔日的军事目的不能再存在于今天，那就应该毫不迟延地为实业目的而组织起来。封建阶级和神学阶级将会感到，他们没有任何方法能同实业家和学者抗衡，以阻止新体系的确立。实业家和学者也将会感觉到，他们应该帮助旧阶级登上新的政治舞台，以补偿这些人因失去旧政治舞台而受到的损失。

我在这里也许对方才叙述的事实说得过多了。但是，这个事实对阐述政治观念十分重要，所以我并不以多讲了几句为憾。我希望这样多讲几句能使读者容易理解我的著作，从而使读者看出，我的观点同一般公认的观点显然不同，因为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尽量确切地（用其他一切方式都办不到这一点）指出实业体系的真实性质，使读者感觉到，实业体系同泛泛的自由体系迥然不

同，而人们却往往把这两种体系混淆起来。一句话，我要把以一般历史事实的连贯数列为基础的科学政治学，同那种以多少有点模糊不清和多少有点空洞无物而只有神学色彩的抽象假定为基础的形而上学政治学截然分开。

在上述的一切里，我只从主要学说应该更换的观点出发，考察了社会目前应该进行的伟大道德运动。然而还有一个观点，我不能不在这篇序言里略加说明。

观念和情感必然互相联系，彼此适应。观念方面的一切巨大运动，都将在情感方面引起类似的运动。从这一点来说，博爱是一切哲学的不可或缺的共同点和助手。为了引起以改革一般观念为目的的伟大哲学运动，就必需在所有可以感受高尚情操的人们中间大力培养博爱精神。旧的一般学说的衰落，使利己主义蓬勃发展起来，日甚一日地成为建立新学说的主要障碍。因此，为了攻击和粉碎利己主义，就得使博爱发挥作用。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哲学工作，甚至应当超过哲学工作。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应该在拙著的第一片断，就向博爱者呼吁，即向一切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呼吁，而不问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也不管他们属于旧体系还是属于新体系，或者是属于过渡的体系。我将以《致博爱者书》来结束本书。

这部书收载了从 1820 年 6 月到 1821 年 1 月间致各界人士的书信。

这些通信的目的，在于以逐级上升的步伐达到最高的观点，再从这个最高观点于结束本通信的《致博爱者书》中俯瞰一切事物。

二、导论

两个敌对的党派为了独占现有的权力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每一方都根据不同理由认为权力是自己的天赋财产；而政府则竭力自保，不被这一党或那一党所陷害，但认为自己应当满足这两个党的贪欲，把执政的好处比较平均地分给两个争权夺利的阶级；最后，深受双重压迫之苦的各种实业家，即农场主、工厂主和商人们，都衷心地希望自己不再成为各种阴谋诡计的牺牲品，但是，他们既没有任何明确的认识，又没有任何提高认识的决心，所以仍然处于消极状态，袖手旁观双方的斗争，天真地坐待那批依靠和急于依靠阴谋诡计和挥霍浪费为生的人大发善心，使他们摆脱这种处境——这就是摆在一切公正不偏和有教养的观察者面前的现代政治生活的全景，这就是革命迄今造成的悲惨结果。在革命之初曾明确宣布，要建立经济的和自由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直接的和唯一的目的，是为勤劳的生产阶级谋求最大福利。在我们目前的文明条件下，生产阶级组成了真正的社会。

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的革命离开了它的最初目的，把社会带到并停留在目前所处的悲惨的境地呢？有什么办法可以使社会摆脱这种处境，建立巩固的秩序和长远的繁荣呢？这是两个互有密切联系的一般性问题。我现在就来对这个问题作一个初步的解释。

我主要希望读者注意的本书宗旨，是使王权的利益同实业家的利益接近，或者往好一点来说，是使双方的利益一致。我将到处

宣传这一点。把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的想法，是我在著作本书时始终支配着我的头脑的主导思想。如果我能使实业家也象王权的真正朋友一样，把注意力认真地集中到这一基点上，那就算达到了我的最重要目的。

为使有关的双方能够了解这种接近的全部重要意义，我要努力向他们分别指出：(1)革命离开原来的目的，主要由于王权和公社所犯的错误，即因王权在召开三级会议之后不久，就使自己同公社分离了，而公社则使自己走上敌视王权的道路，没有使双方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而这种联合对于双方的好处，已经受过几个世纪的考验；(2)因此，在目前条件下，无论是王权还是公社，当务之急是立即恢复这种明智的联合。

我曾向王权指出：既然革命的真正目的至今还没有达到，而且因为这一目的是早已提出的，所以只要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障碍还没有清除，革命的目的就仍然存在，并要保持它的全部力量和整个规模。这是因为：政治组织的各种现实需要也和个人的需要一样，只要没有得到满足，便将继续存在，而且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越久，它就表现得越强烈。由此可见，革命远远还没有完成，只有完全实现事物的进程为革命规定的目的，即建立起新的政治制度以后，革命才算完成。

任何人力都不能使这种自然运动倒退，或者使它半途而废。出来领导这一运动，这对于王权可能最有好处。

我在以下探讨王权的本身的和直接的利益时将要证明：王权急于自保的绝对必要性，将促使王权立即决定尽快地和全面地同实业家联合起来，只有实业家才能真正地保卫王权不受拿破仑封

建制度的侵犯。我要指出，不相信实业家对于以王朝为代表的王权的忠诚的施政偏见，这是毫无根据的。从实业家的地位来说，他们本质上是拥护秩序的，在政治方面，除了希望建立经济的和有利于实业的管理制度以外，他们别无他求，所以只要王权明确地表示愿意同他们结成同盟，让两个至今依靠他们生活的不劳而食的阶级自食其力，实业家就不会产生那怕是小小一点改朝换代的念头。这样做了之后，实业家就会表态，使野心家无法实现他们企图推翻现王朝并把他们的傀儡拥上王位的一切阴谋。

另一方面，在我向实业家呼吁时，将对他们指出，他们参加政治活动和直接处理自己的公共利益的时机已经来临，用不着多花时间在内部磋商，但要请教研究实验科学的学者，把他们看成是自己人和同一团体中的人；我要向他们证明，他们从革命开始以来所遭到的一切灾难的第一个共同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亲自参与政治，而总是委托法学家来保护他们的社会利益。我要设法使他们相信，不依靠自己而希望仰仗他人来建立旨在为农业、实业和商业造福的节约的经济制度，那是十分愚蠢的，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有建设这种制度的真心和能力。我也要使他们相信，目前他们的被动无为，是应当立即克服的唯一的真正障碍，因为他们的力量，在一切方面和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决定性作用。

总结以上的材料，我得出了下述结论：如果王权了解到自己的最重要利益，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吸引实业家参加政治活动，那么，实业家就会毫不犹豫地、信心百倍地走上为他们指出的道路。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权的利益也要象实业家本身的利益一样，迫使实业家自己把这方面的主动权操在他们手里。不论是在

前一场合，还是在后一场合，实业家的第一个政治行动，都应当是郑重地和坚决地声明，他们毫无条件地希望王权保持在波旁王朝的手里。这项声明可以粉碎野心家取得胜利的一切希望，它对于挫败他们的可耻阴谋是很必要的。我要向实业家指出，波拿巴分子设法叫你们相信波旁王朝打算延续自己的非法政权，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的成见，因为波旁王朝自然希望天下太平，政权安然无恙（实业家的保护完全可以保证王朝做到这一点），而不想把政权扩大到超过社会的目前需要。

本书对实业家和王权所作的一般结论是：这两种力量联合起来有莫大的好处，但这种联合既不宜过于仓促，又不宜过于密切。

但是，只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人们经常向政府和人民提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虽然十分正确，可是没有任何实际用场，因为它们不够明确，没有指出可以立即采取的实施办法。因此，我认为应当提出立即可行的行政措施，以使拙著更加完整。这项措施的目的是：着手建立实业家和王权之间的联盟，建立和组成新的政治体系。一方面，这些措施如被王权决定采纳，可以立即由王权实施；另一方面，我要向实业家证明，即使王权还相当糊涂，不能理解这些措施的实际用处，他们也有简单合法的手段来立即敦促王权采纳这些措施。

从这个概述可以看出，我的这部著作是由三个论断构成的。首先，我断定实业家和王权必须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其次，我论述了使这一联盟开始行动的措施；最后，我指明这些措施能够轻而易举地直接付诸实现。

三、上国王书

陛下：

多年以来，特别是现在，君主们的忧虑集中在社会机构的状况上面。

在法国，如同在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一切有远见的人士，都忐忑不安地注视着社会所陷入的危机；一切头脑清醒的人士，不管他们对这种危机的性质和防止方法有什么看法，都承认目前的政治状况绝对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人人都宣称，最后必须建立稳定的秩序。现在，各族人民和各国君主都出之于自身的利害关系，深切地感到有此需要。

既然灾祸的存在已被充分证实，并为大家所公认，那就只有一条出路：寻求消灭灾祸的手段。可惜，政治家和政论家至今为此所做的种种努力，并没有使这一问题的解决得到任何显著的进展。这是十分清楚的，因为尽管出版了许多理论著作，作过了一系列的实际尝试，可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还差不多都同样对现状感到不满，都同样为自己的未来担扰，都同样不知道应当往何处去。

由此必然得出如下的结论：政治家和政论家们恢复社会秩序安定的探索工作，至今方向都是不对头的。

如果溯本求源，研究他们的方向错在哪里，就会发现这几乎完全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判断的基础放在纯形而上学的原则上，放在对社会现状的表面分析上，而没有放在对文明发展进程所作的一系列广泛的历史观察上。这种情况，不难用下面一些只需扼要指

出的论点来加以证明。

用政府最能理解的观点去考察重大的政治问题，问题就会归结为:什么样的秩序目前最能使社会稳定。

然而，唯一稳定的和持久的国家制度，显然是以世俗力量和精神力量为基础的制度。这两种力量，目前已经发生极大的影响，并且由于事物的自然进程，它们都表现出希望日益取得优势的倾向。如果确是如此，那么毫无疑问，只有考察过去，才能有办法正确无误地发现这是一些什么力量，尽量精确地判断出它们的倾向和它们的优势程度。由此可见，为了指导政治家制定他们的一般行动计划，应当把研究文明发展的进程当作是政治判断的基础。这是因为即使最有才干的政治家，也从来没有采用过这种方法，他们只是分析了社会的现状，而未研究以前的社会状况，以致他们的政策至今都缺乏可靠的基础。

对现状进行这种孤立的分析，不管分析得怎样巧妙，都只能得出极其肤浅的或甚至完全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种分析，总是喜欢把两种因素混淆起来，或者把甲当作乙，把乙当作甲。这两种因素在现实的政治机构里经常同时并存，但是把它们区别开来，又是十分重要的。这两种因素是: 正在消逝的过去的残余和正在成长的未来的萌芽。

为了搞清政治观点，把两种因素划分开来，对于哪一个时代都是有用的，尤其是在我们正处在人类最伟大革命的今天，这种划分更是重要的。

如果不以深入研究过去为向导，怎么能够把行将灭亡的制度的社会因素同即将建立的制度的社会因素区分开来呢?

如果没有这种细微的划分，人有什么洞察力能够避免一些常把虚有其表和具有所谓形而上学本质的力量，误认为占有实际优势的力量呢?

因此，要想洞察现代社会危机的真相，找到克服这一危机的可靠手段，各国政府就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判断的基础，放在对文明的发展进程所作的一系列历史观察的一般结论上。

此外，还必须注意：这种观察只有上溯到很久以前，并涉及到整个社会制度及其最重要的因素，才能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和益处。如果观察的时代过近，或者观察的视野过窄，都将导致新的错误。这方面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

我认为，现代社会的形成时期即中世纪，是观察的最恰当的出发点。对这个时期以前的过去进行哲学考察，可使我们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一般事实，这个事实足以把政府的目前政策置于真实的和非常广泛的基础之上。

我在这封敢于呈给陛下的上书里，只打算简述一下这一事实及其主要后果。

陛下，基督教在欧洲传布和西罗马帝国被北方民族征服，奠定了现在社会的基础。在法国，现代社会开始于五世纪，然而，只是到了十一世纪，由于封建制度在全欧普遍确立，由于精神权力在希尔德布兰德①教皇及其最初几个后继人时代最终形成，它才全部建成。

① 希尔德布兰德 (Hildebrand)即格雷哥雷七世(Gregorius VII)，1073—1085年罗马教皇。他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措施，比如禁止买卖宗教职位，规定神职人员不得结婚，实行严格的教会纪律，等等，从而大大加强了天主教的地位，使它具有全世界性的神权政治的意义。——译者注

在这种旧秩序下，整个世俗社会都操在军人之手。一切财产，不管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也完全属于他们。甚至劳动者个人和他们全体都成了军人的奴隶。

僧侣阶级也是如此，它同军人平分封建制度的世俗特权以后，就不仅独占了整个社会的而且也独占了社会各个部分的精神领导权。社会的公共教育和私人教育，都完全由僧侣阶级领导；此外，他们的学说和决定还指导着年龄不同和生活状况各异的一切人的思想和行为。

这种政治制度没有依靠当初建立它的那种力量，就维持了几个世纪，因为它与当时的文明状况完全适应。那时，实业还处于幼稚状态，战争成了人们的主要工作，既把它作为发财致富的手段，又把它看成是保护财产免受经常威胁的手段。由于这两种情况，军人自然有权有势，受人尊敬，而实业家自然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另一方面，实证科学还不存在，僧侣阶级是唯一有些知识的等级，从而必然取得控制人们思想的全权，主宰人们的信仰，结果在社会上占据了与他们的高级职务相适应的地位。

文明的自然进程，引起了两个主要的事件，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还伴随着与这个发展多少有些密切联系的大批次要事件。这两个主要事件不可遏止地逐步破坏了这种政治制度，因为它们从上到下逐步改变了与它们相适应的社会状况。这两个事件，就是公社的解放和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的实证科学的发展。

原先处于奴隶地位的实业家，由于顽强劳动、坚忍不拔、省吃俭用和创造发明 终于使他们的主人允许他们积蓄的一小点财产增加起来。最后，军人为了更便于自己享受实业家创造的新产品，

也同意实业家自由支配自己的人身和劳动产品。

这一解放为实业界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所以从这个时候起，实业界就不断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需要和享乐的范围由此逐渐扩大，于是产生如下的结果：实业家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创造出了大量的新财富，而贵族则不断向他们出卖自己的动产和不动产，而且出售的数量越来越多。

这两个奔向同一目标的常在因素所起的作用虽然缓慢，但继续不断，结果引起了所有制的变革，使包括农场主在内的实业家现在拥有了最大数量的财富。

这次变革又在社会的总发展进程中引起了另一次变革。

随着社会依靠实业而不断丰裕，战争便开始失去它的进攻的重要意义。

由于西欧各国都发生了这种革命，防御性战争也日益失去它的重要意义。

因此，军人的职业目前在社会上只能起着极其次要的作用。

火药的发明有力地促进了这一自然结果，使军事教育不再成为一种专门的教育，使军事力量从本质上依赖于工业了。因此，现在只有最富裕的和最有教养的民族才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

实业的这种逐步发展和封建制度的相应衰落，在公民的生活中同时引起了实业阶级的政治影响的不断增强和封建阶级的日益衰微。

陛下，先王们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大大地促进了事物的自然进程。正因为这两个因素经常共同发生作用，贵族的政治力量丧失殆尽，而他们在公民生活中的作用也同时下降。

如果现在从精神方面去仔细考察一下社会，我们就会看到社会在这方面也完全改变了。

当欧洲通过阿拉伯人引进实验科学的时候，僧侣阶级首先开始研究它，但是不久以后，就把它完全放弃了。于是，实验科学落到另一个特殊阶级的手里，这个阶级从此成为社会的一个新因素。

由于科学从此以后得到巨大的成就，僧侣阶级的知识优势便完全消失了，而这种优势曾经是精神权力的真正支柱。在教育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逐渐摆脱了神学观念的全面束缚。最后，从承认每个人有权批判这种观念，有权按照自己的观点接受或拒绝这种观念的时候起，这种观念的政治影响，甚至它的道德影响，都被连根铲除了。

随着僧侣阶级的观点丧失统治力量，学者的观点便开始在他们的专业方面建立了威信，甚至在学者的观点同僧侣阶级的观点公然抵触的时候，学者的观点仍未失去其威信。

现在，只有科学的论断能使人人信服，而神学的武断只能在社会最愚昧无知的阶级中有其实际的影响，然而就是在这些阶级当中，神学武断的影响也是相当微弱的，绝对赶不上学者的观点在这里发生的影响。

这个事实可能值得惋惜，但又必须完全承认，而且绝对不能忽视，因为忽视了它，就会使我们找不到消除社会的混乱状况的手段。

上述的一切，是对七、八百年来的最重要政治事实所作的最一般观察的概述。这个概述本身也可以用一般事实的概括精确地总结于下：

“社会上的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都已易手。真正的世俗权力

现在集中在实业家手里，而精神权力则集中在学者手里。此外，这两个阶级也是唯一能对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实在和经常的影响的阶级。”

这个基本变革，也是法国革命的真正原因。这一巨大的危机完全不是来自这个或那个孤立的事实，而不管这个事实具有什么实在的作用。政治制度变革的唯一原因，就是旧政治制度所适应的社会状况完全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六百多年来逐渐完成的市民革命和道德革命，产生了政治革命，并使这一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再没有比这种情况更符合事物的本性了。如果一定要想说明法国革命的起因，那就应当把这一革命的开始时期追溯到公社开始解放和实证科学在西欧开始发展的那个时刻。

在根据上述的概括制定我认为各国政府现在应当采纳的行动计划以前，必须回顾一下法国革命至今经过的道路及其主要结果。虽然社会的基本形势仍然同方才我所说的情形大致一样，虽然社会还只按照原来的方向向前发展，但是所发生的事件却给它带来了一些纯粹偶然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促使事件的真正性质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了。

既然法国革命的根本原因是世俗力量和精神力量对比的变化，那末，以应有的方式来指导革命的唯一手段，毫无疑问就是吸引取得最优势的力量直接参加政治活动；而在今天来说，这个手段仍然是唯一能够完成革命的办法。因此，应当号召实业家和学者去建立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政治制度。陛下，您的大名鼎鼎的不幸的兄长①赋予第三等级在三级会议中以双倍代表权的时候，显

① 这里指的是路易十六，他被法国大革命推翻，1793年被处死刑。——译者注

然是理解到了这一点的。

可见,革命在开始的时候是很好的。但是,它为什么几乎是立即就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呢? 说明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为此必须回顾过去。

按人的本性来说，人是不能不经过中间阶段而从一种学说过渡到另一种学说的。在应用于人类在文明的自然进程中必须经过的各种政治制度的时候,这条规律起着更加严格的作用。因此,既需要在实业中创造代替军人权力的新世俗权力的各项因素，又需要在实证科学方面创造继承神学权力的新精神权力的各项因素。这种需要应当发展中间的、具有承先启后作用的过渡性的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并使它们发挥作用。(在社会形势的这种变革开始叫人强烈地感到以前)这种中间性权力的唯一作用,就是使一个社会制度容易向另一个社会制度过渡。

为了从军事原则向实业原则过渡，就必须创造中间性原则。这一原则承认军事原则居首，但要使它的作用服从于为了实业家的利益而规定的各种限制和规则。

同样地，为了从以神启为基础的神学权力向以论证为基础的科学权力过渡，也必须建立一种中间性权力。这种权力允许某些主要宗教信仰占居优势，但也承认研究各种次要问题的权利。即使历史未使我们认识这两个一般事实,我们只要深思一下,就可以想出它们。

实际上,历史将向我们证明，这两个中间阶级,在世俗权力方面就是法学家,在精神权力方面就是形而上学家。

法学家原来只是军人等级的代理人 ,后来很快形成为独立的

阶级。这个阶级创立了法学以后，便改变了封建制度的作用。所谓法学，不外是反对采取暴力的防范体系。

和这种情况一样，形而上学家① 是从神学内部成长起来的，他们一直把自己的论断建立在宗教之上。但在他们确立了可以研究信仰和道德方面的问题的权力以后，便改变了神学的作用。

他们的活动主要开始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而以上一世纪宣布信仰无限自由而告结束。

由于事物的这一必然趋势，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便在最近二、三百年间几乎独霸了政治舞台，而公社则逐渐习惯于把他们看成是公社的一般利益的天然保卫者。

因为他们确实出色地完成了文明的自然进程为他们规定的任务，公社便把一些相对正确的东西看成了绝对正确的东西，并在1789年参加三级会议的时候，认为最好委托他们来保卫实业界的利益。

公社由于自己的政治无知而铸成的这个重大错误，就是革命一开始便走上错误方向的主要原因。

公社应当了解过渡时期已经结束，或者至少已前进得相当远了，所以法学和形而上学家的作用也已结束，或至少对他们的主要作用可以这样说。

公社应当了解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建立新的政治制度，而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一切工作只限于梦想改革，所以他们已经不

---

① 在英国和德国，精神权力方面的改革，显然也是由他们实行的。

在法国，主要是文人起了这种作用。但是，因为一切文人的原则本质上都是形而上学的，所以我认为也应当把他们称为形而上学家，而不叫做文人——虽然文人这个名称比较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

能正确地领导这场革命了。公社应当想到，只有精明强干的学者和实业家才能完成这项任务。总而言之，公社应当从这些人当中选拔自己的顾问。

由此可见，负有建立新政治制度的使命的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只能按照他们走惯了的老路继续前进，完全忙于替被统治者建立广泛的保障制度，为统治者规定各种限制，而不知道他们想要抵制的力量几乎已经完全消失。

当他们表示愿意继续前进的时候，他们又钻进了牛角尖，只研究如何建立他们认为最好的政府的问题，结果又犯了老毛病，把这个问题当作法律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来解决。这是因为作为他们的一般政治活动的基础的人权理论，实际上不外是把最高的形而上学应用于最高的法学。

在这里用不着回顾这个方法产生的荒诞观念和它的可悲的实际后果。尽管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虚伪方法的这些后果有很大危害性，但指责他们的这种错误并不是哲学的任务，因为这完全是他们固有的行为方式，而这种方式的根本缺点，完全不适于解决为这些人提出的任务。

可见，一切错误归根到底在于公社的行为，公社从完全不应当依靠的阶级中选出了一些人物作为自己的代表。如果实业家响应王权的善意的号召，从自己人中间为自己挑选一些领导人，那末，我们就有可能避免我们革命中的一切深重灾难。

遵循简单的常识，胜于追随虚伪的理论。如果公社亲自研究过自己的利益，它就不会被形而上学家的关于人权的论断所迷惑，而只会按照自己的政治经验办事。当时，如果公社也象原先赎买

自由那样，就会把一直为军人等级享有的和使公社受害的那部分政治权力从军人等级那里赎买过来。这样，消灭封建制度就不会采取暴力，而是依靠友好的协定了；革命从一开始起也就具有和平改革的性质了。

此外，革命也会很快结束，因为公社清楚地知道什么东西符合它的利益以后，只要遵循实证思想，就可以直接走上新政治制度的道路。然后，随着人们的思想渐渐明确，新的政治制度也会逐渐通过正常的方法建立起来。

陛下，我所以认为必须作以上的叙述，这完全不是为了对过去表示徒然的感叹，而是为了指出实业家在革命初期所犯的错误。这一错误曾使革命走上了不正确的方向，而且直至目前，它仍是建立符合王权和公社利益的稳定秩序的主要障碍。

我深信，陛下对自己的王朝所能作的重大的贡献，莫过于运用自己的影响去克服实业家的政治惰性，并消除他们一心去找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来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的顽固性。此外，这种观点所根据的观察，对于公社来说是真实的，而基于同样的原因，对于王权来说也是恰当的。

既然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不能代表公社的共同利益，那么根据同样的原因，他们也不能充当王权的顾问。

在说明了革命所采取的方针以后，我要谈一谈革命迄至复辟所造成的主要后果。

在目前的观察中，首先必须注意的是：在世俗权力方面，消灭了封建特权，拍卖了贵族和教会的地产，出现了新的封建制度；而在精神权力方面，则胜利地建立起信仰自由的原则。

陛下钦颁的宪章①，后来叙述了这些结果。

出售贵族和教会的地产，是一种违反事物的自然进程的暴力行为；而建立新的封建制度，则是革命一开始就采取的错误方针的结果。至于消灭旧的封建制度，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则完全没有偶然的性质。这是社会从公社得到解放和阿拉伯人向欧洲输入实证科学以后开始的一连几个世纪的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只能把这些结果看成是旧社会制度至今渐渐衰落的自然结局。

常有人说，任何性质的巨大工程的竣工，往往完全归功于最后插手这项工程的人——虽然这个人对于这项工程的成功实质上只起了很小的作用。有些认识肤浅的人，也完全根据这个理由，把推翻旧社会制度的功劳归于法国革命。但是，只要稍微深思一下，就可以避免这个十分明显的错误，可惜这种错误竟然成了革命拥护者及其诽谤者的许多不正确论断的泉源。什么奇迹转瞬之间就把一座经过六百多年的辛勤劳动造成的、而且应当承认已经安然无恙地存在了七、八百年的建筑物摧毁呢？只要这样自问一下就够了。

制宪会议废除的封建制度，不过是贵族当时还保有的政治权力的残余。这种残余是一些已经几乎毫无作用的然而对公社颇多危害的权利。从胖子路易六世到路易十一期间，接着又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四期间②，封建制度就已经实际瓦解。同封建制度在这个期间的损失比较起来，革命使封建制度受到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

① 参看第192页注。——译者注

② 法国国王胖子路易六世（1108—1137年在位）、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和路易十四（1661—1715年在位），对加强王权同封建诸侯的斗争，扩大国王的统治范围，建立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巩固王权和在法国建立专制制度，等等，曾经起过很大作用。他们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城市和工商业阶级。——译者注

如果把这种想法用于精神权力方面，更能清楚地说明问题。宣布可以从根本上摧毁一切神学权力的信仰自由原则，不过是革命以前长期形成的理性状况的庄严表态。理性的这种状况本身，是文明进程的直接结果，这一进程开始于欧洲发展实证科学的期间，特别是开始于发明印刷术和十六世纪实行宗教改革的时期。当时文明的进程已使消灭神学权力成为不可避免的事，犹如在希尔德布兰德教皇时期，由于当时的社会在四、五百年中所处的道德状况，必须建立这种权力一样。

由此可见，革命本身的业绩，并不象一般想象的那样重要。这个时代只是旧社会制度衰落过程的结束时期，即是已经进行了五、六百年而到这个时期就要完成的过程的结束时期。推翻这个制度既不是革命的结果，更不是革命的目的；恰恰相反，这倒是革命的真正原因。革命的真正目的，即文明的进程为革命规定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新政治制度。正因为这个目的还没有达到，所以革命也还没有完成。

目前法国以及西欧其他国家所陷入的道德和政治混乱，完全起因于旧社会制度已被破坏，而新社会制度尚未建成。只有开始建立新社会制度并使其全面发生作用，才能制止这一危机，恢复秩序的稳定。上述的一切，就是我们深刻观察从公社解放和阿拉伯人向欧洲输入实证科学开始直到现在为止的文明的不断发展进程所看到的明显的图景。

在陛下① 驾返以前，国内局势就是这样；从圣上归国以后，情

① 圣西门的这份上书就是呈给路易十八的。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时，路易十八由国外回到法国，随后颁布了他的宪法。——译者注

况也还没有发生变化。社会上存在两种性质完全对立的力量。一个是衰老的、无力的、不能作为支持点的、无法长期自存的力量。这也就是与僧侣阶级合谋的旧封建制度的力量和新封建制度的力量①。反之，另一种力量却是强大的、有力的、真正能在世俗权力方面和精神权力方面进行建设的力量。它一方面存在于实业家当中，另一方面存在于学者和艺术家当中。

因此，陛下的群臣应当制定的政治行动计划，是不言而喻的。这项计划就是让随着事物的进程而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的阶级自食其力，同时补偿他们的个人损失，使已经占据优势的力量活跃起来。

可是，群臣没有这样做，而是做了一些什么呢？他们把两类贵族都看成了王权首先应当依赖的阶级，只关心在王权的保护下维持两类贵族之间的均势，使其中的任何一类贵族既不能够承认自己被排斥，又不能认为自己受宠爱②。

---

① 我坚信新封建制度的力量是腐朽的力量，虽然它出现的时间还不久。

显而易见，在目前的文明状况下，建立新封建制度是完全违反事物的自然进程的，它也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波拿巴仿效克洛维斯一世* 在十九世纪于世俗权力方面恢复军事封建体系的努力，同尤利安努斯**皇帝当基督教的传播正处于全盛时期在精神权力方面恢复异教的努力一样，都不会获得成功。

一切违反自然的创造物，它的存在只能是转瞬即逝。这就是我们的蛊惑家们在法国鼓吹的罗马共和政体的命运，这也将是在革命当中偶然产生的拿破仑封建制度的命运。如果王权不去支持这种封建制度，而把同公社建立直接和密切的联系看作是自己的巩固的支柱，那么这种封建制就会自然消灭。

② 对于王权和公社来说，这个受过有关双方合理而激烈的批判的均势政策，当然要比只同其中任何一部分保持特殊的和无条件的联系好一些。既然已经采取了有背于公社利益的支持王权的无益计划，那么这个制度也就成了在若干时期内支持王权的唯一的手段。

* 克洛维斯一世(Clovis I)法兰克国王（481—511 年在位），法兰克王国的奠基人，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关系是在他统治时期形成的。——译者注

** 尤利安努斯(Julianus)，罗马帝国皇帝（361—363 年在位），曾企图恢复古代多神论，以此来反对基督教。——译者注

这项计划完全没有用处，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它依靠了已经丧失任何实际意义的力量去支持王权，而这种力量本身还要仰仗王权来支持它的不可靠的存在，所以它们是王权的真正负担，而决不是王权的支柱；第二，这项计划责成公社去支持新旧封建制度，这必然要建立起一个负担非常沉重、开支不断增加、从而日益促使公社对王权反感的管理制度。

因此，这项行动计划使王权真正的朋友失去了势力和金钱，而把它们送给了王权的真正敌人。

任何错误总要有它的原因，但最常见的情况是：不是来自心术不端或愚蠢无能，而是来自对于应当作为判断基础的事实缺乏理解，或者对于这种事实的选择不当。我不揣冒昧，敢于认为陛下的群臣所以采取了如此恶劣的制度，是出于这种原因。

我认为，有四个事实上的错误使他们产生了理论上的谬见。

第一，我毫不怀疑，群臣确实认为两个贵族集团是国家的最重要阶级，觉得他们的政治力量很大。尽管这种想法的论据多么欠缺，但是再没有比它更自然的想法了。只要深入研究一下五、六百年来的文明进程，就可以避免产生这种政治错觉。然而直到如今，只有极少数的政治家和政论家理解到这种研究的必要性。如果不进行这种研究，怎么能不对社会的真实情况产生错误的看法呢？凡是能够掩盖社会真实情况的东西，现在都被收集起来了。一方面，两个贵族集团及其代理人形成了两个有组织的党派，活动非常积极，其中最活跃的人物是两党各自雇佣的主要代理人，他们差不多都是法学家，即差不多都是目前评论政务和谈论国事的人。因此，这两个党怎么能够不给人以庞然大物的感觉呢？

另一方面，无论是实业家，或者甚至是学者，都还没有在政治方面组织起来。他们对于自己的共同利益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积极性。他们完全不关心这个问题，只是在被压迫得太沉重的时候才呻吟诉苦；他们不去寻找不幸的根源，以求挽救的良药；他们没有能言善辩的有名律师；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为数甚少，而且不能单独形成一个党团。由于产生上述谬见的这两个总原因，要想毫无错误地评价两个封建主集团的实力与公社的实力的对比，简直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养成习惯把政治判断建立在对公社解放以来的文明进程的一系列历史事实上面，就必然会产生错误。

第二，陛下的群臣毫无疑问地会认为，僧侣阶级的力量是最强大的支柱。这仍然是一种错觉，而指出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也是非常容易的。

至今的一切道德观念，都是以僧侣阶级的学说为根据的。学者还没有树立起实证的道德体系，甚至还没有建立这种体系。这种体系不排斥高尚宗教信仰的有力和有益的协助，但它是独立于宗教的体系之外的。上一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们如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出于对事物状态这种隐隐约约的认识，曾严厉地谴责过一些浅薄的哲学家，指出他们侮辱和嘲笑作为一切道德基础的宗教观念，是一种轻率鲁莽的态度。

对待事物的这种明智态度，目前已先后在学者和实业家中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为经验越来越迫使人们感到需要道德观念，从而也感到了特别需要支持这种观念的基础。

现在的这一代人，已经在我们的书刊和社会中铲除了上一代

人感到洋洋自得的那种对待宗教信仰的无礼可笑的语调。这种语调现在几乎到处受谴责，甚至在我们那些悠闲自在的沙龙里也受到谴责，认为那种语调是一种不良的嗜好。代之而兴的，是普遍尊敬宗教观念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基础是承认目前需要宗教观念。如果没有十分仔细地观察和一点也不了解阿拉伯人向欧洲输入实证科学以来人类理性的发展进程，那就很容易把这种情感误认为真诚信仰，或至少误认为企图恢复信仰的昔日力量的倾向。但是，在理解这一发展进程的那些人看来，尽管有我上面提到的事实，僧侣阶级的学说也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力量，再也不能成为王权的支柱，再也不能成为道德的基础了，因为学者还没有把道德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

事物的这种最后状况一定很快就会结束。当这种状况不复存在的时候，僧侣阶级目前仍然发生的影响就将永远消失。

第三，陛下的群臣大概认为旧贵族非常忠诚于王权；而由于国王的恩泽，新的贵族也将会很快地无限忠诚于王权。

毫无疑问，对两类贵族当中的许多品质高尚的人士持这样的态度是没有错误的；这些人一方面值得尊重，另一方面值得感谢，这便使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来指导个人的利益。但是，对广大的贵族不能作出这样的判断。过去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一般说来，旧贵族一般志在恢复昔日的特权和财富，如果可能，甚至还要恢复那种国王在当中只是Primus infer pares① 的制度。这类贵族把国王的庇护看成是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他们的忠诚和俯首听命也服从于这一目的。尽管这个打算荒谬已极，但它并未因此而不存在。

① 拉丁文，“群中之首”的意思。——译者注

至于波拿巴的贵族，他们一般都把国王的恩赐看作是国王的义务；他们非常敌视旧贵族的竞争；他们把官职看成是自己的自然而合法的财产；他们觉得，只有把他们中意的人扶上王位的时候，自己的爵位和财富才能够有所保障。现在，所有明白事理和公正不偏的观察家都已十分确信这一点，只是还没有把这种情况声张出去罢了。

第四，群臣也许害怕公社一般对王权不太忠诚，特别是对波旁王室如此。这种顾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实业家和学者深信，为了维持和平和保持秩序，是需要王权特别是需要波旁王朝手中的王权的。从实业家和学者的社会地位来说，他们也最关心这一点。他们敬爱波旁王朝。他们怀念波旁王朝从公社解放以来对于公社所作的一切贡献，同时希望和相信波旁王朝不会放弃这项工作。他们害怕波拿巴及其党羽的专制，吃够了这种专制的各种苦头；当他们看到权力落到新人手里的时候，他们感到专制制度返老还童了，不但没有失去原有的力量，而且取得了新的力量。总而言之，他们是陛下宝座的天然支柱。

陛下，从以上的陈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圣上的群臣从复辟以来实行的政治计划，不但本身毫无用处，而且没有任何有根据的理由使人去采纳它。群臣必须放弃这一计划，而只能从下述道路中选择一条：不是同两类贵族当中的一类贵族结成密切的联盟而牺牲另一类贵族，就是同公社真诚地联合起来而抛弃两类贵族。

陛下，我认为我已经向您证明，在这两类贵族中，没有一个能够成为圣上的宝座的支柱。其次，我认为也同样是一件无庸争辩的事，就是公社已明确表示出要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以结束革命的

愿望。这种政治制度的基础是实业和实证科学，前者是新的世俗因素，后者是新的精神因素。我要说，这种愿望将必然排除一切障碍和战胜一切党派的抵抗而最终实现。因为这是最近六百年来文明进步的最终结果，甚至还可以说是从文明开始以来的整个进步的最终结果。

由此可见，为了采取长期的行动计划，就必须下定决心，而不要在我指出的两条道路之间有一分钟的犹豫。第一条道路只能取得转瞬即逝的成就，寿命太短；而为了使陛下的宝座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之上，正如不难证实的那样，只有走一条非常简单而且十分可靠的捷径，这就是真诚地同公社结成同盟。

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我们提出的每项假设可能产生的后果就够了。

如果群臣专靠一类贵族，并为了满足他们的贪心而牺牲公社的利益，恐怕就要发生下述的情况：

假如只依靠旧贵族，失宠的新贵族就要设法公开地和全力以赴地推翻陛下的宝座，而且他们可能达到这一目的，因为唯一能够妨碍他们达到目的的公社，在这个假设中只能有气无力地反对他们；

反之，群臣假如把新贵族当作唯一的支柱，那么新贵族很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更加信心百倍地去反对陛下的至高无上的王朝。

毫无疑问，保持均势的制度将比这两种情况都要好一些。但是，这种制度仍有一个根本的缺点，而且我认为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如果陛下不庇护两类贵族，叫他们自消自灭，而同忠实

于您的公社结成同盟，那么您的宝座就会永世长存，因为只要公社消极抵抗，就能使这两类已经没有力量的贵族无法实现他们的任何阴谋。

当然，正如陛下已经废除许多对于公社不仅无益而且只能成为负担的大部分开支和职务，因而同意减缩各部及其所属机关的权力一样，陛下也应该同意减缩王室的费用；总而言之，王国政府要取消封建制度的最后残余，使自己具有公社的性质。由此而来的好处则是确保天下太平，将至高无上的王位世代相传下去，不必害怕野心家的任何阴谋，陛下因建立新的政治制度而可取得法国和一切文明民族的立法家和永世恩人的荣誉。我认为，这一切好处毫无疑问会绰绰有余地补偿陛下因减少权力而来的损失。权力的减少并不是一种耻辱，因为权力是相对的，或者是用暴力取得的。

其实，我们所指的并不是采取全新的方法，而指的是只恢复陛下最英明的祖先们曾经采取过的一向同公社结成联盟的办法，特别指的是忠实遵守陛下的至高无上的皇兄赋予公社在三级会议里双倍代表权的时候所规定的路线。

陛下！

请废除两类贵族，由实业家组成选举团，用奖励的办法引导学者研究主要的政治问题。毫无疑问，这就是同公社开始结成密切同盟的最好的而且具有决定作用的手段。

陛下在这方面必须要克服的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障碍，将是实业家对政治的漠不关心，过于不相信自己的文化修养和政治能力，过分信赖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但是陛下的英明果断，以及受到陛下英明果断鼓励的学者的活动，很快就会克服这种困难。使

实业家对于自己的尊严和政治价值具有正当的感情，就会立即使他们得到活动的能力，即得到他们为了完成文明的目前进程为他们规定的使命所缺乏的唯一条件。

陛下，我极其坦率而真挚地表达的希望您的至高无上的王朝永远保持住权力的思想，就是如此。

您的最忠诚的臣民谨呈

四、致博爱者书

先生们，鼓舞着你们精神的热情来自神赐。它使你们站在基督教徒的前列，它赋与你们以同邪恶的欲念以及同受这种欲念支配的国民和国王进行斗争的权利和义务。

你们的先驱开始组织了人类社会，而你们则要完成这一神圣的创举。初期的基督教徒建立了一般道德的基础，对朝野宣布了神的原则：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互爱互助。他们想出了符合于这个原则的学说，但是，这一学说在他们那里只具有思辩的性质，所以根据这个神的原理来建立世俗权力的光荣任务，就落到你们身上。你们要永远负责向各国的君主证明，他们的利益和义务要求他们给自己的臣民制定一部可以直接改善人数最多的阶级的社会状况的宪法；你们的使命是鼓励各国的这些领袖使他们的政治符合于基督教道德的基本原则。

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你们曾经把人类从退化当中拯救出来。现在，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在文明状况的不同时期所能达到的最大相同），这正是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先生们，你们应当效

法你们的先驱，你们应当发挥出与他们相同的坚毅精神。他们创立了基督教，而你们应当使它革新；你们应当使道德体系趋于完善，使世俗权力服从于道德体系。

先生们，我们要认清现代社会的状况。我们要把注意力首先放在法国身上，从研究法国的主要机构所处的状况开始，即从研究僧侣阶级、王权和司法权的状况开始。

法国的僧侣阶级是基督教僧侣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它从自己的神圣奠基人那里接受了始终不渝地维护穷人的事业和不断地改进社会这一最下等阶级的身心状况的任务。但是，它实际上已把自己的这项神圣职责忘得一干二净，以致现在它的唯一工作是向人民宣传绝对服从世间统治者的教义，不以更大的努力去大胆地提醒王公及其宫廷人员记住宗教为他们规定的对人民应负的义务。

在法国，也象在全欧洲一样，王权最初是一种野蛮的制度，也就是由赶走了罗马人的野蛮民族在法国建立起来的制度。但是，法国的国王从信奉基督教开始，特别是他们自封为“神赐国王”以后，就改变了这种制度的性质。既然他们采用了这个基督教称号，显然也就承担起不断地致力于改进自己臣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命运的义务。但是，每当王权屈服于僧侣阶级和贵族——人们的这些真正吸血鬼的时候，就把这项义务忘得一干二净。

最后，如若我们研究一下司法权，那就一定要承认：一方面，信奉基督教的法官的职责在于调节个别人之间的纠纷，而主要是保护他们不受政府的各种专横压迫；另一方面，他们目前还似乎抱着建立最专制的专横统治的目的。

我完全不想根据上述的一切，断言全体僧侣、全体大臣和全体法官都怀有不良的意图；恰恰相反，我深信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心地善良。他们虽然作了坏事，但是本来想把事情办好。我甚至深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开始明白自己应当怎样做人的时候，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先生们，你们可以看到，法国目前的政治局势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因为那些最有权力的人不去履行基督教为他们规定的使命，没有不断地和多方面地改进人民的命运，反而把自己拥有的权力用于完全有利于统治者和有损于被统治者的秩序方面。

我们还应当指出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这就是法国统治者的领导无方和国家权力的使用不当给法国人带来的政治灾难，还不是他们的唯一不幸。法国人还因波拿巴而遭受着另一种不幸，这是侵略野心带来的后果。

凡是热中于侵略的民族，心中一定燃起邪恶的欲念；他们也必然象崇拜阴谋狡猾之徒那样，极其崇拜性格残酷的人。当具有这种恶劣品质的人在别国为所欲为的时候，留在祖国的和平公民还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完全不会放弃自己的尊严和高尚品质。一旦外部的抵抗超过扩张势力的时候，就会在国内出现狡猾和残酷的后果。在这以前，贪婪是全民族的感情，公民只是集体地怀有这种感情；而到如今，贪婪已变成在每个人身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感情；利己主义这个人类的坏疽侵害着一切政治机体，并成为一切社会阶级的通病。

法国人在他们的革命初期（当时他们遭到欧洲封建制度的攻击），曾经发出只为保卫国土而战的庄严诺言；他们也曾答应把其

他民族看作兄弟，并同他们一道去反对尽管文化上有所进步的欧洲的腐朽制度。

法国人的这种政策是公正无私的，也是非常明智的；它是法国人所能采取的最有利的政策，也是真正的基督教政策。法国人应当一直奉行这种政策，但是非常遗憾，他们改变了这种政策。他们受了奸诈之徒的煽惑，认为自己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而没有想到赔款只能从人民身上得来，因为一切财富都是人民创造的。

法国人参加战争本来纯粹出于自卫，但是他们很快就把战争变成投机的目标；于是他们的这种违反基督教精神的行为，不久就引起别国人民和国王联合起来反对法国人。法国人的大部分领土曾两次被人占领，首都两度失守。最后，被围困在国境以内达六年之久的法国人，由于在侵略时期曾对本国的武夫和为波拿巴搜罗炮灰的有功文职人员表示过崇敬而自食其果，不得不忍受六年的痛苦。

先生们，法国还患有第三种政治溃疡症，病源来自偏爱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对法国人有过很大功劳。它从公社解放以来，直到1789年，曾对文明的进步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从法国和整个欧洲陷入社会危机以后，它就变成了最大的障碍，一直妨碍着和现在仍然妨碍着人们通过建立稳定的秩序，即通过建立符合于文化状况的秩序的办法来恢复社会安宁。

从公社解放到革命开始时期，形而上学搅乱了人们的思想，窒息了常识的呼声，并且创立了一种把僧侣阶级和贵族弄得眼花缭乱的拙劣的政治学说。然而，它却因此对学者和实业家帮了大忙。

形而上学家创造的含糊不清和荒诞无稽的学说，形成了一个反对贵族和僧侣阶级的掩体，实业家和学者可以安心地在这个掩体里研究实验科学。在这个掩体的帮助下，实业和实证科学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来顺利地同僧侣阶级和贵族进行较量。毫无疑问，如果形而上学家不把僧侣阶级和贵族首领的注意力引向别处，不迫使他们忘却本身的利益所应当走的道路，僧侣阶级和贵族首领就会作出如下的结论:

贵族一定这样推论:如果实业发展起来，世界就要日趋文明，战争将愈来愈少,军人的作用将逐渐下降,而和平劳动的领导者最终将要变成社会的第一个阶级。

贵族的首领们作出这种结论之后,自然会妨碍实业的繁荣,而且他们当时有充分可能和一切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

另一方面,神学家们一定警惕自己说:如果我们让一心一意要把我们的知识置于经验之上的学者联合起来，那就必然使神学失去它的全部威信,人们将要皈依纯粹宗教,并使一切国家官员在自己的行动中遵守如下的原则:“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互爱互助”。

当时还拥有权力和必要手段的僧侣阶级作出这种结论之后，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就不能进步。

我们有幸,由于形而上学家的帮助而出现了如下的局面:一方面，献身于实验科学的学者获得了比僧侣阶级丰富得多的实证知识,得到了运用神圣的道德规则的巨大能力;另一方面;实业家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了比贵族巨大得多的财富,对人民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于是,政治力量从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而要把管理国家大事的工作继续留在僧侣阶级和贵族手里，已经成了

反常的和不能允许的事情。

革命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即使形而上学家不愿意过问革命，革命也会很快达到自己的目的。形而上学家在促进危机发展的时候，对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他们打算领导社会以后，又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他们也同贵族和僧侣一样，继续执政都不符合社会的需要。

我们姑且假定下议院只由两个阶级构成：一方面是从事国家管理工作的贵族和官员；另一方面是实业家和以自己的劳动直接促进实业发展的人。再假设，把法官、律师和其他法学家都由下议院中排除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两派之间必然进行坦率而认真的争论。这种争论的题目，将是讨论国家的组织应当是为了军人、游手好闲的富翁和国家官员的利益，还是应当为了生产者的利益的问题。这种讨论的结果指日可待，而且能够成功，因为举国依靠劳动生活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赞成生产者的意见，而且为了国王的利益，也显然应当支持这种意见，并使群臣去执行这种意见。

在这种场合下，政治将变成一种简单的事情，成为一种实证科学。这就可以开始建立符合于文明状况的秩序了，可以着手制定能够长久存在的唯一宪法的第一条了。这第一条便是：

法国人的政治联合的目的，是通过和平而确实有益的劳动来繁荣国家。

这第一条的直接后果，将是最重要的和平劳动部门的领导者对管理国家大事发生最大的影响。

由此可见，只是采纳这一条，就可以结束以僧侣阶级和贵族为一方与以实业家和学者为另一方之间进行了将近三十年的斗争。

先生们，我还要向你们证明：法学家妨碍了这一斗争的结束，正是他们阻挠了宪法的这一基本条款的通过，阻滞了这一条款的效益的实现。

先生们，这个证明是以下述的公认事实为根据的。法学家在各部和议会里占居多数；他们给现有的三个政党提供领袖，领导着“极端分子”①；他们既为自由党人献策，又为政府的拥护者出谋。可见，他们操纵着现代的全部政治工作。

因此，我有根据地说，法学家这类形而上学家在政治上占优势，是法国目前所患的社会病之一。

先生们，在归纳法国人的社会状况的这个概述的时候，我们发现法国人同时患有三种显然不同的政治病：

第一，这个国家的社会组织所依据的三个主要权力，都受一些错误的学说所指导。这些学说已经不以改善社会的最下等和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命运为目的；运用这项权力的人忘记了一切政治团体都应当遵守的伟大道德原则；

第二，整个国家热中于侵略；不管是被统治者还是统治者，目前都被利己主义所支配。利己主义是企图非法地统治其他民族的野心和在军事胜利时期养成的精神习惯的必然后果。

利己主义目前在被统治者当中所占的优势不能产生充分有力的舆论以迫使统治者重新遵循基督教所嘱咐的道德路线。

第三，在讲授野蛮、无知和迷信时代制订的法律汇编的学校里

① “极端分子”（“Ultra”）是“极端保王党分子”（“Ultra-royaliste”）的简称，指拚命拥护旧制度和君主政体的人而言。这个名词在复辟时期，特别是从1814年以后十分流行。——译者注

受过教育的政治上的形而上学家，现在控制着各类各派的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即领导着他们。因此，不可能就一些十分明确的问题展开自由讨论。可见，在目前状况下，要使国王的头脑和人民的思想产生关于必须设法结束革命的明确意见，那是痴心妄想。

先生们，我们现在把视野放大一些，考察一下全欧洲的状况。

数个世纪以来，即从封建制度建立到路德的宗教改革这一段时期内，中欧和西欧的居民已经在两个方面被组织起来了。

第一，他们已经完全服从于封建制度。

第二，他们信仰一个宗教，受一个僧侣集团管辖；这个僧侣集团只服从于一个首领和一个总机关，这个机关对各国政府处于独立地位。

可见，中欧和西欧的居民一方面服从一个精神权力，另一方面又服从类似性质的世俗权力。

欧洲社会从路德实行宗教改革时期开始解体，它按照下述两个方向继续发展：

第一，封建制度首先在英国失去它的本来性质，后来在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以及德意志的几个邦里相继失去它的本来性质。

第二，基督教分裂成四派：天主教派、路德派、加尔文派和英国国教派。

欧洲社会的解体，到神圣同盟形成的时候才最后完结，因为由几个大国的世俗权力首领联合组成的排他性神圣同盟，使自己凌驾于基督教各派的首领之上。于是，精神权力完全丧失了独立性；于是，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之间实际上已经不再存有分界线；最

后，精神权力终于服从世俗权力而同意作世俗权力的代理人。

我认为，对于欧洲状况所作的这一简短的概述，足以使诸位先生相信目前的状况是反常的，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

最后，这个概述也足以使诸位相信目前的危机不只法国有，整个欧洲都有，不能够单独对法国人民进行诊断和治疗，可以治好法国痼疾的药品也应该适用于整个欧洲，因为法国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受着它的邻国的影响，它同大陆上其他民族之间有一种政治性的联系。

先生们，怎样来医治欧洲的政治机体呢？怎样来恢复大陆上的安宁呢？怎样来建立巩固的政治秩序呢？这就是我要同诸位一起研究的实质问题。这个研究对象非常广泛，以致无法一次把它讲完。但是，我希望我对你们所作的第一篇概述，能把一切极为重要的事件都包括无遗。这个概述足以指出前进的方向，而随着我们不断的前进，我们也就会越来越看清目标。

先生们，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也同其他被罗马军队所征服的民族一样，已经遭受过一次同欧洲目前所遭受的危机类似的社会危机。这第一次危机甚至更加残酷和可怕，因为在发生那次危机的时候，文明还不够发达，遭受这种危机的各民族还没有任何的共同原则。这次危机是在罗马帝国崩溃的时期发生的。

被这个帝国征服的一切民族，也染上了我在这封信的开头提到的三种政治病。

他们的政治机构腐朽了，不再适应于文明的状况，它们的活动违反了人民的利益。西塞罗说他无法设想两个卜者能够面面相觑

而不笑。元老院的权力被贬低了，罗马的骑士开始起着首要的作用，他们管理国家大事，而且在代管国库工作的时候，靠搜刮人民的办法而使自己大发横财。

利己主义支配了一切社会阶级；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感让位于贪得无厌的欲念。对公益毫不关心，人民不爱祖国，而一心希望游手好闲。

谁也不再研究任何有利于公益的问题。形而上学家成了政治教师，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一些具有次要意义的琐事。

最后，先生们，人类由于不善于应用既有的知识而直接走上了堕落的道路。人类当中最有教养的一部分人的不幸，由于蛮族的不断入侵而大大加深。这些蛮族的残酷性质，同罗马人的腐化堕落的习性合而为一了。

文明在这次跌倒之后是怎样爬起来的呢？有功于后世的一切进步秩序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这就是你们现在应当集中全力注意的历史事实，因为只有研究这些事实，才能使你们发现可以光荣地摆脱目前的政治危机的手段。

先生们，在罗马帝国衰落和瓦解时期，上帝给犹太的居民指出一项应当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和指导一切基督徒行为的道德原则。上帝说：**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互爱互助**。

上帝的话感动了我们的祖先，使他们受到了十分强烈的鼓舞，以至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只要听到神的启示，就把个人的事情放下，抛开已经开始的事业和拟出的计划，而去反对多神教的信仰，证明这种信仰的荒诞无稽，反对利己主义，证明这种欲念必然导致社会分裂，反对形而上学观念的倾向，证明这种观念只能教导

人们把空话当作事实，并妨碍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应当追求的目标上。

这些初期的基督徒的行为，在各个方面都是值得赞扬的：他们克服了人们当时遇到的一些巨大障碍；他们完成了当时提出的最艰巨任务；他们在勇敢、坚定和明智方面都超过了所有的古代英雄；他们编纂了教义问答，这曾是一切出版物中最有价值的书籍。我在这里所说的教义问答，决不是指目前耶稣会教士拿来教训人的那种教义问答，而是最初的教义问答。最初的教义问答，对于人类的行为作了合理的分析，把人的欲念分成两大类：对于他人有益的欲念和对于他人有害的欲念。

先生们，这些初期的基督徒的行为应当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就要进行的事业，就是要完成早由他们开始的事业。我们应负的光荣任务，就是在政治实践中采用他们只能以抽象形式提出的学说。我们的使命，就是把精神权力委托给那些最能教导他人学习有用东西的人，把世俗权力交给那些最关心维持和平和改善人民处境的有能力的人。

使我们的神圣事业获得成功的关键（我们永远也不应当忘掉的问题），就是要采取说服的办法，这是使我们能够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尽管有人会象迫害早期的基督徒那样迫害我们，我们也决不动手还击。

先生们，从基督教成立以来，我们的先驱者的著作总是抱着同一目的（建立人类的社会组织），具有同一特点（公正无私），但不一定具有同一形式。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他们走过的道路，同时看一看基督教社会的进步。

在基督教产生和最初存在时期，信奉基督教的国家的绝大多数居民都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以致不能想到废除奴隶制的问题。因此，博爱者的政治工作，在这个时期是非常有限的，而世俗权力在这种条件下必然具有十分专横的性质。

你们的先驱者的第一项任务，在他们说服了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的精神权力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完成。基督教的精神权力负责向人们灌输神的道德的问题。不管地位高低，人人都应当服从和遵守这种道德。

在取得这一成就之后，博爱者旨在直接建立社会组织的活动的热情，当然减少了，因为怀有大慈大悲欲念的博爱者，也要服从于支配着一切人的欲念的规律。根据这种规律，这些人只有当他们面对着明确的目的的时候，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全部能力；各种危险只会提高他们的热情和干劲，但是在社会所需要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的时候，就不应当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于是，基督教社会的第二个时期在五世纪从君士坦丁大帝领洗以后开始，这个时期一直继续到十三世纪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为止。

在这第二个时期，基督徒进行了两种活动：有些人致力于保护社会的完整；另一些人致力于组织社会。

撒克逊人、萨拉森人和诺尔曼人相继进攻基督教社会。如果这些热中于侵略的部族完全实现了自己的计划，那末基督教至少要消失许多世纪。在这个时期，博爱者不得不献身于军事工作，他们也这样做了。因为不能同时进行两种工作，所以他们把进行道德教育和组织社会的工作委托给僧侣阶级，也就是委托给以此为

职业的雇佣人员。由此必然产生而且事实上也真的产生了如下的结果:战争打得很好,而赋予基督教社会的社会组织,并没有成为自由的组织。

这一时期的工作,至今仍没有受到好评。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大吵大嚷地指责十字军东征,但是他们大错而特错了。罗马人想驱逐迦太基人,就向迦太基人发动了进攻。如果十字军不向萨拉森人开战,不长期进行战争,萨拉森人就会不断地进攻欧洲。这个民族狂热地迷信穆罕默德,使它在很多世纪未能接受基督教的道德。

应当惋惜的是,博爱者没有亲自组织基督教社会,因为这个组织可以留下他们的公正无私的烙痕;但是我要重复一句,这一点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在这一整个时期,他们所从事的活动都是为保卫社会所必要的。

其次,尽管基督教社会的组织还不够完善,尽管基督教社会里还泛滥着僧侣阶级固有的贪欲,但是十三世纪基督教社会仍然高于以前存在过的一切人类社会。信奉基督教的政治社会之间的联系,比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任何时期都更为巩固。

我现在来回顾一下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由十三世纪开始,到1789年结束。

在第三个时期,发生了三件性质不同的大事,它们都值得你们注意。

当基督教徒结束了反对撒克逊人、萨拉森人和诺尔曼人的长期战争以后,当他们在同这些他们认为唯一可怕的民族进行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以后,他们交由世俗权力治理

的社会组织，已经与他们不相适应了。这个组织本质上具有军事性质，而他们所需要的却是和平机构，他们现在应当献身于和平运动。

由于僧侣阶级到处传教，欧洲的全体居民都信奉了基督教，接受了一切民族和一切人都应当促进人类的共同幸福的原则。从此以后，精神权力需要减少他们的代表人数，以便减轻人民的负担。精神权力主要应当研究和改进实证科学，教导人们学习从事和平工作的有用知识。

这个时期的博爱者深刻地感觉到这些真理，并从十三世纪末开始，一方面献身于研究支配各种现象的规律的工作，另一方面致力于实业活动，通过这种活动生产了物质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需要。

基督徒在基督教第三个时期中从事的最有益活动就是如此。

在这一整个时期里，贵族和僧侣阶级几乎完全去保卫他们从人民那里取得的权力，但是由于情况已经变化，行使这种权力对于社会却是害多益少。我想请你们注意的第二类活动的内容就是如此。

虽然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不断加强自卫，并且具有自卫的强大手段，但在这一时期，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仍然不断衰落。这再一次证明上帝为什么要让有害于人类的社会机构灭亡的原因。

这一时期的引人注目的第三件事，是形成了第三种政治权力，即建立了司法权。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三类活动，便是法学家的活动。

法学家研究各种法律的内容。因此，他们创造了教会法、公

法、封建法、刑法和民法，等等。当然，他们的活动是有功劳的，但是也不能避而不谈他们受到一个根本缺陷的损害。由于他们是在主要的机构已经腐朽和不再适应于社会需要的时候进行活动的，是在这些主要机构中非常活跃的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代表们享有依法不属于他们的权力的时候进行活动的，所以才出现了这种缺陷。

我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研究这第三个时期的问题，而应当开始研究第四个时期了。

但是，在开始讨论问题的本质以前，我希望你们注意这个时期有一个特点，我们认为这个特点使这个时期具有了比其他任何时期都重要得多的意义。这个时期最使我们感到兴趣，只有它同我们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先生们，17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是第四个时期的序幕。实际上，这一时期现在才刚刚开始。它是诞生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以及德国的一部分已发生的变化在欧洲的大部分民族中间掀起了改革社会的运动的时候。

法国不能单独进行改革，它没有自己特有的道德体系。它只是欧洲社会的一个成员，它和邻国在政治原则上自有它们的共同性。简而言之，法国革命的最重要的道德后果，就是它引起了人们产生改善社会的愿望，目前这个愿望已经遍及整个欧洲。

其次，我打算同你们谈一谈未来，以便请你们严格地而不要轻率地判断我的思想。在这封信的开头，我曾拿目前的社会状况同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的社会状况作过比较。后来，我又扼要地叙述了从基督教成立直到目前的文明进程。这些观点当然非常重要，

甚至具有两种不同的价值，但这对我们来说关系不大。你们一方面应当把它们看成是准备性见解；另一方面应当把它们看成是我要讨论的问题的论据。我采用比较法，为的是吸引你们的注意；我对你们进行扼要的叙述，为的是使你们能够用正确的观点来判断我的论点。

对你们说来最重要的问题，你们最渴望知道的问题，我打算向你们说明的问题，就是关于未来将会发生什么的问题。好吧，诸位先生，我就来对这个问题作一个十分明确的解释。我现在就来说明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将由谁来完成，以及将怎样完成等问题。

先生们，我将依次说明上述三个问题，并分别回答其中的每个问题。在每一个回答当中，我都要引用我的观点所依据的论断。

第一个问题　在基督教的第四个时期将要发生哪些主要的政治变革？

回答　我认为在这第四个时期将要组成新的精神权力和新的世俗权力。

我认为新的精神权力要由欧洲现有的一切科学院和有资格进入这种学术团体的一切人员构成。我认为在形成这个核心以后，构成这一核心的人员将会自行组织起来。我觉得这个新的精神权力应受托管理社会教育和国民教育工作。我认为纯粹的福音道德将成为新的社会教育的基础，然后根据财产状况不同的儿童的在学时间，大力普及实证知识。最后，我认为在一切公社中应派遣或多或少的新的精神权力的代表，这些分驻在公社的学者的主要任务，是激发公社的精神工作人员从事公益活动的热情。

我认为，应当委托领导和平工作的人来管理欧洲各族人民的世俗工作。将来要有很多人参加和平工作。我深信，由于统治者本人的切身利害关系，这种管理将首先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然后尽量减少税收，并通过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来分配收入。

我的观点所根据的三个论断如下：

一、社会组织的这些新基础完全符合绝大多数居民的利益，所以应当把它们看成是从神的道德原则引导出来的一般政治结论。这个原则是：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互爱互助。

可见，神的意志是：在目前的文明条件下，基督教社会应按照上述方式组织起来；

二、如果从博爱的观点立论，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我们就应当说基督教社会的这种宪制是废除奴隶制和实证科学压倒神学与形而上学其他部门的自然后果和直接结果；

三、即使只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也看得很清楚，文明的进步一定要导致这种结果，因为精神和物质的力量现在都掌握在研究实证科学的人手里，掌握在从事和管理实业活动的人手里。只是由于旧习惯作祟，社会才受到贵族和神学家的压迫。但是经验证明，当社会的原有习惯同社会的利益矛盾，而社会找到了满足自己需要的新途径的时候，社会就会永远摆脱原有习惯的影响。毫无疑问，社会也将抛弃贵族和僧侣阶级的统治；毫无疑问，政治权力将过渡到这样一些人手里：即现在已经拥有几乎全部社会力量、每天支配着社会的物力、创造着社会的财力并不断增加自己的智力的人的手里。

第二个问题 什么力量可以促成这种变革，什么人能够指导

这种力量呢?

回答　道德感的力量将会促成这种变革,而相信一切政治原则都必然导源于神赐给人的一般原则,则是这种力量的主要动因。

博爱者将会指导这种力量,他们这时所处的地位,将同他们在基督教成立时期的地位一样,即作为神的直接代理人。

博爱者曾以他们的第一次共同努力迫使尘世的统治者接受了神的道德原则,现在博爱之心将以第二次共同努力迫使贵族和神学家服从由这个原则引导出来的主要结论。

我的这个见解的基础,首先在于我们人人都知道的基督教成立以来所发生的事件。

社会的最低等级,对于接受这种信仰,无疑地是抱着最积极、最关心的态度的。这种学说也曾使在罗马人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得到很多好处,所以居民中这两部分数目最多的人,似乎应全力支持新的道德原则,可是事态的进展,却完全走入另一个方向。在世人当中,使徒保罗①是基督教的主要奠基人,他是罗马人;波利欧克特②是初期的殉教者之一,他属于上层社会阶级;人民的下层阶级经常迫害初期的传教者。

在政治改革事业中,对于社会福利的热烈的向往,比可以从改革中获得最大好处的那些阶级的自私心具有大得多的意义,这就是被文明的整个发展过程所证实的真理。一句话,经验业已证明,

① 使徒保罗(Apostle Paul),据说《新约》中的《罗马书》等篇是他所著。保罗的著作对基督教在希腊罗马世界的传播和基督教成为普遍信仰的世界宗教,起过很大的作用。——译者注

② 波利欧克特(Polyeucte)是瓦列里亚努斯皇帝在位时期(254—260年)的一个被尊为“圣者”的罗马军人,因在亚美尼亚传播基督教和反对异教,而被拷打致死。——译者注

最热心建立新制度的人，并不是与这种制度的建立最有利害关系的人。

先生们,除了举这个很老的事实来证明我的见解以外,我想再举一个崭新的而且现在还没有最后完结的事实。

六年以来,我怀着满腔热情力图向学者和实业家证明:

第一,现在,社会上出现建立一个最有利于科学进步和实业繁荣的组织的明显意向;

第二,为了建立最有利于科学进步和实业繁荣的社会组织,必须把精神权力交给学者,而把世俗权力交给实业家;

第三,学者和实业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和需要组织社会,因为学者具有智力,而实业家则拥有物力。

我由于进行这项工作,曾与很多学者和实业家接触,这使我有机会和办法去研究他们的观点和意向。

我的观察使我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我认为在道德方面可以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感情重于思想的人;另一类是感情服从理性判断的人。一些人把改善自己的命运的希望同消灭各种弊端的意向结合起来;另一些人把依靠这些弊端牟利作为自己社会活动的专门目的。简而言之，我认为学者和实业家同其他人一样,也应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博爱者，另一类是利己主义分子。

其次,看到博爱者和利己主义分子的人数,是随着社会所处的一般状况而相对增减的。在目前条件下，利己主义分子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但是与此相反，博爱者也日益愿意团结自己的力量和积极从事活动。

我还发现，人们所献身的职业，对于他们接受博爱者的道德或利己主义观点是大有影响的。终日同人们当中的大多数往来的人，而主要是来自人民当中的人，比较倾向于博爱；而由于职业的性质而单独生活或经常同富人阶级往来的人，除非他们得天独厚，就都倾向于利己主义。

因此，我有理由从亲身经验和历史事实中得出如下的结论：博爱者应当激发贵族和僧侣阶级，使他们服从由神的道德原则引导出来的一般政治结论。根据这个结论，社会的组织应当以替最大多数人谋福利为目的。

第三个问题　博爱者要用什么手段来改造社会呢？

回答　博爱者可以运用的唯一手段就是宣传：无论是口头宣传，还是书面宣传，都可以。他们要向各国的国王进谏，为了尽到自己的基督徒的职责，为了维护自己的继承权万世一统，君主们应当让实证科学的学者领导社会教育和改进科学理论的工作，让最具有管理才能的实业家关心管理世俗工作。

博爱者要向各族人民宣传，让他们齐心协力地向君主表示自己的如下愿望：把精神和世俗方面的公共事务的领导权完全交给最能按照共同利益领导这项工作和最关心这项工作朝这方面发展的阶级。

博爱者必须充分耐心地继续进行口头宣传和书面宣传，以便唤起君主们（依靠他们内心的信服，或在强大的舆论的影响下）在社会组织方面实行文明的进步、全体居民的共同利益和绝大多数人的直接切身利益所要求的改革。

一句话，博爱者将采用的唯一手段就是宣传，而这种宣传的唯

一目的，则是唤起君主利用人民赋与他们的权力来实现势在必行的政治改革。

先生们，我认为博爱者应当利用王权来改造社会的见解，是以下述三个论点为根据的。

首先，正在使基督教组织趋于完善的博爱者，当然也应当怀有曾经鼓舞过基督教奠基人的那种精神；所以他们也要发挥同样的特点，也要沿着同样的道路前进，也要使用同样的手段。

但是，有一个事实人们都十分清楚，它从来没有引起过人们的任何怀疑，这就是早期的基督徒只用说服办法影响君主。他们没有同君主斗争，只是一心呼吁君主信奉他们的信仰；结果，他们有的利用直接影响君主的信念的办法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有的利用以对君主最有权威力量的舆论来影响君主的办法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我根据这个事实得出结论：现代的博爱者决不希望推翻君主的宝座；恰恰相反，他们极想使王权建立一个为改进基督教组织所必要的制度。

其次我要说，如果博爱者打算攻击王权，将是极其愚蠢的，因为他们的这种行动不会得到任何成功，何况法国和甚至整个欧洲的舆论都坚决表示拥护王权。

最近在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① 发生的政治运动，都是由

① 指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在 1820 年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

西班牙的这次革命由 1820 年 1 月 1 日的军事政变揭开序幕，其目的是反对国王斐迪南七世的反动统治。国王被迫宣布实施自由主义的 1812 年《卡迪斯宪法》，但在 1823 年，这次革命的一切果实就全部丧失殆尽。法国经神圣同盟同意，派遣十万大军进驻西班牙，镇压自由主义运动，斐迪南七世趁机废除这部宪法，在国内实行极端反动的统治。

继西班牙之后，葡萄牙也爆发了革命，革命的主力仍然是军人。当时，葡萄牙被英

这些革命初期担当主角的军人发起的，但是世袭的王权仍然受到完全的尊重。我们看到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那不勒斯人都主动表示拥护原来的王朝，只是推翻了违反民族利益的专制政府。

最后，我想谈一谈我亲自看到的法国舆论界对王权所持的态度。我要说，既然我要为实证科学学者和实业家的事业效劳，那末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我认为必须十分明确地宣布：世袭的王权能够为学者和实业家规定新的社会地位，并消除贵族和僧侣阶级的政治影响。

大多数学者和实业家今天所以对我注意，显然是因为我在最近几部著作里，曾经竭力证明君主、学者和实业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利益（具有真正的基督精神，因为它在为人数最多的阶级造福）永远同贵族和僧侣阶级的愿望对立。

一句话，学者和实业界领袖必然希望改革事物的现状，但他们想使这一改革成为神的伟大道德的产物。他们想使这一改革进行得合理合法，即按照国王的意愿来实行。

先生们，我认为在这封信中我已十分详细地指出将要发生什么，为什么发生和怎样发生。现在我应当从理论转向行动。我要向国王提出我对他的群臣的施政的几点明确意见。我要向圣上指明，陛下的群臣的行为与王权和民族的利益发生抵触，完全敌视神

国占领，国王约翰六世正在巴西。革命运动的结果，是制定了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1820年）。国王由巴西回国后，在国会的要求下，宣誓效忠新的宪法。但不久以后，国王便违背了自己的誓言，通过君主政体和教权主义的拥护者的一系列阴谋活动废除了宪法。

1820年在那不勒斯爆发的革命，其性质和结局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革命相同。1820年7月，以军队为主力的烧炭党人起义，迫使国王斐迪南二世宣誓效忠于自由主义的宪法；但在第二年，就在斐迪南二世亲自参加下，引进奥地利军队把革命运动扑灭下去，接着在国内实行极端黑暗的反动统治。——译者注

赐与人的道德原则。我要直言禀奏圣上，什么是能够建立使爱好和平的善良的人感到满意的持久秩序的唯一手段。

先生们，请你们支持我，而为了给我以应有的支持，请你们在所住地区开始履行自己的任务。请你们向人民和君主宣传：恢复安宁的唯一手段，就是把精神权力交给最拥有实证知识的人，把世俗事务的管理交给最关心维护和平和最能办理政务的人。

在目前的文明状况下，这种活动不会使你们遇到巨大的危险。但是，即使现在我们会受到早期的基督徒所受过的那种迫害，这也不应当妨害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和实现我们的使命。最勇敢和最无私的人，历来是而且永远是领导社会的人。军人的英勇精神在愚昧[1]和混乱时代占过首要地位，而市民的英勇精神则会恢复秩序和促进文明的发展。

博爱者在基督教初期的活动，是唤起尘世的有权有势的人接受神的伟大道德原则。我们的使命是继续他们的事业，也就是唤起欧洲各国的君主和邦君，使他们的政策符合这一原则，用最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方法把社会组织起来。

我们应当尽快开始工作。我们可以指望得到神的庇护，得到真正虔诚的信士、真正忠于国王和民族的人士的协助，以及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

如果你们稍微注意一下法国议会的政治活动，看一看下议院的行动，想一想二月七日会议上发生的事件，你们就会看到对立的

① 在我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不仅指绝对愚昧状态，而且也指相对愚昧时代，即也指社会在希望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但不知道怎样建立这种制度时所处的状态。从 1789 年开始，我们就身受这种愚昧状态的折磨，可是军人们却在利用这一点使自己起主导的作用，而不顾文明已经非常进步了。

两党的领袖都已经发出警报；你们也会看到你们应当开始行动的时刻终于到来；你们还会看到：如果你们再迟迟不表示自己的意见，你们的沉默就要为野心家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使社会遭到利己主义和统治欲可能给它带来的一切灾祸。

三色帽徽的拥护者和白色帽徽的拥护者① 互不信任，彼此以夸夸其谈的说法，来掩饰自己的真正意图。如果发生斗争，那将在谁和谁之间发生呢？显而易见，将在旧军和新军之间，即在旧贵族和波拿巴所扶植的新贵族之间，也就是在拿破仑时代执掌大权的人和受国王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人之间发生。

如果白色帽徽被打败，法国将受拿破仑的贵族和武夫的统治；反之，法国人则将重新受旧封建贵族的压迫。这两种前途都不为人民所欢迎，而且也不符合博爱者的意愿。

信号已经发出，时机已经来到，我们应当发挥我们的一切能力了。我们要重申神的伟大道德原则，这项原则是既适用于法国人又适用于欧洲其他一切民族的唯一集合口号。我们要勇敢地从这个原则中得出共同结论，并大声疾呼：应当把政权从军人手中夺过来，交给那些最爱好和平、最能生产和最能管理行政工作的人。除了军人、贵族和神学家，我们再没有其他敌人；我们可以战胜他们的唯一手段，就是证明他们的一切政治原则都同国王和民族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背道而驰。

先生们，在这封信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请你们回忆一下早期的基督徒的传教活动；我们要仿效他们；谁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就

① 三色（蓝、红、白）帽徽流行于1789年法国革命时期，白色帽徽是王权的标志。——译者注

不必追究他们的既往；谁主张精神权力应当交给最有教养的人，而世俗权力则应交给最关心维护和平和国内安宁并最能管理行政工作的公民，我们就应当把他们看成兄弟。

先生们，极端保王党、雅各宾党或波拿巴派当中的某些十分杰出的人，或许就是被上帝选来建立新基督教、即建立完全摆脱各种迷信的最完美的基督教的人。迷信曾使基督教的僧侣阶级沉缅于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我们的祖先则由于无知而把迷信当作了信仰。一句话，无论是道德上的异教徒，还是政治上的异教徒，只要他们真心诚意地放弃自己的异教观念，为建立真正的学说而热心工作，我们就准许他们加入我们的行列。

明哲保身的人非常乐意支持既有的秩序，他们有时也能略微改变这种秩序，但却不具备实现重大改革所需的那种魄力。早期的基督徒都是一些热情洋溢的人，新基督教徒也应当这样；但是热情的人，由于他们的性格，也能犯重大的错误。比如，使徒保罗最初就是基督教的最坚决的敌人。此致

敬礼！

你们的最忠实最顺从的仆人

昂利·圣西门鞠躬

黎塞留路 34 号

再启：

我奉劝诸位仔细阅读这封信前面的几封信，你们在那些信里将会找到用来反对各种诡辩的必要论据，同时也会看到若干事实可以作为论据，以证明欧洲人要想结束因文化的进步而引起的政治危机，唯一的手段就是把政权从神学家、贵族、军人和形而上学

家的手中完全剥夺过来。

我也请诸位读一读拙著《组织者》①。这两部著作当然还远远没有达到它们应该达到的地步，还远远不如今后就这个问题将要写的著作。但在目前来说，它们仍然是本着这封信的观点来阐述所讨论的问题的唯一两部著作。

先生们，我建议诸位读一下普拉德特先生所著《论欧洲和美洲》②。作者在这部书里，概述了他以前的所有著作，高瞻远瞩地论证了事实。他并未开出治疗的处方，但他以明察秋毫的眼光诊断出了我们所患的社会病的性质。

（徐仲年　董果良译）

① 我们从《组织者》中选译了两篇文章，参看本书第235—249页。——译者注

② 普拉德特，多米尼克（Pradt, Dominiqae　1759—1837年），法国神甫出身的外交官，也是一个著述颇多的反动政论家，曾代表僧侣阶级出席1789年的三级会议。——译者注